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

ISBN 7-5004-5240-3
9 787500 452409 >
ISBN 7-5004-5240-3　定价：35.00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日] 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5-58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004-5240-3

Ⅰ.中… Ⅱ.①石…②袁… Ⅲ.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Ⅳ.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294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 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4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一、除特别注明外，引文中的（　）为原注，［　］为引用者注。

二、注释说明所用罗马字代号《A》—《G》，分别表示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如下档案目录。

《A》：《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本邦人之部　主义者名簿》分类项目 4—3—2—1—1—1

《B》：《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外国人之部　支那国人》分类项目 4—3—2—1—2—1

《C》：《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社会运动状况　支那》分类项目 4—3—2—1—4—5

《D》：《要视察外国人之举动关系杂纂　支那国人之部》分类项目 4—3—1—2—5

《E》：《外国人退去处分关系杂件　英国人》分类项目 4—2—6—21—3

《F》：《外国人退去处分关系杂件　支那国人》分类项目 4—2—6—21—8

《G》：《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杂之部》分类项目 3—10—5—3—6

三、收录于各国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资料集（俄文版：*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 I.（1920—1925），Москва，1994；Т. II.（1926—1927），Москва，1996；Т.

III. (1927—1931), Москва, 1999; 德文版: *RKP* (*B*), *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 Dokumente*. Bandl. (1920—1925), Munchen, 1996; Band2. (1926—1927), Munster, 1998; 汉语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 1 卷, (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的文件)的文件, 因其文件号码相同, 注释说明中只标出文件号码, 如〈文件○〉。

序　章

第一节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接触

1921年4月，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上海。他当时到过的地方，经过其后80年的沧桑，很多已经旧踪难觅，现在却只有一处复原成当时的样子加以保存。这处建筑，现在的门牌号是卢湾区兴业路76号，旧时是法租界望志路（Rue Wantz）106号。[1] 不过，对这处建筑加以复原并非是为了纪念芥川造访上海的足迹，现在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门前的铭牌上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字样。也就是说，在芥川来到该处不久后，就在他所看到的那个地方，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

当然，芥川并非因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将要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来，而是为了会晤“‘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的“李人杰”。李人杰，原名李书诗，通常称李汉俊，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成立时的成员之一（脱离中共后，1927年遭军阀逮捕杀害）。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芥川来访三个月后，即1921年7月末，就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了。芥川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会晤了中共领导人，实在是一种巧合。

据推测，芥川和李汉俊是4月25日前后晤面的，芥川《上海游记》里有《李人杰氏》一节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与村田［《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同访李人杰氏。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数分钟后，李人杰氏来。［以上为会见时芥川所作笔记］

与芥川见过面的李汉俊

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会客室内通向二层的梯子垂落于室内一角，故有人下楼，客人先见其足。李人杰氏出现时，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脚上的中国鞋。[3]

“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芥川对李汉俊居处的描写，和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完全

一样。复原的大会会议室里，摆着长方桌和洋式坐椅，也有通往二层的楼梯，同样简朴得没有任何令人悦目的饰物。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恐怕就是在这间芥川走后没有加以任何改变的房子里召开的。

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这样记载道：

> 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李氏又云，要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蹙眉。[4]

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李汉俊，在此次会晤两个月之后，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此时他正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其笔锋犀利、逻辑严谨、感觉敏锐，恰如芥川对他相貌的描述一样。这一点，从初期共产主义者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5]也可得到证实。正是他对芥川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所谓“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是指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即成为一副空架子，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的革命，而不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私相授受或互相争夺；自己正是为了宣传革命而面对“万里荒芜”大声疾呼。同时表达了“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会见快结束时，芥川问：“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

“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可芥川没有记下面对如此回答自己作何感想；不过芥川对李汉俊其人颇有好感。芥川4月30日从上海寄给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在上海见到的名士中，“李人杰才华出众”。[6] 当然，这时的芥川不会想到，这位同龄人也将和自己同一年（1927年）夭折。

第二节 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李汉俊对芥川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态度，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中国的民众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了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但是，要使其按照明确的方针（比如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社会革命，从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李汉俊向芥川喻之为“万里荒芜”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缺少满足中国知识分子求知欲的书籍和杂志。其次，作为社会革命基础的工人运动，尽管不断发生工潮，但其实际性质仍然属于同乡意识、同业公会的范畴。另外，中国究竟有没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筹备成立共产党的李汉俊等人思索的问题之一。

尽管如此，困难和曲折最后都被克服，在20世纪20年代伊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党在历尽曲折之后，在1949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政党，这些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这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以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有二十多部，至于发表文章则达两千五百多篇以上[7]，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

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还要再写这部书呢？那是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比如，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各种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等）到底是何种组织？何时成立？相互间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目前还仅是根据回忆录等进行各种猜测。因为每一个事件都应经过研究考证，在描述中共成立史的时候，更必须加以细致的、有时是琐碎的甄别。本书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考证，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8] 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另外，据信 1919 年全国已经有约二百万产业工人（其中上海有约五十万人）。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成立相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2 年，即中共“一大”之后一年召开的。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 1921 年 5 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约两个月。如果共产党的成立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共产党在东亚成立的顺序应该是日本、中国、朝鲜，但是，为什么事实却恰恰相反呢？

如果说，这种“时差”，仅仅是可以忽略的“极微误差”，共产党在这三个国家几乎是同时成立的，那么，就必须解释之所以同时成立的原因。这个原因，不用说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是造成共产党按完全相反

的时间顺序在日本、中国、朝鲜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既然共产党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成立，是以共产国际为纽带而密切相关的，那么就不能够将其分开来看。换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能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样一种狭窄的观点来考察，而必须从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宽阔视野来把握。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探讨中共成立的必要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而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何时从何地传来的呢？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 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受俄国革命鼓舞而参加共产党的当事者的感性认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俄国革命成功而一下子就传进中国的。当时的毛泽东恐怕也知道，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上述李汉俊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这些都表明，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10]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叙述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是贯穿于中国和日本及世界之间的“思想链条”的历史。

共产党成立之前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在中国也与日本一样，都是获得“外来知识”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外来知识”即西方思想中，又尤其晦涩难懂，所以，不难想像即使有

日文文献的帮助，接受起来也有很多困难。与李汉俊一样通过日文文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在1919年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转述一位德国人的话说：“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11] 所以，在探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不但应该充分考虑到知识本身固有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尽管存在这样的距离，所谓“共产党”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为基础。

但是，成立共产党必须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共产党成立时，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平当然各不相同。就三个国家来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成熟，许多青年与其说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为了从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而加入共产党，这在高丽共产党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同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里面，许多党员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同时，也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大会（1919年）上并没有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它是在欧洲的革命运动趋向低潮之后才注意到亚洲的，而重点提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则是在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我们在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时必定要提及的列宁与罗易（M. N. Roy）围绕“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次大会上。虽然罗易关于亚洲的革命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并没有写进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去，但确实是共产国际认识到亚洲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于因西伯利亚干涉军的

渐次撤退和远东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衰退而逐渐重新掌握远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1919 年发生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足以使其把目光投向东方。于是，1920 年 9 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宣言》里的有名语句被重新阐发，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13]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远东的工作，从 1920 年前后，以派遣使者的形式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俄国国内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也成为了工作对象。高丽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从这点讲，我们不能忘记，与陆路相连的中国接触，显然要比与日本接触容易得多（就日本来讲，还要考虑到日本警察的严密防范）。

不言而喻，中共成立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是中共的成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此前虽然也有不少旨在弄清这种关系的研究，但是资料本身十分匮乏，加上这些资料中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被长期封存，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多种语言的资料分散在中国以外，这些资料既互相交错，又有不少互相矛盾之处，故而要断定一个个事实殊非易事。近年来，所谓莫斯科档案大都得到解密，从前只被少数苏联学者垄断并部分引用的文件资料，现在大都可以读到。[14]而且，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大型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5]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所占分量并不多。比如，1921 年 1 月至翌年初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曾经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最重要机关，但其活动的具体状况迄今是个谜团。同样，尽管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时期

派到中国的人员中有俄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朝鲜人等，但是，此前除了关于魏金斯基（G. Voitinsky）、斯内夫利特（H. Sneevliet，一名马林 Maring，本书采用其一般称呼“马林”）等有比较完整的研究[16]以外，其他出现在回忆录中的“密使”们，至今连其生平也不得而知。

另外，1956年至翌年，当时的苏共中央曾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17]交还给了中国共产党，该档案现保存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内，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来往文件等约两万多件，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只公开了几份。现在，该档案馆不但外国学者不得涉足，连对中国学者也仍然紧闭门户。[18]在这种状况下，要弄清初期的中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本书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力图再现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员交往。

这里顺便还要提一下如何对待回忆录的问题。由于初期的共产党是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因而第一手资料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回忆录在资料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很大。例如，中国出版的共产党成立时期的综合性资料集《“一大”前后》（共三册）[19]中，回忆录占到了一半以上的分量。这些回忆录中当然难免有记述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因此，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要通过它们来确定具体的时期或事件，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些回忆录是在其他回忆录的基础上润色而成，故此，不少情况下并不能因为其叙事详细而加以轻信。关于如何对待中共成立时期的资料，日本学者森时彦早就指出过分依据回忆录的危险性，他主张对待回忆录要先进行一番彻底清算，然后再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重新建构党史。[20]这个主张，对在有关党史的资料已经相对大量公开的现在，仍然具有说服力。本书中，有的部分当然不得不依据回忆录，但在论述时，将努力根据已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对每个回忆录加以引证和纠正。

看看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国内的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基础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试想，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纵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得再广泛，或者苏俄和共产国际再做工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因此，以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为中心的激进知识分子们，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最初的中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日本、欧洲等地方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们结合为共产主义组织的过程各不相同。有的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在介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感到有成立党的必要，有的是从事学生运动的，甚至有的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初期党员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例如，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中国人中，到1949年还在人世的有六人，但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除了毛泽东、董必武之外的11个人中，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就义的三人，病逝者一人，而脱党的有七人，即超过出席“一大”人数的一半。[21]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收集党史资料，对早期参与党的工作的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调查取证，结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有关创建时期的地方组织的杂志、回忆录等资料。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数量对于一个50余人的小组织来讲极不相衬。在中国，中共创建史研究主要指对这些地方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史的研究，和早期领导人的人物研究。

本书有关中共创建时期地方组织的记述，许多地方依据中国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观点整理出的这类组织史，其对象只覆盖了与后来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因而有遗漏，“异端”或“冒牌”共产党——如果把与现在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称做“正统”的话——的存在，就是一个例子。在当时，尽管“共产主义”一词的内涵不是很明确，但却强烈地吸引着部分知识分子，而“共产党”的名称也还不是专指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各地存在许多所谓“冒牌”共

产党。这一事实却几乎不为人知。此类“冒牌”共产党之一是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物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不久后因未能赢得正统地位而烟消云散。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苏俄、日本及朝鲜都有些进步分子将他们当做中国的“共产党”。“冒牌”共产党涌现的背景之一是，苏俄方面对中国的工作直到某个时期以前没有统一，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从这点讲，对待各地的各种共产主义组织，都应该从共产国际与东亚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观点考察。补充一点说，一部分领导人后来走向“冒牌”共产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是1919年6月结成的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也不外是五四学生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中共的创立开辟了道路——的成果之一。由此可知，为早期中共提供了许多人才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创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一定就是一条直线。

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矛盾和内心世界，则更加复杂。比如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向布尔什维克的转变，上述李汉俊等激进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悲壮、孤独的情怀等等。本书中特以施存统为例，对其思想和活动进行勾画。施存统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也是由无政府主义转为布尔什维克的青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日本警方才留下了他的资料）。他于1921年末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是参与创建中共的党员中最早被录下口供的人。所以，寻觅他当时的事绩，不仅有助于了解加入共产党的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对考察中共成立的具体过程也大有帮助。

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少数知识分子于1920年开始的创建中共的进程，在1921年7月的“一大”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一大”文件记载，当时党员仅有53名。[22] 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要研究的是一个前后时间仅两年左右、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历史现象。当然，后来的中共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质的方面，抑或在量的方面，都与创建时的中共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本书仍要对其进

行研究，概略讲来有三个原因。其一，历史现象或大或小，并不影响从学术的角度探求其全貌的好奇心。其二，后来的中共从未改变过党的名称，也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在谱系上，早期的共产党到底是其惟一的源头。因此，中共的创立正是“星星之火”，尽管开始时是弱小的，但到底是拥有6000万党员的巨大执政党的原点。

其三是基于对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20世纪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重要性的认识。所谓现代意义是指，由于国际间沟通和宣传媒体的发展，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互为因果、同时发生，而任何一个现象都不可能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其影响也都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这一点，政治上表现在包括对民众的影响大大增强，为了主义可以牺牲生命，为了主义可以杀人。意识形态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方面我们可以探讨其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继承性和隔绝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国一国历史的巨大时间跨度，即通过比较后来中共面貌变化的方式来考察。我们这样做时，就要思考前苏联的中共党史学者反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观之，中共是否是早产儿？当然，也可以采纳部分欧美学者曾经使用过的方式，以中共成立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不相称为由，认为中共的成立是苏俄强行输出革命的结果，而将其与后来毛泽东的中共（中国化的共产党）相对比。但是，本书不准备按时间轴进行那样的比较。因为，无论是不是早产儿，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事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里，共产党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中共的成立是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的表现。要把中共成立史从后人评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去，这就是本书的全部意图。

在对本书做了简略概括之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可以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也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

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本书各章将分别对此三要素进行探讨，尽管它们本身也是相互交错的，并且“天地人”的表述也稍嫌陈腐。

注释：

[1] 原建筑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Rue Admiral Bayle）交叉处，后门是从贝勒路树德里进去，故有时称贝勒路树德里3号。

[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找和确认中共“一大”会址的经过，请参阅沈之瑜《“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载《上海滩》1988年第10期；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3]《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47—48页。另有如下论文论述芥川龙之介与李汉俊在上海晤面，青柳达雄：《李人杰について——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中の人物［李人杰——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中的人物］》，《国文学——言语と文艺［国文学——语言与文艺］》第103号，1988年；单援朝：《上海の芥川龙之介——共产党の代表者李人杰との接触［芥川龙之介在上海——与共产党代表人物李人杰的接触］》，《日本の文学［日本的文学］》第8集，1990年；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每日新闻社1997年版等。

[4] 前引《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第48—49页。

[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页。《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赤色工会国际的报告（1923年5月31日）》（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 Leiden, 1991, p. 539，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6]《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1卷，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47—148页。据此函来看，把李汉俊介绍给芥川的是泽村幸夫。关于泽村幸夫，请参阅斯野修二《支那通について［中国通］》，《中国研究月报》第554号，1994年12月20日。斯野修二：《ある“支那通”の轨迹——泽村幸夫について［一位“中国通”的轨迹——关于泽村幸夫］》，《中国文学会纪要》第15号，1994年。

[7] 邵维正：《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拙稿《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曾庆榴、洪小夏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华星出版社2000年版。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

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关于此正式见解是否妥当，在中国国内也有若干不同意见。请参见王学启、张继昌《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3 期；曹仲彬、杜君：《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王学启、张继昌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等。

[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0—1471 页。

[10] 详细论述中国以日本为媒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著作之一是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方近代思想的接受与明治维新》，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99 年版；汉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1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李大钊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页。这段话源自日本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 1913 年版）第一篇、第八章《难解なるカ ル·マルクス［难解的卡尔·马克思］》开头部分。见后藤延子《李大钊とマルクス主义经济学［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 26 号，1992 年。

[12]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3 页。

[13]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64 页。目前可以见到的专论巴库大会的论文，只有伊藤秀一：《バクIの东方各民族大会について［关于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1 号，1972 年。

[14] 当然，并非全部莫斯科档案都已被开放。比如，即使现在利用频率最高的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罗加斯皮］，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所保存的文件，其中归在全宗 514（中国共产党）下的 1222 个卷宗，就因优先使用权归中国的理由，原则上不予开放。补注——现在，全宗 514（中国共产党）档案基本上已开放了。

[15] 1994 年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正在陆续刊行原苏联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俄文版：*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 -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 I.（1920—1925），Москва，1994；Т. II.（1926—1927），Москва，1996；Т. III.（1927—1931），Москва，1999；德文版：*RKP（B），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Dokumente*. Band1.（1920—1925），Munchen，1996；Band2.（1926—1927），Munster，1998；汉语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 1 卷，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

［16］仅举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下。关于魏金斯基的有，В. И. Глунин, Григорий Войтинский,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 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1970（格卢宁：《格里戈里·魏金斯基》，《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关于马林的有，《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 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 Leiden, 1991；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17］关于这些档案的返还经过，请参阅裴桐《1956 年赴苏联接受档案追忆》，《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

［18］根据马贵凡：《赴苏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情况述略》（《中共党史通讯》1991 年第 16 期）记述，自苏联解体前的 1990 年至翌年，苏联又交还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也同样没有公开。

［1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三），人民出版社 1980　1984 年版。

［20］森时彦：《中国における勤工俭学运动研究の动向［中国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动向］》，《东洋史研究》40 卷 4 号，1982 年；森时彦：《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 80 号，1985 年。

［21］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人的传记，收于郑惠、张静如主编《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56 页。

目　录

序章…… (1)

第一节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接触…… (1)

第二节　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第一节　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思潮…… (1)

1. 知识与革命运动 …… (1)

2. 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与传播媒介 …… (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6)

1.《晨报副刊》与陈溥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6)

2. 陈溥贤与日本的革新运动 …… (12)

3.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 …… (16)

4. 李大钊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 (1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 (22)

1. 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22)

2. 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24)

3. 戴季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 (27)

4.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 …… (31)

5. 留日回国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35)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

——新的外来知识的出现 …… (39)

1.《新青年》杂志的变化 …… (39)

2.《共产党》杂志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文献 …… (45)
3. 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 (48)
4. 李大钊与布尔什维克文献 …… (51)
小结 …… (53)

第二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 (71)
第一节 鲜为人知的“密使” …… (71)
1. 苏俄接近远东 …… (71)
2. 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一)
——布尔特曼 …… (74)
3. 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二)
——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 …… (76)
4. 俄西伯利亚、远东的对华工作机关 …… (80)
第二节 魏金斯基的活动 …… (83)
1. 魏金斯基一行来华 …… (83)
2. 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 …… (89)
3. 魏金斯基的身份和活动据点 …… (93)
4. 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 …… (96)
5. 使者相继来华 …… (107)
第三节 中国“伪”共产党始末 …… (109)
1. 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 …… (109)
2. 1921 年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 (112)
3. 大同党
——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 …… (115)
4. 苏俄与大同党的工作 …… (118)
5. 姚作宾与全国学联
——后“五四”的学生运动 …… (125)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156)
第一节 上海的建党活动 …… (156)

1. 对中共发起组形成的研究 …… (156)
2. 中共发起组的几个侧面（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共产党” …… (160)
3. 中共发起组的几个侧面（二）
——“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 (167)
4. 中共发起组的活动 …… (171)
第二节　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 (175)
1.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 (175)
2.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 (180)
3. 武汉、长沙、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 (18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致共产国际的
报告》 …… (195)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
获得的中国情报 …… (195)
2.《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201)
3. 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
报告 …… (206)
4. “中共使者”张太雷 …… (209)
5.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 …… (214)
6.《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的起草者 …… (219)
7.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 …… (22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245)
第一节　召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 (245)
1. 马林、尼科尔斯基来华 …… (245)
2. 大会的召集 …… (251)
第二节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 (255)

1. 时增时减的“一大”出席者人数
——回忆录是如何写成的 …… (255)
2. 大会代表 …… (264)
3. 会期 …… (266)
4. 大会会场被搜查之谜 …… (271)
5. 大会讨论的内容 …… (273)
第三节 年轻的党员们
——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 …… (279)
1. “非孝”青年 …… (279)
2. 摸索中国改造之路
——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284)
3. 留日生活 …… (285)
4. 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 (291)
5. 东京被捕以及被驱逐出境 …… (297)

附录一 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 …… (326)
附录二 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 …… (340)
附录三 施存统口供 …… (368)

参考文献目录 …… (372)
后记 …… (40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思潮

1. 知识与革命运动

众所周知，1919 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一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早在清末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主要对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国内通常见到的刊物上进行宣传，则不得不等到 1919 年。[1] 1919 年以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进入中国，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在描述“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状况时这样说：

> 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2]

马克思主义以大城市为中心传播，不久在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酝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许多西方新思想一样，首先是必须通过文字即书籍学习的东西。比如，在研究早期毛泽东思想时，很多学者会考察他在何时读过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书籍。[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共产主

义运动中，获得“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从这种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可称之为“知识革命”的浪潮。而这个“知识革命”可以说带有两层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五四时期混沌不清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轴尚未出现，因而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例如，李大钊常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1919—1920年之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而简明易懂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变为口语，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

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称为“知识革命”的另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换言之，有理论根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E.H.卡尔（E. H. Carr）早就称俄国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为“目的意识性”或“自我意识性”，并指出这是与其前的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不同之处。[4] 亦

即，从“俄国革命是有意识地计划并实行的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这句话可知，所谓19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事先即已充分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程序，再依据此程序发动起来的，在这一点上，与其前的革命运动大不相同。既然存在发动革命之前必须理解的思想、主义这种“知识”，那么，抛却这种“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俄国革命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同样“并非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由计划好未来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是要进行革命、而是由对进行革命的各种可能条件做了分析和准备的知识分子”[5] 主动开始的。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也不是经济学说发展的必然归结，更不是以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契机的。换句话说，完全是“学习”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被予以充分考察，这不仅因为其“学习”过程所表现出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发人深思，还因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后来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带上了“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特属性——试看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无不有著作集或全集之类的革命理论体系。[6] 在这一点上，日本在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迅速流入以后，“以学习知识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7]形成了第二梯队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主流，这对考察同一时期的中国有启发意义。

2. 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与传播媒介

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必须涉及五四时期新思潮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一时代背景；而要考察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想是如何传播和被接受的，则必须探讨使其成为可能的当时的文化状况，特别是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即印刷传媒的状况。因为，对于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关心外国思潮，也无论他们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如何迫切希望改造

社会，要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思潮（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存在承载新思潮的一定程度的物质条件即印刷传媒。换言之，不仅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各种外国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这一现象本身，与五四时期印刷传媒的发展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长住在北京的日人牧师清水安三（后成为樱美林学校的创立者）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8]；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1919年评论中国的杂志时就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9] 而现在我们也可以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0] 中看得出当时杂志激增和泛滥的情形。正如罗家伦慨叹的那样，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停刊；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呈显出空前的盛况确属事实。

不用说，杂志发行的这种盛况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新文化运动”排除空洞晦涩的文言，提倡以口语（即所谓“白话”）创作新文学；受此影响，白话文体在五四时期已经相当普及，许多新创刊的杂志都采用白话。虽然以广大农村为中心，文盲占大多数[11] 这一事实仍然存在；但不能不说杂志发行得以繁荣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白话文体普及，从而扩大了书籍的读者范围的缘故。

五四时期杂志、书籍发行的迅速增加，其背景之一还在于商业出版界的成长。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虽然五四运动以前就进行出版活动，但其出版的书籍几乎仅限于教科书等学校教材、中国古典以及辞书等工具书；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出版社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籍，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书籍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了。而五四时期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图书局等，也是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以推进出版近代化的。[12] 总起来看，中国商业出版界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

在这些大量刊物的流通方面，设在各高等教育机关内的书报贩卖部在出版社和读者之间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书籍流通体制，许多学生通过设在各学校内的书报贩卖部求购书籍；通过书报贩卖部，即使在地方城市，也可以订阅北京、上海出版的书报。而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书籍，负责贩卖部的人（往往是有活动能力的学生）还通过书籍的订购情况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当时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陈望道曾这样回忆书报贩卖部：

> “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13]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学生们通过书报贩卖部相互沟通联系的情景；而自不待言，这些书报贩卖部在五四运动后得到扩展、更加活跃。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即后来产生了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籍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经销书籍、杂志的广告。

在考察印刷传媒的传播空间时特别值得注目的是，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杂志，还经销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例如，1920年7月，毛泽东为了普及新文化，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处叫做“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其经销的书籍、杂志多种多样。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新青年》杂志销售册数之多（1920年9—10月共320册，至1921年3月累计达2000册）。同时，每日在此购阅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的，1920年10月也分别达65份和42份。[14] 当时的报界还不存在全国性报纸，《时

事新报》和《晨报》也分别是上海、北京的地方报纸；但在这个时期，即使远在长沙也能够通过书报贩卖部读到上海、北京的日报。而在当时，杂志、报纸又通常是被反复传阅的，所以，其影响要远远超过其销售份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短时期内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地方城市也得以传播的背景之一。

《时事新报》和《晨报》受长沙青年欢迎是有其理由的。这两份报纸分别开辟有副刊《学灯》和《晨报副刊》，接受读者投稿，同时积极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所谓副刊，是五四时期以后出现并普及的中国报纸的附录，相当于当今的“文化版”；当时，与杂志一样致力于介绍新思潮的，就是这些“副刊”。[15] 副刊的开辟证明，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对世界新思潮的关心空前高涨，报纸也不得不对这种变化作出回应；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报纸以及报界自身开始摆脱从前作为政论报纸时的那种十分浓厚的党派色彩，积极发掘和吸纳读者的意见，从而向商业报纸转变。[16] 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四大副刊”的是，《晨报》的《晨报副刊》、《京报》的《小京报》、《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这“四大副刊”中，除《小京报》外，在五四时期都曾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由于副刊的出现，小说、诗歌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自不待言，外国的各种思想、报道、旅行记等的翻译也得到了发表的园地。知识的市场在五四时期的扩大是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和众多新思潮一样沐浴了她的恩惠。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1.《晨报副刊》与陈溥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虽然由于印刷传媒的发展，新思想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但这并没有减少传播者们研读、吸收马克思主义时所品尝的异乎寻常的艰辛。因为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购得外文图书方面，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困难之大皆远非今日可比。那么，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共产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呢？他们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读了什么样的书籍呢？这些书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很遗憾，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这些问题，许多至今尚没有答案。比如，谁都知道当时刊行了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但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所谓经典著作以外，到底是谁翻译出版了什么样的书籍，则连一个概述也见不到。[17] 实际上，在当时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中，考茨基（K. Kautsky）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讲解书的翻译，以及“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书籍，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要多。在这里，让我们首先来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经过，特别是其取得途径、翻译和出版的各种状况。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的中心人物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9 年夏逃离北京在昌黎小住，在那里写下了他那篇值得永远纪念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8] 在这篇论文中，他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陈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含有批判观点的见解。过去，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提到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先于这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19]

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其文章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反复转载。另外，正如后文所述，《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20] 也有颇深的关系。《晨报》是在北京发行的日报，发行数量在 1919—1920 年约为 5000—8000 份[21]，在北京属于大报。如前所述，当时的报界尚没有全国性

报纸，《晨报》的流通也基本上限于北京周围；但是，在开辟了副刊之后，通过当时设于中国各大城市的书报贩卖部等，也获得了外地的定期读者。除了这批直接购阅者外，《晨报副刊》的文章还因其立意新颖而被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屡屡转载，其影响远不止于一份地方报纸。

《晨报》自1919年2月起，刷新了相当于文化版的副刊（第七版）版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开始宣传各种外国思潮。同年4月1日开始连载渊泉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收于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年出版]的摘译），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形式，刊登了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问题研究》第二册，1919年2月和河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及国体研究录》一卷一号，1919年4月），接着，同月9日又刊登了食力译《劳动与资本》（原著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但食力译文是对收于《社会问题研究》第四册的河上译《劳动与资本》的重译）。进入6月，开始登载渊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原著为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渊泉译文是对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卖文社出版部1919年5月出版]的重译）。这次连载，算上中断的一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1月。7月刊登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为堺利彦：《唯物史观概要》，《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1919年4月）没有注明译者，但是从译文中术语的翻译推断，这篇译文似乎也是出自渊泉之手。[22] 除此以外，7月还登载了没有注明译者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原著为收于《改造》1919年7月号的贺川丰彦著《唯心的经济史观的意义》）。就这样，《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

上述刊登于《晨报副刊》上的渊泉的译文，不仅在时期上最

早，还对“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上部构造［上层结构］、下部构造［下层结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等等这些在中国首次出现的社会科学术语都加了注释；在这一点上，也超出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这也就是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影响极大的《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甚至远在四川的《国民公报》争相转载的理由。[23] 特别是从1919年6月开始连载达半年之久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其德语版和日语版分别在当时的欧洲、日本，被认为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著作。比如，高堺素之译日语版《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就被誉为“无论谁来翻译，要做到比这更易理解，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人读这部译著还感到不好理解，那么，他读德语原文，也免不了作同样感想”。[24] 虽然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及其单行本《马克斯经济学说》[25] 没有获得日文版那样热烈的反响，但是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选择这部书，并且连载达半年之久，这证明了《晨报副刊》编辑的见识之深。

综合研究五四时期报纸杂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李大钊的年谱等都说李大钊参与了这个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6]，还有人甚至说，指导《晨报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李大钊本人。的确，李大钊在1916年做过《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但是，由于和报社后台进步党立场相左，同年9月，他在任仅20多天就辞去了编辑主任一职，离开了《晨钟报》。[27] 后来，《晨钟报》改名《晨报》后，李大钊虽然也时常向《晨报副刊》投稿，但并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8] 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在《晨报副刊》上连续翻译、发表这些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到底是谁呢？曾经有人解释说，“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这是不正确的。据笔者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的记者陈溥贤的笔名。[29]

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入《晨报》前身《晨钟报》，后任《晨报》主笔。1918年末，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积极采访“黎明会”及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现状。五四运动前回国，4月起以“渊泉”的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他正任《晨报》总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20年末，作为中国报界第一位驻欧洲特派记者赴英国。1924年因攻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遭冯部缉捕。1928年《晨报》停刊，随张学良去东北，历任《民言报》主笔、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顾问等职。1930年任北平晨报社社长，后加入国民党系的南京中央通讯社，1936年被任命为该社东京特派记者。1938—1948年任国民参政会议员，1940—1950年任中央通讯社主笔，1948年以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57年8月逝世于台湾。[30]

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而其前半生所发挥的作用，与李大钊多处重合，这一点则更重要。陈溥贤和李大钊在同一时期（1915—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时期一同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以留日学生总会及其机关刊物《民彝》为阵地共同积极活动。《民彝》创刊号（1916年5月）载有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成立的报道，其中李大钊、陈溥贤皆列名委员。二人回国后又一同入《晨钟报》做编辑，从这点推测，1916年以后，二人的同事关系应该也相当亲密。关于陈溥贤和李大钊的这种关系，此前没有任何论著涉及，只有极少含糊的回忆。[31] 但是，事实上，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下面，让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来简要考察一下陈溥贤当时的活动。

如前所述，1918年末，陈溥贤曾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被派驻东京数月。他用“渊泉”的笔名发回《晨报》的《日本之讲和态度》（1919年1月11日）、《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同

年1月21日）等报道说明，开始时，他主要想探索日本朝野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所持的态度。当然，中国舆论最关心的山东问题的动向也是他关注的内容。恰在这时，吉野作造（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以及他指导的进步团体“黎明会”的活动在日本舆论界产生极大反响，这立即引起了陈溥贤的注意。在《日本之黎明运动》（1919年1月28日）、《黎明运动之第一声》（同年2月14日）这两篇报道中，陈溥贤满怀期望地声援黎明会。他的注意力一旦转向新思潮，就由普选运动而工人运动，最后，终于朝向了度过了“严冬时期”正在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回国后，陈溥贤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东游随感录〉，前后达一个月。其中在第17次《日本底言论界》中，特别立《社会主义研究底杂志》一项，介绍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言发行两万余份）、堺利彦和山川均等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研究》（言发行七八千份）等刊物及其性质。[32] 又把第26次连载特别题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了始自“东洋社会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同时把现今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派，即堺利彦等“纯粹马克思主义”派、高堺素之等“国家社会主义”派和大杉荣等“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并祝愿欧洲大战以后呈一泻千里之势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途中不要遇险，平平稳稳达到目的地”。[33] 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当中，陈溥贤尤其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动向；这一点，仅在1919年3月20日的《日本之新潮流》，以及同年4月24日的《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这两篇文章里[34]就表现得很清楚。他在这些文章中赞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诚学术界一巨观也。”就这样，在日本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一事，似乎激发了陈溥贤回国后全力以赴介绍这些新思潮。

“渊泉”即陈溥贤最初要考察日本的军部、政党、议会等统治机构，后来逐渐转向考察工人运动、社会运动，这个转变是有其必然性的。1919年，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围绕山东权益问题的

中日关系；但是，在全面观察了日本的军部、主要政党、实业家们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他断言，中日两国的“真正底亲善”只有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主导政治之后才能实现。他说：

> 据我底观察说来，中日两国要想增进真正底亲善、发扬互助底精神，军阀时代是绝望了，资本家时代更没有希望。日本劳动阶级能够出来当家底时候，然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理想底境遇。所以我们对于日本劳动阶级，有无穷底期待。[35]

他之所以关注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除了对其动向和学说本身的兴趣以外，还因为中日关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变，最终有利于“改造”中国。值得深思的是，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大前提，因而接近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点与下一节将要探讨的戴季陶有共同之处。

陈溥贤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当然也及于俄国革命以及中国的工人问题。例如，关于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陈溥贤于4月13日发表了署名“渊泉”的“时评”文章《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文中对北京政府盲从欧美部分列强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示疑问，呼吁要积极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承认革命政权；还把1919年5月1日的《晨报副刊》题为“劳动节纪念”号，并亲自撰写《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一文，主张人类作为劳动者有“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而对北京政府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为危险思想并加以取缔则表示反对说：“资本阶级所看做危险的思想，由劳动阶级看来，却是正当防卫的权利咧。”[36] 就这样，陈溥贤在言论遭到残酷镇压的北京，勇敢地坚持宣传“危险思想”。

2. 陈溥贤与日本的革新运动

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的积极活动，并不限于利用报刊介绍马克

思主义，他还参与了在这个时期放射出璀璨光辉的中日先进知识分子的交流运动。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的一个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和北京的李大钊曾经相互交换“黎明会”的《黎明会讲演集》和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37] 李大钊非常关心黎明会的指导者吉野作造的动向，甚至曾经设想自己也模仿吉野，组织中国式“黎明会”，使其成为对顽固思想进行斗争的共同战线。[38]但是，读读李大钊有关黎明会的文章[39]就可以发现，他所知道的黎明会的消息，几乎都来自陈溥贤所采访文章。五四时期李大钊和吉野作造互相交流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团于1920年5月访问日本[40]，而为了实现这次访日在两者之间努力斡旋的，正是陈溥贤其人。

吉野曾在1920年5月1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就中国学生的访日计划发表谈话说：“北京大学方面，除了李大钊、陈启修等教授外，我想晨报的有权威的记者陈溥贤等也正在全力斡旋此事。”[41] 陈溥贤在东京做晨报特派记者时，不仅详细地考察了黎明会等日本新思潮的状况，还与吉野个人有过亲密接触[42],而于北京方面，又与李大钊有旧谊，因而是居间斡旋的最佳人选。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1920年5月带到日本给宫崎龙介（宫崎滔天的长子）的介绍信上，陈溥贤和李大钊同具其名[43],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溥贤的作用。

陈溥贤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的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基本上是翻译日文刊物而成的。由此可见，抛却同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就无从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看一看当时接连不断地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都借鉴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我们就会明白，《晨报副刊》的陈溥贤绝非特例（请参考本书附录一〈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这从后面将要探讨的上海方面的情况也看得出。而这种渠满而溢，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发生在五四之前十余年即

清末革命运动时社会主义思潮由日本向中国的传播。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初盛行于中国的时期（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与日本“大逆事件”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期相重合；而正如幸德秋水等明显影响了清末的社会主义宣传[44]一样，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在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复苏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相互作用之中发生的。关于这之间的情形，冯自由早在1920年就这样说过：

> ［在日本］自从幸德秋水被杀，更没有人敢倡导这种危险的话。中国的新学书籍，大半由日文翻译出来。日本这种印刷品既然很少，中国哪里还有译本呢？……［而现在］我国主张社会主义者得许多日本文译本为生力军，便也发刊各种书报，尽力宣传这种主义。……这是我国人近来趋向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因。[45]

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等反帝运动的高涨，对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剔除寄生于自己体内的帝国主义意识的一次考验和试金石；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的进展，也的确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朝鲜的兴起。可见，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朝鲜的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股在互相影响中发展、深化的跌宕起伏的巨浪。比如，对于在五四时期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只有日本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其军国主义性质，才能使打倒中国的军阀统治更容易进行；同样，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其意义也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而受到了热切的瞩目。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时，往往是把已经在日本翻译、介绍过的内容有选择地重新译成汉语；翻译、介绍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例如，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等等）时，也多半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

在中国，除了部分国民党人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期研究史是一个空白状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未知数，许多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科学语汇是闻所未闻的。如此看来，在五四时期，通过日本的文献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文献中的语汇也直接用日语引进并逐步固定下来，毋宁说是非常自然的。

下面，让我们简单叙述一下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1919年这一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所谓“严冬时期”，堺利彦等日本国内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只好“鬻文为业”，勉强把守孤垒。但是，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堺利彦、高堺素之等试探着警方的反应开始在他们所办的《新社会》杂志上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上述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1919年5月出版后，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其销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堺利彦等所办的《新社会》，1919年也售出1.5万册以上，山川均于稍后创办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发行也非常稳定。[46] 另外，综合革新杂志《改造》、《解放》也都在这一年创刊，特别是《改造》杂志，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刊登探讨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使发行量激增[47]，日本因而出现了“只要是马克思，不论好坏都大受欢迎，令人恐惧”[48] 的思想状况。陈溥贤就是在东京做特派记者时（1919年初赴日，其后又于同年7—8月再度以特派记者身份驻东京），敏锐地觉察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复苏的动向，在这些日文社会主义刊物出版后，立即进行翻译并在《晨报副刊》上

发表的。

陈溥贤作为《晨报》总编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又于1919年下半年列名发起并支持激进青年参加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运动）。[49]1920年末，他作为中国报界历史上第一位常驻欧洲的特派记者[50]赴英国后，仍然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晨报》发回了《英国共产党大会记》、《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等报道。但是，就笔者所见，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时期，除了工读互助团运动以外，陈溥贤没有任何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迹象，因而也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事实，只是从其简历可以看出，在李大钊故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有所加强。尽管如此，陈溥贤作为在五四时期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尤其是在介绍学说时，对汉语中尚未消化的语汇进行注解）这一事实，应该与他和李大钊的交往同样受到尊重。因为，在1919年第一次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见面时，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需要注解的新的外来学说，而那难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陈溥贤加以注解介绍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革命的学说的。

3.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

陈溥贤作为中介者的作用，不仅见于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知识分子与李大钊之间的联系上，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发挥。众所周知，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51]；而河上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贤在资料方

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1919年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52] 在陈溥贤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等的观点。[53] 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环境中，要理解未知且极难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断言李大钊之所为只不过是不成熟或者是模仿固然容易，但是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倒是更应该瞩目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所呈显出的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即，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然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缘故。李大钊受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前他也曾接受过茅原华山（原名茅原廉太郎，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很大的影响。[54] 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外来“知识”之间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外来知识对李大钊的触动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

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同年年底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不仅可以得到河上肇的著作，而且也可以得到堺利彦、山川菊荣等的著作。[55] 而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下面，我们就以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为例，探讨他与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4. 李大钊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1920年12月，为了谋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56] 以堺利彦、大杉荣为中心在东京成立。有意思的是，李大钊竟也参加了这个同盟。[57] 也就是说，李大钊终于积极地加入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了。根据保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同盟名册（已故向坂逸郎收藏，现存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记载，疑为中国人（或朝鲜人）的会员倒是有几名，著名人物却只有李大钊一人。[58] 李大钊到底怎样知道了社会主义同盟，又是怎样加入该同盟的呢？探讨一下与李大钊同住北京的名册上的另一个人丸山幸一郎的生平，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丸山幸一郎（1895—1924）是北京的日文期刊《日刊新支那》、《周刊新支那》、《北京周报》的记者和编辑（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59] 当时也居住在北京的清水安三晚年曾这样回忆丸山和李大钊：

> 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或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60]

> [李大钊] 民国五年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和

> 白坚武一起办了一个名叫晨钟报的小报，自任编辑主任。后来，经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介绍，任图书馆主任。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铃木兄不久就去了东京，但铃木兄是曾影响李君向左倾的人……[61]

我们无从确认与丸山一同影响李大钊“向左倾”的铃木长次郎是什么人；不过，由此可知，五四时期前后，李大钊与丸山等居住在北京的进步日本人有交往。

丸山任编辑的《北京周报》曾屡屡刊登李大钊的谈话或文章，其主要者有，《支那工人运动的趋势》（第 8 号，1922 年 3 月）、《宗教妨碍进步》（第 12 号，同年 4 月）、《支那统一方策与孙、吴两氏之意见》（第 33 号，同年 9 月）、《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第 66 号，1923 年 5 月）等。此外，在《李大钊氏》（第 33 号，1922 年 9 月）这篇介绍李大钊的文章中，丸山称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理解工人运动的人”，并声援说：“我们认为这位新思想家和新运动的领导者的言行，将给予新支那的未来以很大的刺激和影响。故此，他以后将持何种思想，将发起何种运动，我们将怀着浓厚的兴趣拭目以待。”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断定，采访李大钊的上述谈话，并为他刊登文章提供方便的，就是时住北京的李大钊的理解者和支持者丸山昏迷。

丸山昏迷，原名丸山幸一郎。根据日本内务省编辑的需要监视人物一览名册（所谓“黑名单”）的记载，丸山 1895 年生于长野县，1916 年底到东京，就读于中央大学英语科夜校，同时与大杉荣、堺利彦等“主义者”交往，因而被圈定为乙类需要监视人物。[62]他到中国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但是，上述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第 3 号（1920 年 12 月）上登载了他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支那的社会主义》的通讯（可见，他虽然身在北京，仍从日本购阅《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到中国之后仍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可以肯定地说，介绍

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另外，李大钊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是以堺利彦的《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中的三篇论文和译文为蓝本写成的[63]，而设想在堺利彦和李大钊之间有丸山居间联系，似并非臆测。也就是说，李大钊追随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即堺利彦等“马克思主义派”并进而加入其中，是因为有丸山这位友人。

李大钊是否参加了更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并非仅仅是为了汲取知识。从他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来看，李大钊也并没有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方面把日本和中国分开来考虑。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除了当时的世界主义气氛（“世界都是光明啊！人类都是同胞啊！愿我全亚洲的青年努力！”[64]）以外，没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无法想像。

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注，使李大钊在1919年以后把阶级观点引入相关的妇女问题，并开始研究工人问题；而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日本的影响。比如，《战后之妇人问题》[65]一文被认为李大钊向社会主义革命寻求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的道路，是他思想的一大进步；可是，该文基本是翻译山川菊荣《1919年与世界妇女》（《中外》1919年2月号）而成。而论工人运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66]，也参照了山川菊荣《“五一”节与八小时劳动》（《解放》1919年6月号），以及《改造》1919年9月号刊登的新妻伊都子《一种不诚实的劳动论》和山川菊荣《答新妻氏论》。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知识”给予李大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另外，围绕李大钊，也不乏收集书籍和研究社会主义的话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成立的学术团体“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该会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集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67]，据说为了把收集来的书报供人阅览和讨论，还设了一个叫“亢慕义斋（Commu-

nism 斋)”的图书室。翻看该研究会 1922 年的藏书目录[68]即可发现会员们是何等地渴望得到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同时又是何等热心地搜集这种书籍。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严重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缺少文献的情况下，李大钊所获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何等的先进。

自 1920 年下半年始，李大钊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一面与上海的陈独秀联络呼应，一面指导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会、发行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刊物《劳动音》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等。他在北京的名望很高，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作讲演，或者指导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而李大钊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却不仅因为他的声望，也因为他遇时而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知识而愈加巩固。这种情景，从曾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朱务善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下面是一段有关李大钊在社会主义讨论会上担任评判员时的情景。

> 记得评判员［即李大钊］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的］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沈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69]

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必须同时也是理论家，但是，如上所述，李大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许多是取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李大钊在这次讨论会上的发言，通过随意引用河上肇的著作而增强了说服力，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五四时期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处的知识环境。

以上所叙述的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使我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1919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不是倡导“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这“三无主义”并曾结成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也不是在最高学府执教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是李大钊、陈溥贤、邵飘萍[70]等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期研究，或者更广泛地讲，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如果不是经常关注俄国革命等世界规模的社会变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流行等外国新思潮的动向，具有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外语能力，并且掌握印刷传媒的人物，不用说读懂马克思主义书籍，就连接触这些书籍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看来，中日两国在1919年同时流行马克思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1. 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1919年到192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北京同样高涨的另一个城市是上海。1920年初，在中国最激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逃离北京移居上海，北京《晨报》的陈溥贤于1920年底作为特派记者赴欧离开中国之后[71]，上海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上海与中央政府脚下的北京相比，对社会主义刊物的压制要松一些[72]，这也是上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和被接受，也与北京一样，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将看到，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思想条件的苏俄方面的消息，以及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领导人的著作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的。

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73]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74]，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75]如果说其领导人孙中山所倡导

的民生主义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学说，那么，他们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而表现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者，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也是有其缘由的。

似乎是受到了《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上海出版的《建设》、《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些国民党系刊物，也从1919年夏开始积极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趣的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社会主义、回国后出入于孙中山和戴季陶门下的李汉俊，和作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拥护者，早就反复研究土地问题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开始时努力于中国传统中寻找社会主义理念，或者向中国的古典中去寻求符合唯物史观的所有制的历史。例如，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接触过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即使是他，在对人谈起全面改造社会时，也要借用墨子的“兼爱”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的理想[76]，而胡汉民和廖仲恺则更是主张《孟子》描写的古代土地制度理想即“井田制”，试图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找出先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形态。[77] 可见，虽然出现于清末的“井田制＝社会主义理想＝中国传统”这一单纯思维[78]到了五四时期早已被超越，中国古代史也已经按唯物史观来解释了，但是，他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学说时，仍然摆脱不掉旧有的知识体系。

这件事显示，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极易受到旧的思想框架的束缚；反过来讲，在“社会主义”的概念尚未扎根以前，就连对外国思潮造诣颇深的留学生和国民党系知识分子也难免这样去做，即为了便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的确，要按照其本来概念去理解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殊非易事。而随着有关社会主义的知

识越来越丰富，对墨子的“兼爱”和孟子的“井田制”的顾盼则会越来越少。不过，这件事却暗示着，即使孙中山身边那些在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姑且不论他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当他们把这一概念传达给别人时，没有某种形式的媒介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因如此，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

国民党系刊物《建设》一卷六号（1920 年 1 月）《通讯》栏的一番问答表明，这些国民党系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日本论坛的动向，尤其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趋势，就如同日本的读者一样熟悉。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译载了日本的北堺吉（北一辉的胞弟，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题为《社会主义之检讨》一文，读者刘凤鸣向《建设》编辑部提出疑问说，时至今日，是否还有必要在中国介绍如此谬误百出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对此，《建设》同人“民意”详细叙述了日本论坛对北堺吉论文的反响。他说，北堺吉论文在《中外》1918 年 8 月号上刊登后，河上肇、山川均、茅原华山、高堺素之都分别在《中外》、《新社会》等刊物上著文痛加批判，为此，北堺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忏悔——代笔事件之告白》表示道歉，因此，在日本，北堺吉的论文毫无价值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民意”文充满自信，似乎在说，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在日本已经有了结论，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再重复议论。这个时期的“民意”应该是朱执信的笔名。[79]总之，《建设》的编辑们曾经详细研究过社会主义派的河上、山川、高堺等执笔的论文，是显而易见的。

2. 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五四时期齐集于这些刊物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国民党人士中，与曾在清末革命运动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胡汉民、朱执信相比，戴季陶处于中心地位。戴季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动

机，也许是亲眼看到1919年6月的“三罢”斗争——即五四运动最高潮时上海掀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的威力，因而深切感到有必要认真探索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方案。此后，他作为国民党内最负盛名的理论家，开始以《星期评论》、《建设》为阵地，呼吁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必要性，并亲自广泛收集、介绍和宣传外国的社会主义书籍。[8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9年11月始在《建设》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连载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都译自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陈溥贤曾在北京翻译过)。[81] 在1920年前后的上海，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动向的，是戴季陶和曾校订汉译《共产党宣言》的李汉俊，而将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1920年初移居上海的陈独秀，并与陈共同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心成员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则是戴季陶。[82]

戴季陶从1919年夏开始介绍革命俄国的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说，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达到的水平，远在同时期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之上。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戴季陶、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就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所作的评论。这个工读互助团自1919年下半年以来深受中国进步青年的热切关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上述陈溥贤等都曾对其进行支援。然而终于在1920年3月因活动失败而解散了。

所谓工读互助运动，主要是由王光祈等1919年8月提出，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支持的激进青年的运动，它受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的影响，其发起目的是要实践“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83] 但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因经济原因和人际纠纷，1920年3月就被迫解散。对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李大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在城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因为，“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要靠资本家给劳动

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企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李大钊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84] 在这里，他虽然也提及资本家、劳动者，但把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最终原因归咎于城市的非人性，因而他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法就是，既然在城市进行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就应该转向农村。

而陈独秀则基本上认为，工读互助团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参加互助团的青年们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的习惯和生产的技能，并说，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问题，还呼吁计划在北京以外发起工读互助团运动的青年们不要再重蹈覆辙。[85] 对于早期以来一直批判中国人懒惰、放纵的陈独秀来说，发出这样的批评也许是自然的；但是，他没有考察社会经济方面的任何原因。就在前一年，即 1919 年 12 月所写的《告北京劳动界》中，在谈到“无产的劳动阶级”时，陈独秀还在说，“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86]，表现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关心。但是，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改造人心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和如何把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John Dewey）的民治论（民主自治论）应用于中国[87]，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则不能不说相对淡薄了。

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同时期的戴季陶是怎样思考的呢？他在发表于《星期评论》第 42 号（1920 年 3 月）上的《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一文中这样说：

> 官厅是受有产阶级拥护，同时又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机关。……在这一种生产制度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作生产的工作，同时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因此，他提出了“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样一个极其理智且又带有煽动性的解决方法。当然，在上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里，也分别能够看到他们倾向农村、农民的特征，以及对中国人传统习性的批判；但是，戴季陶从当时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必然性，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来看，其水准显然超过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据说陈独秀曾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88]；而1920年夏，正在由无政府主义摸索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也讲：“我在上海，受季陶的感化最大，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89] 从上述戴季陶开陈的理论来看，他们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3. 戴季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如前所述，戴季陶曾以日本人高堺素之的翻译为底本，重新翻译了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译名《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这部最适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著作，这件事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而他1920年1月写给堺利彦的一封信，则证实了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在这封充分显示了其不凡的日语水平的信中，戴季陶对堺利彦这样说：

> 日本乃东方先进国家，我深信，在 Political Revolution 方面处于引导者、先驱者地位之日本，在 Social Revolution 方面也必定依然是引导者、先驱者。我相信，此伟大改造事业，只有与世界之平民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尤其在东方，此伟大改造事业，唯有消除军国主义之日本后才能完成。故日本诸同志之工作，实乃对世界对东方之莫大援助，特表深切祝愿。现在，根据我等夙来信奉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

民主——之最终目的“民生主义 Socialism”改造世界之时机已经成熟，故自去岁始纠合同志，为宣传此事业竭尽绵薄。虽于文化程度极低之民族从事宣传颇感困难，然际会黎明之期，我等之宣传于各方皆引起强烈之反响。……临末特恳请先生者，请赐教先生等倾尽热忱和精力而作之著作、杂志之目录。若先生手头有贵译考茨基之《社会主义伦理学》（我友李君佩氏正重译贵译本。李氏笔力坚实，应无大谬。还请宽恕未获事先允许）之英译本，敬请惠借，以便对照贵译本中删除部分。惠借时间，一周亦可。如东京书店有售，敬请赐教书店名称。[90]

在这封信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之所以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伟大改造运动中，日本同志的积极工作不可缺少。与上述陈溥贤一样，戴季陶也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社会革命相互促进，是中日亲善的前提。这种认识在他的《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一文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妨碍两国亲善和合作的，不仅有“官僚、军人、商人”们，还有“造成这近代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因此，“中日两国的革命——变更生产、交换、分配制度的革命——如果不能成功”，则两国人民的亲善和合作“是绝对无望的”。[91] 他也认为，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是互相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这封信更加引人注目之处，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戴季陶当时研究社会主义时所处的资料环境。尽管从信函的行文来看，戴季陶与堺利彦并未曾直接晤面，但是，戴季陶最期望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人物堺利彦的，是请他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刊物和得到这些书籍的途径。我们不难想像，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缺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这个难题在中国国内又难以解决。

那么，当时，中国竟没有某一家书店经销社会主义方面的外

文书籍吗？难道上海的外文图书竟如此之少，以至于戴季陶不得不请堺利彦告诉他东京的书店的名字吗？胡适的体验可以解答这些疑问。胡适曾经留学美国，此时已经享有盛名，他曾经慨叹，上海最大的经销外文图书的伊文思书店和商务印书馆里摆放的外文图书，远远落后于欧美的思想潮流。他说：

>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印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92]

胡适所需要的哲学、文学类书籍尚且如此惨淡，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更加就可想而知了。从戴季陶的信函中可以看出，纵然他是上海研究社会主义的最有名的权威，要得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也不能尽如人意；进而言之，连上海这个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尚且是如此情形，在地方城市求购社会主义方面的外文书籍，则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反过来说，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就像戴季陶的信函所暗示的那样。

对于戴季陶渴望得到社会主义书籍的恳请，堺利彦给予了什么样的援助，不得而知。但是，从堺利彦曾把这封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来看，估计他向戴季陶寄送了其所希望的目录等相关资料。实际上，戴季陶确实曾经收到日本出版社直接寄给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写于 1920 年底的另一封日文信证明有此事实。在那封为了感谢赠给他日文版《资本论》（高堺素之译，大镫阁 1920 年出版）而写给出版社大镫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 贵译慎重严谨，更经著名学者校阅，使人未通读之前即

觉值得相信。想我国青年能通日语而不易得英法译书者，通读之后，亦可因此译本得窥马克思主义学说之真谛。[93]

汉译《资本论》直到1930年代才刊行，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外来知识，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日文著作无疑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读读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刊载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更加一目了然，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另外，追随社会主义的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宫崎龙介、平贞藏等也曾往访上海的戴季陶、李汉俊[94]，这表明他们处于距日本的新思潮最近的位置。如此看来，后文将要探讨的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中国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的汉语全译本的日文底本，也就不足为怪，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了。

1920年夏，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以陈独秀为中心开始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后，部分是由于所追随的孙中山的反对，戴季陶开始疏远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另外，从戴季陶在五四时期发表文章的意图也可以看出，以戴季陶为主，胡汉民、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其目的是要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防患于未然[95]，也就是说，是要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和平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强化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戴季陶后来转为反共，并激烈地批判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和共产国际。但是，他在批判共产主义运动时，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96] 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绝非肤浅之物。正因如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时，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戴季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初期之所以能够扮演指导者角色，就是因为他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知识分子。在戴季陶的思想里，是要防止早晚必定发生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但是，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人们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具有的吸引力（即曾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发挥了指导作用的思想）与实际学习起来所感到的困难之间的鸿沟，只有靠对外国思潮具有深邃洞察力、且精通日文社会主义文献的戴季陶来填平。

4.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

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许多人都知道，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朱执信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甲马尔克）》中的引用介绍。[97] 十数年后，1919年出现了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98]《新青年》杂志同人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出，中国知识分子因而能够读到全文，是1920年的事。陈望道也是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共早期党员。他不久后就脱离了共产党，转而从事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其他脱党者遭到残酷迫害，而他竟能有幸得免，多半因为他是《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99]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欧洲各语种译本，已经有许多研究；[100]日文版翻译过程的研究也比较充分。[101] 但是，中国最早的全译本，即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陈译）的底本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未必已经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阐明戴季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此，应该就底本的出处详加考察。

关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过，陈望道本人留有回忆录，其中这样写道：

回国［1919年6月］后，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遭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牵涉到我，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102]

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103]

陈望道在故乡翻译完毕来到上海，是1920年6月前后；6月底，陈独秀收到了译稿[104]，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8月。[105] 陈望道说，他是从戴季陶给他的“日文本转译”的，而也有人说，他参照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的英文版。[106] 不过，后一种说法的根据不清楚，陈望道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英文版，所以他究竟是否参照了英文版，并不明确。问题还是戴季陶给陈望道的底本是何种版本。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尽管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却惟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

当时，《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书店没有发售，不过，并非没有翻译过。在日本，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上，译者是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二人，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英译本。但是，日译本遭“报纸条例”封杀，即日被禁售，堺和幸德与《平民新闻》发行人兼编辑西川光次郎一同被起诉。一年多以后，堺利彦以“学术研究资料”为名再次将其公之于众，这就是刊登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1906年3月）上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刊登的《共产党宣言》是全译本，补译了在《平民新闻》刊载时略去的第三

章。这次翻译没有遭到封杀，但 1910 年“大逆事件”发生后，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书籍文献就不得再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严冬时期”。到了 1910 年代下半期，社会主义文献又开始逐渐出现，可只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允许发售。不过，在 1920 年前后，《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彻底地销声匿迹。有证据表明，堺利彦周围的人曾经悄悄地传阅和抄写日译手抄本；而事实上，一本注有“大正 9 年［1920 年］”的日本某人译《共产者宣言》（以幸德、堺译本为蓝本的油印本，出版年不详，现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被保存至今，不禁使人缅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努力。另外，堺利彦本人也为了补订旧译之不足，而于 1921 年前后开始着手再译《共产党宣言》。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这些日文译本来寻找陈译本的底本。首先来看陈译本，其第一版和 1920 年 9 月的第二版，现在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很长一个时期，要读到这些原始版本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陈望道文集》第 4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收录了陈译本第二版，现在很容易读到陈译本的译文。检索陈译本的译文可以发现，其依据的底本，可能性最大的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刊载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之处（译语尚未固定而标注西文原句的位置一样，比如“自由民 Freeman”、“奴隶 Slave”、“贵族 Patrician”、“平民 Plebeian”等）十分明显，据此可以推断，陈望道翻译时依据的底本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收录的幸德、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

戴季陶在 1919 至 1920 年间竟持有十几年前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乍听上去，有点离奇。不过，有证据表明，他确实持有这本创刊号。他主编的《星期评论》第 31 号（1920 年 1 月）上有戴季陶译《马克斯传》一文，这篇文章就是转译刊登于这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 Liebknecht）原著、志津野又郎译《马克思传》而成的，因此，戴季陶不可能

不知道这本创刊号上载有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可以肯定地说，陈望道回忆中提到的戴季陶给他的日文版，就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那个译本。

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重新比较陈译本和幸德、堺的合译本就会发现，二者间有两个较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附在幸德、堺合译本中的恩格斯《致英文版序》在陈译本中没有被译出；另一个是，有几处译语不尽相同（如，Bourgeois［幸德、堺合译：绅士；陈译：有产者］、Proletariat［幸德、堺合译：平民；陈译：无产者］）。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日本悄悄流传的几个手抄本和油印本中，有的与陈译本形式相似。例如，上文提到的油印本《共产者宣言》，以及堺利彦 1921 年前后改订的译稿（未刊，现藏于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都没有译出《致英文版序》，而 Bourgeois 和 Proletariat 也分别译为“ブルジョア［Bourgeois 的日文音译］”、“有产者”和“プロレタリヤ［Proletariat 的音译］”、“无产者”。这样看来，也许陈望道从戴季陶处得到的，原本就是没有《致英文版序》、而译语也是经更改的秘密流传本，总之，这样的可能性是无法完全排除的。

不过，按常识来考虑，既然手头已经有《社会主义研究》上登载的幸德、堺的原译，一般不会再特意去搜寻秘密流传本。陈译本中没有《致英文版序》，也许是陈望道认为把重要的正文部分译出就足够了，因而没有翻译幸德、堺合译版的序。考虑到当时的翻译一般是略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 Bourgeois 和 Proletariat 的译语，在当时的中国，比如陈溥贤在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就直接采用了河上一文中的“有产者”、“无产者”，所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产者”、“无产者”已经使用得很广泛了。大概陈望道在把《社会主义研究》上的幸德、堺合译转译成汉语时，没有直接采用原译的词语，而是将其酌情改成了当时中国通用的词语。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受到了志在变革社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热

烈赞扬[107],为创建共产党奠定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作用。青年毛泽东也是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之一。他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翌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108] 不过，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陈译本尚未出版。据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该会成员罗章龙认为，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可能是这个油印本。[109]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也就难辨事情的真伪。但是，不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的仅56页的《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直至193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

5. 留日回国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者留日学生。以数次到过日本的陈独秀为主，上述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和李达等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被国民党系的刊物频繁转载；还有些人，如李汉俊等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很难将他们与国民党系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基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比较年轻的一代。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110]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言论活动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经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承认从日本留学回国者对当时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比如，邵力子曾这样说过：

>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

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111]

曾经在日本留学、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宣传主任的李达也这样回忆说：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112]

这个时期里，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语文献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当数本书序章中提到的李汉俊。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 年，12 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但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 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和陈独秀、李达等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主要通过其言论活动对创建共产党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后脱党。国民党重要人物李书城的胞弟。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先驱之一，关于这一点，同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包惠僧曾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13] 除日语外，李汉俊还通晓英、德、法多种语言，但其理论的来源还是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比如，他批驳张东荪（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主编，当时关注社会主义）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114] 中，就引用了大量日语文献（北泽新次郎著《劳动者问题》、田文三著《欧米劳动问题》等）；他翻译的《马格斯资

本论入门》（原著 Mary E. Marcy，Shop Talkson Economics）也并非译自英文原著，而是译自日文译本（远藤无水译：《通俗马克思资本论》，文泉堂 1919 年出版）。清楚地附于论文后的参考图书目录，则表明他随时都在关注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动向。比如，为了纠正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解而写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115] 一文后面列出的参考书目里，既有《经济学批判》、《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等汉译文献，也有堺利彦著《恐怖·斗争·欢喜》和《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河上肇著《唯物史观研究》、高堺素之著《社会主义的诸研究》。另外，在叙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16] 一文里，他把“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社会民主主义”作为鼎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要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金线”，这也与前文探讨过的李大钊一样，都是直接承袭了河上肇的见解（前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当时的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超群出众的，这从他为有志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写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读书指南一事也看得出来。他在 1920 年对“要讲马格斯社会主义以及于要晓得马格斯社会主义的人”所能提示的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的文献仅仅是“马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论）”[117]；但是，两年后写的文献指南里，所列书目则包括了译自日文的书籍，显然丰富多了。在这篇指南里，他不仅提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好遵循的读书顺序，还颇具信心地说：“这样反复得两三次，心得就必有可观，以后看书也就必定容易，或者可以不待选择而任意看了。”[118] 他还断言：“这只要略微晓得点近一二年来的日本底言论界的情形，也是可以领略的。”[119] 可见，他的信心来自精通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

前文李达所说从日本得到的帮助，并不仅指翻译日文刊物。据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堺利彦、山川均有所接触[120]；而李达、李汉俊则在留学

时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在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甚至有些青年，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等，为了求得社会主义文献竟特意赴日留学[121]；对于他们来讲，学习日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码事。因此，我们在前述戴季陶致堺利彦函中看到的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与堺等的交流，在戴季陶脱离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则通过施存统和陈望道的渠道被继承了下来[122]，并得到了加强，以至于后来山川均为《新青年》撰文。

刊登于《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 年 5 月）上的山川的论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译者附记说，该文是应《新青年》同人即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之请而写的。[123] 附记还介绍了山川的简历和代表著作，这使山川在中国也得到了驱多病之身为社会主义运动奔走的名望。还有，施存统留学时曾从东京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投稿介绍山川编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不但推荐说："买这种［《社会主义研究》］，比买《改造》、《解放》［都是日本的革新派综合杂志］要好得多"，而且还列出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求购时的联系地址和价格等。[124]

切不可以为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创建共产党而开展工作始于 1920 年，其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和介绍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举办小范围的学习会；实际上，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些被认为通过阅读外国文献而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一方面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呈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新传入的革命运动方式要求在实践革命以前必须学习和研究一定的主义和学说，这两个方面使外来知识和能够理解这种外来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

识界宛如各种新思潮的大熔炉，许多人正如董必武讲的那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需要像李汉俊那样的先导人物来“把头绪理出来”[125]，指点迷津。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
——新的外来知识的出现

1.《新青年》杂志的变化

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初时称《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曾对现代中国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无须赘言其宣传“批判孔教”和“文学革命”等产生了如何的震撼，以及如何率先鼓吹西方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1920年以后，《新青年》成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这种变化发生在1920年5月（七卷六号）短暂休刊至同年9月以新的姿态重新刊行（八卷一号）这段时间里，八卷一号上刊登的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次表态，以后的每期也都辟有介绍革命后俄国现状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以刊载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的翻译文章，杂志的性质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比，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苏俄的现状，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讲或著作等传到中国的却很少。当然，报纸的外电对“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的革命政策、内战的情形等也有所报道，但是这些报道往往既片面，又带有猜测和偏见，不能够使已经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的中国知识分子满足。在中国最早高度评价俄国革命的，是受刘师复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所办的刊物，比如《劳动》曾刊登了《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等文章。[126] 但是，该杂志只出到第五期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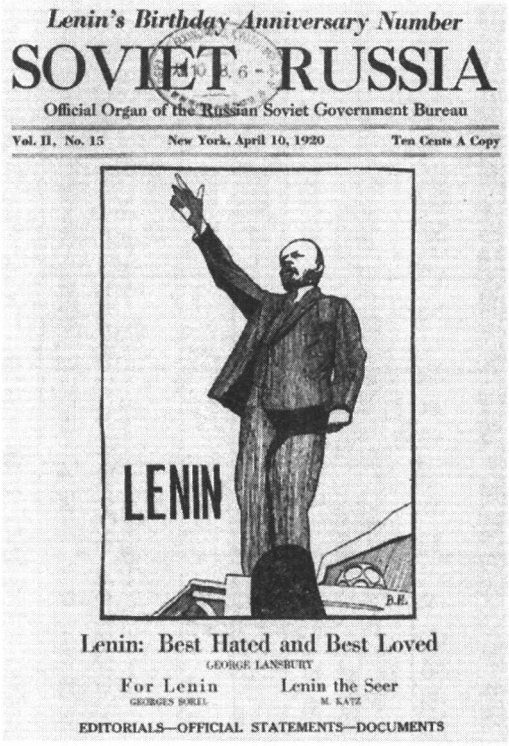
1918年7月停刊了。在《新青年》暂时休刊的1920年5月以前，译成汉语的列宁的著作和演讲的数量，据笔者调查，只有四篇（不含会见外国记者的报道），且都不是全译。[127] 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翻译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即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因信息管制等无从诠释布尔什维克主义。[128] 精通日语文献的戴季陶在1919年说过这样的话：

> 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很。而且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的最大困难。[129]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 Karakhan）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是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精神。宣言的详细内容半年后，即1920年3月末到4月初才传到中国。[130] 后来，中苏间围绕宣言中有无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字句发生了外交纠纷[131]；但是，在当时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划时代的宣言被称为“空前的美举”。[132] 这以后，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关心一下子高涨起来了，而重新发刊的《新青年》新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心。

《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刊登译自欧美杂志上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最大来源是名称叫《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的杂志。《苏维埃·俄罗斯》是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Russian Soviet Government Bureau）的机关刊物（周刊），1919年6月创刊（见图1）。这份刊物上刊登的许多介绍革命后俄国情况的文章被翻译成了汉语，例如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

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托洛茨基的《我们要从那里做起?》等（见表 1)。另外，八卷三号（1920 年 11 月）上还登载了列宁的演讲《民族自决》[133]（震瀛［袁振英］译)。对于《新青年》在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后的变化，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连主编陈独秀都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当时代办编辑工作］亦主张稍改内容"。[134]同为《新青年》同人的胡适在给另外的同人的信中表示不快也是自然中事，他写道："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135]


Lenin's Birthday Anniversary Number

SOVIET RUSSIA

Official Organ of the Russian Soviet Government Bureau

Vol. II, No. 15　New York, April 10, 1920　Ten Cents A Copy

LENIN

B.E.

Lenin: Best Hated and Best Loved

GEORGE LANSBURY

For Lenin

GEORGES SOREL

Lenin the Seer

M. KATZ

EDITORIALS—OFFICIAL STATEMENTS—DOCUMENTS

图 1

《新青年》复刊后的封面，则从视觉上表现了“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的这种变化。自八卷一号起，随着杂志性质的变化，封面也变成了那个十分有名的图案，按茅盾的话说，就是“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见图2）。[136]据他说，这个图案暗示的意思是“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137]后来，这个图案还被用作1922年上海共产党员创刊的“新时代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封面（例如：高堺素之著，夏道尊、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1922年）。[138]可见，它是早期共产党的象征性图案。

图2

不过，这个图案并非《新青年》同人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模仿了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见图 3）。按照一般解释，美国社会党于 1901 年成立后，吸纳各种社会主义势力，至 191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在几个地方议会和地方首长选举中获胜，在 1912 年的总统选举全国投票中，该党候选人德布斯（Eugene V. Debs）曾赢得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历史上最多的百分之六的选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流派坚持反战立场，部分干部遭逮捕入狱。俄国革命后，1919 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共产主义劳动党（The Communist Labor Party），以后逐渐衰退。看来，上海的《新青年》的同人们——他们正在开始结成共产党的活动——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美国社会党的刊物，看中了该党的党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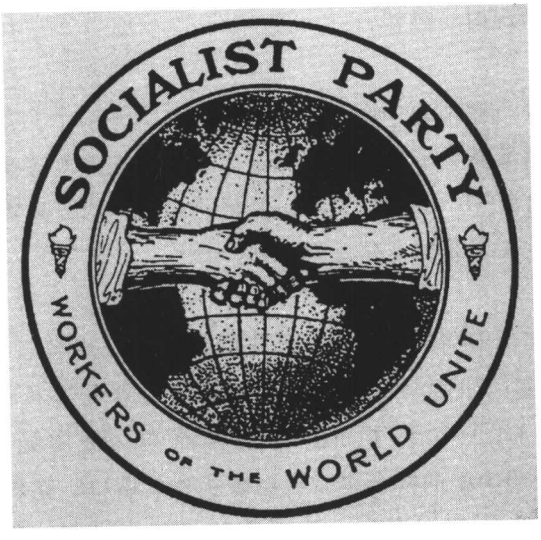


图 3

美国社会党的这个党徽，曾用于其非正式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发行地：芝加哥）的插图；但该杂志于 1917 年被禁止发行后（1918 年 2 月号后

停刊[139]），只有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Charles H. Kerr & Co.）[140]用于部分小册子的封面。在1920年前后能够得到的小册子中，比如克尔（Charles H. Kerr）的《何为社会主义》（What Socialismis）[141]的封面使用了这个图案。上海的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很可能参考了这些小册子。191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活跃，因此出版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的刊物。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在欧美先进国家当中，美国成立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早（如“共产主义劳动党”和“共产党”都成立于1919年9月）[142]，可见美国特别关注俄国革命。而产生这些共产主义政党的美国左翼也早就为了出版社会主义书籍而设立了出版社，其代表就是芝加哥的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

在20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也主要从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购得英语书籍。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边健太郎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这样说：

> 那个时期，社会主义的书籍总共就那么十几册，其他的就必须读英语书籍了。英语书来自美国芝加哥的查尔斯（以下不清楚——原注）书店。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都是从那里来的。[143]

1920年代中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柯柏年（原名李春蕃）说，当时，“向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Charles H. Kerr & Co.）购买了一批包括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144]，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也曾从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购书。据说，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曾经把考茨基《阶级争斗》（*Das Erfurter Programm*）的英文版寄给在武汉的恽代英，请其翻译[145]（恽代英翻译的汉语版于翌年1月出版）。而该书英文版最普及的是克尔出版社的版本[146]，因此，陈独秀寄给恽代英的该书英文版很可能就是从克尔出版社购得的。

综上所述，1920年9月复刊后的《新青年》的变化之一，

就是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书籍取代了来自日本的同类书籍而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同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创建共产党的进程正式开始，急剧传入中国的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书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的消息来源。

2.《共产党》杂志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文献

《共产党》月刊是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从其名称可以看出，该刊物的创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将在下文（第三章第三节）叙述它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此处，主要通过探讨其与欧美的英语版社会主义文献的关系，来分析该刊物在接受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看其装帧（见图4）。《共产党》月刊在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The Communist，其下载卷首论文。把卷首论文登在封面上，这在当时的中国期刊里是很少见的形式，更不用说刊物名称用大号英文印刷了。实际上，这种形式与上述《新青年》的封面一样，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当时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的党刊 *The Communist*（见图5）。两者形式如此相似，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 *The Communist* 的汉语版。很明显，在封面上刊登卷首论文的形式，也是模仿了 *The Communist*；而《共产党》里面刊载有译自 *The Communist* 的文章，则证明了封面相似并非偶然。[147] 也就是说，与《新青年》一样，陈独秀等《共产党》的编辑们，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英国共产党的党刊，于是将其形式用于自己的刊物。

看看《共产党》的内容会发现，译自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与《新青年》一样，其来源之一是《苏维埃·俄罗斯》，译自此刊物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革命后苏联的现状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动向（见表2）。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1号上译载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这是第一次把列宁的著作目录以比较完整的形式介绍到中国。

COMMUNIST

共產

图 4

THE
COMMUNIST
An Organ of 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Task awai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By ARTHUR McMANUS

图 5

列宁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与革命》（第 4 号，仅译该书第一章）、《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皆载于第 2 号）、《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 3 号）等，无疑都是创建共产党的重要指针。追踪这些汉译的英文底本可以发现，《国家与革命》译自《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美国的社会主义期刊）1919 年 2 月号[148]，《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译自《共产党》（*The Communist*，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刊）1920 年 6 月 12 日号[149]，《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译自《民族》杂志（*The Nation*，美国的综合性期刊）1920 年 10 月 13 日号，而《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 IWW 的恳请》（第二号）译自《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刊物）1920 年 9 月号。[150] 仅从此处所举即可看出，上海的共产主义者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美国报刊，从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到共产主义派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都有。

翻译上述文章的是“P 生”，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茅盾即沈雁冰。这个时期，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

报》做编辑，同时发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这样回忆翻译列宁《国家与革命》时的情景：

> 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151]

茅盾的回忆有不准确的地方。他把只翻译了第一章的原因归于自己能力有限，而实际上，他当时据以参考的英文刊物《阶级斗争》上原本就只有第一章。这且不提，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当时要理解列宁的著作，确实必须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非仅语言功力强就可以做到。

尽管翻译上存在这样的困难，上述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的翻译，其意义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茅盾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152] 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通过接触这些英文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形态，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这是从日语社会主义文献中不可能得到的。从对杂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来摸索中国国内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事实上，较早地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运动"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纲领的精神，经过翻译，改变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其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性研究，变为对列宁式运动论和组织论的吸收。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1920 年下半年以后传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俄，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

借用日本国际共运史专家山内昭人的话来说，这是“国际化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53]向中国的传入。我们现在可以分四点来概括其历史背景：①当时，中国和苏俄间的交通、通讯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内战而时常处于隔绝状态，而北京政府对有关革命俄国的消息实行管制，也使有关俄国的书籍难以流通；②在美国，俄国的移民和流亡革命家较多，这使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其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包括分裂、合并）也较早；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知识虽然较丰富，但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相对落后；④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里面，几乎没有懂俄语的人才，只有通过英语文献来了解俄国革命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如此迅速地被介绍和接受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由于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其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了他们惟一能够选择的新的国际。[154]欧美和日本的共产党的创建，尽管形式不同，但都经历过与第二国际的继承或决裂的过程，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自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之下。下文中，我们将以早期中共的中心人物陈独秀为例进行探讨。

3. 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1920年的上海，陈独秀是人们所公认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155]的传单而遭逮捕，辞去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于次年2月移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并把这里作为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据点，直至同年12月去往广州。

上文中已经探讨过，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方面来看，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并不出众，也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

义。而在上述改变了封面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156] 里面，他把自己明确规定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表示自己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谈论政治。可以说，这篇《谈政治》是对此前的《新青年》提出的巨大挑战。因为，《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57]，而该杂志之所以能够抓住许多青年的心，不是因为批评政治，而正是因为鼓吹思想和意识的戏剧性改造。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谈政治》的内容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唐突。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他说：

> 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各国的资产阶级］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从引文可以看到，虽然略嫌粗糙，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基本的概念却是不容置疑地被提示了出来。更加值得注目的是，在中国还根本未见踪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修正主义、议会主义），也被认为歪曲了马克思原意而与无政府主义一同受到长篇大论的批判。他批判说，倍倍尔（A.

Bebel）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革命，主张议会主义，从而向权力“投降”，激烈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当然，他也认为：“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但同时也警告说：“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惟一的敌人。”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标明他引用的社会主义文献是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和李卜克内西的《莫妥协，莫政治交易》（英文版）[158]，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但是，由于他已经基本上把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也可以推测他曾经读过某种文献，或者凭他敏锐的感觉抓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总之，这篇文章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式开始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谈政治》一文发表四个多月之后的 1921 年 1 月。[159] 也就是说，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颠倒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与以往的国际共运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也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容易在中国被接受。

在日本，明治时期以来的老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在 1920 年谈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曾说：“此两种国际社会主义今后将如何对抗，或者如何融和，确实也是一出好戏”[160]，“以俄罗斯之布尔什维克为中心和正宗的国际共产党新近兴起，称第三国际……反对也好，赞成也好，重要的是必须先了解其内容”。[161] 但是，陈独秀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没有顾虑这些的必要。在 1921 年 1 月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不值一提。可以说，陈独秀等中国社会主义者们，是直接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曲折后于 1919 年所达到的高度出发的。

4. 李大钊与布尔什维克文献

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李大钊很早就参考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也是极早就对俄国革命产生共鸣，对其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最有名的人物，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代表性论文是写于1918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62]等。李大钊评价俄国革命，是基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地理史观和文明观（从东西文明的角度理解俄国）。[163]不过，仅凭这一点，当然不能全面理解李大钊如何看待俄国革命。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他所利用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并对当时中国的英文版布尔什维克文献的大致状况及其性质进行探讨。

李大钊在1918年上半年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当然还没有什么能够参考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因而文章的基调显得直观而印象化；其引用的资料来自茅原华山著《人类生活史》（弘学馆书店1914年出版）、P.S. 芮恩施著《世界政治》[164]、升曙梦著《从民族特点看俄国革命与其前途》（《日本评论》第25号、1917年5月）等，都不能算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165]同年12月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则引用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载H. 威廉斯（Harold Williams）的通讯报道（原刊登日期不详），以及《隔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 London）载F. 哈里逊（Frederic Harrison）的文章（卷首论文，1918年1月），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则是借助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即 L. Trotzky, *The Bolshevi kiand World Peace*, New York: Boniand Liveright, Jan. 1918）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并大量引用了该书。山内昭人曾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一书在美国的刊行和日文版（室伏高信译：《过激派与世界平和》，上田屋1918年5月出版）的仓促出版，以及这些版本在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166]，在这里，让我们依据山内的研究，来考察李大钊是如何解读这部著作的。

首先，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李大钊依据的版本似乎不是室伏译日文版，而是英文版。[167] 日文版误译颇多，室伏本人也于出版后不久即决定毁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李大钊很可能持有英文版本，因为他介绍该书的一段文字即“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就是斯蒂芬斯（L. Steffens）为英文版所作序文的翻译。其实，英文版的这篇序文对该书写作时间的解释并不准确，并且译文和结构也存在很多问题（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改编）。早在该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美国一个社会主义者指出这些缺点说：“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标准，而是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标准来划分俄国的。……如果说［美国出版托洛茨基的这本书］尚有一个意义的话，那就是，这本书表明了托洛茨基并不是德国的爪牙，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正是英语版表明的这“一个意义”原原本本地成为了李大钊理解俄国革命的基本标准。李大钊从该书得出的结论如下：

> 可知陀罗慈基［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168]

也就是说，在李大钊的眼里，托洛茨基作为俄国革命前一名国际主义者的形象与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之一的形象互相重叠，他就是由此出发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的。断章取义地引用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的讲话来解释俄国革命，这种做法是当时的一般倾向，并不限于中国，也是美国商业出版界大肆炒作托洛茨基这本书的理由之一。虽说解释的方向有点不同，李大钊也

是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前的言论（恐怕李大钊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从而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的。这种解读方式（不可以简单地视为误解），使他对俄国革命有了独特的理解。

如前所述，此后的李大钊开始研究并借助日语文献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一直关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动向，收集有关的英语文献。在1921年写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69]一文中，他列出了三种当时可以见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英文版）。其中列宁的著作有：①《无产阶级的革命》（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②《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ndSchool印行）；③《国家与革命》。托洛茨基的著作有：④《多数派与世界平和》；⑤《俄国革命史》；⑥《无产阶级革命》。这里面，①和⑥是同一部著作，故共计五种。[170]到了这个时期，李大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已经丰富得多，比如托洛茨基曾经是孟什维克等。这大概都是他阅读英文版文献的结果。在上述五种布尔什维克文献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尤其值得注目。因为这部著作在质和量两方面，在当时美国普及的文献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因而被称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研究和把握俄国革命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山川均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是理解俄国革命最好的参考书。[171]值得注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共在1921年至1922年通过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参阅本书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之A34、35）的底本就是该书收录的《苏维埃的活动》（The Sovietsat Work，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章。与日本一样，这本书无疑对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到了巨大作用。

小　结

本章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何深受同时期日本、

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日本的关系而言，表现为恰在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更广泛地看，则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的历史的重要一幕。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之被接受与欧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思想链条”的一环。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没有国境的运动，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

粗略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俄的影响，并逐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支柱；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底本发生改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大胆地讲，借助日本接触了世界新思潮的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通过这种改变，开始借助苏俄看世界了。而从《新青年》杂志的体裁、内容的戏剧性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改变在 1920 年下半年首先起于上海。再回头看译自《苏维埃·俄罗斯》杂志的文章的对照表（表 1），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汉语译文的发表顺序与《苏维埃·俄罗斯》上发表的原文顺序不一致，有的甚至是颠倒的。这个事实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新青年》同人用做底本的《苏维埃·俄罗斯》杂志，并非定期购阅，而是于某个时期（大概是 1920 年下半年以后）分几次集中购进的。

《新青年》杂志同仁于 1920 年下半年集中购进《苏维埃·俄罗斯》，标志着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在这个时期的急剧传入。那么，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呢？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有片山潜从美国往日本寄送布尔什维克文献，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当然，上海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都市，原本就有可能住有追随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国人。比如，住在上海、向《星期评论》投稿纪念劳动节的英国籍俄国人李泽洛

维奇（Jack Lizero vitch），据说就是一位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者。[172] 不过，更应予以关注的，还是来自苏俄方面的推动，即自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来华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使者们带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改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

注释：

[1]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岩波书店1976年版）和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 Y., 1976（汉译本：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叙之甚详。

[2]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8卷5号，1921年1月。

[3] 杨纪元：《毛泽东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竹内实：《毛泽东》，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49—56页。

[4] E. H. Carr, *1917: Beforeand After*, London, 1969, pp. 8—9.

[5] E. H. Carr, *1917: Beforeand After*, London, 1969, pp. 8—9.

[6]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注意到理论、道义定位和意识形态等在现代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实际运动的巨大作用，论述了作为革命运动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因其具有“知识”而获得正当性和权威的倾向。参见Alvin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1979（汉译本：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章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现代性，即，不论在任何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催发的革命中，都可以发现“通过知识进行指导”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承载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7] 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编著：《大正文化1905—1927》重订版，劲草书房1987年版，第299页。

[8] 清水安三：《支那新人と黎明运动［中国的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第162、167页。

[9]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

绍》第1—3集（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1] 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约为80%（狭间直树等著：《データでみ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数据］》，有斐阁1996年版，第34页）。另外，帕特森（D. D. Patterson）曾推算，1920年代初期，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Leiden, 1971, p. 61；汉译本：陈曾烹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版）。

[12]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1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54页；《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同前，第64页。

[15] 要大致了解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很方便，但遗憾的是，该书有关每种副刊的叙述过于简单。

[16] 关于五四时期的报纸，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ャーナリズム［五四时期的新闻界］》（《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3函，11，同朋舍1985年版）叙之甚详。

[17]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汉译历史，以下的专著和目录较详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资料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1987年版）较全面地收录了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这些目录和资料集都没有涉及翻译底本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汉译基本上都是从日语或英语转译的，但却完全没有考察译自何种底本。

[1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19] 如果按党派系列划分，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属于研究系，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较大。关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叙之颇详。

[20] 中国有关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日本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述评，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有，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

录》，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0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版，以及后藤延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第491号，1989年）；而中国则有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综合性研究。

［21］前引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新闻界》，第107页。

［22］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译者是中共创建时期主要成员之一李达（第13页）；但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并未见其向《晨报》投稿，故王炯华的推断不无勉强。

［23］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8页。

［24］河上肇：《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载《社会问题研究》第7册，1919年7月。

［25］《晨报副刊》连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于1920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为此，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高蓚的答复。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页。

［26］前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27］《李守常启事》，载《晨钟报》1916年9月5日。

［28］一般所谓李大钊曾做过《晨报》或《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说，似乎源于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这一记述错误。后来，这种说法又和李大钊曾向《晨报副刊》投过稿一事结合起来，遂成为“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甚至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29］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承认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是陈溥贤（例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30］有关陈溥贤（陈博生）的生平，本书所依据的史料如下：叶明勋、黄雪燧：《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补排印本1970年版；支那研究会编：《最新支那官绅录》，富山房1918年版；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

文会 1937 年版；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 1940 年版等。

[31] 据笔者所见，暗示李大钊和陈溥贤之间关系的资料，只有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9 页。该文提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后，陈溥贤曾到停放李遗体的寺庙去过。据此揣测李大钊和陈溥贤在“五四”以后可能仍一直交往。

[32]《晨报副刊》1919 年 11 月 6 日。

[33]《晨报副刊》1919 年 11 月 18 日。

[34]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署名，但从内容可以看得出是出自陈溥贤之手。

[35] 渊泉：《东游随感录（十）》，载《晨报副刊》1919 年 10 月 29 日。

[36] 渊泉：《什么叫做危险思想?》，载《晨报》1919 年 6 月 29 日。

[37]《黎明会（1 月 5 日东京通讯）吉野博士》（载《每周评论》第 5 号，1919 年 1 月）好像是吉野致《每周评论》同人信的译文，其中记述李大钊曾赠送《每周评论》给吉野，而吉野则约定将赠送《黎明会讲演集》。笔者发现该文，受到赖松尾尊豪：《五四期における吉野作造と李大钊［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吉野作造：《现代宪政の运用［现代宪政的运用］》附录，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8 年版；修改后再收于松尾：《民本主义と帝国主义［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98 年版）的启发。

[38]《致胡适（1919 年 3 月）》，《李大钊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6 页。

[39] 明明（李大钊）：《祝黎明会》（1919 年 2 月，见《李大钊文集》第 2 卷，第 283—284 页）。

[40] 关于吉野作造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交流，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请参照松尾尊豪：《民本主义者と五四运动［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收于松尾：《大正デモクラシー の研究［大正民主主义研究］》，青木书店 1966 年版，修改后再收于前引《民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前引松尾：《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与李大钊》；王晓秋：《李大钊与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拙稿《吉野作造と 1920 年の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与 1920 年的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选集月报》第 14 号，《吉野作造选集》第 8 卷附录，岩波书店 1996 年版。

[41] 笔者发现该文，受到了前引松尾：《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启发。

[42] 陈溥贤 1919 年的第二次访日在 7—8 月间，在日期间应邀再次往访吉野，并就日中两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协商（渊泉：《访问吉野作造博士记》，《晨报》1919 年 8 月 16 日）。另，吉野作造日记 8 月 7 日、11 日、29 日记载了和陈溥贤来往的情况（《吉野作造选集》第 14 卷，岩波书店 1996 年版，第 214、217 页）。

[43]《李大钊等致宫崎龙介函（1920年4月27日）》，宫崎智雄藏。另，该信也收录于《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94页，但是，发信人“陈启修、陈传贤、李大钊”中，“陈传贤”为“陈溥贤”之误。

[44] 1910年，日本政府借口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明治天皇图谋不轨，实行大逮捕，残酷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结果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史称“大逆事件”。关于“大逆事件”以前的中日社会主义思潮的交流，请参阅前引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88—90页。

[45]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11页。

[46]《时事新报》（东京）1919年6月9日晚报报道。笔者发现该文，受到了金原左门：《昭和への胎动［昭和时代的萌动］》（小学馆1988年版）的启发。

[47] 关忠果等编著：《杂志〈改造〉の四十年［《改造》杂志40年历史］》，光和堂1977年版，第40—46页。

[48]《マルクス出版界を压倒する〈资本论解说〉［马克思统治出版界《资本论解说》］》，载《解放》1920年1月号。

[49]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载《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

[50]《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共同启事》，载《晨报》1920年11月27日。据该文讲，中国各报社其前未曾在欧洲派驻特派记者。同时被派往俄国做特派记者的是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

[51] 斋藤道彦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2号，1970年）和后藤延子：《李大钊とマルクス主义经济学［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6号，1992年）附有对照表，分别证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半部分是根据河上论文，而后半部分是根据福田德三的著作写成的。另外，专门探讨河上对李大钊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论文有，郑学稼：《河上肇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收于《中共兴亡史》第1卷下，帕米尔书店1984年再版；杨奎松：《李大钊与河上肇——兼谈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2期；后藤延子：《李大钊と日本文化——河上肇·大正期の杂志［李大钊与日本文化——河上肇·大正时期的杂志］》，《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报告书》1990年等。补注——最近日本出版了探讨河上肇在中国的影响的专著，三田刚史：《复活的河上肇——近代中国知识的来源》，藤原书店2003年版。

[52] 高一涵和李大钊交谊颇厚，他在回忆（《回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说，李在日本留学时（1914年至1916年）就曾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有的研究据此认定李在五四运动前既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此点，前引后藤《李大钊与日本文化——河上肇和大正时期的杂志》对高一涵回忆录的内容做了进一步剖析，证明这种认定是不正确

的。

[53] 河上肇在1919年时，虽然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存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解放人的灵魂。堺利彦把这个时期河上的思想称为“灵肉二元论”，指出其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河上肇君を评す［评河上肇君］》，《新社会》5卷7号，1919年3月）。

[54] 关于茅原华山与李大钊的关系，请参阅前引拙稿《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及拙稿《东西文明论と日中の论坛［东西文明论与日中两国的论坛］》，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近代日本对亚洲的认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版。

[55]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00—116页）引用了堺利彦《唯物史观の立场から［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三田书房1919年8月版）中的翻译和论文，由此判断，这个时期的李大钊肯定已经看过堺利彦的著作。

[56] 关于社会主义同盟，请参照藤井正《日本社会主义同盟の历史的意义——“大同团结”から“协同战线”へ［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历史意义——从“大同团结”到“协同战线”］》，增岛宏编：《日本の统一战线［日本的统一战线］》上，大月书店1978年版。

[57] 山边健太郎：《パリ·コミュ ン百年と日本［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与日本］》（《图书》1971年8月号）和后藤延子：《李大钊资料拾遗、并びに觉书［李大钊资料拾遗及备忘］》（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21号，1987年）都对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及丸山幸一郎在其中的作用有所介绍。

[58] 除李大钊外，从姓名判断像是中国人或朝鲜人的还有吕磐石、赵文谟、陈泉荣、张省吾、黄登明、林觉文、柳来祯等。另外，关于加入社会主义同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请参阅松尾尊𡈽《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年。

[59] 关于丸山幸一郎在北京的活动，请参阅饭仓照平《北京周报和顺天时报》，《朝日ジャ ナル［朝日专刊］》1972年4月21号；山下恒夫：《薄幸の先驱者·丸山昏迷［不幸的先驱丸山昏迷］》，《思想の科学［思想的科学］》1986年9—12月号。

[60] 清水安三：《回忆鲁迅——回想の中国人（1）［回忆鲁迅——回忆中的中国人］》，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1号，1968年。

[61] 不见死生（清水安三）：《李大钊の思想及人物［李大钊的思想及其人］》，《北京周报》第256号，1927年5月。

[62] 内务省警保局：《本邦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名簿［我国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名册］》，社会文库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人物研究史料

(1)》，柏书房 1964 年版，第 178—179 页。另外，与此同时，丸山还与周作人、鲁迅等中国的文学家、作家积极交流，1922 年始先于日本国内在《北京周报》上翻译介绍鲁迅、周作人、谢冰心等的文学革命成果。在当时居住北京的日本人中，丸山尤其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新文学。但是，他于 1924 年患肾炎，同年 9 月在故乡长野县病故，年仅 29 岁。

[63] 后藤延子：《李大钊における过渡期の思想——"物心两面の改造"について［李大钊的过渡时期思想——关于"物心两面之改造"］》，《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22 集，1970 年；斋藤道彦译：《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 5 号，1974 年，第 6 号，1976 年。另外，斋藤对于李大钊的引用来自被禁止发售的那期《新社会》提出疑义；但是，堺的这些文章都被收录于 1919 年 8 月公开发行的论文集（前引堺利彦《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里面，所以，自然的推断应该是，李大钊读的不是《新社会》，而应该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

[64]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 年 4 月，《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6—177 页。

[65]《李大钊文集》第 2 卷，第 277—282 页。

[66]《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8—192 页。

[67]《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 年 11 月 17 日。

[68]《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 年 2 月 6 日。不过，该藏书目录的著者名、书名不一定准确，要通过这些目录了解当时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情形，必须与其他资料核对。

[69]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前引《"一大"前后》（二）。此处所谓河上所举鸡蛋孵化小鸡的例子，原载河上《唯物史观研究》第一章，弘文堂书房 1921 年版。

[70] 五四时期前后，在北京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报道俄国革命的另一位记者，是《京报》的邵飘萍。他在 1920 年通过泰东图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失业者问题》等书，而这些书都是他自 1919 年底作为《大阪朝日新闻》顾问在日本时执笔的。如此看来，他也是一位向中国传播日本思潮的人。详见旭文编著《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4—82 页。

[71] 陈溥贤：《从北京到西贡》（《晨报》1920 年 12 月 22、23 日）记载，陈溥贤作为驻英特派记者于 1920 年 11 月 20 日离开北京，经法国赴英国。另外，有人认为陈溥贤赴英是"五四"后资产阶级资助的一系列留洋之一（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 65 页）。陈溥贤于 1922 年 10 月回国，从 11 月 1 日始重新开始在《晨报》社工作（《陈溥贤启事》，载《晨报》1922 年 11 月 1 日）。

[72]《言论压迫の喜剧——支那 LT 生より［言论压迫之喜剧——支那 LT 生投稿］》，载《新社会评论》7 卷 4 号，1920 年 6 月。据信该信为上海的某社会主义者写给堺利彦的，其中说北京政府查禁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上海没有直接影响。

[73] 严格地讲，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一派 1919 年 10 月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以，把孙中山一派人士称为国民党员是不恰当的。此处为了方便，将他们称为“国民党系人士”。

[74] 关于国民党系人士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活动，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年版）以及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叙之甚详。

[75] 同为国民党系的谢英伯说，他在五四时期以前就在上海开设了“马克斯派社会主义讲习会”，主张自己才是“中国共产派之提倡最先者”（《谢英伯致大光报函》，《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5 月 14 日）。谢英伯在美国留学时（1914 年至 1916 年）经江亢虎介绍入兰德学校（Rand School）学习。回国后，任“中国社会党筹备处”主任，以期等待江亢虎回国（1917 年 6 月），重建中国社会党。但是，重建未成，江一个多月后即回美国，中国社会党在这个时期的重建似乎无果而终。谢英伯在自传（《人海航程》）里以及《广州民国日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许是指追随江亢虎社会党的某种活动，或者是指他自己也曾参与过 1922 年初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谢说他也曾进行过言论方面的工作，但其内容无从确认。这方面的情况，请参照谢英伯《人海航程》，《革命人物志》第 19 集，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 年版，第 350、353 页；《社会主义家组织政党之筹备》，《民国日报》，1917 年 6 月14 日。

[76] 李人杰（李汉俊）：《改造要全部改造》，载《建设》1 卷 6 号，1920 年 1 月。

[77] 比如胡适、廖仲恺、胡汉民《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载《建设》2 卷 1 号，1920 年 2 月。

[78] 关于清末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密不可分，请参阅前引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 133—136 页。

[79]《建设》杂志的编辑中用“民意”作笔名的有胡汉民和朱执信，但是，建设社在朱故后的 1921 年编的《朱执信集》，将《建设》杂志上署名“民意”的文章都作朱执信著而收录在内。另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也把署名“民意”的文章（包括《建设》1 卷 6 号所载信函）作朱执信著收录。的确，由于胡汉民也曾参与编辑《建设》，难以完全否定“民意”是胡汉民的笔名的可能性。但是，既然建设社也把署名“民意”的文章作朱著，此处也取“民意”即朱执信笔名的立场。

[80] 关于戴季陶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请参阅前引吕芳上《革命之再起》；汤本国穗：《五四运动状况における戴季陶——“时代”の方向と中国の进

む道［五四运动形势下的戴季陶——“时代”的方向和中国前进的道路］》，《千叶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B—19，1986年。

［81］《建设》1卷4号—3卷1号，1919年11月—1920年12月；《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2—7日。戴季陶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似乎原拟连载后即出版单行本（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译者序），但是实际刊行延至1927年（考茨基著，戴季陶译，胡汉民补译：《资本论解说》，民智书局1927年版）。

［8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第7页；《袁振英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第472页；以及《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1967年版，第27—28页。

［83］关于王光祈与工读互助团运动，请参阅小野信尔《五四运动前后の王光祈［王光祈五四运动前后］》，《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22号，1990年。

［84］李守常（李大钊）：《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1920年4月，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4页。

［85］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载《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

［86］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载《晨报》1919年12月1日。

［87］从《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和《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4日）可以看出，陈独秀注意到了杜威的“民治论”，并主张将其应用于中国。

［8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97页。

［89］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载《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8月26日。

［90］戴天仇（戴季陶）：《三民主义》，载《解放》1920年2月号。这封写给堺利彦的信日期为“民国8年［1919年］1月7日”，但文中写到将另寄《星期评论》新年号（《星期评论》1919年6月创刊，1920年6月停刊），由此判断，“民国8年1月7日”应为“民国9年［1920年］1月7日”之误。信中谓李君佩翻译的考茨基著作连载于《闽星》杂志，但中途停载。

［91］戴季陶：《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原载于1920年7月的《黑潮》2卷1号，此处引自《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17日的转载。

［92］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93］戴天仇：《反响》，载《解放》1920年12月号。《解放》杂志是大镫阁发行的。

［94］平记念事业会编著：《平贞藏の生涯［平贞藏的一生］》，非卖品，1980年版，第101—102页；宫崎龙介：《新装の民国から［新气象民国通信］》，《解放》1919年12月号。宫崎龙介和李汉俊是在东京帝国大学结为朋友的。

[95]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皆载于《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

[96]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年版）有关民生主义部分；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97] 有关朱执信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引狭间《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第3章叙之甚详。

[98] 舍译：《共产党的宣言》，载《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李泽彰译：《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载《国民》2卷1号，1919年11月。

[99] 陈望道的生平，请参阅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0] 最具代表性的为Bert Andrea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Histoire et Bibliographie 1848—1918*, Milano, 1963（安德烈亚斯：《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历史与书目》）。

[101] 从书志角度考察日语版《共产党宣言》的有，大岛清：《日本语版〈共产党宣言〉书志》，收于栉田民藏著、大内兵卫补修：《〈共产党宣言〉の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青木书店1970年版；盐田庄兵卫：《〈共产党宣言〉の日本语译をめぐって［关于《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之研究］》，《季刊科学と思想［季刊科学与思想］》第69号，1988年；石堂清伦：《堺利彦と〈共产党宣言〉その他［堺利彦与《共产党宣言》及其他］》，《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0号，1997年等。

[102] 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另外，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认为陈望道从杭州回义乌的时间是1920年4月13日。

[103]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第20页。

[104]《俞秀松日记》1920年6月27日、28日条，《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105] 伍仕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任武雄、陈绍康：《〈共产党宣言〉陈译本出版时间补证》，《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说校订者是陈独秀和李汉俊，是玄庐（沈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30日。

[10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前引邓明以《陈望道传》，第38页。

[107]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刊行后第二个月即1920年9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

刷，可见当时非常受欢迎。前引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说，《共产党宣言》刊行后，不少人来函询问该书是何处发行。

[108] E.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61, p. 155；汉译本：《斯诺文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1984年版，第135—136页。

[109]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前引《"一大"前后》（二），第192—193页。

[110] 研究留日学生与中共建党的论文有，王奇生：《取径东洋、转道人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彭焕才：《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111]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第68页。

[112]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第52页。

[113] 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114]《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

[115]《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月23日。

[116]《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6日。

[117]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译者序。

[118] 前引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

[119] 前引李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120]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4—35页；前引邓明以《陈望道传》，第13页。如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述，施存统与堺及山川确有接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陈望道也与他们有过接触。

[12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52—153页。

[122] 晋青（谢晋青）：《日本社会运动家底最近倾向》（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3月14日）之陈望道附记，以及前引《言论压迫之喜剧——支那LT生投稿》。

[123] 该文原文（日语版）未收入《山川均全集》，据此推测，可能是专门为《新青年》而作。据山川论文的译者说明说，《新青年》也曾向堺约请文章，但因堺太忙未获成稿。另外，中共在成立后不久，曾把堺和山川对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的见解印成小册子，在上海等地散发了约五千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124] CT（施存统）：《介绍〈社会主义研究〉》，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

9月27日。

[125]《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第369—370页。

[126] 一纯：《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皆载于《劳动》第2号，1918年4月。较早而稍详细地介绍列宁和托洛茨基生平的文章，还有今井政吉著，超然、空空译：《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载《解放与改造》1卷2号，1919年9月。

[127] 这四篇文章是，①金侶琴译：《俄国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15、16、19日，原文为《告贫苦农民》，1903年，转译自Robert Crozier Long翻译的英文本；②侶琴（金侶琴）译：《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载《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原文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7年，转译自Crozier Long翻译的英文本；③郑振铎译：《俄罗斯之政党》，载《新中国》1卷8期，1919年12月，原文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7年，转译自英文版（收于Clara E. Fanning, comp., *Selected Articles on Russia; History, Descrip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18）；④侶琴（金侶琴）译：《建设中的苏维埃》，《解放与改造》2卷6号，1920年3月，原文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译自英文版。前引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中不包括①和④。关于在这个时期翻译列宁著作的金侶琴（原名金国宝，1894—1963）的生平，请参阅钟凤《金侶琴——最早中译列宁著作的人》，《人物》1984年第6期。

[128] 有关堺利彦、山川均、高畠素之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以及布尔什维克文献向日本传播的研究论文，最早的是村田阳一：《最初に日本へ绍介されたレーニンの文献［最早介绍到日本的列宁著作］》，载《经济》第72号，1970年。但是，山内昭人：《ボリシェヴィキ文献と初期社会主义——堺·高畠·山川［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畠、山川］》（《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0号，1997年）要详尽得多。

[129]《李宁的谈话》（《星期评论》第16号，1919年9月）中戴季陶的附记。

[130] 上海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1920年3月25日的报道在中国最早刊发了《宣言》全文（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稍早用汉语报道宣言概要的，是2月24日的《民国日报》。4月3日，北京的《晨报》对全文做了报道，4月5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发了宣言全文。

[131] 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到底有无明确表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字句，以下几篇论文进行了探讨。伊藤秀一：《第一次カラハン宣言の异文について［关于第一次加拉罕宣言的异文］》，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第41号，1968年；藤井升三：《中国革命と第一次カラハン宣言［中国革命与第一次加拉罕宣言］》，《アジア经济［亚洲经济］》10卷10号，1969年；М. С. Капица, Важнейший документ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9, No.2（贾丕才：《苏中关系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载《远东问题》）。但是，李玉贞：《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谈起》（《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55—56页）确认，1919年8月外交人民委员部印刷的中文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确曾明确表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

［132］《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

［133］中文版转译自美国杂志《解放者》（*The Liberator*）1920年6月号。原文是《在俄共（布）第八次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

［134］《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35］《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前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9—10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136］前引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49页。

［137］同前。

［138］关于《新时代丛书》，请参阅陈绍康、萧斌如《介绍〈新时代丛书〉社和〈新时代丛书〉》，《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另外1923年在日本秘密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河上文库藏），其封面也模仿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但是握在一起的两只手中间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

［139］山内昭人：《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研究——片山潜·ボリシェヴィキ·アメリカレフトウィング［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片山潜·布尔什维克·美国左翼］》（ミネルヴァ书房［MINERVA书房］1996年版，第167、310页）。该书资料调查翔实，本书有关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许多书志性叙述以该书为据。

［140］芝加哥的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社，创设于1886年，1899年开始出版社会主义书籍，低价刊行原来稀少昂贵的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贡献颇大（Charles H. Kerr, *What Socialism is*, Chicago, n. d., p. 21）。

［141］出版年份不详，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藏本购于1917年，该书1927年曾再版。1920年前后，是可能在书籍上看到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的。

［142］The odore Draper, *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57, pp. 178—184. 下文中，关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政党动向等，除特别注明外皆依据此书。

［143］远山茂树等编：《山边健太郎·回想と遗文［山边健太郎·回忆和遗文］》，

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0年版，第222页。

［144］柯柏年：《我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简单经历》，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9页。

［145］恽代英等人的互助社机关刊物《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我们的消息》栏有“代英近来规定每日读书或作文七小时。……他所译《阶级战争》一书，预备半月内译完”的通报（前引《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200页）。据此推断，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开始翻译《阶级争斗》的时期大概是1920年秋。发现这件史料，得益于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的启发。

［146］K.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Erfurt Program*］, trans. by William E. Boh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 1910.

［147］《*The Communist*》第1号（1920年8月5日）上文章（Arthur Mc Manus, The Taskawaiting the Communist Party）的译文，刊登在《共产党》第1号（震寰译：《共产党未来的责任》）。

［148］有关英译《国家与革命》各种版本的刊行情况，请参阅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第301—302页。

［149］《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准确地讲，应该是“美国共产党”统一派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合并后结成的“美国统一共产党”（The 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于1920年5月所制定的“章程”和“纲领”（*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Report of the Joint Legislative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Seditious Activities, filed April 24, 1920, in the Senat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ol.2, Albany, New York, 1920, pp. 1859—1901; Draper, op. cit., pp. 218—222）。

［150］《共产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最初似乎刊登在美国左翼期刊《团结》（The Solidarity）1920年8月14日号上（Draper, op. cit., p. 435），但《共产党》所载译文译自美国杂志《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

［151］前引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54页。

［152］同上书，第153页。

［153］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第117—128页。

［154］关于五四时期中国新闻界介绍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情况，资料集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下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论文有徐有礼《五四前后中国报刊对共产国际的介绍》，《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1期。

［155］前引《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5—26页。

［156］同上书，第154—164页。关于《谈政治》在《新青年》历史上的地位，请参阅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の思想世界——《新青年》の群像［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新青年》群像］》，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296—320页。

[157]《通信》，《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158] W.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trans. by A. M. Simons and M. Hitch,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 1911.

[159]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前引《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41—256页。

[160]《时评》，《新社会评论》7卷2号，1920年3月。

[161]《海外时潮》，《新社会评论》7卷4号，1920年6月。

[162] 皆收于前引《李大钊文集》第2卷。

[163] 详细请见前引拙稿《东西文明论与日中两国的论坛》。

[164] P.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New York, 1900. 另外，该书有日译本（高田早苗抄译：《帝国主义论》，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版），但李大钊的引用似来自原书。

[165] 美国学者德利克（A. Dirlik）指出，李大钊的“法兰西之革命……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的观点，是受了《劳动》第3号（1918年5月）刊登的劳人《李宁之解剖》的影响；该文说：“法兰西—革命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A.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1989, p. 27）。

[166] 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第304—305页；前引山内《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嵜·山川》。

[167] 托洛茨基的这部，后来被从英文版译成汉语（舍我译：《广义派与世界和平》，载《解放与改造》1卷7号，1919年12月。但未继续译载）。

[168]《Bolshevism的胜利》，前引《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5页。

[169] 前引《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98—122页。刊登该文的《新青年》9卷3号（底页发行日期1921年7月1日）的实际刊行时间应为8月下旬到9月之间。根据有二。其一，该期刊登的公博（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有关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录；其二，该期所登广告称已经出版的《共产党》第5号在广州出现是在9月初（《广东群报》1921年9月2日广告）。

[170] 原书分别如下。①N. Lenin/L. Trotzky,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Chapters by Louis C. Fraina, New York: Communist Press, 1918; ②N. Lenin, *The Soviets at Work.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1918; ③《国家与革命》的英语版本未能确定；④L. Trotzky, *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18. ⑤L. Trotzky, *From October to Brest-Litovsk*, New York: Social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19;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London: Leo & Unwin, 1919. 包括《国家与革命》的英语版在内的各种书籍的刊行情况及内容，前引山内《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叙之甚详（第295—307页）。

[171] 前引山内《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莓·山川》。

[172] 李泽洛维奇投稿、李汉俊译：《五一》，《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关于李泽洛维奇在上海的活动，有的论文利用英国外交档案进行了研究（李丹阳：《在沪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未刊稿）。

第二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节　鲜为人知的“密使”

1. 苏俄接近远东

俄国共产党（布）（以下简称“俄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正式开展工作，始于1920年春派遣格里戈里·N. 魏金斯基（Grigory Naumovich Voitinsky）一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国。不过，魏金斯基赴华，既是试图影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一直推行的接近西伯利亚和远东工作的一个结果。让我们首先从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1919年）开始，对魏金斯基赴华前的背景作一回顾。

1919年3月，还在俄国革命后的内战和干涉战争硝烟四起的时候，由俄共主导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世界性大会，旨在创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以取代以往的社会主义国际。在这次有纪念意义的大会上，没有安排时间讨论、事实上也没有怎么讨论殖民地问题和东方问题，但与会者中却有两名中国代表。他们是刘泽荣（刘绍周）和张永奎[1]，其中刘绍周受到了列宁的接见，还在大会上发了言。[2] 他们的身份是“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Chinese Socia list Labour Party）[3] 的代表。但是，这个党不是中国本国的组织。他们是侨居俄国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是为了参加大会而成立的纸上政党。

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有40万—50万中国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远东一带。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劳工，据

说，俄国革命爆发时，仅莫斯科就有3000中国人。[4] 革命后，这些中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也响应革命而成立了各种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就是刘泽荣和张永奎等留学生组织的“中华旅俄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их Гражданв России，1917年4月成立于彼得格勒），以及十月革命后由该组织发展而成的“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их Рабочихв России，1918年12月成立于莫斯科，会长是刘泽荣）。这个联合会受到苏维埃政府的承认，一方面帮助贫困的中国工人回国，同时作为事实上的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展活动。[5] 刘泽荣等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上所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就是这个“旅俄华工联合会”。

其后，“旅俄华工联合会”扩大了活动规模，并建议苏维埃政府向中国派遣代表，同时，1920年6月25日在会内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при РКП（б），7月1日得到俄共中央委员会承认），成为实际上的党组织，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大会时，仍然以“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名义，选派了刘泽荣和安龙鹤[6]两名代表参加会议。在这次大会期间的7月25日，刘泽荣还在莫斯科与马林（H. Maring）和朴镇淳（D. Pak，朝鲜革命家）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一事进行了协商。[7] 人们都知道，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开始把眼光朝向东方[8]（共产国际指导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于此次会议后的9月在巴库召开）；殊不知，与此同时，在俄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活动，还为在远东和中国国内开展工作而加紧准备着。

另一方面，在内战仍在激烈进行、列强的革命干涉军队仍未撤退的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境内，从1919年初也开始了对远东各国的接触。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情报宣传机关，以“与东方及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联

络，组织同他们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煽动工作”。[9] 该局成员之一加蓬（F. I. Gapon）于同年6月18日写的专题报告称，必须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加蓬的计划还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势力建立密切关系，并对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援助。[10] 有人说，“1919年是苏俄与外部世界完全孤立的一年”[11]，就西伯利亚来看，托木斯克、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这些重要城市确实还在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控制之下；但是，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们已经把视线投向远东。

在这种情形下，曾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一带活动、当时正在莫斯科躲避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V. D. Vilensky-Sibiryakov，俄共党员），于8月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不久获政治局批准，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离开了莫斯科。他赴任时接受的使命是：①鉴于日本、美国、中国三国的利害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②唤起中国、蒙古和朝鲜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③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④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12]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9月进入西伯利亚，在那里活动到年底；后来，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1月），遂于2月14日携杨松（Ya. D. Yanson）抵达伊尔库茨克，后再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并留在了那里。[13] 这时，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远东州委（此时仍处于地下状态）在1月刚刚发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通报说，准备与中国革命家建立经常性联系。[14] 在这种形势下，威廉斯基不仅出席了在尼科里斯克召开的俄共远东地区代表会议，向驻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军司令官提议日本与苏俄建交等[15]，忙于解决远东的悬案，后来还亲自去了中国（后叙）。同年4月，魏金斯基一行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去中国，就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指示的。

2. 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一）——布尔特曼

在叙述魏金斯基访华之前，有必要对曾先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活动的几个革命派俄国人（包括非布尔什维克）进行考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我们只能在零星的警方记录或回忆录中知道他们的存在；事实如何，扑朔迷离。不用说，他们并不一定是有组织地活动，所以，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正式记录留存下来。又由于西伯利亚、远东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形势异常复杂，他们的背景关系也不易理清。尽管如此，把支离破碎的记录拼接起来，也还是能够依稀看得出他们的形象。

作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最早进行接触的俄国使者，布尔特曼（N. G. Burtman）这个俄国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布尔特曼在加鲁尚茨（Garushiants）于原苏联时期进行的研究[16]中最早被提及，又因迈斯纳（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7]而为一般学者所熟知。迈斯纳的这部著作开辟了美国李大钊研究的滥觞。加鲁尚茨和迈斯纳对布尔特曼的记述，都是以缪勒尔（A. A. Muller）1957 年写的回忆录[18]为依据的，据说缪勒尔曾与布尔特曼共同在中国工作过。缪勒尔这样回忆道：

> 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在 1919 年 9 月与布尔特曼会面时，他依然和学生们保持联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
>
> 我们向中国学生们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1920 年 1 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四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确立了联合，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

作。[19]

看来，1919年前后，布尔特曼等已经与李大钊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了接触。但是，由于缪勒尔当时的行踪不清楚，难以推断更具体的时期。

据后来出版的布尔特曼的传记[20]载，布尔特曼1900年生于敖德萨。1915年前后全家迁居哈尔滨，布尔特曼在哈尔滨上中学时得知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1918年夏成为俄共哈尔滨秘密支部的成员。后就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1919年2月因煽动学生运动被开除。回哈尔滨后，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3月接受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指示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他到天津后，在俄籍美国人斯坦因伯格经营的公司（可能是石德洋行[Steinberg & Co.]）工作，同时与天津、北京的学生以及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1919年春）；1920年1月15日接受组织决定离开天津。在这部按缪勒尔回忆录写就的传记中，布尔特曼与李大钊有过两次接触，都有相关的具体数字，但是没有注明根据所在。

这部传记给人的印象是，布尔特曼被派往中国内地，是布尔什维克有组织的活动的一环，这点却颇令人怀疑。因为，布尔特曼死（1921年初）后的悼词中只写到，他被驱逐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后，“返回哈尔滨，在铁路工人中进行地下宣传鼓动工作，1919年初加入俄国共产党。1919年中期，高尔察克发动军事攻势，他不得不逃往中国”。[21]关于布尔特曼与李大钊等中国人的交往，悼词也只字未提。再加上，在布尔特曼所属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12月写成的报告[22]中，列举了几个曾经在中国活动的俄国人，却根本没有提到布尔特曼的活动。考虑到上述缪勒尔的回忆录是在为中国革命献身的李大钊被赞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后才写就的，我们难以断言布尔特曼和缪勒尔接触的就是李大钊其人。纵然他们确实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过，恐怕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是

布尔特曼个人交际范围内的事。

布尔特曼在1920年初取道蒙古回国，3月初到达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成为远东共和国政府的一员，同年6月抵达伊尔库茨克，在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工作，该局设东方民族处后，就任该处主席，主持该处的日常工作，直至去世。[23]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布尔特曼就任东方民族处主席，与他在中国内地的活动经历恐怕不无关系；而他任上工作突出，所以就倒过来把他过去的经历也一并解释为曾经与中国社会主义者有交往。

3. 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二）——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

如果说布尔特曼是在华北活动的神秘“使者”，那么，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地下活动的，则是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这三个俄国人。让我们首先来看波波夫。[24]

查普曼（H. O. Chapman）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苏俄密使“波波夫”（M. Popov）的名字。该书称，波波夫于1919年受苏俄派遣来华调查中国情况，数月后回国提出了报告，于是，1920年苏俄派来了使者，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25] 这个见解，后来被骆传华所继承，并写进《今日中国劳工问题》（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出版）一书（第39页）中：“1919年俄人包朴甫到上海调查中国有无传布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920年苏俄共产党遂派员至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

根据英美的外交文件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件，波波夫（别名“斯莫尔斯基 Smolsky”）一共来过上海四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5月和波德伟斯基（Podvoisky）一起从俄国到上海；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来过一次，1920年（年初和7月）来过两次。据说，他来华前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的现役军人，派其来华的是该军区布尔什维克组织，或者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

员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先斯基（A. Voznesensky）；他计划在上海建立情报局，主要接触的是张墨池、景梅九等无政府主义人士，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也有所接触。[26]日本外务省的文件[27]也报告说，波波夫与上海的“过激派机关报 Shanghai Life”（关于俄语《上海生活》报后叙）有关系；还有消息说，1920 年 10 月，他负责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

关于波波夫活动的资料只有以上警方记录，没有发现派他来华的俄国方面的文件。警方资料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把一切可疑的俄国人都看成布尔什维克或“过激派”；因此，这些资料不一定准确地记录了波波夫的活动。不过，波波夫与魏金斯基来华后正式展开的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是事实。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断言，他在 1918—1919 年来华时，已经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任命的正式“使者”。与上述布尔特曼一样，他的来华和活动，与其说是有组织的，也许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顺言之，波波夫于 1921 年春由上海去北京，后来好像回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28]，似乎再也没有到中国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加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

和波波夫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活动的，是阿格辽夫（A. F. Agarev）。我们先来看警方有关阿格辽夫的记录。驻上海的日本武官 1920 年 3 月的报告称，据驻沪俄国武官的情报，“俄国人阿格辽夫正与李仁杰［李汉俊］、吕运亨等密筹，计划发行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29]李汉俊，不用说是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人物之一，而吕运亨则是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志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于同年 5 月报告说，“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阿格辽夫”2 月由上海经天津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数日后再度来华，5 月 15 日旋又离开上海，经北京往符拉迪沃斯托克。[30]看得出，这个时期的阿格辽夫频繁穿梭于远东各地。他的头衔是“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而他在 1918 年 6 月末苏维埃被政变推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会复活后，

确实曾经做过市长，按党派立场来说，阿格辽夫是孟什维克。[31] 1920年1月，由革命诸党派组成的沿海州地方自治政权成立后，他被这个临时政权派往中国进行外交交涉[32]，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上海的社会主义者的。事实上，在俄共方面1920年12月的报告中，阿格辽夫是被当作魏金斯基受派来华前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来记述的。[33] 但他与魏金斯基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却完全不得而知。

与阿格辽夫不同，波塔波夫（A. S. Potapov）由于为魏金斯基在中国打下了开展工作的基础而引人注目。[34] 波塔波夫原为沙俄帝国的高级将领（少将），20世纪初在远东服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5月被派往中国，十月革命时正在中国，革命后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提供远东的军事情报。一个时期似乎曾在日本，但1919年12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以后一直在中国。[35] 波塔波夫在上海期间（1919年12月17日—1920年4月22日）[36]，1920年3月与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戴季陶、孙伯兰等名士有过交往，据说曾计划发行“过激主义之书报”[37]；4月末曾和朝鲜著名社会活动家吕运亨一起，到过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控制下的福建省漳州（闽南护法区）[38]，29日与陈炯明会谈，提出对陈的革命活动予以援助[39]；同年5月22日，波塔波夫还加入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大同党”（后叙）。

关于波塔波夫当时的身份，曾在上海与他有过接触的美国记者索科尔斯基（G. Sokolsky）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 S. Cunningham）密报说，波塔波夫“表面上像个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信任”。[40] 从这个角度讲，波塔波夫与上述布尔特曼、波波夫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他和波波夫等的很大不同在于，他通过活动取得的情报肯定传递到了苏俄方面，而这些情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俄的对华工作。陈炯明在接受波塔波夫的访问后写给列宁的信，通过波塔波夫送到了莫斯科，并被附以“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

主义者”的注释，刊登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上。[41] 人们都知道，后来苏俄在中国最初的合作对象就是陈炯明。本书无暇探讨孙中山、陈炯明等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42]，但是，陈炯明给列宁的表示全面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信，无疑使苏维埃方面给予了陈炯明很高的评价。

波塔波夫在上海和漳州收集的情报，有些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动向的，也提供给了苏俄方面。比如，1920年5月1日，他在漳州看到当地举行庆祝“五一”盛大活动，这种情形通过他也报告给了上述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并与他接触过的上海学生领袖的情况一同在威廉斯基的文章中被介绍了出来。[43] 1920年4月来华的“正式”使者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有一段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44]，看来魏金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而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也在这个时期报告说，“波塔波夫从其头领‘塔拉索夫’［魏金斯基的化名］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45]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波塔波夫是威廉斯基——魏金斯基这条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渠道上的重要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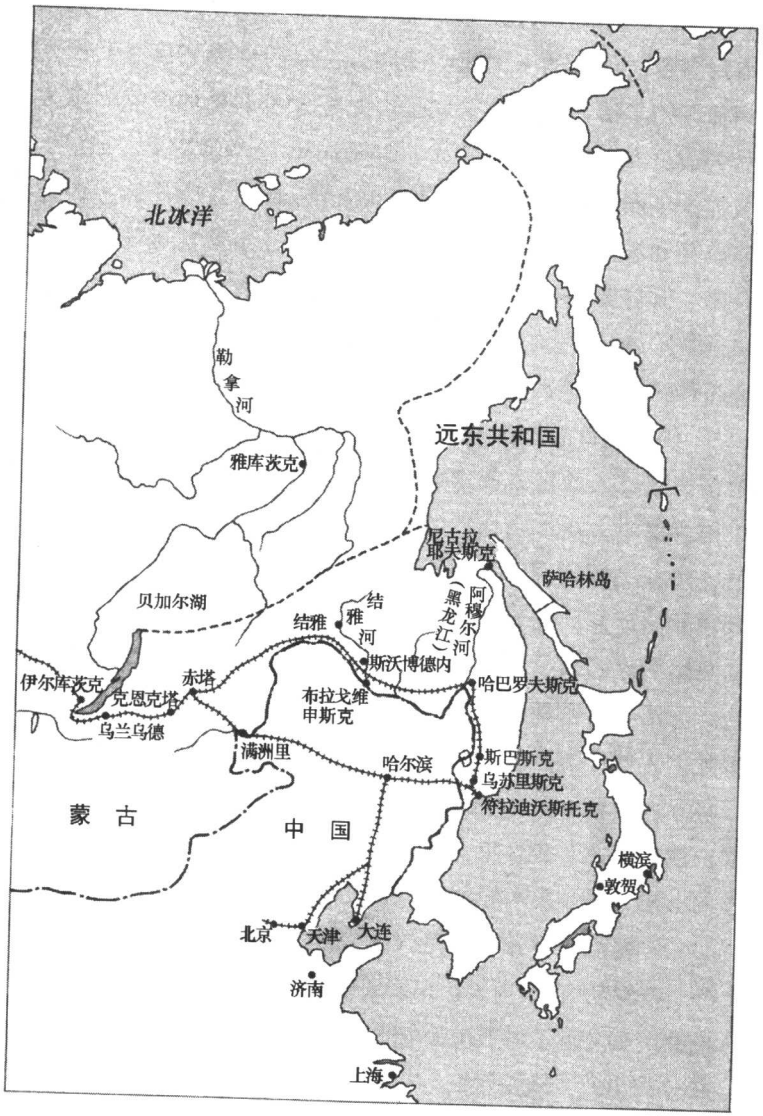
波塔波夫还与提供布尔什维克书籍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事有关。他曾报告说，“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列涅［音译］，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刊物上”。[46] 不清楚这里所说的小册子指的是什么，但所谓“李列涅”（Li Rienie，ЛиРиение）就是李人杰（Li Renjie），即指李汉俊，而在共产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在《新青年》八卷三号（1920年11月）上翻译发表的《我们要从哪里做起?》。[47]

波塔波夫从漳州回到上海后，6月初会见了孙中山，向他介绍了苏俄的情况。但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不同，态度十分慎重。他不久后就离开了上海，1920年秋，经欧洲回到了莫斯科。[48]

4. 俄西伯利亚、远东的对华工作机关

苏俄的对华工作分为好几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的系统。这些系统不仅相互间关系复杂，而且因内战局势的发展而时常改组，仅弄清其变化过程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了一个缓冲的远东共和国（Far Eastern Republic），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情况更加混乱。上述布尔特曼、波波夫、波塔波夫等“鲜为人知的密使”们的活动背景难以澄清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组织系统上的混乱。很长一个时期，学者们连1920年4月来华的魏金斯基到底是俄共的使者，还是共产国际的使者也搞不清。[49] 魏金斯基来华后，俄西伯利亚、远东党、政府、共产国际等各系统杂乱交错的状态仍然持续了一个时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也复杂起来。为了理解其之所以复杂的背景，有必要对西伯利亚、远东的俄共地方党组织和对华工作机关的沿革作一鸟瞰。[50]

首先看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即1918年12月17日成立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以下简称“俄共西伯利亚局”），和1920年3月3日成立的俄共远东州委。前者是为了贯彻执行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工作，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关，而后者则是为了管辖即将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党组织，分别在鄂木斯克和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成立的，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又分别迁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新西伯利亚）和赤塔。远东州委刚成立时是俄共西伯利亚局的下级组织，同时，因为远东全境尚未统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设了分局。这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内设有外国处，作为对外工作机关。远东州委升格改组为与俄共西伯利亚局同级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以下简称“俄共远东局”），是1920年8月的事。[51]



苏维埃俄罗斯所属远东周边地图（1920—1921 年）

而托木斯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则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了东方民族处，并以此为对外工作的窗口。当时，伊尔库茨克有许多侨居俄国的中国人、朝鲜人，他们也为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而开始了活动，据说这就是设立东方民族处的背景。东方民族处的成员有冈察洛夫（N. K. Goncharov）、布尔特曼、加蓬，后来又加入了布龙斯泰因（M. N. Bronshtein），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布尔特曼和布龙斯泰因两个人。该处自一开始就按民族设置了下级科室，阵容颇整齐。下级科室有中国科（阿勃拉姆松［M. M. Abramson］、霍赫洛夫金［V. Hohlovkin］）、朝鲜科（格尔舍维奇［Gershevich］）等；因为没有懂日语的人才，暂时没有设日本科。[52]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科里没有中国人。据说阿勃拉姆松和霍赫洛夫金二人的汉语都很好；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在当地众多的中国侨民中，找不到合适的共产主义者。由于各机关间的派系矛盾，东方民族处（以及俄共西伯利亚局）与俄共远东州委（以及其领导的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却并不协调。东方民族处屡屡向莫斯科递函表示不满，说由于远东州委和远东共和国政府的阻挠，无法与远东地区取得联系；同年秋，又直接要求共产国际将该处纳入共产国际系统，以避免远东共和国从中作梗。[53]

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工作机关渐次形成的时候，俄共中央于1920年9月2日决定，把中国侨民团体在莫斯科成立的上述“俄国共产华员局”迁至远东，改称“远东俄国共产华员局”，并令其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直接联络、从事活动。[54] 该举措大概是为了扩充该处人员。于是，诞生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组织终于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从事活动的根据地。

再来看共产国际系统，其对华工作的准备工作也是自1920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如前所述，同年7月，马林、刘泽荣、朴镇淳等人曾于莫斯科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一事进行过磋商，后来，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8月决定，在世界各重要地区派驻驻外代表，并指定马林为驻上海代表。[55] 9月15日，该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在远东设立共产国

际书记处。[56] 决定做出后，上述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遂反复要求把共产国际的书记处设在该处。开始时，共产国际书记处似乎准备设在远东共和国首都、同时也是俄共远东州委所在地的上乌丁斯克（或赤塔）。[57] 后来，围绕远东的书记处应该设在哪里，以及如何统一山头林立的各机关进行了反复探索——此处不便详述——，最后，1921 年 1 月，根据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分别于 1 月 5 日和 15 日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Дальневост очныйсекрета риат ИККИ）设在了伊尔库茨克。根据该决定，东方民族处撤销，其原有成员编入远东书记处，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代表团的不少工作人员也纳入了该书记处的机构。至此，原来分属共产国际、东方苏俄外交组织、党组织的对华工作机关，基本上统一到了共产国际系统里。

但是，东方民族处（伊尔库茨克）和俄共远东州委、远东共和国（上乌丁斯克、赤塔）之间的摩擦并未就此完全消释，因为远东共和国虽说在苏俄控制之下，却在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展对华交涉。[58] 远东共和国的正式对华外交交涉，始于以优林（M. I. Yurin）为团长的代表团（名义上是商务代表团）访华；该代表团于 1920 年 8 月 26 日到达北京。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在中国开展活动，包括文件传递、汇款等技术方面，不得不借助当时在北京合法活动的优林代表团的力量。资金和情报必须经过北京—赤塔这条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了远东共和国政府以及俄共远东州委的介入。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就是在苏俄的对华工作窗口尚未统一的时候来到中国的。

第二节　魏金斯基的活动

1. 魏金斯基一行来华

作为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其后数次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影响的格里戈

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是于1920年4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的。当时，他才刚刚27岁。派遣他的，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

魏金斯基来华，按上述苏俄对华工作机关的演变来讲，是在其中的主要机关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以前，因此，起初可能是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独自进行的对外工作之一。事实上，在后来东方民族处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59]（以下简称《报告》）中，魏金斯基一行赴中国确实被看成俄国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城市在远东独自进行的行动之一。他被派往中国的1920年4月，正值身负俄共政治局使命的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期间，而威廉斯基的使命是“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因此，威廉斯基肯定与派遣魏金斯基一事有关。当时的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势力相当大，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沿海州政府主席尼基福罗夫、交通部长库什纳列夫都是靠该分局的支持进入政府的。[60] 另外，当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尽管仍然有日本军队驻扎，但依然是对外交通的枢纽，这也是先于内地的伊尔库茨克、赤塔向中国派遣“使者”的重要背景之一。

魏金斯基于1893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1907年自学校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事务会计等，1913年为谋生计赴美，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在美国、加拿大生活约五年之后，1918年春回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斗争，因而遭逮捕，被判刑流放萨哈林岛。伏刑期间举行暴动，1920年1月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活动。[61] 他不会汉语，被选拔为赴华使者，大概是因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语，培养了他的政治感觉。

据《报告》称，魏金斯基一行由他本人和“两名助手季托夫（Titov，东方学院毕业生）和谢列勃里亚科夫（B. I. Serebryakov，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全权代表。关于季托夫，只知道

他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62]的毕业生；而谢列勃里亚科夫就是那位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屡见其名的金万谦。[63]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报告》没有明确叙述魏金斯基一行的任务，但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活动推测，他们的任务应该是调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社会运动，物色社会主义者，倘若可能，则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报告》只说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上海）”，没有提到所取的路线——尽管从当时的交通情况判断，一般应该走海路。他们可能先到天津、北京，然后又去了上海，也可能径直去了上海。不过，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信[64]里写到经由北京收到了电报，还报告了天津的联络地址；所以，先到北京的可能性要大些。当时接触过魏金斯基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也说，他先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然后按李大钊的意见去了上海。[65]在这里，我们就当作他先到了北京。

据以往的说法，魏金斯基一行中还有担任翻译的杨明斋（旅居俄国的山东籍侨民）和马马耶夫（I. K. Mamaev），而《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两个人，故在此稍加考察。一行人中有杨明斋和马马耶夫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录。[66]杨明斋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01年，为生活所迫到了俄国，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做过多种工作。也有人说，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事组织中国劳工的工作，回中国以前，担任“华侨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俄共从事秘密工作。[67]

关于杨明斋，除包惠僧外，还有人回忆他与魏金斯基一同来北京；其中有的回忆录还说，曾听杨明斋本人谈过魏金斯基和李大钊接触的经过。[68]如后文将要探讨的那样，很明显，杨明斋也在上海与魏金斯基一同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所以，估计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即开始他也许并非正式成员，但是，从魏金斯基在北京开始活动时，他就加入了进去。杨明斋后来在自己写的个人履历中，将自己的来华时间写为1919年末[69]，如果

这个时间无误，那么，杨明斋很可能是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因故回国，而在魏金斯基来华后又与其会合的。

关于马马耶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魏金斯基等人自北京到上海时，他留在了华北[70]；另一种说法是，他当初就没有加入魏金斯基一行。[71] 而后一种说法大概是正确的。因为据《报告》记载，马马耶夫是魏金斯基出发后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国处成员之一，后来又与阿勃拉姆松一起在哈尔滨从事活动。而说马马耶夫与魏金斯基同行的包惠僧，当时并不在北京，所以他的回忆是否可信，值得怀疑。不过，也不能就此断定包惠僧的回忆完全没有根据。在1953年的回忆录中，包惠僧说，1920年秋，马马耶夫来到了他当时所在的武汉，而武汉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内容与此相符。[72] 虽然至今没有发现马马耶夫到过中国内地的正式记录，但很可能他确实到过中国，并在武汉与包惠僧见过面，而包惠僧却把这此次见面与未曾直接接触过的魏金斯基一行来华当成了一码事。

魏金斯基在北京首先接触的是李大钊。这时的李大钊已经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并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二人的会面似乎是自然中事。不过，对魏金斯基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自然应该有人把李大钊介绍给他。而这个介绍人大概是李大钊的俄国同事、北京大学的俄语和法语教师伊万诺夫（A. A. Ivanov），或者是同为北京大学俄语教师的柏烈伟（S. A. Polevoy）。

伊万诺夫（中国名：伊文）生于俄国，因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而逃到法国。据说，从1907年到1917年，他曾与克鲁包特金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共同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同年9月，作为克伦斯基政府的外交代表团成员来华。十月革命后，他转而拥护革命政权，在北京的法语报纸《北京报》（Journalde Pekin）上发表拥护苏俄的言论；同时，自1919年9月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法语、俄语。[73] 伊万诺夫把魏金斯基介绍给李大钊一说，来自同时期在远东活动的俄国人达林（S. A. Dalin）于

1975 年发表的回忆录。[74]

主张伊万诺夫是介绍人的说法，细究起来，都源于达林的回忆录。不过，其他几份资料也间接暗示了伊万诺夫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报告》就把他当作魏金斯基来华前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说他是“来自巴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法语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事实上的编辑”；而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中也记述到，他通过《北京报》收到了西伯利亚方面发来的电报。[75] 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伊万诺夫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但是，对于在中国没有任何活动基础的魏金斯基来说，“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伊万诺夫给予他的援助，哪怕仅仅是通讯方面的，也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伊万诺夫对魏金斯基一行的使命知道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李大钊的同事，有充分条件在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之间牵线搭桥。

与伊万诺夫相比，柏烈伟的作用似乎大得多。魏金斯基是由柏烈伟介绍给李大钊的说法，也来自上述包惠僧的回忆录。包惠僧说：

> 他们［魏金斯基一行］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开展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京大学俄文教授的鲍立维［柏烈伟］。鲍立维原是白俄而同情十月革命的。……他［魏金斯基］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其他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76]

这段回忆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说苏俄大使馆也做了工作，而当时苏俄大使馆尚不存在。不过，从中却可以看出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离不开当地俄国人的协助，特别是柏烈伟的政治支持。关于柏烈伟来华的经过和时期，有的说他是 1918 年下半年来华，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有关系；[77] 还有的说他在十月革命后做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78] 但这些说法的可信成分有多大，不得而知。从当时中

国警方的材料看，他当时住在天津，每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讲授俄语。[79]

如果说包惠僧当时并不在北京，那么张国焘则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他的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

> 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他［魏金斯基］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做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80]

在《报告》里，柏烈伟被当做和伊万诺夫一样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前就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天津大学教授［原文如此］”、共产党员。魏金斯基在来华后写给上级组织的几封信中[81]，也报告说得到了柏烈伟的积极协助。不仅如此，后来北京的优林代表团等远东共和国的有关使节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资金时，柏烈伟也曾从中斡旋。[82] 很明显，柏烈伟对于魏金斯基来华后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介绍人。

不过，柏烈伟后来的活动情况似乎并不值得称道。曾经与他共同编撰过俄语语法书的张西曼说，他是一个“败类”，一边发放秘密入境证明给那些希望赴俄的人，一边贪污共产国际的公款；后来贪污行为暴露，被勒令回国，而他害怕受处分，就逃到美国去了。[83] 当时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学生也回忆说，柏烈伟仗着有苏俄做靠山，行为很不检点，多次受到俄语系实际负责人伊万诺夫的斥责。[84] 而优林也在1921年写信指责柏烈伟泄露机密，要求将其召回莫斯科，并给予处罚[85]，这证明柏烈伟行为不检点并非谣传。来自苏俄的活动经费管理不善并非稀罕事，同样的问题在一部分高丽共产党有关人身上也曾发生

过。[86] 总之，虽说是共产主义者，早期参加活动的人，其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2. 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

魏金斯基在伊万诺夫、柏烈伟的协助下，与李大钊进行了接触。他们二人都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其后李大钊成了在北京从事中共建党工作的中心人物，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在初次接触时就商谈了如何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说，即“李大钊还和魏金斯基等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87] 当然，二人的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此类记述无非是推测而已。但是，有一种说法使这种推测看上去很有道理，因此在想像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前，让我们先对这种说法做一探讨。这种说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88]，即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就成立共产党进行过商议。按这种说法考虑，李大钊早就考虑成立共产党，因而他和俄共代表魏金斯基之间的会谈，当然是围绕成立共产党而进行的。

所谓“南陈北李说”，虽涉及几个细节的说法稍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 1920 年初（2 月前后）陈独秀在秘密离开北京赴天津的途中（或者是在天津）与同行的李大钊商议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部门也执此说。[89] 此说主要流行在中国大陆，其意图是，强调创建中共并非由于共产国际或苏俄的指使，而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本质上却事关中共成立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还是中国人自己进行革命运动的产物的问题。

“南陈北李说”的根据是几部回忆录，但是追根求源，都来自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首先，1927 年 5 月，他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90]

当时登载于报纸上的这个回忆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或者是笔录者的错误），此处稍做补充。第一章曾述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逮捕，在狱中被关押至9月。出狱后，翌年1月末，他躲过监视经上海到了武汉，2月4日始在武汉停留数日，其间做了几场演讲，这就是所谓北京各报登载的演辞。不过，这次陈独秀到武汉，李大钊没有同行。陈独秀是2月9日乘火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因擅离北京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他感到不安全，就躲到《新青年》同人胡适和李大钊那里，不久就又逃离了北京。[91] 所谓与李大钊商议建党，就是在这个时候。

高一涵在发表悼念演讲前后不久，还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92] 这篇文章也描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的情形，他们乘坐的车辆和化装的样子也都被写得生动逼真；但奇怪的是，惟独没有提到他们商议建立共产党的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修改补充的回忆录[93] 里，二人不是去了李大钊的老家，而是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与1927年的悼念文章几乎相同。不用说，文中没有提到他们曾商议建立共产党。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二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的内容，为什么在几乎同时执笔的另一篇追悼文章和其后的回忆录中都见不到呢？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的内容，并非亲笔书写，而是报社记者笔录下来的，因此当场概括不准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那就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成了中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根据。

如果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是正确的，当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有力根据。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回忆录

问题太多。这不仅因为高一涵亲手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商议建党一节。最大的理由是，高在回忆中说，他当时在北京，并协助陈独秀逃离了北京，而此点也正是高一涵回忆录值得相信的证据；但是，事实上，1920 年的那个时间他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94]，因此，对他们逃离北京的过程小说般生动逼真的描述，不客气地讲是捏造，善意的解释则完全是道听途说。

1927 年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共产党创建时的领导人，而胡适和李大钊仗义隐藏并帮助过陈独秀脱险，也是北京知识分子圈内津津乐道的美谈。因此，高一涵的回忆只可能是把有关轶事适当拼凑而成的，不能据此认定陈独秀、李大钊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已经商议过创建共产党。[95] 而以如此没有根据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为前提推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初次接触就探讨了建立共产党，也必须重新加以考察。

关于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在北京接触时的情形，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张国焘的回忆，自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96]

细读魏金斯基在同年 6 月和 8 月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其记述也主要以上海为主，里面有陈独秀的名字，而李大钊的名字则根本没有出现。[97] 从这点来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二人在北京的会见，大概正像张国焘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苏俄来的记者与一个对俄国革命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交换了意见而已。1920 年 4

月魏金斯基来华时，恰逢革命性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张国焘说：

> 这宣言约在1920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98]

魏金斯基就是恰巧在这样的时期来到北京的，可以想象他作为从苏俄来访的人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然，他向人们解释了革命俄国的现状及前途，也肯定谈到了制定和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苏维埃政权，还可能涉及到了俄共以及共产国际。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与李大钊的交流竟达到了足以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深度，有点太过性急。比较妥当的看法是，二人的接触，还是像张国焘说的那样，仅仅是一般交流；而魏金斯基正式开始活动，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者结成一个组织，是在他到达上海以后。

几乎在魏金斯基来华的同时，斯托扬诺维奇（K. A. Stoyanovich，一名米诺尔［Minor］）也被从北方的哈尔滨派遣到了天津。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录了此次派遣。《报告》说斯托扬诺维奇懂法语，工人出身，共产党员。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线上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城市中俄国侨民比例最高、有浓厚异国风情的城市。1917年6月，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秘密成立了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在11—12月，对实际统治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俄国人管理）发动了夺权斗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以响应十月革命。可见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基础较强。[99] 哈尔滨虽说是中国领土，但一半是俄国人的城市，也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据点之一。不清楚斯托扬诺维奇在哈尔滨从事过什么样的活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

此次派遣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活动之一。大概与派遣魏金斯基一样，派遣斯托扬诺维奇也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没有迹象表明他和魏金斯基曾在天津、北京共同活动过，但魏金斯基在上海开始活动后，斯托扬诺维奇接受魏金斯基的指令从天津到了广东，以达尔塔通讯社（the DALTA News Agency，远东共和国的通讯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同时参与了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后述）。

3. 魏金斯基的身份和活动据点

魏金斯基一行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的时间，估计是在1920年4月末或5月初。[100] 魏金斯基的公开身份与在北京时一样是新闻记者，很可能就是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的记者。关于这一点，魏金斯基6月写的工作报告中有些线索。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 我们将遵照您的提议，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虽然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6月1日《China Press》发表一篇关于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社论，是根据我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写的。在今天的这期上，他们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101]

《China Press》是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魏金斯基的这封信，既没写收信人，也没写日期。但从内容判断，应该是写给派他来华的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或者就是写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等人的；而信的日期则是他提供的《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一文在《大陆报》上发表的日期。收录该信的资料集的编者在注解中说，没有发现这一天的《大陆报》，故日期不详。但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资料中，却恰巧有当日《大陆报》的这篇文章的剪报[102]，其日期是6月9日。由于这份剪报的存在，可以确定魏金斯基的报告信

也是写于6月9日。令人感兴趣的是,《大陆报》是把《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作为"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Dalta News Agency of Peking)提供的消息刊登的。也就是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陆报》报社认为魏金斯基是达尔塔通讯社方面的人。魏金斯基在报告信中还要求寄送一些应该对外发表的文章等,这也可以证明他当初是以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的。收集情报和报道、宣传苏俄,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说,记者的身份和俄共密使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103]

达尔塔是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设立的通讯社,其在中国的活动许多方面尚不清楚,但其北京分社的业务好像是在1920年6月开始的,由一个叫霍多罗夫的任北京达尔塔通讯社的主任(分社长)。[104] 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这个霍多罗夫原来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过《遥远的边疆》(Далекаяокраина)报的编辑,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一直是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达尔塔通讯社后来被苏俄的罗斯塔通讯社(the ROSTA News Agency,塔斯社的前身)吸收,再后来成为驻中国的苏俄机关的重要联络据点。可以说,这一切都起于魏金斯基等和霍多罗夫之间的合作。[105]

魏金斯基在上海据以立足的苏俄机关,还有他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指定为通讯地址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公营进出口公司),以及与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同在一座楼内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报(ШанхайскаяЖизнь,英文称 Shanghai Life)。[106] 其中,《上海生活》报(1919年9月创刊)最早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称为"纯粹的过激派机关报"[107](参阅图6),其编辑之一古尔曼(M. L. Goorman)后来还从事被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员与日本之间的联络任务,作为情报员积极为苏俄工作。[108] 在当时的国际都市上海,包括上述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这些"鲜为人知的密使"在内,有许多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在活动,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魏金斯基绝不是在孤军作战。

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
SHANGHAI LIFE
Четверг 12 Февраля 1920 г.
ТЕЛЕГРАММЫ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Whiteaway
ПАЛЬТО И ПЕРЧАТКИ
Whiteaway, Laidlaw Co. Ltd.

图 6

这个时期的上海，俄国侨民大约有 5000 人，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109]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东进而逃到上海来的难民；不言而喻，其中出现了一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而随着白军的败退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原在上海的旧俄国驻外机关等，逐渐地被新来的新政权官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所接收。在不肯承认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北京政府 [110] 所在地北京，俄国侨民类似在上海那样被接收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等人从事活动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些条件，加上交通方便，使魏金斯基得以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

4. 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

有关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资料，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魏金斯基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1920 年 9 月），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 今年［1920 年］5 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Восто чноаз иат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III Комин терна）”。[111]

照字面解释，可以说，在魏金斯基到上海后，共产国际的驻外机关马上就成立了。报告中没有出现魏金斯基的名字，但派遣魏金斯基的既然是威廉斯基，那么，至少可以说，设立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无疑是以魏金斯基在上海为前提的。威廉斯基到远东，就是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的指令[112]，看来，他是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试图通过设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方式实施这一指令。尽管如此，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否经过共产国际中央正式承认，并被纳入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内，却甚可疑。如前所述，在此之后两个月，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央还在讨论设立远东局的问题，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最终成立，是 1921 年 1 月的事。[113] 所以，在上海成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很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临时”机关。

魏金斯基在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和达尔塔通讯社安下营盘后，在同行翻译杨明斋的帮助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上海俄国侨民的支持下，与上海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集有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中国各城市以及朝鲜、日本的情报。在和上海各界人士的交流中，陈独秀当然是主

要对象。陈独秀这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后越发激进，他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实际上编辑只有他一个人）也移至上海，并以七卷六号（封底载发行日期5月1日）为“劳动节纪念号”，整册讨论工人问题。该期还集中介绍了各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欢迎态度。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迎接魏金斯基来上海而为之，但是迎接他到来的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了。

除陈独秀外，上海还有许多人士和团体有可能与魏金斯基合作。陈独秀周围就有：和《新青年》一样发行纪念劳动节特刊的《星期评论》杂志的李汉俊、戴季陶等社会主义者；在副刊《觉悟》上连篇累牍地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等国民党系人士；虽有别于国民党，但同样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研究系日报《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记者。而团体则有：计划联合各工人团体、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国民党系工人团体“中华工业协会”[114]；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等。在这些方面，上海的社会运动基础也比北京要优越得多，并且，这里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到处充满了欢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象征的革命俄国精神的气氛。

魏金斯基与这些人士和团体的接触相当顺利，在他1920年6月9日从上海写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信中报告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正共同进行工作。[115] 在这封信中，除了他作为记者公开进行的活动外，还报告了他的真正使命即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看得出，魏金斯基在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与陈独秀接触，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

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已发现的只有6月9日和8月17日这两份，事实上，6月9日以前还有一份，但是至今尚未发现。[116] 另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接到魏金斯基报告后于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17]，也是我们探寻魏金斯

基在上海活动的文件资料。这些报告，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魏金斯基的活动场面以及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过提供了不少新的事实，但是，有些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指导他们的俄国人看来，党的创建过程是不同的，而这种不一致本身正是历史摆脱不掉的现象，即，本来是惟一的历史事实，却因观察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成员和魏金斯基等“使者”共同创建共产党这一惟一的历史事实，看法是怎样地因人而异？为何因人而异？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探寻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具体过程时再加以考察，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苏俄方面执笔报告的人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

首先来看魏金斯基的报告。魏金斯基在6月9日的报告[118]中说已经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了关系，然后写道，“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而在汉口协助开展工作的，是上述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柏烈伟教授”推荐的“一位编外副教授”。[119]可见，这个时期，魏金斯基借助在华俄国侨民的帮助，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各城市也已经开展了工作。他还写道：

> 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联合出版局（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бюро）”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陈独秀教授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根据此处所述，当前的工作目标是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各地多种多样的组织，召集会议以促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统一，而其中心人物无疑是陈独秀。不过，设想中的核心组织即“联合出版局”具体是什么组织？其中国名称不得而知。有人解释是《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处、上海的群益书社[120]，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一般来讲，俄国人的报告中很少使用人名、地名、组织名称等专有名词，这份报告也如此；因此，要将报告中的名称与当时中国的名称对号入座是困难的。再者，地理观念也与现在有点不同。比如，报告中的“华北”看上去是指北京、天津一带，但实际上，在其他的报告中，却多把上海等江南地区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时南方政府统治的以广东为中心的地区是“南方”，以北都看做是“北方”。总之，这个时期魏金斯基的工作对象虽然仍以上海的中国活动家为主，却已经开始向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扩展，并且，协调和统一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正式步骤即召集会议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中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是否按计划举行，不得而知。另一份俄国方面的文件记载，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在上海召开了会议[121]，也许就是这次会议；但无从确认。不过，既然会议的决议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等的主导下，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者的工作肯定已经付诸实施。

有意思的是，就像是为了推动魏金斯基进一步开展工作似的，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这时来到了中国。据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记录载，威廉斯基是作为优林代表团的秘书，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的名义，先于代表团于6月下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华的[122]；事实上，他确实于7月4日来到了北京。[123] 他到北京后，即于第二天（5日）至7日，与接受电召后赶来的天津、上海等地的在华俄共党员举行了第一次正式

会议，交换了意见。在上海开展工作的魏金斯基，以及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柏烈伟等很可能也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据威廉斯基的报告载，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交换了意见，确认“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要“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124] 我们自然能够注意到，在这里，魏金斯基等“积累的经验”得到了肯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程已经临近了。总之，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号令。

这次会议后，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让我们来看他 8 月 17 日的报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份报告与 6 月 9 日的报告不同，是写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前面已经探讨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共对华工作机关，经过一番波折后，在 1920 年 8 月成立并置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之下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这种情况，在上海的魏金斯基是知道的。顺言之，据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后来的报告称，8 月 17 日的报告，是该处从魏金斯基那里收到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125]

这份报告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开头报告“革命局”成立的一段：

> 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处，即出版处、情报煽动处、组织处。

这个“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 ноебюро）的四名中国成员的姓名，报告中没有记载，汉语如何称呼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革命局”至少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内[126]，其实就是后来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毫无疑问的。报告

还说，除上海外，北京也成立了“革命局”，上述米诺尔即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按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斯托扬诺维奇还被从天津派往广州去成立“革命局”，还计划在汉口成立“革命局”；还有在沪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组成的“朝鲜革命局”与中国的“革命局”互相配合进行出版工作。

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则记述得相当详细。首先，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的：

> 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的话》（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Рабочеслово）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共产党宣言》，不用说是指同年8月刚刚出版的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的那个版本。报告中提到名字的小册子和传单，有些尚不清楚；不过，《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可能就是《谁是共产党》[127]，《士兵的话》大概指《一个兵的说话》[128]，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前后散发的小册子。而《工人的话》可能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周刊杂志《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该杂志8月22日发行了第2期，载有陈望道、李汉俊和陈独秀的文章。《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除《共产党宣言》外，该“研究社”还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1920年）。据此判断，“社会主义研究社”亦即新青年社（《劳动界》的总经售处也是新青年社），实际上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

关于情报煽动处，报告这样写道：

> 情报煽动处成立了俄华通讯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информбюро），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主要是从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民族》周刊（Nation）、《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维埃日历（Совет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129]也被全文刊用了。

“俄华通讯局”，就是以与魏金斯基一同来上海的杨明斋为中心设立的“中俄通信社”（有时也作“华俄通信社”），所谓负责情报处资料（翻译）的“一位同志”，概指杨明斋。现在能够确认的该通信社最早的稿件，发表在这一年7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因此，“俄华通讯局”应该是在这之前成立的。[130]“中俄通信社”与达尔塔通讯社、罗斯塔通讯社实际上是一体的。上述霍多罗夫后来在广东说：“华俄通信社是达罗德（总社在赤塔）、洛斯德（总社在莫思科）两个通信分社合组而成的。”[131]达尔塔和罗斯塔主要向国外提供消息，而中俄通信社主要向国内提供翻译成汉语的新闻。

在这份报告里，情报处的资料来源写得很清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美国左翼杂志《纽约呼声报》一起，还提到了《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要稿源《苏维埃·俄罗斯》。如前章所述，在这份报告之后不久重新发刊的《新青年》开始连篇累牍地译载《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的布尔什维克文章，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份刊物的影响也骤然间大了起来；而这份报告证实了，介绍这些英语文章给《新青年》的就是

魏金斯基他们。

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年）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刊物的倾向、出版社等），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要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的出版社（比如，芝加哥的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的刊物，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考虑到魏金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魏金斯基不仅在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方面，而且在传播其理论基础即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有关组织处的部分，魏金斯基报告了他们工作的对象，以及工作的进展情况：

> 组织处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这里已经有了几个我们着手培养的发起组。这一周，我们组织处要召开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纲领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报告称计划设立“工会中央局”，以统一各劳动团体，甚至准备好了决议；但是，检索《劳动界》等当时的各种报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或者成立了劳动团体的统一组织。这个时期，陈独秀等确实曾经呼吁“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32]，也与上述中华工业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劳动团体有过接触[133]；但是，这些

五花八门的团体最终没能联合起来。这年9月，陈独秀倒是亲自活动成立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召开发起会议，11月21日正式成立[134]），但那也不是“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那种规模的会议。陈独秀曾评论当时的劳动团体说：“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135] 看来，统一这些劳动团体的工作，没有能够像报告所说的那样取得进展。

从上述“革命局”的工作来看，联合各劳动团体等组织方面的成果，比出版、宣传方面的成果小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召开的在华俄共党员会议上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之后的1920年7月至8月间，在“革命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调确实加快了。魏金斯基的报告还就以后的工作做了这样的预测：

> 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 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这个青年同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说准备成立革命学生团体的统一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事先进行了磋商，并为此于“今天”即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召集北京、天津的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是怎样的会议呢？可能性最大的，是8月16日至

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互助社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发起“改造联合”的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后来的中共党员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等都是会员），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其宗旨是继承中国青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奋斗精神；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学的山东籍学生（宋介，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为首、于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组织（发行《曙光》杂志，自1920年起开始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天津的觉悟社是以周恩来、刘清扬——后来都是中共党员——等为中心、于1919年9月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人道社是发行《新社会》杂志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与北京YMCA有关的青年于1920年8月结成的青年组织（刊行《人道》杂志）。关于青年互助团，其所在地和成员都不清楚，大概是当时随处簇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一。

这五个团体的会议，好像是由天津的觉悟社牵头，为了联合分散于各地的进步团体而召开的。但是，在16日的茶话会上，实际召集人、代表少年中国出席会议的李大钊呼吁，为了求得内部一致，有必要明确主义，提议各团体据此主义加强联络。18日，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联络筹备会（少年中国学会有李大钊、张申府出席），会上决定统一团体的名称为“改造联合”，并通过讨论决定制定活动内容和组织大纲。[136] 第二天，在北京的少年中国茶话会上，李大钊说：“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最后决定共同讨论其方针。[137]

报道此次会议的短消息中并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名称，五团体结成的“改造联合”也似乎只存在了很短时期，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证明其后进行了何种活动；只有曾经参加“改造联合”这次会议的人留下了如下的回忆：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

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138] 如前所述，“华俄通信社”是“革命局”的情报处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魏金斯基报告中“青年同盟将派代表参加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的革命局”一节相符合。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魏金斯基所说的旨在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就是“改造联合”的会议。看来，是魏金斯基在报告中把“改造联合”这样的联合进步小团体的动向夸大成了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尽管魏金斯基的报告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具体的组织名称和人名也难以和中文名称对号入座，但还是清楚地表明，在他到上海后，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的指导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中国各地建党的具体过程，在这里先简单叙述一下魏金斯基回国前的足迹。不过，现存的魏金斯基报告仅有上述两份，他 8 月以后的活动，只有零星资料可供参考。

首先看他的另一个任务，即接触朝鲜、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139] 1920 年 10 月，魏金斯基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的大杉荣（日本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过面。据大杉荣著《日本脱出记》载，8 月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的要人 M（所谓“马某”）来访，劝他到上海去一趟，大杉遂于 10 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 L（李东辉）、C（陈独秀）、R（吕运亨）等。[140] 会见时在座的“俄国人 T”，大概就是魏金斯基（化名塔拉索夫）。[141] 大杉说，他回国前从 T 那里接受了两千日圆的活动经费。

在与中国政要的接触方面，10 月 9 日，魏金斯基在北京与柏烈伟一同会见了有“进步军阀”之称的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就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并介绍了革命俄国的各种组织。[142] 此举一方面是作为记者采访，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了解北京政府的支柱、直系实力人物吴佩孚的动向。11 月，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拜访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143] 会见时，

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过，同时也就俄国革命的状况提出了许多问题。据说，孙中山还提出，从地理条件来看，他的根据地广州与俄国之间联络起来不方便，能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一处大功率无线通信设施，以便与广州间互相联系。[144] 魏金斯基对此提议是如何答复的不得而知。这次拜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试探褒贬参半的孙中山的立场。

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应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之邀赴广州，魏金斯基也一前一后（或是结伴）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除了与已被派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等一起帮助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魏金斯基所说的“广州革命局”）的工作以外，还和陈独秀一同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145] 广州的建党活动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广州之行是北京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团长优林指示的，同行者还有柏烈伟。[146] 可能优林因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迟迟没有进展而焦急，于是派人到广州的南方政府去摸底。魏金斯基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 年 1 月 12 日 [147]，其后不久即经北京回俄国去了。他回国时所取的路线和详细时间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在这年 1 月在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工作过一个时期。[148] 后来，魏金斯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 年 11—12 月）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积累了工作经验，成了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他再次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是回国三年后的 1924 年 4 月。[149]

5. 使者相继来华

在早期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所开展的工作中，魏金斯基的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魏金斯基在华期间，俄国方面的对华工作窗口并未统一，在魏金斯基一行以外，还存在其他渠道。连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这个为了统一对华工作而于 1920 年 8 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机关，从 8 月到 12 月这段时间，也仅从魏金斯基处收到过一次报告 [150]；给魏金斯

基汇寄活动经费，也因该处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倚靠俄共远东局。[151] 由于联络体制尚不健全，致使魏金斯基在华期间继续有其他系统的各色“使者”相继来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赫洛夫金(V.Hohlovkin)和福罗姆别尔格(M.Fromberg)。[152]

首先看霍赫洛夫金。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转述了1924年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话，大致如下：1920年初，可能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来到北京访问了李大钊，并向他试探组织共产党一事，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关于成立共产党的积极反应后，霍赫洛夫金高兴地回伊尔库茨克去了；不久后，魏金斯基就被正式派来了；哈尔滨出生的霍赫洛夫金汉语很流利，后来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53] 假如这段回忆无误，这个霍赫洛夫金就是先于魏金斯基被派来华的苏俄使者。不过，虽然他后来确实做过东方大学的远东部主任[154]，却似乎并非苏俄最早派来中国的使者。因为派遣他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载，霍赫洛夫金（该处中国科书记）是该处于1920年8月成立后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信使。这份报告说，霍赫洛夫金的任务是运送和传递可以变卖的宝石、书籍以及给上海支部（魏金斯基）的详细指示。[155] 大概与中国方面联系，每每必须经过远东共和国或俄共远东局，不甚通畅，因而才直接派人去的。他去中国肯定是8月以后，但成行和回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上海是否与魏金斯基成功接触，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另一位是福罗姆别尔格，他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斯穆尔基斯（Yu. D. Smurgis）[156] 在魏金斯基回国前的1921年1月经满洲里派来上海的。[157] 福罗姆别尔格此前似乎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情报部门工作过，据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与上海的魏金斯基取得联系，以便支援中国的工人运动。斯穆尔基斯1921年6月3日的报告说，远东局的代表（可能即指福罗姆别尔格）已经到达上海，但是没有讲明到达时间。不过，在另一份报告中斯穆尔基斯又说，持有福罗姆别尔格介绍信

的二十几名中国人6月10日来到了赤塔。考虑到当时上海和赤塔之间的交通情况，福罗姆别尔格应该是在这数月之前到达上海的。福罗姆别尔格是否按计划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了联系，也无稽可查。斯穆尔基斯7月6日的报告倒是谈到，福罗姆别尔格在上海正与魏金斯基共同开展工作；但是，此时魏金斯基早已离开了中国，肯定是某种误解，或是把1921年6月到上海的马林或尼科尔斯基误以为魏金斯基也未可知。[158]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不久，福罗姆别尔格随后就出现在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59] 据说，1920年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俄共党员，总共有十几个人。[160]

霍赫洛夫金、福罗姆别尔格等来华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且不论结果如何，因其目的都与魏金斯基的工作有关，我们大致上还可以理解他们的背景；但实际上，魏金斯基回俄国前后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还有另一条与他完全无关的渠道。这无疑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对远东工作的混乱情形，而这另一条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产生了与陈独秀等无关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致使在魏金斯基指导下开始启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

第三节　中国“伪”共产党始末

1. 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

1921年初魏金斯基（可能是为了报告在中国的工作[161]）回国后，到同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这段时间，苏俄、共产国际没有再派使者来中国。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上海仍然有福罗姆别尔格等部分苏俄人员。但是，魏金斯基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回国，对上海的共产主义者打击不小。其后，直到马林来华这段时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因资金困难而陷于停顿。除此以外，中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末从上海去了广州，也是活动停顿的原因之一。例如，他们的

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在1921年1月出了八卷五期之后，一直中断到4月；《共产党》月刊也于1920年12月第2期以后，有半年多未能发行。[162] 马林后来写的报告表明，这些出版活动之所以中断，并非完全由于警方干扰[163]：

> 魏金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六十人。他们在工人学校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也不得不中途停办。[164]

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包惠僧也说："后因魏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165] 可见，魏金斯基回国，直接造成了活动经费的中断。就在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暂时停顿期间，受苏俄对华工作的推动，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此前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5月，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委托赴上海，他在上海接触的中国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在20年代初昙花一现的"中国共产党"。

近藤荣藏是日本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成员，他按照1921年春秘密来日的朝鲜人李增林（或称"林某"）的建议，于同年5月受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只身来到上海，与当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接触，并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接受了活动经费。但是，他在上海接触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怎样的组织呢？或者说，一同出面接洽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的人物呢？这些问题都还不十分清楚。近藤晚年在回忆录[166]中写道，在上海，欢迎他的有李东辉、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则有"北京大学讲师、中国共产主义拓荒人""黄某"（即黄介民[167]）；而警方根据他的口供整理的文件[168]记载，当时在

场的还有金河球、朴致顺［朴镇淳］、李东辉、金立等朝鲜人，和中国人“姚作宾”。

这里提到的人里面，朴镇淳、李东辉等人都是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景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黄介民”、“姚作宾”这两个中国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在当时的上海，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以李汉俊、李达等人为中心开展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小组里没有叫“黄介民”、“姚作宾”的人。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近藤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是李达、李汉俊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来历不明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呢？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又是以什么身份一同会见近藤的呢？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最早在中国出现，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这方面现存的资料有1912年3月的上海《民权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以及同年4月28日的《盛京时报》（奉天）登载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不过，这些“共产党”似乎未曾实际存在过，没有任何资料反映他们具体从事了哪些活动，其组织构成也一概不得而知。[169] 到了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二字对一些守旧的人来说是“大逆不道”，但却吸引了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除陈独秀等人以外，1920年到1922年，陆续出现了不少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团体。那时，“共产党”还不是陈独秀等人的组织的专用名称。事实上，1920年3月在重庆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在北京，1922年2月则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些组织都留下了他们自己写下的宣言或报告等资料，也有人对这些团体的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170] 这些“杂牌”共产党都是时代的潮流自然激起的浪花。但是，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结成，因而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党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争正统的关系，这是与那些“杂牌”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而他们之创建共产党，正是苏俄、共产国际多渠道对华

工作的结果。

2. 1921 年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就创建时期的史料而言，与“正宗”中国共产党相比，“杂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言，而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党”甚至连一份报告也没有留下，更不存在比较完整的资料。不过，利用仅有的几份资料来描画他们组织“共产党”的经过，还是可能的。让我们先从他们 1921 年在莫斯科的遭遇看起。这方面，有当时留下的以下三份资料可以反映姚作宾 1921 年在莫斯科试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情形。

一份是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于 1924 年发表的《赤俄游记》中的一段，大致内容如下：上海的朝鲜人金某［金立?］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了四五十万元的活动经费，便通过姚作宾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接上了联系，并提供了一千元会议经费，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因而得以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反对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只有少数人坚持派代表。最后，姚作宾于 1921 年经欧洲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姚作宾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并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多少军队。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抗议书，并以全体学生罢课相威胁，同时派代表监禁了姚、张［张民权］。[171]

另一份资料，是曾在民国初期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记录他 1921 年莫斯科之行的游记中的一节《纪中国五共产党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参加 1921 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172] 江亢虎记录下的另外四个遣使赴俄的“共产党”是：①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来了学生“张君［张太雷］、于君［概指俞秀松］二人”为代表；②也是来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留学生们，但“不承认张、于为代表”的“少年共产

党”；③黑龙江省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的“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④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江说，这五个党都主张自己是正统组织，但②的人数最多，他们抨击其他组织假冒“共产党”时，“对姚尤为激昂，但不知结果如何”。

第三份资料，是曾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73]的人于1922年以“CP”的笔名写的文章《我观察过的俄罗斯》[174]，其中这样写道：在莫斯科，“最可以表现中国人的劣性质的，就是什么中国学生联合会长廖某［疑为“姚某”，即姚作宾］和张某［张民权］的冒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原来这廖某从前曾和高丽人金某［金立?］骗了俄国一笔金钱，托辞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后来在中国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有留下，就和这张某再来俄国干同样的把戏了。可是他们被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予以一大打击，就回中国去了”。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似乎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个党与前来莫斯科参加1921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其他几个中国“共产党”一样，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而互相展开了明争暗斗。顺言之，与姚作宾一起被指冒称“共产党”的张民权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175]，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176]他似乎也和姚作宾一样打了“共产党”的旗号。就像高丽共产党内“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相互攻讦一样[177]，各国的自称“共产党”要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大概姚作宾的共产党为了获得承认也使用了一些伎俩。而他们的这种做法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那么，姚作宾接近共产国际的努力结果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一件资料来推测其结局。这是一份声

明，从内容判断好像就是上述抱朴《赤俄游记》里提到的那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姚作宾的代表权问题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抗议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派来俄国的代表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 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公民姚作宾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一起讨论甚至决定的东西（根据姚作宾的建议，共产国际拨给款项等），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因为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178]

在这份声明之前稍早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即陈独秀等组织的共产党，所以不难想象这篇声明对姚作宾等的活动有多大打击。事实上，在这以后找不到共产国际仍以姚作宾为对象的迹象，三个月后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里也看不到他的名字。[179] 姚作宾的“共产党”终于未能获得正统的地位。

那么，姚作宾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仅仅是为了获得经费而采取的冲动之举吗？果真如此，如俞秀松声明所说，共产国际与受到“正宗”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的各色共产党猛烈攻击的姚作宾的共产党就提供经费等问题进行协商，又如何解释呢？近藤荣藏为了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来到上海时，姚作宾等也一起出席了会见，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姚作宾等的共产党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革命组织。

3. **大同党**——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

本章第二节曾述，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1921年7月亲自到过北京；同年12月回国后，他在莫斯科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名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180]，可以告诉我们他在中国期间所关注的是哪些社会主义势力。该文概述了五四学生运动、各地的工人运动、民国以来的现有政党的动向等；在“中国的革命组织”一项里，他写道：“从伟大的俄国革命爆发时起，在中国新的党派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然后特别举出了如下两个组织，即拥戴陈炯明为领袖的福建“真理社”（Tchen-Li-Tche），和“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Da-Tun-Dan），并说这些组织都诞生自“学生运动所形成的纽带”。该文对当时已经开始活动的陈独秀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只字未提，令人费解。但饶有兴味的是，被誉为“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党派的这个“大同党”的成员之一正是“Jao-Tso-sin”[181]，即姚作宾。他当时是总部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的理事。

从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主要是陈炯明以福建漳州为根据地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五四运动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学生组织，而这些情报则来自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波塔波夫的报告。本来，苏俄派遣各类使者来华的契机之一，就是出于对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震撼和关心，他们在陈独秀等以外，把上海的全国学联这个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视为可以合作的对象也是不难想象的。[182] 事实上，据中国警方的文件记录[183]，1920年3月，姚作宾和戴季陶一同在法租界贝勒路义和里14号全国学联办事处与俄国人（大概就是上述波塔波夫）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如何进行“过激主义”宣传。

下列事实则表明，上述记录未必是假，即姚作宾为了与俄共组织建立关系，曾于同年5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

斯托克。俄共方面的文件称他为“同志”，说：“今年［1920年］5月，中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184]

姚作宾1920年5月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魏金斯基刚刚从这里被派往中国。这时的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曾经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革命派学生发过回信[185]，并热情赞扬“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以，姚作宾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之行实际上是把学联的态度转化成了行动。总之，姚作宾从1920年春天开始谋求与苏俄的革命运动合作，而对全国学联有所期待的威廉斯基等俄共有关人也对姚作宾的态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姚作宾等的“大同党”，许多方面尚未弄清，综观各种资料，大致情况如下。首先是“大同党”成立的时期。日本警方资料记载，“大同党”是“主张四海同胞主义的黄介民［黄介民］发起”，“民国6年［1917年］央创立”的。[186] 而据发起人黄介民讲，大同党的前身是1915年7月成立的“新亚同盟党”，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他和朝鲜留学生申翼熙、张德秀，以及中国留学生陈其尤、王希天等共同组织的。[187] 申德熙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后来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部长，韩国独立后担任过国会议长，并曾是总统候选人；张德秀也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朝鲜留学生学友会干部，一个时期曾在中国参与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成为《东亚日报》副社长，韩国独立后曾任韩国民主党干部。他们二人都是朝鲜独立运动史上有名的活动家。陈其尤是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国民党系革命家，当时正在中央大学学习，后来成了陈炯明的幕僚，上述波塔波夫到漳州时，担任接待的就是他[188]；王希天是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即中国YMCA的干事，后来在关东大地震时遭日本陆军杀害。[189] 中朝两国留日学生倾向于联合，从后来不久堺利彦、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分子和

中朝留日学生们共同组织“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190]一事即可窥见一斑。黄介民等组织“新亚同盟党”就是这类联合的先声之一。这个大同党的活动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1922年访问中国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主义者山鹿泰治说，他同年在上海加入了大同党。[191]所以，大同党至少在这个时候还存在。

“大同”这一名称，不用说，是指《礼记》礼运篇中的理想社会。当然也可以按康有为式的“大同”概念来解释。不过，莫斯科的中国侨民组织的上述“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大同报》（Великое Равенство）就没有康有为所谓的“大同”的意思，而是“表示社会主义世界上人人平等的意思”。[192]“大同党”的命名想必是为了表达笼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大同党的政纲和方针是“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具体地说，就是突出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否认某国有统治韩国并台湾之权、某国有统治印度之权、某国有统治安南之权”。[193]据说，大同党的前身“新亚同盟党”的政纲和方针也是“反抗强权，互相协助，审察时机，先后图谋各地独立，缔结一大同盟，主持亚洲大局，维持世界和平”[194]，可见，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础的国际革命组织。发人深思的是，先于魏金斯基来华的“密使”之一波塔波夫在1920年5月加入了大同党。[195]也就是说，波塔波夫也好，收到波塔波夫报告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也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革命组织。

大同党领导人之一黄介民，原名黄觉，江西省清江人。[196]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在江西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与陈溥贤、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民彝》杂志的编辑工作。如前所述，他在这前后组织了“新亚同盟党”。引人注目的是，“新亚同盟党”成立后不久，他就为了实行党的宗旨而与部分朝鲜留学生到了朝鲜，在那里，与赵素昂[197]等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社会

主义者进行了广泛的交往。[198] 近藤荣藏在上海会见与苏俄、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时，黄介民之所以也在场，就是缘于这时结下的关系。1918 年，留日学生掀起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黄介民也参加了进去，成为学生们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 [199] 的主要成员，还参与编辑运动机关刊物《救国日报》。翌年，五四运动爆发，黄介民以上海为中心参加了多方面的活动，还成了国民党系劳动团体中华工业协会的领导人物之一。如前所述，中华工业协会在 1920 年曾计划举行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活动，而积极推进这项活动的正是黄介民。[200] 他还积极协助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朝鲜独立运动。当时，新亚同盟党时期的同志申翼熙、赵素昂等朝鲜独立运动志士，正在以临时政府和中韩互助社 [201] 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作为谋求被压迫民族联合的大同党的领导人之一，黄介民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从主义上讲，也是很自然的。总之，黄介民不仅是五四时期上海学界、工界的头面人物，与朝鲜独立运动也保持着关系，而他的这些活动体现在组织方面，就是他和姚作宾的大同党。[202]

关于大同党的党员人数，日本警方报告称，“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日本人等，合约三千人”[203]；可是，纵然“党员无任何负担，……行动各依良心即可，是一个极其含混的纯粹的秘密团体”[204]，这个数字也难免有夸大之嫌。由于此外没有任何资料，所以无法推测大同党的实际党员人数，也不清楚加入大同党的其他中国人都是什么人。不过，综观各种资料，大同党的主要成员似乎还有学联方面的康白情、王德熙、温立等人。[205]

4. 苏俄对大同党的工作

如前所述，魏金斯基 1921 年初回国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暂时陷入了停顿。就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后不久，有一位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从共产国际来到了上海，与黄介民等大同党人进行了接触。他就是出席 1920 年的共

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朝鲜代表（韩人社会党）、并被选为大会后产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远东代表的朴镇淳。朴在这次大会期间，曾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在莫斯科与马林等进行过磋商[206]，他来华的目的——不知是否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据推测是为了设立远东局，以及改组韩人社会党为共产党组织（高丽共产党）。[207] 据说朴携带巨额经费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0年底。[208] 在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朴镇淳与韩人社会党成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一同接触的，就是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

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谈到朴镇淳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是王若飞1943年在延安所做的报告。王若飞在报告中说：

> 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209]

这里提到的“巴克京春”，正是朴镇淳。[210] 所谓最早来华的“华俄通讯社社长”，可能指的是上述达尔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霍多罗夫。不过，朴镇淳在上海活动的时期，王若飞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说的朴镇淳来中国组党等，并非直接见闻，而是从其他党员那里听说的。共产国际以黄介民为对象开展工作一事，周恩来在60年代也谈到过[211]，大概在早期加入共产党的部分人士当中并非新鲜话题。张国焘也说，当时“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212]；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旅沪朝鲜人士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中朝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拥有共同的

印刷厂等。[213] 但是，早期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由于因活动经费发生内讧，以及争夺运动领导权等，发展过程十分复杂，至今仍难以窥知全貌。[214] 不过，就来华的朴镇淳等人的活动而言，似乎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全面承认。1920 年 12 月，领导魏金斯基工作的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派遣朴镇淳赴华明确地表示了不满。

克拉斯诺晓科夫安插的朴镇淳和其工作人员朝鲜人朴爱，不断进行反对东方民族处和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派代表朴镇淳去中国，他打算在那里召开朝鲜社会党［韩人社会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上海没有大量朝鲜群众，这次会议无非是朴个人对他本人所熟悉的朝鲜知识分子的挑选。……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东方民族处提供帮助，但有时从事纯革命的党的工作，不同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相协调。例如，正当朝鲜真正的共产党需要经费时，该委员部却绕过东方民族处拨给朴镇淳四百万卢布供朝鲜社会党使用。[215]

这个报告中提到的克拉斯诺晓科夫（A. M. Kras noshchekov），是当时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在俄共里，处于领导俄共远东州委的地位。[216] 关于苏俄的远东工作窗口分成好几个系统并且相互间缺乏协调，东方民族处的上级机关俄共西伯利亚局与俄共远东州委以及远东共和国争夺对远东工作的领导权等情况，已经在本章第一节有所探讨。从上述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看，朴镇淳的工作得到了俄共远东州委、共产国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任，但谋求统一远东工作的东方民族处却投以怀疑的目光。高丽共产党的分裂和内部斗争的原因，就在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人是舒米亚茨基 B. Shumyatsky）和赤塔的俄共远东局分别独自地组织和支援朝鲜共产主义者。马林后来就高丽共产党的内讧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派朝鲜人之间的

争吵，本来是伊尔库茨克同赤塔之间的纠纷，特别是舒米亚茨基同志同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之间的纠纷”。[217] 如此看来，朴镇淳属于赤塔的俄共远东州委系统，也就是说，他来华时的组织背景与其前的魏金斯基那条渠道稍有区别。

1920年底来到上海的朴镇淳，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微妙立场，以及共产国际在他之前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经做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代表委员，他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其对象自然也包括中国人；而他又没有什么可靠渠道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因此无疑只能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即旅沪朝鲜活动分子的周围来物色中国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因此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志士关系密切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就自然地成了他接触的对象。

实际上，除了朴镇淳以外，苏俄还通过另外的渠道谋求与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或者说“正宗”的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共产党”组织）进行接触，这个渠道就是1920年9月迁到远东的上述“俄国共产华员局”，即中国人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以及与该组织有关系的、居住在俄国远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对接触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积极的，是隶属于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所在地是与中国黑河隔阿穆尔河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时该地居住有许多中国移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有中国支部，该支部有发行中文旬刊《共产主义之星》(Коммуни стическая Звезда)[218] 的刘谦（俄国名字：费奥德罗夫 [S. Fedorov]）。和其他“鲜为人知的密使”一样，刘谦的生平与活动也还是个谜，但是，有几份资料记录了他在1920年下半年参与了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身为俄国共产华员局一员的刘谦，1920年7月28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询问受华员局委派回到中国的江亢虎（同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消息，信中同时希望中国同胞把江当作“亲密的同志”。[219] 刘谦还于同年夏

天至秋天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后，1920 年 10 月 5 日，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报告了与孙中山会谈的结果，同时提出了一份大胆的进攻中国内地的计划。[220] 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俄国共产华员局虽说成立于莫斯科，但曾经选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大会，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刘谦称自己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大同党的姚作宾也加入了刘谦等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221] 姚作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点和时期不清楚，不过，刘谦等人似乎有意以旅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核心，进一步联合江亢虎这位中国内地社会主义运动的拓荒者和姚作宾等这些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刘谦在报告里没有直接谈到姚作宾和大同党，但对学生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刘谦也认为与俄国有共鸣、并有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足以成为成立共产党的基础。

对刘谦要把成立于俄国的中国共产党移植到中国去的构想，俄共远东州委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远东州委所属的俄国共产华员局在 1920 年 12 月 6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联络上海、天津的青年组织的事宜，并“批准刘同志（费奥德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222] 第二年 1 月 16 日又计划向中国派宣传活动人员，以在孙中山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223] 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施，因为刘谦在 1920 年底或翌年初突然死去 [224]，而同为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的刘泽荣在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1920 年 12 月）之后，不明不白地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225] 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这些漫无计划的对华工作，与对待派遣朴镇淳时一样，自然表示了不满。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说：

> 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刘泽荣］，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

> 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俄国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226]

由此可见，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系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触的苏俄方面的使者，无论朴镇淳也好，刘谦等俄国共产华员局系统也好，虽然背后都有共产国际中央或俄共中央这些组织的初步支持，但是，在逐渐成为对远东工作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看来，都是不合格的。也就是说，在各种对华工作的错综复杂的组织背景中，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主义组织被纳入了难免沦为旁系的渠道之中，而他们后来在莫斯科争夺“共产党”正统时注定要失败的理由之一，也正在于此。

不过，朴镇淳、刘谦等来华背后所存在的苏俄方面的意图和想法并不统一的情形，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的领导人当然无从知道。所以，对于黄、姚来说，朴镇淳的来华无疑就是共产国际使者的来访，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与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朴镇淳等人进行接触；而黄、姚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对他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促成其事的朴镇淳来说，都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正当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在日本警方来看，当时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是指黄介民而非陈独秀派的共产党。[227]事实上，严密监视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动向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228] 而陈独秀派的共产党人、当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在接受警视厅审讯时也供述，黄介民等人与陈独秀派是不同的“共产党”：“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创建的，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介民［黄介民］派组织的，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229]

朴镇淳、李东辉等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1921 年 5 月将

“韩人社会党”改称“高丽共产党”（即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6月，朴镇淳、李东辉为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而离开上海经欧洲赴莫斯科，姚作宾也与他们同行。[230] 姚作宾和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既然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委派于同年5月赴上海时，姚作宾和黄介民出现在以朴镇淳为“主持人”的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无从知道，姚作宾是作为“大同党”党员，还是像后来在莫斯科那样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出席会议的。但是，会议上的他肯定认为自己是已经被共产国际承认或者不久后即将被承认的中国的“共产党”的一员；否则，他不会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朴镇淳和李东辉（据近藤回忆，会议上还希望日本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1]那么，朴镇淳、李东辉以及姚作宾当然是知道要召开共产国际大会的）一起去莫斯科。于是，对姚作宾来说，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式登场亮相的仪式的。

和姚作宾同行的朴镇淳和李东辉，不巧中途在科伦坡耽误了时间，到达莫斯科已经是9月或10月，没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2] 上述《江亢虎新俄游记》说，“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而俞秀松1921年9月27日的抗议声明也说，姚“不久前来到莫斯科”，由这些材料来看，姚作宾似乎也和朴镇淳、李东辉一起耽误了行程，没赶得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这个迟误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此时不仅共产国际的大会已经闭幕，更重要的是，张太雷和俞秀松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就姚作宾的立场而言，他的赴俄同路伙伴也不相宜。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早已给朴镇淳打上了不可相信的烙印；而且，排斥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代表南万春（南满春），已经以朝鲜代表的身份撇开迟到的朴镇淳、李东辉出席了

大会，并在会后替代朴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233]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的人际网络庇护下集结而成的党派（其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初——时，正在该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舒米亚茨基举荐参加了大会，并致了贺词。[234]由于在远东的共产国际实权人物舒米亚茨基的支持下诞生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刚刚在第三次大会上做了朝鲜的代表，因而，随其对峙势力上海派高丽共产党领导人来到莫斯科的姚作宾的处境也便岌岌可危；更何况由于和舒米亚茨基的关系而支持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张太雷也已经成为中国的“共产党”的代表。一直警惕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把抗议（上述1921年9月27日的声明）递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这一点也暗示了中朝各共产党组织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展开的较量。

当然，共产国际在高丽共产党内讧的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地以承认伊尔库茨克派取胜而作罢，其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高丽共产党两派一边明争暗斗，一边摸索如何统一。但是，姚作宾的靠山朴镇淳的没落却是无可掩饰的。姚作宾在莫斯科勉强与共产国际举行了会谈，自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因为，且不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的时候（1921年6月）情形如何，在他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马林的出席之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姚作宾既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革新中国的运动中享有的声望，也没有足可依恃的强有力的组织。姚作宾、黄介民的“共产党”就这样结束了其短暂的活动。

5. 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

1921年下半年出现在莫斯科、主张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接近苏俄、筹划成立共产党的呢？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来追溯一下如彗星般划过上海学生运动界的学生运动家姚作

宾的事迹，以探讨后“五四”学生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消长过程。有关五四学生运动的巨大成果之一全国学联，不少研究著作都谈到它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其在1920—1921年之间，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的这段时期的动向，至今尚不清楚。[235] 也就是说，尽管人们都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成立的契机之一，却几乎没有人来探讨后“五四”的学生运动。作为反日爱国运动而开始的五四学生运动，后来其一部分朝着社会改造的方向（最典型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猛进，肯定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236] 在这里，我们就以姚作宾这位后“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另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人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

姚作宾（1893—1949年）是四川省南充人。还在1918年春在日本东京自费留学时，就已经是一个不平凡的留学生斗士。同年4月8日，四川省籍的自费留学生约50人，因借学费事而与中国公使馆职员殴斗，姚作宾在这场殴斗中被日本警察拘留。警方留下的被拘中国学生名单有这样的记录：“姚作宾（年二十四）学校未定”，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237] 而警方第二年整理的留日学生调查书[238] 记载，他此时已经正在明治大学学习，并且是四川省同乡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其影响的有约20名留学生。可见，五四运动爆发时，姚作宾在东京，在留学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

就笔者所见，姚作宾第一次在上海的学生运动圈中露面，是在1920年1月1日，作为任期将满的留日学生代表理事刘振群的后任出席全国学联总会的茶话会。[239] 所谓全国学联，不言而喻，就是那个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为了疏通和强化“五四”后各地涌现的学生联合会之间的联系，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的成立，是全国性群众联合组织的先驱，无疑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高潮的一个里程碑。据说，当时的全国学联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势力。[240] 但是，就像许多联合组织所常见的那样，

由各地学联代表组成的全国学联，在运动风起云涌的1919年将要结束的时候，逐渐迷失了活动方向，致使活动停滞不前。

因为各地学生代表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上海，不得不频频更换理事，而离任理事也经常得不到及时补充，这是活动停滞的现实原因；再加上全国学联的知名干将段锡朋、康白情等人获得上海经济界人士提供的丰厚奖学金而离开学联赴欧美留学（当时学界引清末旧事讥其为“五大臣出洋”[241]），组织涣散难以避免。姚作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的。不过，他没有气馁，而是为了挽回学联的颓势而积极地开展工作。事实上，虽说疾风骤雨般的1919年已经过去，可是，学联仍面临着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因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以至于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也就是，是否由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来解决日本主张继承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问题，学生运动方面当然坚决反对直接交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任学联理事之后的1月至3月，姚作宾一面随时出席学联的总会理事会，一面作为学联代表，屡次担任沪上频繁举行的山东问题国民大会的临时主席。[242] 对于全国学联来说，此次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当然是再次激起已渐趋冷却的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的绝好机会。恰在此时，1月29日，积极反对直接交涉的天津学联遭到了流血镇压，以其高昂的战斗性而闻名的天津学联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243] 不过，这件事倒有可能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再次高涨。于是，为了研究如何推动反对直接交涉的运动，全国学联的总会在2月27日向全国各省区学联发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244] 姚作宾等全国学联的干部们，想必是满怀期待而十分激动的。

但是，各地的代表迟迟未能到齐，他们的期待落空了。同情学联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姗姗来迟的各学联代表原定于3月20日开会，但是，当日到会的不及预定人数的一半，会议不得不临时改为谈话会，正式会议则在一周后的3月27日才得以召开，3月31日才对北京政府发出了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要

求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最后通牒”。[245] 各报社对学联的这些动向的报道，也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多。1919 年下半年，上海各报的《本埠新闻》栏的头条新闻，几乎每天都是有关“学联”动向的报道；而今的全国学联，显然已经没有了往日那样的对舆论界的影响。

不过，事已至此，学联已经无路可退。眼见北京政府并不理睬学联的“最后通牒”，学联总部遂号召各地学联于 4 月 14 日开始大罢课。这是继 1919 年之后的第二次全国大罢课。呼吁进行“最后之决斗”的罢课指示将北京政府称做“北廷”，并说：“毁法卖国之恶政府，决难长此存在”[246]，由此可见姚作宾等学联领导的巨大决心。第二次大罢课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北京政府。罢课的第一天即 14 日，全国学联的代表参加上海学联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时，也在讲演中明确提出“推翻卖国政府”。[247]

可是，各地罢课学生的步调并不一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东南各省的学联，在接到罢课指示后，陆续开始了罢课；但北京政府脚下的北京、天津的学联，由于刚刚遭受重创，没有立即罢课。另外，北方的学联并不赞成上海方面以北京政府为敌的政治罢课的方针。[248] 因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否认北京政府，就意味着倾向孙中山一派的国民党势力，而学生们一般都不愿意卷入这种党派政治斗争中去。事实上，这期间的舆论，只有孙中山、国民党系的《民国日报》等少数报纸赞成学联的大罢课方针，如《时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大报，对以推翻北京政府为目标的学生罢课都持反对态度。

4 月 22 日，北京学生好不容易开始了罢课，然而，两天后，淞沪护军使在上海发布了戒严令，到了 26 日，部分与学生相呼应而罢工、罢市的工人和商店也偃旗息鼓，运动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高潮。5 月 6 日，法租界当局查封了学联总部，已经处于颓势的学联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249] 进退维谷之中，学联总会于 5 月 14 日满怀悲愤发出了 17 日中止罢课的通电。[250] 就这样，

学联倾尽全力的“最后之决斗”，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没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作为学联理事的姚作宾，无疑直接参与领导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和第二次大罢课。但是，俞秀松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声明中则指责他说：“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姚作宾是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姑且不论他主观热忱如何，他应该对学生罢课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他是否因此就是“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却不敢苟同。俞秀松的声明没有说姚作宾有什么值得“唾弃”的行为，问题可能出在以打倒北京政府为口号的“第二次大罢课”，在形式上支持了国民党的党派主张[251]；或者，“为人喜欢出风头，好大喜功”[252]的姚作宾在学生罢课期间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谋求与苏俄方面建立联系一事，被当成了意在抢功，也未可知。总之，从当时报纸的报道里面，找不出俞秀松指责姚作宾等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值得“唾弃”的行为；上述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也对发动学生罢课时的学联总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次大罢课失败以后，1920 年 7 月，姚作宾因学联总会理事任满而卸任，留日学生代表理事一职由即将回国的李达继任。[253] 学联理事会原定 7 月 1 日换届[254]，但各地学联虽经再三催促[255]，却迟迟选不出继任理事；到李达的第二届理事终于到齐、从而得以召开理事会时，已经比预定晚了三个月。[256] 姚作宾等原班人在 7 月 29 日的欢送会[257]后，离开了学联总部一段时间。顺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李达曾任学联第二届理事一事，在其传记中也只有十分简单的记述。在学生运动家当中有这样的评断，即“全国学联第二届、三届都为右翼所把持”[258]，所以，曾经是学联理事，并不光彩。李达在自传[259]中也只字未提自己与学联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涉及他的前任姚作宾，因此无法从李达的自传中了解姚作宾如何卸去学联理事以及他后来所从事的活动。

李达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学联理事会，没有进行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只是消磨时日。奇怪的是，1921 年 1 月，姚作宾突然替代了李达重新成为学联理事，并就任主席。[260] 是姚作宾不满于学联理事会虚度时日呢，还是姚作宾难以割舍学联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姚作宾于同年 4 月写给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和总会工作人员龚德柏的信[261] 中，倒是谈到了李达退任一事。信中写道："李达此番辞职的第一原因是办事产生种种差误，最近数月耗尽精力，身心疲惫，且受环境所迫，不胜同情者也。"所以他解释说，为私，则"目睹此情景，从交友上，我不得不帮助他"；为公，则处此"各理事不负责，各学生不出力"的学界现状，为避免"总会倒毙"，自己也"不得不出来暂时维持本会"。从这封信看，他是为了维持将要崩溃的学联，万般无奈才再次出山的。

实际上，学联在经济上也已经濒于崩溃。姚作宾在信中还说，如果各地学联按规定上缴会费，预算应该有一万两千多元；但是，实际上只有留日、上海、山东等几个地方的学联缴纳会费，全国学联的经费基本上来自募捐和借款。而关于借款，他也诉苦说："时至今日，已彻底走投无路。"他是较晚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留给他的只有处理战败善后的差使。但是，面对困境，他很顽强。从报纸的报道看得出，他一边代表学联频繁出席各处的集会，一边到各地方学联视察，以协调立场，或"解决经济问题"。[262] 这边有上海的学生运动家被捕，他就跑到检察厅去要人；那边的火柴厂因查出日货而与学生发生争执，他又跑去调查[263]，简直是在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他还联系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建立了关系。说起来，1921 年 5 月，他参加为迎接"日本共产党"的使者近藤荣藏而举行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会议时，其身份之一就是全国学联总会主席。

如前所述，1921 年 6 月，姚作宾和朴镇淳、李东辉等同赴莫斯科。同年 7 月 11 日的日本警方报告称，姚作宾"不久前，

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派（据说该总会支付旅费一千元）考察西伯利亚地区过激派形势”。[264] 估计这次所谓西伯利亚之行，其实就是6月的莫斯科之行。而假如正苦于经费枯竭的学联果然支付一千元巨款以成其行，那么，他与共产国际的交涉，除了巩固他自己的“共产党”外，也许还是彻底解决学联财政困难的孤注一掷之举。[265]

上述署名CP的《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说，姚作宾等人遭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痛击，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的旅程似乎充满了艰辛，甚至有人传说“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几乎死在那里”。[266] 在莫斯科的努力失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的学联总部[267]，而他和黄介民的“共产党”不久也就消散了。

姚作宾于1920—1921年投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运动，尽管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难题，可是由于组织涣散、学生的思想意识开始分化、舆论的冷漠、警方镇压日趋苛烈等等原因，已经处于消退状态。学联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热情洋溢的声明，学联代表姚作宾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试图与“过激派”俄国人建立关系，正是在这个时期。姚作宾等部分学联负责人不满足于低迷的学生运动，或者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状态，从而把眼光投向革命俄国，并非不可理解。这样看来，学生运动中的这些行动，是运动消退时期常见的组织分化，以及部分领导人伴随组织分化而走向急进这类现象在全国学联的具体表现。

全国学联成立时的1919年6月，学生运动曾经在爱国的旗帜下达成了高度团结。可是，到了1920年，面对逐渐采取镇压态度的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已采取了否认的方针，从而踏进了曾慎重避开的政治领域；同时，运动的方法和目的的多样化也要求对此提出具体策略。就如何对待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而言，有的学生呼吁暂时支持政府以打破对外危机，有的学生则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与政治发生关系；就运动方法而言，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主张，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通过实践改造社会的主张则有工读互助团运动、各种“新

村”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而姚作宾等学联负责人选择的道路则是，通过与苏俄合作，把学生运动转化为革命运动。从共产国际、苏俄方面（尽管其对华工作渠道不统一）来看，反帝国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否认北京的军阀政府、并具有潜在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显然是一个革新的、因而是值得与之联合的革命预备组织。姚作宾等人成立共产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乍看上去十分奇异，可实际上是以双方的一致愿望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虽说姚作宾等成立共产党这件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一段秘闻，或者顶多是一个插曲，却证明了五四学生运动即使在组织方面——尽管与“正宗”共产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并且不久就消逝了——也是朝向孕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并且与苏俄的对华推动工作密切相关的。

注释：

[1] 较早研究刘泽荣（刘绍周）和张永奎的论文是，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载《历史研究》1979 年第 6 期；稍后的有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两个中国人》，载《党史研究资料》1986 年第 6 期；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张永奎情况简介》，载《革命史资料》1986 年第 4 期等。另外，刘泽荣本人曾就他在苏俄的活动和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写有回忆录（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载《工人日报》1960 年 4 月 21 日；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 年第 60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14 页。

[3] List of the Delegates to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Moscow,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1, 1919. 另外，两位代表的名字分别作 Lau-Siu-Djau, Chan-Su-Kooy。

[4] 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史馆 1997 年版。

[5] 本书叙述侨居俄国的中国人的动向以及其联合会的活动时，主要依据下述研究成果：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К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такт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 ей Китайс кой секции

РКП（6）с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КПК: 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1921—1922,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8, No.2（卡尔图诺娃：《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1921—1922年文献写成）》，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1990年）；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43—53页；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6] 第二次大会的两名中国代表之一“An En-hak”（Ан Ен-хак）一直被译为“安恩学”，最近的研究终于弄清应该是“安龙鹤”（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7]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89，目录1，卷宗14，第122页。不过，经过一番曲折，远东局最后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8] 请参阅伊藤秀一《コミンテルンとアジア（一）——第二次大会に关する觉书［共产国际和亚洲（一）——第二次大会研究笔记］》，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研究》1971年第6号；神户大学文学会编：《研究》1971年第47号。

[9] М. А. Персиц, Восточны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в Росс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нац 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 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1918-июль 1920）, *Коминтерни Восток*, Москв а, 1969（佩尔西茨：《旅俄东方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载《共产国际与东方》）。

[10] 同前；К. В. Шевел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 и 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0, No.4（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远东问题》；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3, London, 1961, p.109.

[12]《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文件四》）。

[13] 同前；上田秀明：《极东共和国の兴亡［远东共和国的兴亡］》，アイペックプレス［埃佩出版社］1990年版，第98、108页。

[14] 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5] 原晖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涉1917—1922［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筑摩书房1989年版，第527—529页；前引上田秀明《远东共和国的兴亡》，第108页。

[16] Ю. М. Гарушянц,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их Марксистовза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Афри ки*, 1961, No.3（加鲁尚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载《亚非人民》）。

[17] M. Meisner, *Li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67, pp. 115, 282; 汉译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8 页。

[18] А. А. Мюллер, *В пламени революци и* (*1917—1920гг.*), Иркутск, 1957, стр. 144—145 (缪勒尔:《在革命的烈火中》)。其中与李大钊接触的部分有中文节译(《李大钊与布尔特曼》,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6—7 期)。

[19] 前引《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 128 页。因其汉译不一定准确,本书引文参照着俄语原文,适当地加以修改。

[20] В. Н. Кучко, Н. Г. Буртман-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 *Опытиурокиистории КПК. К 6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артии*, Москва, 1981 (库季科:《布尔特曼——革命家、国际主义者》,《中共历史的经验教训——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周年》;中文节译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3 期)。

[21] К-н, Л., Нюма Буртман, *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2, 1921 (《纽姆·布尔特曼》,载《远东人民》)。该悼词的作者 К-н, Л, 是常与布尔特曼一起活动的学友考夫曼 (L. G. Kaufman)。

[22]《关于俄共 (布) 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1920 年 12 月 21 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23] 同前;前引《纽姆·布尔特曼》。

[24] 本书有关波波夫的叙述,除特别注明外,皆依据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 55—56 页;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李丹阳、刘建一:《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 6 期。补注——最近出版了波波夫的详细传记:М. В. Крюков, *Улица Мольера*, 29: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полковника Попова*, Москва, 2000 (刘克甫:《莫利爱路 29 号:波波夫上校的秘密使命》)。

[25] H. Owen Chapm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1927: *a record of theperiod und er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 London, 1928, p. 45.

[26] C. M.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York, 1976, pp. 115—116; 汉译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27]《上海佐藤少佐给总长的电报 (1920 年 10 月 7 日)》(《C》)、《外高秘第 351 号有关上海方面过激派等件 (1921 年 3 月 18 日)》(《C》)。

[28]《上海之过激派与朝鲜人之状况 (大正 10 年 8 月 4 日)》,载《外事警察报》第 5 号,1921 年 8 月。

[29]《上海佐藤少佐给总长的电报 (1920 年 3 月 12 日)》(《C》)。

[30]《驻上海总领事山崎给内田外务大臣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15 日)》(《C》)。

[31] 前引原晖之《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第 274、348 页。

[32] 前引上田秀明《远东共和国的兴亡》，第 144—145、153 页；H. K. Norton,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 London, 1923, p. 148.

[33]《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1 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34] 除特别注明外，以下有关波塔波夫的叙述，依据如下研究成果：Г. В. Ефимов, *Сунь Ятсен. Поискпути: 1914—1922*,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18—119（叶菲莫夫：《孙逸仙——道路的探索》）；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 56—59、131—134 页。有关波塔波夫在中国活动的文件，藏于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

[35]《上海电第 38 号间谍（俄国军官）通报（1920 年 4 月 19 日）》（《C》）。

[36]《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长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1920 年 11 月 11 日)》，《陈竞存先生年谱》1920 年条（收于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编刊《海丰人文资料》17，1996 年版，第 175 页）。

[37]《卢永祥复电（1920 年 3 月 13 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18—619 页。

[38] 关于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施行的开明政策，请参阅嵘峨隆《陈炯明支配下の新文化运动——闽南护法区を中心に［陈炯明统治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以闽南护法区为主］》，小岛朋之、家近亮子编：《历史の中の中国政治——近代と现代［历史上的中国政治——近代和现代］》，劲草书房 1999 年版。

[39]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 131 页；《陈竞存先生年谱》1920 年 5 月 29 日条，收于前引《海丰人文资料》17，第 175 页。《陈竞存先生年谱》所记使者名字为“路博将军”，此即波塔波夫。其详细考证请参阅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6 集，1988 年；邱捷：《“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载《学术研究》1996 年第 3 期。还有的回忆记载，苏俄使者曾向陈递交了列宁的亲笔信（陈其尤：《1919 年苏联派第一个使者到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1961 年），但至今未发现该亲笔信。

[40] Wilbur, *op. cit.*, p. 115.

[41] A.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in China: 1917—1924*, Stanford, 1968, pp. 116, 305. 刊载于《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 НКИД*）上的陈炯明致列宁信，由李玉贞全文译出（前引《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 132—133 页）。陈炯明在信中这样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面赞同：“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我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

[42] 关于孙中山、陈炯明等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请参阅如下专著。刘德喜：《两个伟人和两个大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年版；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

际》；M. Kriukov, The Winding Road to Alliance: Soviet Russia and Sun Yatsen (1918—1923), *Far Eastern Affairs*, 1999, No. 2—3; Н. Л. Мамаева, *Коминтерн и Гоминьдан: 1919—1929*, Моск ва, 1999（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

[43] Wl. Wilenski (Sibirjakow), Am Vorabend der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No.16, 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载《共产国际》德语版；汉译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44]《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45]《上海电第38号间谍（俄国军官）通报（1920年4月19日）》（《C》）。

[46]《波塔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莫斯科）》（《文件七》）。

[47] 杜洛斯基著，震瀛译：《我们要从哪里做起?》（原文是 *L. Trotsky, What should we begin with?, Soviet Russia*, Vol.2, No.24, Jun. 1920）。译者震瀛是袁振英。

[48]《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的编者注，及前引 Ефимов, *Сунь Ятсен. Поиск пути 1914—1922*, стр. 117—119（《孙逸仙——道路的探索》）。

[49] 马贵凡：《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

[50] 本书关于西伯利亚、远东的俄共地方组织和对华工作机关沿革的叙述，除特别注明外，皆依据如下研究成果：И.Н. 索特尼科娃（Сотникова）报告、马贵凡编译：《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Г. М. Адибеков, Э. Н. Шахназарова, К. К. Шири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 Москва, 1997（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堀江则雄：《远东共和国の梦［远东共和国的梦想］》，未来社1999年版；山内昭人：《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の组织构造（二）——东アジア关系［早期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二）——东亚部分］》，“早期共产国际与东亚关系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京都）报告，1999年7月。

[51] 关于党组织的沿革，依据 *Сибирскоебю роЦ КРКП (б), 1918—1920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ч.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8, стр. 59, 253—254, 304—305（《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1918—1920年）史料集》第Ⅰ部）。包括该资料集在内，有关党组织的沿革，得山内昭人先生指教颇多，特此感谢。

[52]《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53] 前引索特尼科娃报告，马贵凡编译《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54] 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55] 马林离开莫斯科赴中国的时间是1921年3月。

[56] 前引索特尼科娃报告，马贵凡编译：《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57]《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日本科的组织与活动的计划（1920年10月25日以后）》，《斯米尔诺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0年11月13日）》，皆收于：*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6, стр. 147—151, 155—156（《苏俄的远东政策》）。

[58] 关于远东共和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交涉，请参阅 М. А. Персиц,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и Китай*, Москва, 1962（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章。

[59]《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60] 前引堀江则雄《远东共和国的梦想》，第87页。

[61] В. И. Глунин, Григорий Войтинс кий,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1970, стр. 68（格卢宁：《格里戈里·魏金斯基》，《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

[62] 东方学院（Восточный институт）1899年创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1920年成为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

[63] Dae-Sook Suh, *The Korean Communist Movement: 1918—1948*, Princeton, 1967, p. 18. 金万谦属于高丽共产党的伊尔库茨克派。1926年，为了与张作霖交涉中东铁路问题，金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至奉天，其后也做过外交方面的工作。补注——最近出版了金万谦的详细传记：Б. Пак, *Ким Мангым*（*И. С. Серебряков*）, Москва, 2001（鲍里斯·朴：《金万谦（谢列勃里亚科夫）传》）。

[64]《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6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85—87页；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皆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6] 栖梧老人（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出席者中，包惠僧留下的回忆录最多、最详细，这些回忆录后来被集成一册，刊行了《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几乎无原始资料可资利用的时期，包惠僧的回忆录在中共成立史研究中曾具有极大分量；然而，随着原始资料的发掘，他的回忆录中杜撰和记忆混乱越来越明显。关于其他当事人（比如董必武）怀疑包惠僧的回忆录，请参阅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顺言之，有一个时期，曾有人推测“栖梧老人”是董必武的笔名，最早论证“栖梧老人”是包惠僧的笔名的，是香港的民间学者邓文光（邓文光：《研究现代史的甘苦》，载

《人物与思想》第18期，1968年；后收入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东风出版社1974年版，以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青骢出版社1976年版）。

[67] 杨明斋的传记有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收集资料颇丰，但其在俄时期的活动并不清楚。

[68]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5—86页。

[69] 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я 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Т. I.（1920—1925），Москва，1994，стр. 768（《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Steve A. Smith，*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Richmond，2000，pp. 16，232.

[70] С. А. Далин，*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Москва，1975，стр. 31；汉译见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71]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Китая（1920—192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73，No.1（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徐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2]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回忆前后的回忆》、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73] 关于伊万诺夫的生平，请参阅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ванов（Ивин），*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5，No.4（尼基福罗夫：《阿列克赛·阿列克塞维奇·伊万诺夫》，载《亚非人民》）；徐万民：《伊文与伊凤阁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李丹阳：《英伦航稿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据北京大学保存的校方文件记载，伊万诺夫从1919年9月被正式聘用（关海庭、陈坡：《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若干材料》，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另外，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位伊万诺夫（A. I. Ivanov，中国名伊凤阁，因研究黑城的西夏文物而有名），越飞来华时协助其工作；二人常被混同，但仅同姓而已。

[74] 前引 Далин，*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стр. 31；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26页。在中国，类似说法首见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461页。

[75]《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76] 前引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77] 刘玉珊等编：《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78] 张西曼：《历史回忆》，济东印书社 1949 年版，第 5 页。

[79]《关谦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集会活动及筹资赴俄调查等情致王怀庆呈（1921 年 2 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9 页。据北京大学校方文件记载，他于 1921 年 1 月被聘为该大学俄语系讲师（前引关海庭、陈坡《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若干材料》）。

[80]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第 85—86 页。

[81]《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 年 6 月，上海）》（《文件一》）、《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 年 8 月 17 日，上海）》（《文件二》）。

[82]《斯米尔诺夫为筹措在上海开展共产国际的工作筹集外汇问题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请求（1920 年 12 月 21 日以后）》，前引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стр. 180（《苏俄的远东政策》）。

[83] 前引张西曼《历史回忆》，第 5 页；关山复：《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3 期。据张西曼讲，柏烈伟与苏俄断绝关系后仍留在北京，在北京大学任俄语讲师，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

[84] 高兴亚：《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135 辑，1999 年。

[85]《优林给苏俄政府的信（1921 年 10 月 7 日以后）》。这封信作为中国政府没收的过激派往来信件，转收于《高警第 27941 号关于过激派在远东的宣传工作（1921 年 10 月 7 日）》（《C》）。

[86]《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1 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87]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1 页。

[88] 虞崇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载《江汉论坛》1986 年第 5 期；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载《百年潮》2001 年第 7 期。

[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 页。

[90]《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5 月 24 日。

[91] 关于陈独秀回北京后的情况，请参阅《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5—186 页；苏长聚：《关于〈陈独秀传〉（上）一书中几处史实的订正与商榷》，载《中共党史通讯》1991 年第 6 期。胡适日记（1920 年 2 月 9 日条）中有“因 C.T.S 事，未上课”的记述（《胡适日程与日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4 册，黄山书社 1994 年版，第 244 页），看得出胡适在为陈独秀事奔走。

[92]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93] 高一涵：《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工人日报》1957年4月27日；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963年10月执笔）》，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等。这些回忆录后被以《回忆李大钊同志》为题，收于《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94] 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给胡适、陈独秀的信（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178—179页），证明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

[95] 除高一涵回忆录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下述回忆（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也常被作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旁证”：

“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1920年初］由京来津。……次日晚间，李、姜［姜般若，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段回忆说的好像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去天津避难。但是，不能仅凭这点就断定那时二人就成立共产党一事进行了商议。再者，所谓《益世报》刊登的报道文章也没有确认其是否真正存在，由这个十分暧昧的回忆引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96]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7页，原注2。

[97]《文件一》、《文件二》。《文件二》中有“《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的字句，资料集俄语版编者以该“李同志”不清楚是何人，而汉语版编者则认为是“李震瀛”；笔者认为是李汉俊。总之，肯定不是李大钊。

[98]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另外，《新青年》七卷六号（1920年5月）所收《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狂热反响。

[99] 关于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的状况以及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请参阅前引原晖之《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第144—151页；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6页；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4页。

[100] 没有文件证实魏金斯基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陈公培的回忆录（《回忆党

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说，“我在这年［1920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魏金斯基］”。有关人的回忆还说，除杨明斋外，来华的魏金斯基一行中还有一名朝鲜人“安某”（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这位“安某”大概是高丽共产党方面的安恭根或安秉赞等，但无确证。另外，柳建辉：《魏经斯基1920年4月到过济南吗?》（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论证，魏金斯基一行从北京赴上海的途中曾在济南与接触过当地学生的说法没有根据。

［101］《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102］《公信第286号第2部呈送远东社会党局发表宣言书之剪报件（1920年6月10日）》（《C》）。

［103］抱朴：《批评中国出版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2月27日。

［104］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Абрам Евсе евич Ходоров,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6, No.5（尼基福罗夫：《阿勃拉姆·埃布塞维奇·霍多罗夫》，载《亚非人民》），Whiting, *op. cit.*, pp. 116—118；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俄代表与各报记者之谈话》，载《晨报》1920年9月18日；石克强（К. В. Шевелев）：《孙中山与远东电讯社（1920—1921）》，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载《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105］有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在中国为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是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Alegseev, Alexieff）”（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65页；Wilbur, *op. cit.*, pp. 117, 326—327）。其根据是布施胜治著《ソウエト东方策［苏维埃的东方政策］》（燕尘社1926年版）。布施在该书中记述道，1921年春，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由莫斯科来华，在广州开设罗斯塔通讯社分社及俄语学校，同年3月会见孙中山，秘密缔结了苏俄与南方政府互相合作的协定（第270—272页）。但是，这位“亚列格塞夫”是否真有其人，值得怀疑。1921年4月，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曾在广州采访过孙中山（《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1982年），概布施把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误以为是“亚列格塞夫”。

［106］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经过彻底调查（木下义介：《上海に於ける过激派一般（大正11年6月）［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5—16页［《C》］），查明了达尔塔通讯社与上海生活报社同在一座楼内办公，并互相配合活动。根据该调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位于现九江路与江西路交叉口处，达尔塔通讯社和上海生活报社位于虹口的长治路与塘沽路交叉口处。

［107］前引木下义介《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2页。

[108]《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皆收于松尾尊兒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6年版，第62、110页。

[109] 前引木下义介《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2页。

[110] 中国政府和远东共和国（优林代表团）之间的外交谈判，直到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也没有达成两国建交。到了1924年之后，中苏才正式建交。

[111]《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文件四》）。

[112] 同前。

[113] 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沿革史专著：Г. М. Адибеков, Э. Н. Шахназарова, К. К. Шири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 Москва, 1997（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里，也没有关于1920年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记述。

[114] 关于“中华工业协会”，以及五四运动前后上海的劳动运动，江田宪治：《五四时期の上海劳动运动［五四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5函，17，同朋舍1992年版）叙之甚详。

[115]《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116] 同前。

[117]《文件三》、《文件四》。

[118]《文件一》。

[119] 中文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译者注引加鲁尚茨考证，认为此人是Б.И. 潘克拉多夫。潘克拉多夫（В. І. Pankratov）是苏联著名的汉学者，1916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自1918年起在汉口做俄语教师，同时在湖南、湖北做方言调查。20—30年代，先后在北京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罗斯塔通讯社、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苏俄中国学手册（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彭泽湘：《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120] 在《文件一》的中文译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里，该处为“群益书店”。

[121] И. М. Мусин, *Очерк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опрос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Москва, 1927, стр. 228（穆辛：《中国劳动运动概论》，《中国革命诸问题》第1卷。转引自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22]《收驻崴邵领事电民国9年6月17日》、《发驻崴邵领事电民国9年6月19日》，皆收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刊：《中俄关系史料—般交涉民国九年》，1968年版，《俄对华外交试探》，第50页。

[123]《文件四》。

[124] 同前。稍后，俄共西伯利亚局在10月1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东方民族处的工作，并要求“注意在中国和朝鲜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前引佩尔西茨《旅俄东方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

[125]《文件八》。

[126] 该报告在最后部分说，“《中国社会主义报》（Кита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 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出版者李同志（т. Ли）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报》具体指什么报纸，但所谓“李同志”大概指李汉俊。

[127]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于1921年刊行的《远东人民》杂志（*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第2号（1921年6月23日）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итае）一文，该文用俄音标注汉音的方法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刊行的书籍、杂志，其中有《谁是共产党》。另据《文件八》称，《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的作者是“米宁（Минин）”，不清楚是何人。

[128] 李得胜：《一个兵的话》（1920年再版，出版社不明，收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作者李得胜的生平不清楚。另，该小册子的内容与无政府主义团体“真理社”在1919年发行的《兵士须知》（李得胜述）相同。关于《兵士须知》的封面、内容以及散发情况，请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封面照片及第19—28、30、33页。在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该小册子名为《一个兵士的谈话》。

[129] 中译本正式名称似乎是《十月革命给了我们什么》（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但没有发现中译本原件，其出处也难以确认。

[130]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收有《中俄（华俄）通信社新闻稿目录》。关于该通讯社的活动概况，请参阅方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个新闻通信社——上海“中俄（华俄）通信社”》，载《上海党史研究》1992年第9期；任武雄：《建党时期的中俄通讯社和华俄通讯社》，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131]《本报记者与华俄通信社驻华经理之谈话》，载《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

[132]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第2号，1920年8月。

[133] 沈以行等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2页。

[134]《通信》，载《劳动界》第7号，1920年9月；《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载《劳动界》第9号，1920年10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纪》，载《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135] 前引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

[136] “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载于《少年中国》二卷五期，1920年11月。

[137]《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载《少年中国》二卷三期，1920年9月。

[138] 谌小岑：《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天津觉悟社》，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39] 魏金斯基曾数次从上海向日本派出信使（朝鲜人），以谋求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魏金斯基印象中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是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接触（《文件一》、《文件二》）。

[140] 大杉荣著、飞鸟井雅道校订：《自叙传·日本脱出记》，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84—295页；《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04页。关于“M”，有人认为，“不敢肯定马某其人即上述马马耶夫”（岩村登志夫：《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党の成立［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三一书房1977年版，第78、105页），也有人认为“M”是“Yi Ch’un suk（李春熟）”（R. A. Scalapino,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1967, p. 12；警保局：《朝鲜人近况概要大正11年1月》，朴庆植编：《在日朝鲜人资料集成》第1卷，三一书房1975年版，第124页）。飞鸟井氏采“李春熟”说。

[141] 在日本的有关研究中，多数认为“俄国人T”是“切伦［音译］”（前引大杉荣著、飞鸟井雅道校订《自叙传·日本脱出记》，第292—295页；犬丸义一：《第一次共产党史研究增补日本共产党的成立》，青木书店1993年版，第79页），但其根据不明，“切伦”其人的生平也一概不得而知。

[1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有“昨，俄劳农代表包利克、外金斯克来谈中国现在并将来，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第277页，1920年10月10日条）。白坚武9日刚刚见过李大钊（李与白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友，关系致密），据此推断，有可能是李大钊把魏金斯基介绍给他的。

[143] 魏金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前引《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9—113页；原载《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关于会见的时间，魏金斯基只说“在1920年的秋”，但同时又说，会见后，“不久，孙中山到广州去了”（孙中山出发去广州是11月25日），故作11月。

[144] 同前。

[145]《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前引魏金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146]《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发件地

不详)》(《文件九》)。

[147] 同前。

[148] 前引 Далин, *К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тр. 27—32(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 23—27 页)。

[149] 有一些人认为,魏金斯基第二次来华是在 192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比如,前引《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472—473 页;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 页)。但是,魏金斯基这个时期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 年 11 月 26 日)》,[《文件九十五》]),不可能来华。

[150]《文件八》。

[151]《斯米尔诺夫为筹措在上海开展共产国际的工作筹集外汇问题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请求(1920 年 12 月 21 日以后)》,前引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стр. 180(《苏俄的远东政策》)。

[152] 此外还有一位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K. N. Sokolov-Strahov),他于 1921 年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联系,并据魏金斯基提供的情报报告了广州的政治局势(《文件九》)。但是,只知道他 1920 年 11 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其来华的过程及时间等不详。

[153] Claude Cadart, Cheng Yingxiang, *L' 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emoires de Peng Shuzhi*, Paris, 1983, pp. 162—166(《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轫:彭述之的回忆》);汉译见《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载《争鸣》,香港,第 68 期,1983 年。

[154] 抱朴(秦涤清):《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 年 8 月 27 日。

[155]《文件八》。补注——最近公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致魏金斯基的电报(1920 年 9 月 30 日,伊尔库茨克)》(收于 К. Шевелев, 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No.4 [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 80 周年:新资料》,《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 年第 12 期)称,"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指霍赫洛夫金]",可知霍赫洛夫金是 1920 年 10 月间成行的。

[156] 国际工会联合会是 1920 年 7 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临时机关,翌年 7 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该联合会于 1920 年 11 月指示驻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6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7 页)。

[157] 以下有关福罗姆别尔格的叙述,依据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Профинтерн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Из истории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1*（卡尔图诺娃：《赤色工会国际与中国职工运动（相互关系史）》，载《亚非人民》；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1992*年）以及前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

[158] 马林曾说在上海与他共同工作的有福罗姆别尔格（《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 Leiden, 1991, p. 30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159] 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称，"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弗来姆堡［福罗姆别尔格］的帮助下，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第239页），但没有注明根据何在。不清楚福罗姆别尔格在中国活动到什么时候，不过，据日本警方资料称，1927年时，他是上海的苏联银行"远东银行"的总经理（《上海的劳农俄国远东银行搜查及封锁事件》，载《外事警察报》第62号，1927年8月）。

[160]《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161] 徐相文：《从苏俄的亚洲战略看中共"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台北史馆馆刊》复刊第23期，1997年）认为，召回魏金斯基，是为了使远东共和国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而做出的让步。这种见解过于穿凿。因为，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对北京政府的威胁，尚不足以成为外交交涉的筹码。

[162]《共产党》月刊第3、4号实际发行日期，比杂志底页记载的1921年4月、1921年5月要晚。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书第一章表2。

[163]《共产党》月刊第3号，因被上海法租界警察没收了部分版面，缺了一页。另外，《新青年》8卷6号载《本社特别启事》声明说，由于"特种原因"，以后发行地将移到广州。据《新青年》9卷1号称，所谓"特种原因"，即指"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不过，据说，《本社特别启事》是为了瞒哄警方，实际上，以后仍继续在上海发行（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57页；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64] 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 *op. cit.*, p. 309；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页）。

[165]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前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117页。李达也有同样的回忆（《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166] 近藤荣藏：《コムミンテルンの密使［共产国际的密使］》，文化评论社

1949 年版，第 128—129 页。

[167] 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认为，这位“黄某”即指黄介民。

[168]《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 11 年度 1 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 2 卷，第 106 页。近藤从上海回到日本下关后，被日本警察逮捕。

[169] 观其政治纲领，部分内容与 1912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党”相似，疑为模仿该党的组织。

[170] 杨奎松：《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4 期；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5—187 页；杨世元：《1920 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解析》，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1 期。

[171]《晨报副镌》1924 年 8 月 26 日、28 日。抱朴，原名秦涤清，原为无政府主义者，1920 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赴俄留学。

[172]《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60 页。

[173]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而召集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从 1922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2 月 1 日在彼得格勒闭幕）。有关大会概况，С. А. Горбунова, 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No.4（戈尔布诺娃：《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3 辑，1989 年）；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国际与日本］》（法律文化社 1982 年版）第 4 章叙之甚详。至于该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则有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174] CP：《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载《广东群报》附录《青年周刊》第 6 号，1922 年 4 月 2 日。

[175] 崔醒吾：《张民权是否到莫斯科?》，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 年 10 月 24 日。

[176] 张民权（号美真）是活跃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的名字屡屡见于报端，但其生卒年及籍贯（一说是湖南人）等不详。综合各种资料，其主要活动如下：他是成立于 1918 年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1919 年春为了进行救国宣传从上海赴广东、南洋，1920 年 2 月回国。3—4 月在福建漳州宣传无政府主义，4 月 20 日被陈炯明拘捕，后退避上海。在上海，与世界语学校“新华学校”有关系。1920 年 10 月，作为“活跃分子”，在上海的各类团体中露面，出席工商友谊会的成立大会等。后于 1921 年 6 月得其他同志的资金援助从上海赴莫斯科出

席共产国际大会。据说，他自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去世。前引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认为，“张民权”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张墨池”，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编辑《民声》杂志的“盛国成”为同一人物。顺言之，张墨池在1922年是中韩国民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孙安石：《1920年代、上海の中朝连带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の成立、构成、活动を中心に［1920年代、上海的中朝协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的成立、组织结构与其活动］》，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75号，1996年）。另外，有的记录载，张民权是广东省五华人，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曾在国共合作下的广州，后留学苏联，1949年以后在台湾（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38—39、527—528页）。不过，两位张民权不是同一人物。

［177］以下若无特别注明，有关共产国际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的叙述，皆依据水野直树：《コミンテルンと朝鲜——各大会の朝鲜代表の检讨を中心に［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载《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第1号，1984年。

［178］中央档案馆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莫斯科的档案馆也藏有类似的文件（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9页）。

［179］前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180］Wl. Wilenski（Sibirjakow），Am Vorabend der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China，*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No.16，1921（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载《共产国际》德语版；汉译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181］德语与汉语读音有差距，但同时举出的其他人名字，如“Di-Kan”＝狄侃、“Kai-Bei-Dsin”＝康白情、“Wan-Dei-Shi”＝王德熙、“Fan-Fu-Guan”＝冯复光、“Tzen-Tsao-Schen”＝陈肇甡等，都是1920年初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的理事；据此判断，“Jao-Tso-sin”即姚作宾。关于当时学联理事的姓名，请参阅《两学生会消息》，载《申报》1919年12月12日；《学生总会理事会开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2月14日。

［182］据威廉斯基说，“由各地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组织的执行部”（即“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会”）的七名成员中，包括姚作宾在内的三人是“大同党”党员，一人是“真理社”成员。另，魏金斯基在上海也曾与上海学联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有过接触（程天放：《李公柯四年》，《传记文学》1卷7期，1962年）。

［183］《卢永祥复电（1920年3月13日）》，前引《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18—619页。

［184］《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

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另，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也记录道，姚作宾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为谋求与俄国过激派协作，曾于本年［1920年］4月赴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旅行”（《外秘乙第225号关于需特别监视支那人之动静件（1920年8月9日）》［《D》］）。

［185］《俄学生请求世界同情》，载《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186］《上海に於ける思想团体［上海的思想团体］》，载《外事警察报》第21号，1923年。

［187］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载《清江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该传记是采访黄介民而成，但其中关于新亚同盟党改称大同党的时间并不明确，只说“新亚同盟党后又改名为大同党”。补注——关于新亚同盟党在韩国独立史上的作用，请参阅姜德相《吕运亨评传》第1卷［日文］，新干社2002年版，第98—104页。

［188］陈其尤：《1919年苏俄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61年。

［189］关于王希天的生平，请参阅仁木文子《震灾下の中国人虐杀［震灾中虐杀中国人事件］》，青木书店1993年版。

［190］关于可思母俱乐部，请参阅松尾尊豪《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载《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年。

［191］山鹿泰治：《たそがれ日记［黄昏日记］》第1分册·4《秘密结社大同党》（《黄昏日记》的这一部分内容全文转录于坂井洋史《山鹿泰治と中国［山鹿泰治与中国］》，载《猫头鹰》第2号，1983年。该处叙述以此为据）。据山鹿称，大同党是一个“为自由和和平而努力的结社”，其口号是“超越国籍和阶级，向五大洲寻求同志”。

［192］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1979年，第219页。另，刊登于《解放与改造》一卷二号（1919年9月）的今井政吉著，超然、空空译：《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是“纯粹的大同主义”。

［193］王觉源：《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94页。该书除大同党的政纲外，还简单地介绍说大同党的党员中有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越南人、印度人等中外人士，但未注明所据。

［194］前引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

［195］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7页。

［196］前引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以下除非特别注明，关于黄介民生平的叙述皆依据该文。

［197］赵素昂（原名赵镛殷，1887—1958），朝鲜独立运动的理论家，以其“三均主义”闻名。在明治大学学习结束后回国，执教于法学专修学校，后来赴中国，

参加了独立运动。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赵就任国务院秘书长。20年代初，他似乎也与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一样，一边与共产国际联络，一边从事活动，马林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也有他的名字（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 cit.*，p. 314；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6—67页）。1929年与金九、李东宁等成立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仍任外交部长，在政界占有重要地位。

[198] 据说，赵素昂在自传中也提到了与黄觉（黄介民）的交往（崔忠植：《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2页）。

[199] 关于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和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活动，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叙之甚详。

[200] 黄介民与陈独秀一同出席了1920年4月18日的"筹备劳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0年4月20日），在1920年5月1日的"五一节纪念大会"上担任主席（《民国日报》1920年5月3日），1920年5月16日，仍是中华工业协会总务部主任兼对外代表（《民国日报》1920年5月19日）。

[201] 关于1921年初以后在上海等中国各地成立的中韩互助社（中韩国民互助社），请参阅小野信尔《三一运动と五四运动［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饭沼二郎、姜在彦编：《植民地期朝鲜の社会と抵抗［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社会与抵抗］》，未来社1982年版；前引孙安石《1920年代、上海的中朝协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的成立、组织结构与其活动》。

[202] 黄介民后来继续从事中华工业协会的工作，同时参与编写YMCA的识字教材，参加了"五卅"运动。其后，回到江西，组织"江西革命同志会"，呼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还担任了江西省政府水利局长。1927年，国民党开始反共，他不满于蒋介石的独裁，辞去国民党的要职，回家乡赋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检察厅副厅长等职。

[203] 前引《上海的思想团体》。

[204] 前引山鹿泰治《黄昏日记》第1分册·4《秘密结社大同党》。

[205] 前引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

[206]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89，目录1，卷宗14，第122页。

[207] 韩人社会党在上海改称高丽共产党，是在1921年5月。详见前引水野直树：《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

[208] Dae-Sook Suh, *The Korean Communist Movement: 1918—1948*, Princeton, 1967, p.14.

[209]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

第1期。

[210] 关于“巴克京春”即朴镇淳的考证，以及朴镇淳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请参阅前引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

[211]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212]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2、130页。

[213]《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214] 关于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有，沐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引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孙春日：《上海临时政府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1919年9月—1921年7月）》，载《白山学报》［韩语］第42号，1993年。另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王维舟（1925年加入中共）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我于民国9年（1920年5月），经朝鲜金笠和李某二同志介绍，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王维舟：《我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1982年），但真实情况不详。

[215]《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216] 近年来有如下三种克拉斯诺晓科夫的传记问世：上杉一纪：《ロシアにアメリカを建てた男［在俄国建立了美国的人］》，旬报社1998年版；前引堀江则雄《远东共和国的梦想》；Б. И. Мухач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Краснощ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9（穆哈切夫：《亚历山德·克拉斯诺晓科夫》）。

[217] 前引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 *op. cit.*, pp. 312—313；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5页）。

[218] 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其活动，请参阅《阿穆尔华侨倾向共产》，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9日；В. М. Устинов,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1918—1920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1, No.4（乌斯季诺夫：《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见《苏共历史问题》；汉译见《益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2—3期）；薛衔天：《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机关报〈大同报〉》，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余敏玲：《苏联境内出版的中文期刊1918—1937》，载《前进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

[219]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85页。不过，尽管江亢虎的传记（比如，汪佩伟：《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中记述，江与克拉斯诺晓科夫是同在美国时期的朋友（第172页），但并无资料证明江是受俄国共产华员局委派

回国的。

[220]《刘谦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文件六》）。

[221]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85页。

[222]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Квопросу о ко нтакт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й секции РКП（б）с органи зациями КПК: 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1921—1922,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8, No.2（卡尔图诺娃：《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1921—1922年文献写成》，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1990年）。

[223]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71页。

[224] 前引《江亢虎新俄游记》，第60页。据该书载，刘谦死后，原在黑龙江省黑河的中国社会党旧支部（不清楚是否承袭江亢虎中国社会党）逃入俄国境内，改组成了“中国共产党”。

[225] 刘泽荣被内定为新设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前引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 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стр. 155, 176［《苏俄的远东政策》］），12月13日与中国政府官员张斯麟一起到达满洲里（瞿秋白：《欧俄归客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但回国后即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供职于中国政府外交部。

[226]《文件八》。从《贝拉·库恩给斯米尔诺夫的信（1920年10月1日）》（前引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 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стр. 142［《苏俄的远东政策》］）中，也可以看出对刘泽荣的评价很低。

[227]《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62页；《大正11年朝鲜治安状况其二（国外）》，朝鲜总督府警保局：《大正11年朝鲜治安状况》第3卷，高丽书林1989年复刻版，第424页。

[228]《上海ニ於ケル共产党ノ状况［共产党在上海的情况］》，载《外务省警察史》第47卷，不二出版社2001年复刻版，第3—5页。

[229]《警视厅に於ける施存统の陈述要领［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载《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2年。请参阅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

[230] 前引《大正11年朝鲜治安状况》第2卷，第371页，和《上海之过激派与朝鲜人之状况（大正10年8月4日）》（载《外事警察报》第5号，1921年8月）都记载，朴镇淳、李东辉、姚作宾于6月9日离开上海。

[231] 前引近藤荣藏《共产国际的密使》，第131—132页。

[232] 前引水野直树《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

[233] 关于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请参阅原晖之《ロシア革命、シベリア战争と朝鲜独立运动［俄国革命、西伯利亚战争与朝鲜独立运动］》，菊地

昌典编：《ロシア革命论［论俄国革命］》，田畑书店 1977 年版。

［234］Торжественн ое открытие，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 осъезда коре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 заций，*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No. 6，1921（《开幕典礼　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

［235］研究全国学联活动概要的有，翟作君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历次代表大会介绍》，载《青运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至 1985 年第 2 期；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但是，有关 1920—1921 年这一时期的记述并不详细。

［236］就 1919 年下半年的中国学生运动，详细探讨其走向改造社会的内在意识转变的论文，有小野信尔：《神圣面包——民国 8 年秋季北京的思想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237］《外秘乙第 239 号支那四川省留日自费学生之暴行件（1918 年 4 月 9 日）》（《G》）。

［238］《外秘乙第 390 号支那留学生中有影响人物等件（1919 年 8 月 18 日）》（《G》）。

［239］《学生总会欢送刘振群纪事》，载《申报》1920 年 1 月 3 日。另，派姚作宾为留日学生代表，似乎是留日学生总会正式决定的（《留日学生国耻会盛况》，载《民国日报》1920 年 5 月 14 日）。

［240］前引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第 48 页。

［24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 64 页。可看出许认为全国学联只不过是学生运动家的进身阶梯。

［242］《昨日国民大会之盛况》，载《民国日报》1920 年 2 月 1 日；《国民大会委员会纪事》，载《民国日报》1920 年 2 月 11 日。

［243］关于天津学联的动向，请参阅片冈一忠《天津五四运动小史》，《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 1 函，2，同朋舍 1982 年版。

［244］《全国学生会宣言》，载《时事新报》1920 年 5 月 16 日。

［245］《学生联合会开会纪》，载《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21 日；《学生总会评议部开幕》，《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28 日；前引《全国学生会宣言》。

［246］《通告各地一致罢课》，载《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4 日。

［247］《体育场学生大会记》，载《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5 日。

［248］无射：《为京津沪学生解纷》，载《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20 日。否认北京政府的问题，在翌年即 1921 年的第三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引发了尖锐对立，学联因此而分裂，并解散了一段时间（前引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第 83—86 页）。

[249]《封闭学生总会与各界联合会》，载《申报》1920年5月7日。当日被查封的还有同在法租界内的上海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

[250] 前引《全国学生会宣言》。

[251] 前引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说，“北京的学联认为，上海的学联是南方军阀［指国民党］手中的玩物，有军阀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评价相当低，后来开始国共合作时，最大障碍就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不信任孙中山、国民党。认为1920年全国学联的动向有呼应国民党的政治主张的一面，请参阅末次玲子《五·四运动と国民党势力［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探讨［五四运动史像的再探讨］》，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

[252] 当时的学联负责人之一喻育之的谈话（承蒙李丹阳女士赐教）。

[253]《外秘乙第225号关于需特别监视支那人之动静件（1920年8月9日）》（《D》）。

[254]《学生总会之通电》，载《时事新报》1920年5月25日。

[255]《两学生会选举近闻》，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7日。

[256]《学生总会第二届理事会记》，载《申报》1920年10月10日。

[257]《学生总会理事会交替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30日。

[258] 范体仁：《孙中山先生在全国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年。

[259] 前引《李达自传（节录）》。李达是否知道或参与了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系“共产党”，以及姚作宾是否知道李达等为创建中共而从事的活动，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260]《学生会报告当选理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8日。

[261]《外秘乙第559号留日学生救国团近况（1921年4月29日）》（《G》）。也许是因为姚作宾把所有精力都用来进行实际活动，所以查遍当时的主要报刊，也找不到他写的文章（这也是人们难以了解他所成立的“共产党”的目的和内情的理由之一），这封信就成了他仅存的几篇文章之一。

[262]《学界欢迎策进会代表》，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学生会代表出发考察》，载《民国日报》1921年3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纪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2日。

[263]《援救被捕学生报告书》，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6日；《三团体参观荻昌火柴厂》，载《民国日报》1921年2月26日。

[264]《外秘乙第1067号上海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内定件（1921年7月11日）》（《G》）。

[265] 陈独秀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许多资助，这不是秘密。顺言

之，1922年的资助金额是一万六千多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占所有经费的94%。

[266]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8日。

[267] 关于姚作宾坎坷的后半生（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任青岛“伪”市长），请参阅拙稿《中国“ニセ”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は生きていた［中国“伪”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还活着］》，载《飙风》1997年第32号。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一节　上海的建党活动

1. 对中共发起组形成的研究

如第二章、特别是其第二节所述，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自 1920 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而这些活动是在魏金斯基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一点，从魏金斯基同年 8 月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即报告中“革命局”的活动中，“出版处”、“情报处”，实际上就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华俄通信社”。

但是，如第二章第二节曾提到的那样，魏金斯基的报告生动地传达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状况，其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前身，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看不到有关中国人在回忆录中屡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同盟”等，而报告中的“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在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则从未出现过。如何解释回忆录和报告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再者，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亦即中共发起组，很明显在 1920 年 8 月时已经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成立的呢？让我们首先对此前的一般看法作一整理。

在中国，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1] 研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一书，

根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的回忆[2]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后来，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的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第9—10页）。不过，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是该书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的惟一依据，而近年来，有人对是否曾经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表示疑问。[3] 至于所谓7—8月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众多的回忆之间差距很大，仅凭回忆录难以弄清其真实情况。[4]

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当年的日记[5]，其中有些内容足以推翻此前的定论。日记的1920年7月10日条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6]“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一段，行文确实有些不自然，但由此终于明确了7月以前存在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不过，通过日记并不能弄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详细过程。因为，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尽管每天的记述相当详细）起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其中除7月10日条外，都没有提到“社会共产党”；因此，只能据此判断该“社会共产党”大概成立于6月17日以前，而关于其成立的详细时间及成员，仍然不得而知。

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一般见解认为，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黄凌霜、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柏烈伟的斡旋下，为谋求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而于1920年初成立的，也是后来的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之一。但是，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的根据，细究起来，也只有梁冰弦和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7]，有些被认为参加了该同盟活动的人，甚至否认“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8] 由于梁、郑的回忆相当详细、具体，因此，不少学者为了把它纳入中共成立史中去，对其进行了种种

解释[9]；但是，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这些解释终究不过是推测。

莫斯科档案馆的文件资料，即上述魏金斯基1920年6月和8月的报告，为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提供了一线光明。魏金斯基的报告和俞秀松日记以及上述回忆录之间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之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资料既非互相否定，也非互相印证。近年来，有些学者试图对这三种资料进行全面的合理解释，其代表就是杨奎松和金立人的研究。[10]

杨奎松以俞秀松日记记述不自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态度不明确）为根据，认为“社会共产党”和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一定相同，进而认为，魏金斯基报告中的上海的“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它是由包括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杨奎松认为，该同盟成立于1920年7月19日）发展而来的；其理由是，郑佩刚回忆录叙述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和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几乎一致。这样，魏金斯基报告屡屡谈到的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以及“革命局”派到广州的俄国人最初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都被解释为是“革命局”继承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方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杨奎松推测，“革命局”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在“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立（7月19日）和记录了“革命局”活动的魏金斯基报告完成的8月上旬之间。

然而，金立人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针对杨奎松认为俞秀松日记的记述不自然这一点，金立人认为，从当时中国青年的一般知识水平看，俞秀松日记中的“波尔雪佛克主义”一语，并非现在通常理解的作为共产党组织原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其表达的也并不一定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概念；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俞秀松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才相当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从有关人的回忆推测，其成立提上日程

是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1920年5月，其正式成立在6月。同时，对于中国人的回忆录和魏金斯基报告内容不一致，金立人提出了如下独特见解，即，魏金斯基重视的是如何把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各革新团体组织在一起，可陈独秀等人的活动，自一开始就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所要组织的不是团体，而是陈独秀信得过的个人；“革命局”是按魏金斯基旨在组织各革新团体的方针成立的，而陈独秀本来就不太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和旧有的工人团体，因而没有采取统一行动，而是独自地进行了建党工作（社会革命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者同盟”以及“革命局”是两码事，后来成为中共建党的组织基础的，并非魏金斯基系统的“革命局”（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金立人认为其解散时间是1920年12月］而消失），而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革命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根据这样的解释，金立人得出结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11]

杨、金两位都是中国党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们的推论，都很值得倾听；但遗憾的是，又各有缺陷。先来看杨氏的见解。从俞秀松日记也看得出，他在这个时期与陈独秀来往十分密切，并且除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外，他没有参与任何其他党派组织的活动，因此，不能因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够明确，就说他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与陈独秀等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直接关系。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杨氏不但认为它成立于7月19日，还介绍了开会时的讨论内容；可实际上，其所依据的1927年的俄语文件中只说“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了”[12]，根本没有提到会议的性质和内容。另外，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到底是否真正存在过？是什么样的组织？这些也都没有任何解释。

金氏的见解，不乏灼见，比如他指出当时激进青年对“布尔

什维克主义”的理解有混乱，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对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推进建党工作（是组织革新团体，还是组织值得相信的个人）所持的主张不同等等。但是，把“革命局”（金氏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机关）看作与陈独秀等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金氏认为它的名称是“社会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则有失妥当；因为，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革命局”的活动，显然包括了陈独秀等人积极进行的活动，比如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及《劳动界》杂志等。就史实考证方面来讲，金氏仅凭回忆录就对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成立说予以肯定，不无问题；他援引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作为陈独秀等独立建党的证据，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探讨过的那样，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杨氏也提到的7月19日的“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金氏却断言就是“革命局”成立的会议，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无从知道这次会议性质、内容。最后，和杨氏一样，金氏也对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只字未提。

与中共发起的组织基础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相关的团体，见于汉语资料和俄语资料的加在一起，为数不少；但是，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组织？相互间有什么关系？甚至是否真正存在过？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为了叙述上海的建党工作过程，必须从探讨这些组织的真实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2. 中共发起组的几个侧面（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共产党”

相当于中共发起组，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见于汉语资料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等；而见于俄语资料的则有“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бюр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 коймолодежи）”等。其中，除回忆录外没有任何其他佐证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其真实性显然首先值得怀疑。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发起组的前身的，是邵力子和陈望道，但被认为是其成员的施存统、沈雁冰（茅盾）都明确否认上海有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组织。[13]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主张呢？陈望道的几部回忆录都谈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其中一部这样说：

> 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14]

按这段回忆来说，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但是，实际上，1920年8月刊行的《共产党宣言》，其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也就是说，陈望道因记忆不准确，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如第二章第二节所述，“社会主义研究社”实际上就是“新青年社”，同时也就是魏金斯基所说的上海“革命局”的出版机关；因此，陈望道等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非什么组织名称，而仅仅是笼统地指称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和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

那么，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最初的名称是什么呢？它和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来探讨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谈到中共成立时间的同时期资料，有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和施存统在日本被逮捕后所作的口供记录。

张太雷的报告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я чейки）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共产党细胞”。[15] 鉴于张太雷赴俄国前的诸多活动尚不清楚，因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份报告是否准确

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共成立时期的正式报告，其中称建党活动最早始于1920年5月，当然比其他回忆录要可信得多。

施存统的口供，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于1921年底被警视厅逮捕、接受审讯时的记录。从前，他在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曾经被介绍过[16]；但是，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近年解密的《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2年2月）中，发现了《施存统在警视厅所做陈述要点》（请参阅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这份资料记录的施存统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所作的陈述，比他在预审法庭上的证词更加详细。他说：

> 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原文如此］）、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魏金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

当然，这是施存统在被警察拘押时的口供，所以，不能断言他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但是，从他如实坦白了本属不可泄露的中共有关人的别名、住处等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信的。施存统直到

1920年6月赴日以前，一直在上海跟随陈独秀进行活动，到日本后，也与上海的共产主义人士保持着频繁联系，因此，比起张太雷，他更加直接地见闻了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甚至知道苏俄方面所提供资金的具体金额，可以证明这一点。

遗憾的是，施存统没有谈到“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不过，他提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这两个与党有关的组织，并明确地说它们分别成立于1920年8月和5月。的确，共产主义小组旨在从事实际运动而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施存统已经在日本，他是通过来自上海的联系间接知道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7月）的报告也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союзмолодежи）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17]，也证明青年团是于同年8月成立的。[18]

据施存统的口供，1920年5月成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学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机关，而它肯定就是前文探讨过的出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中，《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上海“革命局”出版处的活动，由此可以判明，相当于该出版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吴明）、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重辅）和施存统等七人，在施存统尚在上海的同年5月组织起来的。[19]这七人中，除了王仲甫（重辅）不知是什么人物以外[20]，其他六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发起组织中共的人物。

无论是张太雷的报告，还是施存统的口供，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件，都主张共产党的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5月，因此，可以说他们采取某种形式而进行的活动——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是在这前后开始的；而这种活动之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

如前所述，“社会共产党”的名称，见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员俞秀松的日记1920年7月10日条。俞秀松在北京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于同年3月和施存统一起来到上海[21]，此后即加入陈独秀等的团体从事活动，这在上述施存统的口供中有所涉及。因此，从常识考虑，他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应该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至于日记所反映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暧昧见解（“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正如金立人指出的那样，从当时激进青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解的混乱考虑，也绝非不自然。

总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即，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俞秀松的日记里，明确地记载着“社会共产党”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共产党”是什么时间组织起来的？如前所述，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始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在7月10日以前都没有涉及“社会共产党”。也就是说，从日记看，我们只能推测，组织“社会共产党”应该是在6月17日以前的事。

对于推测“社会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与其性质极具参考价值的，是施存统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和他晚年的回忆录，以及施存统口供中提到名字的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录。据施存统回忆，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在戴季陶退出之后的第二次会议上，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22] 虽然这是5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其内容（比如成立时的成员）和他1921年的口供几乎完全吻合，应该说比其他人的回忆录要可靠得多。[23] 施存统的口供和回忆录与其他人回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含有1920年6月赴日留学这一时间标志；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他还在上海的同年6月以前发生的事。

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也和施存统的回忆录内容相符。首先来看俞秀松的回忆。关于建党过程，俞秀松1930年在莫斯科写

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道："1920 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24] 可见，俞秀松和施存统一样，都说曾经举行了两次发起会议，党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起成立的。陈公培的回忆虽然有几处细节与施存统不同，但也同样说在他自己和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参加的发起中共的筹备会议上，制定了五六条简单的章程。陈公培说，"这次会是 1920 年夏举行的"，但同时又回忆说，开过会的"当晚，施存统去日本……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25] 施存统留学日本，确实是在戴季陶和宫崎父子的帮助下才实现的，由此判断，陈公培的回忆是十分可信的。

那么，施存统是何时赴日的呢？按陈公培的回忆来说，施存统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正式制定了章程，因而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党组织成立的日子；可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施存统说，他是 1920 年 6 月 20 日离开上海赴日的，这需要加以若干说明。6 月 20 日是船离港的日期，他在俞秀松等朋友们的陪同下到码头乘船，是在前一天即 19 日晚上。[26] 但是，俞秀松在当天的日记里，虽然记录了送施存统上船，但却只字未提他自己应该也出席了的"社会共产党"的发起会议。因此，对陈公培说的发起会议在施存统上船的那天召开的说法，不能毫不怀疑；不过，可以推断，发起会议的举行距施存统离开上海应该相隔不久。这种推断的证据是，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宴会是在 6 月 16 日[27]（陈公培也可能错把欢送会这天当成施存统出发的日期），而初时参加了创建"共产党"会议的戴季陶为了治疗神经衰弱离开上海去湖州的时间，是 6 月 17 日前后。[2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约一年之前的 1920 年 6 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 1920 年 7 月、8 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

“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但是，这个“党”[29]后来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30]）、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31]）、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同时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即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

如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在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小组曾称为“社会共产党”。但是，为什么魏金斯基在8月的报告里对此只字未提呢？换言之，魏金斯基报告中的上海的“革命局”与这个“社会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金立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而施存统却明确地说魏金斯基也参与了发起“共产党”的会议[32]，仅凭这点，金氏的见解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考虑，即“革命局”和“社会共产党”是对同一个组织的不同称呼。金氏的见解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指出了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对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推进建党工作（是组织革新团体，还是组织值得相信的个人）所持的主张不同。也就是说，由于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考虑问题，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这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观感。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中心的各地的社团、“崩得”（犹太工人团体）的代表，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会议，集结了分散于各地的许多团体而成立的（不过，活动家们于会后全被逮捕）。可以推测，熟知布尔什维克建党历史的魏金斯基曾设想在中国也同样以集结现存革命团体的方式创建革命政党。魏金斯基在报告里反复谈到如何统一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现有工人团体，却极少提及中

国活动家个人的名字，并不单单因为语言障碍，而是他对创建中国革命政党的设想的鲜明反映。

另一方面，当时的陈独秀尽管与新兴工人团体保持着接触，但明显地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在魏金斯基撰写报告的1920年8月，陈独秀也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的工人团体》的短评，其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33]，与魏金斯基对工人团体的看法明显不同。从他的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谈政治》看得出，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也显然没有好感。用这种态度来从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自然会基于和自己的信任关系去吸纳个人。如此，参与建党的中国人在撰写回忆录等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记述建党过程，即，急进分子的结合诞生了"党"。

3. 中共发起组的几个侧面（二）——"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另一个组织，是见于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所谓"社会主义者同盟"是怎样的组织？梁冰弦撰有关"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最早回忆录中有这样一节：

> 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柏烈伟］，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久居华北。……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会乐于携手……那时留守学舍［晦鸣学舍］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与北大黄超海［黄凌霜］，让他们就近接洽。黄氏约同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34]

根据梁冰弦的回忆录，以及受此触发而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录，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是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在魏金斯基的推动下，“同盟”不仅在上海开了一个“又新印刷所”，出版发行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书籍，在北京、广州也发行了《劳动者》、《劳动音》等杂志。[35]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回忆无误，那么，1920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相当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上海的“同盟”是中共发起组。上述杨奎松、金立人两位学者，尽管语感不同（杨奎松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同一个组织；金立人认为前二者是同一组织，但与陈独秀等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关系），却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存在的。

举出“社会主义者同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中共人士提到这个组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也见不到这个组织的名称。因此，我们不能即刻断定当时的联合组织的名称就是“社会主义者同盟”。但是，各地社会主义者在 1920 年下半年结成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却是事实。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他的报告中反复提到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11 月创刊的《劳动音》杂志上，也有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写的文章。如此看来，“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是实际存在的，可当时的资料中为何不见其名呢？

实际上，据信参与发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黄凌霜的文章，曾经谈到“同盟”，这就是 1923 年 4 月发表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办的《工余》杂志（第十六号）上的《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该信有关“同盟”的部分如下：

> 当露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译一九一

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北京晨报出版），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尚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36]

信中提到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指北京晨报社1920年4月出版的兰塞姆（Ransome）原著、兼生（黄凌霜）翻译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37] 黄凌霜在该书出版前，好像请同志读过。这且不提，问题是接下来的“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一段，内容与梁冰弦、郑佩刚谈到“社会主义同盟”的回忆录一致。对照他们的回忆录，可以断言黄凌霜和李大钊一起在天津见到的俄国人就是柏烈伟，而一同去广州设立通信社的“露人某君”，可以断定就是中共方面的文件[38]也曾提到的、黄凌霜将其介绍到广州革命界、设立了俄国通讯社的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L. A. Perlin）等人[39]；而黄凌霜“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的记述，则与魏金斯基1920年8月撰写的报告内容（在北京、天津，有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开展活动，为了在广州建立“革命局”，斯托扬诺维奇将被派至广州）完全一致。可见，梁冰弦、郑佩刚的回忆绝非虚构。

不过，他们的回忆录反映了事实，并不等于所反映的全部是事实。黄凌霜的信只说由于他协助了俄国人（柏烈伟）和李大钊，使得苏俄在中国得以开始开展活动，却并没有说他们的组织叫什么名称，因此，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体称做什么，及其与中共发起组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还是魏金斯基的报告。在1920年8月的这份报告里，魏金斯基告诉我们，他当时正在试图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并且，8月17日，“彻底解决联合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这次会议就是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的联合会议，李大钊

也出席了，会议的结果产生了“改造联合”。而在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40]，可见“改造联合”的活动融入了苏俄通讯社的对华工作。黄凌霜的信也记述了他们的小组设立了通讯社，由此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黄凌霜信中所说的他与李大钊、柏烈伟一起进行的活动，对于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魏金斯基看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而李大钊则称其为“改造联合”。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推论，那么，这许多名称所指称的统一战线组织，和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是同一个组织。其根据是，魏金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俄语原文（Союзсоциа 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以俄语表述的自称（Социали 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41]），是相同的名称，只不过语序不同而已。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的报告称，1920年8月成立的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这种情形与无政府主义者回忆录所谈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情况完全相同。总之，“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改造联合”实际上是一码事，都是通过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与苏俄人士共同进行的活动，只不过由于所处的角度和语言环境不同，出现了四种表述而已。

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郑佩刚回忆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端（收到柏烈伟来信）在192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同年5月[42]；但是，若“社会主义者同盟”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别称，其正式成立应该是同年8月。因为，旨在联合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中国人称之为“社会共

产党”，魏金斯基称之为“革命局”）成立之后进行的。

另外，部分人之所以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可能是比照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名称，该“同盟”1920年8月开始加快了筹建步伐，其动向也备受中国国内瞩目（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李大钊加入了该“同盟”），同年8月就做了详细报道。[43]

4. 中共发起组的活动

上述第2、3小节探讨的内容概要如下，即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以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进入6月后一个时期称“社会共产党”（或“共产党”、“社会党”），8月设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广泛团结青年社会主义者，扩大势力；同时，上海的发起组本身的成员也不断增加，主要从事出版、宣传等活动。这些活动，在魏金斯基眼里，被看成是上海“革命局”的活动，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则被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当作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从时期来看，这一系列建党准备工作，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毫无疑问带有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性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活动，除了上述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期刊，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外，还开展了面对青年的教育活动（开办“外国语学社”），以及工人运动（设立“上海机器工会”）。

外国语学社是1920年9月开办的外语学校。上海《民国日报》（9月28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该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校址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即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新渔阳里六号至同年6月是戴季陶的寓所，距《新

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极近。外国语学社名义上教授外语，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似乎也都在这里讲授过初级外语[44]；但实际上，是各地学生运动家和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的青年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后的避难所，或者希望赴苏俄的青年们的留学介绍所。

比如，继北京之后，上海也摸索实行了工读互助团运动，而“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这些后来的中共党员，都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9月时的总干事是长沙县长姜济寰，书记干事是毛泽东），则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后来也都是中共党员——来外国语学社学习。[45]据说，“俄罗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陈独秀的好友、时任船山中学校长的贺民范，彭述之就是经贺民范介绍来外国语学社学习，以准备赴俄留学的。[46]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潮头已过，而新生俄国则代替法国受到部分激进青年的注目。实际上，当时不仅流传着某某机关介绍中国青年赴俄学习，还有报道说，有的青年为了去俄国而寻找各种途径。[47] 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就是为了满足青年们赴俄留学的热切需要而进行预备教育的机关之一。不用说，学员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因而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的人才来源。1920年时，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有60人左右，其中不少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48]

在当时的上海，教授语言并斡旋赴俄留学的机关，除外国语学社外，还有一所名叫“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学校，和共产主义小组关系极近；施存统“口供”中所说“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原文如此］之世界语学校”就是指“新华学校”。地处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的新华学校（也称“新华世界语学校”），是1919年冬从欧洲来的斯托帕尼（V. Stopani，1893？—1921）和陆式楷等世界语学者开办的[49]，也是标榜世界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据点。[50] 有些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也同时在“新华

学校”学习世界语，看来也有一些人员方面的交流。[51] 例如，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廖划平、袁文彰、抱朴（秦涤清）等1921年3月准备赴俄国时，就持有“新华学校”教师斯托帕尼的介绍信。[52]

斯托帕尼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俄国，据说他为了躲避兵役而从高加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到了上海。[53] 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从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刊登的他的信中，可以了解他思想立场的一个侧面。在这封信中，他一方面说，“我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同时又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他如此解释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立场，即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理想是正确的，适合促进人民觉醒，但不能一蹴而就；既然如此，也就不太适合“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到达真幸福和真自由这一理想的第一阶段，在现时，不得不借助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列宁也并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必定会实现。[54] 持此种立场的斯托帕尼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那么，各种关心社会主义和苏俄的青年聚集到“新华学校”，而他也不辞辛劳介绍青年们赴俄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对无政府主义颇感兴趣的俞秀松也曾学习过世界语[55]，但不清楚他是否曾在斯托帕尼的“新华学校”学习过。不过，在俞秀松那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远没有分化，并非像斯托帕尼那样，一方面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真理”，同时明确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做实现“真理”的手段。众所周知，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苏俄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尚不明朗，许多人相信，赴俄国后可以通过世界语和俄国革命家交流[56]，所以，世界语被认为和俄语一样是接近革命俄国的桥梁。“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学员也到“新华学校”学习的原因正在于此。

自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斯托帕尼，在促成廖划平、抱朴等无政府主义者赴俄国之后，不知为什么，于1921年3月27日饮

弹自戕，翌日死去[57]，因此，他生前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魏金斯基等人的关系也就不得其详。从“外国语学社”和“新华学校”的关系来推测，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是，从斯托帕尼为那些等不及“外国语学社”安排的青年们独自斡旋赴俄[58]来看，他和魏金斯基等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非常密切。

和“外国语学社”以青年为对象不同，“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目的是进行工人运动。如前所述，陈独秀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因此，“上海机器工会”可以说是成立新的“真的工人团体”的一种尝试。“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湖南人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杂志的号召而发起的[59]，1920年10月3日举行了发起会议。据报道，发起会议的地点是“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与会者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了言。[60]陈独秀等只作为名誉会员，是因为正式会员只限于机器工人，这一点反映了陈独秀呼吁成立“真的工人团体”的意图；而开会地点选在“外国语学社”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则说明该工会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有力支持。

该工会于11月21日正式成立，当日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与会；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会议圆满结束。[61]与会者人数不少，但多半是赶来祝贺，工人会员实际上只有370人左右。[62]不过，这个工会的特点是与其他现存工会泾渭分明：“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63]这些倾向还得到了美国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组织IWW（世界产业工会同盟）的积极评价，该组织在工会成立后不久即发来了贺电。[64]因此，中国警方自然认为上海机器工会是

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党陈独秀”授意下合谋组织起来的，并摆出了镇压的态度。[65]

但是，上海机器工会的实际活动相当温和，主要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教育以及相互扶助等工作，并没有如警方所严密防范的那样激进。就笔者资料调查所见，该工会并没有发起要求改善具体劳动条件的运动，也没有对当时上海发生的其他行业的工潮进行支援。陈独秀等共产主义小组对该工会只是从旁协助和支持，并没有对其进行一元化领导，这表明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摸索知识分子与工人如何合作。继上海机器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宗旨类似的“上海印刷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也深入工厂进行调查，陈独秀和李汉俊对几次工潮也进行了积极的声援[66]；但是，共产党本身主动组织工会，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

第二节　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1.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其活动与上海一样十分活跃，在北方是北京，南方则是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北京的李大钊、广州的谭平山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南谭北李中间陈”，可见，北京和广州都是仅次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在北京，五四运动以后，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们正在积极开展平民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团的运动；而在广州，由于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工人数量又仅次于上海，所以早就存在着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上海的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个城市具有的特殊条件，其建党过程与上海有若干不同之处。首先来看北京的情况。

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最可靠详尽的史料，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

报告》。[67] 这份报告是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据认为是张国焘）执笔的，其中关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这样写道：

> 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报告谈到的党组织的活动有：发行《劳动音》[68]、《工人的胜利》、《五一节》等小册子，散发上海印刷的《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69]，翻译《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共产党纲领》（未出版）[70]，还介绍了“我们的一个同志”发行的《曙光》[71] 杂志。此外，还详细叙述了对工人开展的工作，说工人工作非常困难，应该重视教育对工人带有优越意识的知识分子。

不少学者认为，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但是，上述报告根本没有提及这个研究会。因此，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该研究会并非北京的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母体，而是为了满足当时青年学生中萌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而准备成立的一般性学术团体。顺言之，称该研究会发起（不是成立）于1920年3月的，是该研究会翌年11月的启事[72]，正式成立是中共“一大”后的1921年11月，而以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举行学习会、讲演会则更晚些。所以，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还是如报告写明的那样，是在上海方面正式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之后的1920年10月。[73] 如果说在这之前有什么成立组织的动向，则应该是李大钊等于同年8月组织的“改造联合”，或者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里谈到的柏烈伟指导的北京的“革命局”等。

北京小组的报告说，小组成立时，有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小组，后来又一起退出了。在上海和广州，也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一起退出北京小组，意味着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分裂，在此，有必要就此时期和其后二者的关系加以探讨。共产党方面有关人士曾屡次回忆北京小组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对立和分裂，但是，这些回忆毕竟都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正统的，涉及其时期和过程时，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在进行探讨时，还是应该重视当时的文字资料。

幸运的是，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有当时混入组织的警方谍报员所写的报告可供参考。1921 年 2 月至 7 月，一个名叫关谦的谍报员伪装成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两个共产主义团体（无政府党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留下了一系列谍报记录。[74] 他的第一份报告（1921 年 2 月 12 日）称，“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张阶级专政，已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表明这时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已经分裂。不过，其中有些人似乎两派的会议都参加，关谦本人就是混在这些人里刺探双方的组织内幕的。

首先来看无政府主义派。从关谦的报告看，2 月到 3 月，“无政府党互助团”方面脱离了共产主义派，并准备成立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同时，还共同凑集旅费，准备派同志赴俄国，以了解革命俄国的实际状况。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还报告中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可见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交流非常频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州方面的通讯多次报告该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对立，即陈独秀和区声白等不和，陈独秀的态度如何蛮横等。关谦报告说，陈独秀使用软硬两手，一方面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冲突，同时又在写给北京的信中呼吁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而北京的无政府主义派则回信给陈独秀，意欲弄清陈的真实意图。如下文将要探讨的那样，由于陈独秀和区声白在该年年

初展开论战，广州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彻底对立，这个时期也许进行了旨在修复关系的最后努力。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讨论的基本上是陈独秀的动向，而几乎没有涉及北京的共产主义派。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派认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取决于共产主义派领导人陈独秀持何种态度。

关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75]），关谦报告他第一次参加该派会议的那天（3月16日），青年共产国际方面有人谋求接触，即会议上传达了“俄国少年共产党员格林（英语作Green，俄语作Грин）”要求派代表参加将要召开的“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的来信。关谦的报告称，当时住在天津的格林才20岁左右，时常来北京（寄住于灯市口12号）；此次来京已有两周，会议当天有事回天津，不能出席会议，因留书一封。信中要求立即选出代表，以参加预定于4月25日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76]，并表明旅费将由他代付。

有关此处的格林，我们不知道他更详细的生平，及其来华的时期和经过。[77] 不过，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收到了以“谷林”的名义发来的要求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邀请信，信中“谷林”的所属机关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Eastern Secretaria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 ist Interna tional of Youth）。[78] 看来，格林肯定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有关机关派在中国的联络人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传达了格林来信的当日的会议上，马上进行了选举，选出何孟雄并计划让其不久后与格林一同赴俄国。关谦的报告中还有北京青年团交何孟雄带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件抄件[79]，信中报告，北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还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举权”。这封信写于1921年3月，按其“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之说推算，北京的青年团应该是前一年11月成立的，即相当于党的“共产

主义组织”成立后不久。

被选为代表的何孟雄后来确曾试图赴俄，但不幸的是，4月，他在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与北京、天津、上海的13名青年[80]一同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这其中的详情，关谦引用关押在黑龙江监狱中的何孟雄请求营救的信，做了详细报告。何孟雄在信中说，他由于持有格林的介绍信，赴俄计划被发觉，故而遭到逮捕；但是，青年团发给他的证书以及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因为缝在棉衣里面没被发现，被幸免逮捕的格林拿走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何孟雄被逮捕的消息后，即于4月25日开会讨论营救措施，决定由李大钊出面通过官界的关系进行营救，并募集了所需款项。李大钊等的努力没有白费，5月，何孟雄等13名青年被释放。但是，赴俄的目的最后没能实现。[81]

在关谦的有关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活动内情的报告中，有魏金斯基的得力助手柏烈伟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或帮助他们赴俄国，甚或给他们以经费方面的支持（2月19日、28日报告）的内容，而看不到参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迹象的情况，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他是不介意在中国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裂痕，还是如当时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借苏俄的背景独断专行呢？也许兼而有之。不过，对于他们这些俄国人来说，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的这种对抗搅不起多大的风浪，明确区分谁是无政府主义者，谁是共产主义者，并只支持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把本来人数极少的社会主义者再行筛选，没有多大意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区别，而苏俄有关人并不着意加以区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里的这两种态度，在下一小节将要讨论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里也存在。

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人数及成员，此前存在从10人到15人等多种说法[82]，但是，其根据都是后来的回忆录，出入颇大。较早的文字资料，有俄国人纳乌莫夫（C. N. Naumov）根据口头调查于1927年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

关于北京的早期组织这样写道：

> 组织中八位同志，有六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即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但是，组织因为有（一）邓中夏、（二）罗章龙、（三）刘仁静、（四）姓名不详、等四位新成员的加入反而得到了加强。[83]

据此，组织成立时的人数大约是八人，其中共产主义者，自一开始就参加的是李大钊、张国焘，后来又加上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他们形成了共产主义派的中心。[84]

2.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发起组在上海形成后，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也在进行。不过，自刘师复以来，广州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据地，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要比上海和北京复杂得多。关于广州的建党过程，一些曾经亲与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留下了回忆录；但是，这些回忆录相互间出入颇大，要据此再现具体过程相当困难。[85] 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以原始资料为根据。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份最可信的资料《广州共产党的报告》。[86] 这份报告与上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样，是中共“一大”的广州代表（据认为是陈公博）为出席大会而准备的书面报告。

> 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Социалист] 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去年年底，B 和佩斯林

[Неслин] 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世界》[МирТруда] 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 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世界》，印数为三千份。……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 B 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

这份报告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过程，但是，其中有几处错误，还有化名，故先作简单说明。首先，所谓《社会主义者》日报，就是当时从北京大学回来的陈公博、谭平山等创办的《广东群报》（1920 年 10 月 20 日创刊）。该报的英文名称为 The Social，大概译成俄语时写成了 Социалист。而所谓无政府主义派发行的《劳动世界》周刊，是《劳动者》（1920 年 10 月 3 日创刊）周刊之误。还有，报告称陈独秀到广州的时间是 1921 年 1 月，正确时间应该是 1920 年 12 月末。[87]

让我们再来看看报告中的人物。所谓 1920 年末来广州的“B”，肯定就是魏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这一年的年底访问了广州，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 1921 年 1 月 12 日。而和“B”即魏金斯基一同来广州的佩斯林，正确名字是佩尔林（L. A. Perlin）。[88] 我们不太清楚佩尔林的生平及其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从报告观之，他好像在魏金斯基、米诺尔前

后来广州，一边从事罗斯塔通讯社或达尔塔通讯社的工作，一边通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接触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从黄凌霜投给《劳动者》的文章[89]看，他这个时期肯定恰好在广州。顺言之，当时在广州从事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在回忆录中说，1920年10月，“Perkin（波金）”等俄国人随黄凌霜等来到广州。[90]且不论时期是否准确，这与报告中所述佩尔林来广州是一致的。最后，所谓在广州活动的米诺尔，就是在魏金斯基一行来华的几乎同时被从哈尔滨派往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的别名，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介绍过的。斯托扬诺维奇是受魏金斯基指示，1920年8月从天津来广州设立“革命局”的[91]，他在9月底从广州发出了有关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报告[92]，9月以后肯定在广州。和夫人一同到达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不但从事罗斯塔通讯社的工作，还以“米诺”的名字开办了俄语学校[93]，以物色“革命局”需要的人才。很早就在广州开展活动的斯托扬诺维奇，其身份是罗斯塔通讯社的派驻记者，甚至有人说，他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实际上是苏俄在广州的“国家代表”。[94]

综合这些俄国人的经历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看，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即，1920年以后，受魏金斯基指示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部分因为引荐者黄凌霜的影响，首先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进行了接触，成立了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组织，并开始发行《劳动者》杂志。而这时正在发行《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即后来的中共成员，因为主义不同没有参加。后来，1920年底，陈独秀在魏金斯基前后来广州，他们即展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同时着手组织新的党组织；不久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也就是说，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阶段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合作，而在广州，则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当初成立了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关于这一点，谭平山

1922年在讲演中谈到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曾有所涉及。他说：

> 青年团前年［1920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8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95]

谭平山在这里谈到，1920年下半年成立的组织，在1921年初解散了。当然，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不过，共产党和青年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96]，所以，他说的也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情况。

负有成立“革命局”的使命来到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开始时的工作对象何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这除了他们不了解当地社会情况这一不言而喻的原因外，还应该考虑到，与北京的情形相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严格区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广州原本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这一特殊要素也不可忽视。无政府主义者和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成立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者陈公博眼中，“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事实上不久后就解散了。不过，这个“共产党”到底有其“执行委员会”，还发行了杂志，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其加以探讨。

有关这个无政府主义派的“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除其《劳动者》杂志外，原始资料并不多；不过，他们散发的传单，以及属于他们这一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和会议记录倒是有所保存，从中可以窥见其倾向。广州的日报《广州晨报》曾报道，1920年12月23日，广州市内有人散发了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印刷的传单。[97] 传单颂扬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最纯全、最圆满、最正大”，称遵循这

个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该传单旗帜鲜明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虽然也提到了马克思等“集产主义派”，但只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劳动者》杂志的每一篇评论中，都能看到这类无政府主义倾向。陈公博报告中所谓“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之语，无疑就是指这种倾向。而这些活动都是明确地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进行的。

同一时期的《广州晨报》上，还刊登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98] 这份简章规定了团的章程，称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实行社会改造”，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通讯地址为“广州晨报社晨光编辑部石龙”。所谓“石龙”，就是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赵石龙。从上述“共产党广州部”的号召传单能够在《广州晨报》上全文刊登来推测，该报社很有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大本营。《广州晨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有人认为该报也标榜无政府主义。[99] 被认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的人物的回忆录，都没有涉及他们和赵石龙的关系。但是，1921 年二三月，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发生所谓“无政府主义论战”，赵石龙的《广州晨报》也随之展开了对陈独秀的批判（见后文），由此判断，赵石龙肯定也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一员。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于 1921 年 1 月再次刊登在《广东群报》上[100]；内容和《广州晨报》所载几乎相同，只是其前言称，广州的团成立于“两月以前”，按此推算即成立于前一年的 11 月。上述谭平山的讲演说成立时间是在 8 月，似乎应取时期近者即《广东群报》的 11 月说。果真如此，上述“共产党广州部”即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也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成立的。

舒米亚茨基发表在伊尔库茨克的俄语刊物上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101]，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占大多数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的部分情景。据该文称，在 1920 年

12月5日召开的广东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报告了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比如，佛山、广州的工人组织工作比较顺利；《劳动者》杂志已出第六期，从第七期开始将把印数增加到四千份；设立了图书室，以便向团员提供参考书等。虽然无法断定舒米亚茨基文中提到的活动家如“关关（音译，Гуань—гуань）”、“张德（音译，Чжандэ）”等到底是谁，不过，《劳动者》杂志第6期确实是在开会的那天即12月5日发行的，据此可以断定，舒米亚茨基的文章无疑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某种形式的记录写成的。上述谭平山的讲演称青年团没有开展什么值得一提的活动，可舒米亚茨基的文章告诉我们，一直摸索如何与工人进行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就把活动的舞台转移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作。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在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的推动下成立的广州的“共产党”，在1920年11月至12月间，开展了以宣传为主的一系列工作。

如陈公博《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所述，1920年底陈独秀等来到广州，使广州的“共产党”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统天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国民党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州，并请其就任广东教育界改革的关键机关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102] 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的政策可能抱有一定的期待。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到广州赴任之前，曾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可以在广东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还可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103]

陈独秀到广州后，立即积极地进行讲演活动，1921年1月16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所作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尤其有名。在这次讲演中，陈独秀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彻底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流的“国家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表达了最大程度的赞赏。两天后，讲

演概要在《广东群报》一经刊出[104]，立即遭到了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上述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区声白的激烈反驳。1921年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陈独秀早在《谈政治》（1920年9月）一文中，就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根本上反对政治”的。对此，朱谦之、黄凌霜、郑贤宗（太朴）等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苏俄的工农专政进行了反驳（皆登载于《新青年》）。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这种潜在对抗，终于因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讲演而表面化，从1月到4月，区声白和陈独秀共发表了六篇文章进行了公开辩论。[105] 在这场争论中，虽然陈独秀极力避免非理智的批判，承认区声白不是“卑鄙的”“中国式无政府主义”，但结果却只能使两者间根本原理的区别更加明显。这种区别在于，是承认集权性的组织和领导对于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作用，还是以讴歌“自由组织”、“自由联络”的无政府主义为最根本的真理。

在这里，我们无暇详细探讨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总计超过两万五千字的争论。[106] 不过，就其与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关系而言，上述《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所谓“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指的就是这场与“无政府主义论战”。这场论战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在论战过程中脱离了党。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广州共产主义组织——即陈公博所谓“真正的共产党”成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陈公博的报告并没有提及详细时期。不过，从间接资料推测，大概是在1921年2—3月。同年3月初，无政府主义者和陈独秀派在《广州晨报》和《广东群报》上互相毁谤，是一个标识。如前所述，《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人士的堡垒之一，该报于3月2日突然开始对陈独秀派进行人身攻击，呼喊：陈等意在将广州的公立学校攫为私有，甚至想篡夺《广州晨报》。被点名批判的陈独秀、陈公博、沈玄庐、袁振英等则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在《广东群报》上刊登文章予以回敬，包括揭露《广州晨报》的赵石龙等的

个人生活。[107] 这次攻讦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论战”锣鼓正酣之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理论对抗，达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

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的复刊，体现了双方已经彻底决裂。1916年停刊的《民声》杂志，经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人筹划，于1921年3月15日在广州复刊。[108] 复刊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已占到复刊的后评[109]等，都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决裂、亦即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是《民声》杂志复刊的契机。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在俄国人的资金支持下发行的《劳动者》杂志于同年1月停刊，因而与陈独秀等人最终分裂，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同年3月回归于刘师复时期的《民声》的老路。这一点也可证明陈独秀的“真正的共产党”是1921年的二三月成立的。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有的回忆录称，陈独秀直到最后都希望避免分裂、保持统一战线。[110] 但是，当时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从广州得到的信中却说，对主张双方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服从自己一派的“集权主义”[111]，而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言论也表明，他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品行上“懒惰、放纵、虚无、放任”[112]，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走向决裂。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分裂后成立的广州的“真正的共产党”的成员，陈公博的报告称，“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其余六人，可能是报告中提到的广东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在陈独秀前后来广州的袁振英、沈玄庐、李季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人。

重组后的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排除了有工人运动经验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而在工人运动方面没能开展什么值得注目的工作，但在宣传和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1921年后，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广东群报》上，从上海的《共产党》月

刊转载的文章，以及介绍苏俄的文章都显著增多，这表明共产党在南方已经开始确立有效的宣传阵地。其领导人陈独秀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21年9月，这期间，他一方面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同时又遭到反对他在广州推行的教育改革的守旧派的诽谤（“废德仇孝”、“禽兽学说”）。

3. 武汉、长沙、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武汉、长沙和济南都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因此，这几个城市此前肯定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他们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等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其规模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小，保存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少。再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因此，有的学者由此认为，比如长沙在中共“一大”前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并无“共产主义小组”即党的组织。[113] 的确，如果以后来的党团关系为标准来严密界定其组织，这种看法也许能够成立。但是，考虑到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的仅三四名成员）里，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追究长沙的组织是党还是团，没有什么意义。换言之，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

【武汉】

武汉的共产主义组织，是1920年秋在来自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关于何人参与其事，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曾商之于旧友董必武；也有人说，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党，回到武汉后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些说法都是以后来的回忆录为根据的[114]，现在已经无从确认。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还有的回忆录谈到，1920年秋，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人曾作为苏俄使者在武汉短期逗留[115]；但是，这也同样没有文字史

料可资佐证，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不过，当时的俄语资料证实，1920 年 11 月，武汉（武昌）确实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上述舒米亚茨基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中就收录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和其后的几次会议的议事记录。据舒米亚茨基介绍的会议记录载，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是在 11 月 7 日。在有 18 人参加的这次会议上，Лючуй（刘伯垂）和 Дун（董必武）首先做了发言，然后，Бо（包惠僧）宣读了青年团章程。章程如下：

一、名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Уханьский Кружо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二、团的目的：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三、团的会议预定每周举行一次。

四、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团。

五、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驻地暂设于武昌。

据这份会议记录称，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刘伯垂、张国恩、董必武、包惠僧、郑凯卿等，为了“学习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消灭资本家，并排除阻碍我们扩大势力的各种障碍”而发起成立的。刘伯垂说：“简单地讲，我们结社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几个在会上发言的人，却都没有阐明社会主义为何物。比如，董必武在发言呼吁必须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正确性，就如同牛顿和哥伦布发现真理那样。他说：

> 自大战结束以来，科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崭新理念的潮流正向我们涌来。当今之际，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呢？不用说，我们应当加入给世界带来新文明的运动中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而包惠僧则说，为了破除顽固墨守“忠孝”的湖北教育界，“必须倾全力学习社会主义”。董必武和包惠僧晚年曾回忆道，当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116] 透过会议记录，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当时的那种思想状况，即，但凡旨在破除旧社会、实行社会改造的，都称其为“社会主义”，并相信那就是科学真理。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无疑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的科学根据。

他们后来开始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俄国革命，的确也是事实。11 月 14 日、21 日的青年团会议上的演讲，就援引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工人为什么贫困，还通过略图标出俄国的政党发展过程，以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由于在应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工人贫困原因的演讲中，同时提倡应该拥有英国式的工会组织，舒米亚茨基在这些引用文的末尾特意注上了问号和感叹号，表示出对远东的“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水平的轻蔑。这种态度只能说明革命成功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优越意识，却半点也不能贬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努力。本书著者面对这些演讲，一读之下，倒是不禁惊叹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竟能对“社会主义”有如此之深的理解。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反复提出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从包惠僧在团的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讲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联合的一个侧面。他说：

>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自己和佣人应该平等相待。不借助别人而能够做到的事，不用吩咐佣人，而应该自己来做。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起“劳动者”，首先产生的印象就是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的佣人，或者他们经常接触的人力车夫等，包惠僧的演讲所反映的也就是当时他们脑中的这种“劳动者”形象。当然，在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里，长期以来，“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通义”（《孟子》），所以，在提倡与之相反的“劳工神圣”时，比起工厂里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更容易发现他们生活里的“劳力者”，从而将转变自己的“劳心者”意识看作是与“劳动者”的联合，这一点也不奇怪；毋宁说，这种意识转变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正因如此，在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117]等生活信条以后，这种禁欲性的实践才抓住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青年们的心。

由发现生活中的“劳动者”到开始接近工厂劳动者，已经无须太多的时间。武汉的青年团（包惠僧）通过武汉的扬子机器制造厂原技师的介绍，于12月19日考察了该厂，迈出了走向工厂劳动者的第一步。虽然这次视察实际上仅仅是向工厂的技术人员简单地询问了一些问题，但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厂劳动者极端隔绝的情况下，能够走进劳动现场，已经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了。[118]

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有关人士回忆说，该小组成立于1920年秋。但是，综观上述会议记录记载的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该小组应该诞生于青年团成立的11月，其主要成员则是青年团发起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以及报告中没有出现、但是后来作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陈潭秋等。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武汉的组织成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曾拨款一二百元，支部成立后的两三个月间，上海方面每月汇来两百元活动经费，并说这些经费是共产国际提供的。[119]这一提及地方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经费的惟一资料，因为是事后回忆，其具体数字无法确认，但由此看得出，武汉的组织和上海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

【长沙】

与武汉的情形一样，在有关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见不到“党”的存在，只有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点滴

记述。

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毛泽东，曾于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会见过陈独秀。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20] 据毛泽东回忆，所谓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克卡朴著《社会主义史》。[121] 不过，他去上海时，这三册书实际上都还没有出版，也几乎没有社会主义书籍的单行本。大概他是根据以前在报纸或杂志上读过的文章与陈独秀进行交流的。

从时期判断，毛泽东这次与陈独秀会见，可能没有具体涉及成立共产党。但是，毛泽东于同年7月回到长沙后，自夏至秋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还从事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同时与上海的陈独秀似乎一直保持着联系。顺言之，"文化书社"经销的书籍（1920年10月）包括《新青年》(150多册)、《劳动界》（130册）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代销这些刊物的数量比其他刊物多得多。[122] 毛泽东大概就是通过代销这些刊物，与上海的陈独秀保持着定期联系的。

据毛泽东的友人张文亮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曾于11月17日寄给他10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并委托他物色同志，12月27日又寄来9册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123] 每次寄送的资料都较多，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与上海之间的联络窗口。毛泽东翌年1月写给蔡和森的信表明他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动向，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24]

正如张文亮日记所示，1920年11月，毛泽东的手里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据张的日记，青年团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这个表述其实和前面引用过的广州、武汉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宗旨是一样的。据此推测，似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个时期都接到了督促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示。张文亮12月2日的日记载："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并嘱我多找真同志。"可见毛泽东曾准备请陈独秀来长沙，以举行青年团成立大会。但是，陈独秀最终没能来湖南，青年团于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毛泽东等于1918年4月发起成立的团体）开会时决定成立，13日召开了成立大会。[125]

有关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的原始资料只有这些，更详细的情况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个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就"党"组织而言，毛泽东致蔡和森信表明，他似乎已经自认是上海党组织的外地成员，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状况。1920年八九月，时在法国的蔡和森就成立共产党一事致信毛泽东时[126]曾告诫说，事情一定要秘密进行；也许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活动因此十分缜密。长沙的早期党员，除毛泽东外，据说还有和他一同出席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彭璜等。[127]总之，这些党员不过是与毛泽东交往过密的两三个志同道合者，远非一个团体或组织。

【济南】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两名代表参加。但是，在那以前，济南存在什么样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又是什么时间成立的？很遗憾，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以解答这些问题。武汉和长沙的情况，因为有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尚可粗知其概要；而济南的情况，由于直接当事人王尽美和邓恩铭都离世极早，本人生前没有任何回顾材料，只有他们周围的有关人士写的间接回忆录。在国内当初曾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里，就数济南小组的真实情况最难把握。此前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乎所有研究，其所依据的也

都是间接的回忆资料[128]，而这些回忆的内容，有不少都经不起推敲[129]，因而，这类资料再多，也不可能使我们把握事实真相。

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中共“一大”以前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只有两个人，即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130] 他们是如何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联系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时在上海的李达的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是惟一资料。李达说：

［中共发起组］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只介绍了济南五中三个学生组织［原文如此］，他自己未参加）。[131]

受陈独秀委托在济南发起组织的王乐平，时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五四运动时期是山东省的运动领袖之一，国民党系的有名人物；1919 年 10 月开办“齐鲁通讯社”（1920 年改名“齐鲁书社”），以经销各地进步刊物。[132] 齐鲁书社与陈独秀的新青年社也有联系，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过广告[133]，还是《新青年》杂志在济南的“代派处”（代售处）。王乐平与王尽美是同乡，据说还是远房亲戚。[134] 鉴于王乐平与《新青年》关系如此密切，陈独秀委托他负责在济南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是非常有可能的。王乐平自己似乎并没有直接参加创建济南的共产主义组织，但是，这个过程与上述长沙的情形一样，都标志着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人际关系对于中国各城市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极大。

1920 年 11 月，王尽美等人提出“研究学理”和“促进文化”的宗旨，成立了名叫“励新学社”的学生团体，并发行《励新》杂志为机关刊物。[135] 这几乎就是所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惟一值得一提的活动。不过，《励新》所刊登的多数文章，都是谈山东的教育改革、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的，并没有着意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迹象，也见不到湖南长沙那样的旨在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开展的活动。综上所述，事实恐怕是这样的，即出席中共“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与其说代表了济南的“组织”，不如说是作为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的济南人士出现在会场上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致共产国际的报告》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获得的中国情报

如本章第一、二节所述，1920 年下半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首先在上海摸索展开，同年 10 月至翌年初，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开始响应并形成程度不同的组织。中国各地的这些共产主义者和有相同思想倾向的留日学生代表，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后，于 1921 年 7 月齐集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大会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即 1920 年底至第二年的前半年，恰值曾指导上海中共发起组工作的魏金斯基回国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1921 年 6 月）之间的时期，形成了史料上的一段空白，既没有俄国方面的较为确切的报告，也缺乏中国方面的原始资料。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由于经费不足，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曾出现短时期停滞；但建党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停顿。

这段“空白时期”的史料，有《中国共产党宣言》，这可算是中共最早的正式文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苏俄影响，各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为了表明其诞生的必然性和奋斗目标，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制定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所谓《中国共产党宣言》即属此类。不过，《中国共产党宣言》有不少疑问没有解决，因为其现存文本译自英语，而原文写就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不得其详。

“空白时期”的另一个谜团，是所谓“中共三月会议”，即中共“一大”前的1921年3月，为了清算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而召开的会议。最早赴俄的中共党员张太雷，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中共三月会议”，但是，是否真正召开过这次会议，至今尚无定论。也就是说，中共最早的正式文件和正式报告都有待解决的疑点。

在这一节中，作者拟探究上述疑点，并就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间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此，有必要对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及其刊物的情况首先加以探讨。因为，上述文件和报告，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伊尔库茨克写成的。魏金斯基暂时离开中国的时期，恰好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在新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之下终于得到统一的时期相重合。那么，负责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呢?

关于1921年1月成立的远东书记处的人员构成及其到任时期，尚有若干不明之处，但是，其中心人物是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鲍里斯·舒米亚茨基（Boris Z. Shumyatsky，1886—1938）。另外有全权副代表明斯克尔（Minsker）、布卡蒂（Bukaty）、斯列帕克（Slepak）、鲍格里茨基（Bogritsky）、加蓬（Gapon）等[136]，初时没有中国人（后来加入了张太雷）。该书记处1921年2月创办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杂志（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137]，同年5月又创办了《远东人民》杂志（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 о Востока）[138]，从这两份杂志可以了解远东书记处所获得的部分中国情报。不过，《远东人民》且不说，在此前的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利用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见图7；以下简称《通讯》），故在此略加详察。

《通讯》第一期刊登的《中国的罢工运动（摘要介绍中国的工人刊物）》（署名：布拉索夫斯基）和《文献目录（中国共产党

刊物概观)》(署名：伊里伊奇）这两篇文章[139]，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伊尔库茨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得到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共的刊物。前一篇文章在开头部分介绍说，作者手头存有1920年7月至12月出版的部分中国工人刊物，并从其中的各期《劳动界》引用了数篇。[140] 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1920年12月的报告[141]称，上海的魏金斯基寄来了一些杂志和小册子，其中包括《劳动界》。可见，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至1920年12月已经传到了伊尔库茨克。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БЮЛЛЕТЕНЬ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Издается как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Центра.

Выходит п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м.

№ 1. Иркутск. 27 февраля 1921 г.

Наши задачи.

Проект и издание „Бюллетене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 ре-шение создать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центр преследует ту цель, которая сама собою вытекает из (нрзб.)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образовавшееся в Иркутске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наш Центр был еще в Москве, поставило себе задачу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вязь с (нрзб.) Китая, Кореи, Тибета и Монголии.

В виду фактических (нрзб.) ряда чисто (нрзб.) пришлось (нрзб.)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нрзб.) Китай, Корея, Тибет и Монголия.

Проведение, или метод класс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етод класс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етод класс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图7　通讯

后一篇《文献目录》举出的中共的刊物，除汉译《共产党宣言》（文章将其出版地误作北京）外，小册子有《苏维埃·俄罗斯》，定期刊物则有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和《劳动界》、北京出版的《劳动音》、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并分别做了简要介绍。其中，关于《苏维埃·俄罗斯》，除了出版形式（1920年北京刊，共31页，附列宁肖像）外，对其内容的介绍也尤其详细。中国方面的资料里见不到《苏维埃·俄罗斯》（也没有原件遗存），从《文献目录》介绍的概要判断，大概为《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文章集成。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述，《俄罗斯研究》的资料来源是美国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可能是在出单行小册子时沿用了该杂志的名称。定期刊物中的《劳动者》，如前一节所述，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与共产主义者分裂前发行的；但是，饶有兴味的是，《文献目录》却断定它是中共的刊物。《文献目录》还称，关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刊物，已收集到至前一年12月号的各期；可见，中国出版的刊物，伊尔库茨克大概在一到两个月后即可收到，这与前述《中国的罢工运动》所介绍的情况差不多。可以断定，伊尔库茨克和上海间人和物的交流大概需要一两个月。

顺言之，同一期《通讯》刊登的未署名的《中国的劳动者》（Рабочиев Китае）一文，转载自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恐怕也是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的魏金斯基等人连同中共的出版物一起寄到伊尔库茨克的。

另外，该期《通讯》还刊登了三封中国同志即瞿秋白、俞颂华和杨勋（音译，Ян-Сюнь）的来信。瞿秋白、俞颂华当时都在俄国，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的驻俄国特派记者。瞿秋白后来是中共领导人，但是，这个时期还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瞿秋白的来信题为《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苏俄的期望》，俞颂华的来信题为《我为何来到苏俄》，后者注明撰稿日期为1921年1月29日。[142] 他们二人1920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与北京政府的外交人员一同经哈尔滨、满洲

里、赤塔进入俄国，第二年1月7日抵伊尔库茨克，两天后即9日离开伊尔库茨克，同月25日到达莫斯科。[143] 从他们的行程看，俞颂华的来信应该写于他们到达莫斯科之后，再经某种方式传回伊尔库茨克，发表在《通讯》上的。瞿秋白的来信没有注明日期，但似乎不太可能写于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期间，大概是在途径赤塔逗留约半月期间写成，而后传递到伊尔库茨克的。

瞿秋白在来信中首先叙述了中国的社会状况，然后谈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向。他说，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有《晨报》、《时事新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来信的最后说，“不久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 коймоло дежи）。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瞿秋白来俄国前是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外交部的俄语专业学校）学生，曾在北京的《新社会》等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呼吁解决社会问题；而他所属的人道社，是“改造联合”这一事实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发起时的团体之一（尽管不清楚瞿秋白是否参加了发起会议），所以，瞿秋白即使不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应该了解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动向。

俞颂华在来信中自称“社会主义者”，介绍了中国的产业状况、工界状况，并表达了对革命俄国的期望，但没有直接谈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杨勋（Ян—Сюнь）在来信（《中国的劳动问题》[144]）中用统计表对中国工人的处境做了介绍。该信日期是1920年1月，发自南京，杨勋的身份是新闻记者，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里没有此人，因此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通观各期《通讯》，来自中国人的信仅此三件，并不见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投稿。至1920年底，就连魏金斯基从上海直接寄给伊尔库茨克的报告也只有一件[145]，所以，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对收集到的中国情报，包括这些中国记者的文章在内，看来几乎是无从甄别地悉数刊登在《通讯》上的。

然而，约一个月后发行的《通讯》第2期（1921年3月20

日）所载文章，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组织的活动。这篇文章就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亲自执笔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146] 该文如其题目所示，是介绍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特别是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状况的。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以相当篇幅引用了武汉、广州、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披露了自 1920 年 11 月上旬至 12 月上旬在上述三城市召开的共六次会议的记录。其中一部分，在本章第一节探讨广州和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时已经介绍过。包括青年团章程在内的这些记录，是会议的原始记录，极具史料价值。

舒米亚茨基在文中并没有解释是如何得到这些会议记录的，但是，他在 7 年后为追悼张太雷所发表的文章中说，这些记录是张太雷 1921 年初来伊尔库茨克时随身带来的。[147] 关于张太雷赴俄国，本节第四小节将作详述，总之，他于 1921 年初抵达伊尔库茨克是事实，因而，会议记录由他带至伊尔库茨克，概不为虚。舒米亚茨基在文末注明执笔的时间和地点是“伊尔库茨克 1921 年 2 月”。如果他引用的会议记录是张太雷带来的，张太雷这时应该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似乎自 1921 年初才格外丰富起来，寄自中国的刊物是其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则是中国的活动家们直接带来的资料，他们从这个时期逐渐开始来到伊尔库茨克。

远东书记处继《通讯》之后发行的《远东人民》第 2 期（1921 年 6 月 23 日）上刊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148]（无署名），则证实了这种推测。该文列出了四十二种汉语社会主义刊物（包括单行本、小册子、杂志、报纸）。其书目本身自属难得，而刊物名称全部用俄语和汉语（以俄文拟汉音）两种文字表示，尤其耐人寻味。[149] 这样的处理，如果没有熟悉中国国内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中国人——也许是张太雷——的合作，是不可能做到的。

综上所述，舒米亚茨基领导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直

至1921年2月前后，都是通过偶尔来自俄国国内或国外的情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是不全面的；自同年2月以后，中国活动家们开始携带着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来到俄国，这增加了远东书记处所得到的情报量。基于这些情报写就并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上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自1920年底至翌年上半年的活动进展。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进展的，正是中共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2.《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苏共中央1956—1957年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部分汉语文件之一。[150] 该《宣言》由正文和一位姓"Chang"的人写于1921年12月10日的前言部分组成，正文又分三章，即"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正文有汉字两千多字，不算太长。这份文件的存在及其内容之被披露，是档案移交后的1958年的事，北京的《党史资料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第一期最早做了报道。[151] 不过，该刊物是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一般人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知道它的存在。

让我们先看《宣言》正文的内容。第一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并预言，由于政权、军队等统治机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压迫劳动群众的，将被废除。不过，这些"理想"并非一蹴而就，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章中，提出了逐步实现的步骤，强调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而关于政权，则须与俄国革命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夺取政权，取得由工人、农民掌握的政权。引人注目的是，此处强调了由产业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作为对资本制度斗争的方式将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按照设想，由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产业工会，将不断地通过罢工动摇

资本主义国家；而在夺取政权的关键阶段，由共产党号召实行的总罢工，将给予资本主义国家最后一击；这些产业工会在革命后将转化为执掌社会经济命脉的机关。这里所设想的，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不如说更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模式。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中论述世界革命形势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被当做不仅是俄国、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和反革命势力还存在一天，就具有其积极意义。总之，《宣言》从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和其一般的实现步骤谈起，后半部分则更加具体地解释了在当前时期应该采取的实施方法。

可见，就正文的内容看，《宣言》的确是正在组成的中共在即将开始活动时的重要文件。但是，《宣言》是由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经过怎样的过程写成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用来回答这些问题。[152] 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该《宣言》虽然也被收录在中共中央现今的正式历史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但并非作为正式篇目，而是作为附录资料。因此，我们只有通过“Chang”写的前言来探讨《宣言》的制定过程。下面是前言中有关《宣言》的制定和形成的部分。

> 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920 年］11 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这个宣言］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
>
> Chang 1921 年 12 月 10 日

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知道，这个《宣言》（汉语本）并不是原本，而是“Chang”从英语重新翻译成汉语的[153]；《宣言》虽然

从未向外发表，却是中共中央在1920年11月正式通过的。关于《宣言》的制定，我们只知道这些情况，但前言还提供了一些线索，是我们可以了解翻译的经过。“Chang”只说在“此地”找不到《宣言》的汉语原本，没有明确所谓“此地”具体指什么地方；不过，我们不难推测“Chang”其人是谁，以及“此地”指何处。线索就是前言中提到的“远东人民会议”，和前言写就的日期。所谓“远东人民会议”，从“1921年12月”这个日期推断，无疑是指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54]（中国共产党也曾派代表参加）。果真如此，“Chang”就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人，亦即张国焘[155]；而所谓“此地”即指张国焘等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曾长时间逗留过的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156] 只有这样，张国焘才有可能在“此地”找不到《宣言》的汉语原本，只有根据《宣言》的英文本重新译成汉语；而，《宣言》的英文本则可能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保存的。

张国焘可能于1921年底在伊尔库茨克看到过《中国共产党宣言》，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那就是上述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俄语刊物《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157]）上刊登的舒米亚茨基的《共产国际在远东》。[158] 在这篇文章里，舒米亚茨基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集结起来，并指出：

>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宣传家的小集团，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正在把进步的中国无产者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共产主义组织之内。至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有了七个地方（县级）组织，并在更多的产业地区成立了支部。共产主义者们的活动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近，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的任务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都将通过宣传工作，

> 组织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成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以及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159]

如引文中所示，舒米亚茨基在文中不仅提到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会议，而且介绍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部分内容。而文中引用的“我们的任务乃是……”一段，则正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中的字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相关部分如下：

>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两者是相同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160] 舒米亚茨基文中引用的字句和《宣言》一致，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曾被部分学者怀疑为是后人伪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肯定是当时的文件，而且，在舒米亚茨基写这篇文章（大概是1921年4月或5月[161]）以前，肯定已经被递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只有这样，张国焘也才有可能在这一年的12月在伊尔库茨克将它重新译成汉语。

第二个结论是，根据舒米亚茨基所说，这份《宣言》是在“中国的中央”——大概是在上海——召开的“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并且至少是经过某种形式的会议通过的正式文件。张国焘说，《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的”，舒米亚茨基也证实了这一点。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学生运动家，还与李大钊共同以北京方面代表人物的身份参与了1920年以后的创建中共的活动；既然他明确地说“这个宣言是

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应该是可信的。而如果真如张国焘所说，《宣言》是1920年11月决定的，是“收纳党员之标准”，那么，即使未曾对外发表，《宣言》仍然不仅是创建时期中共的最早的正式文件，而且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正式诞生。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发生在1920年11月，还有其他根据。这就是《共产党》月刊的创刊（1920年11月7日）。无论从刊物的名称看，还是从其创刊的日期（俄国革命纪念日）看，该刊物的创刊都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宣告了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发起组面向党内发行的月刊，如第一章第四节所述，其形式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The Communist）。致力于成立共产党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为期，创办了以《共产党》为名称的刊物，这是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明确表示。《共产党》创刊号的文章《世界消息》则明确地使用了“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字句，这是中共在刊物中第一次自称“共产党”。这样看来，在正式成立“共产党”之时，为了阐明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而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也是非常自然的事了。事实上，《共产党》创刊号卷首的《短言》（无署名）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这说明二者是在极其相近的时期内写成的。据此可以推断，《宣言》也是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制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推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时在上海的魏金斯基也可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宣言》的制定。[162]

已如反复谈到的那样，1920年中期以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小组开始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这期间，他们有时自称“社会共产党”，有时也自称

“共产党”。当然，这些称呼并没有经过具体会议正式决定，而作为一个组织，其轮廓也还不清晰。如果说有什么标志结束了这个模糊的时期，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时间上给予了明确的界定的话，这个标志就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这一点，不仅对于制定《宣言》、创办《共产党》月刊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如此，对于收到《宣言》和刊物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来说也是如此，远东书记处在其机关刊物上出版的文章中，也明确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鉴于这些情况，我主张中共成立的日期是1920年11月。[163]

3. 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报告

如果说中共最早的内部正式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宣言》，那么，中共代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交的、注明日期为1921年6月10日的书面报告，就是中共面向党外的最早的正式报告。该报告最早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的报告）》为题，刊登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远东人民》第三期（1921年8月）上。[164] 1928年，舒米亚茨基在为悼念张太雷而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再也无人提及。1971年，当时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Persits），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当时）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发现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题为《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的俄语打印稿，并与《远东人民》刊登的报告比较研究后发表[165]，这才为世人所知。再到后来，中国的中央档案馆也发现了内容相同的俄语打印稿，并被翻译成汉语。[166]

总体来看，张太雷的报告中，介绍中国社会概况较多，而具体的记述则较少（比如，党员人数就没有提及）。但是，该报告涉及中共创建过程的几个重要情况，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中国

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其中谈到1921年3月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相关部分引用如下：

> 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167]

冷静地阅读这份报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为了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去，共产党在1921年3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会上制定了党的宣言和临时纲领。据此理解，实质上的党的代表大会，在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同年7月初在上海召开前，早就召开过了。发现张太雷报告的佩尔西茨在比较报告中的“三月会议”和中共“一大”的会议内容后也断言，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168] 佩尔西茨认为中共“一大”前曾经召开过类似预备会议的“三月会议”的见解，在中国的中共党史学界引起了争议，再加上张太雷报告的汉译本的出版，于是出现了不少研究“三月会议”的论文。[169] 但是，这些论文几乎都仅凭张太雷报告这个惟一资料来探讨是否曾经召开过所谓“三月会议”，并以此比照验证其他资料，而在探讨张太雷报告本身的资料价值方面，却留下了缺憾。在此，我们首先来探讨有关“三月会议”的其他资料。

其实，提及“三月会议”的文字资料，张太雷报告并非惟一的一件，1921年与张太雷同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也曾在他写的文章中谈到过“三月会议”。这就是1921年写成的题为《社会主义

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和1929—1930年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中文手稿。这两份资料也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170] 其中，《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都与张太雷报告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即上文简要引用的部分几乎相同。乍看起来，瞿秋白的文章证实了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的记述（至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张太雷报告实际上是与瞿秋白共同执笔而成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第一页上却分明有眉注：“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171]

这样看来，瞿秋白之所以在其文章中涉及“三月会议”，仅仅是由于他所参照的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事实上，瞿秋白1920年底就已经离开了中国[172]，1921年3月即使召开了这次会议，他也不可能知道。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写道：“1921年3月（据秋白的报告）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通过第一决议”[173]，似乎“三月会议”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其蓝本则是他自己数年前写的文章（亦即张太雷报告的摘要），这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根本未曾出席过“三月会议”的瞿秋白，在张太雷报告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揣测而已。因此，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成了所谓“三月会议”的惟一根据；换言之，判断旨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即“三月会议”是否真有其事，全在于张太雷报告是否可信。

张太雷报告，除“三月会议”外，还这样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 截至今年［1921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1. 北京组织……2.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3. 汉口组织……4. 上海组织……5. 广东组织……6. 香港组织……7. 南京组织……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地方组织的数字，即 1921 年 5 月有七个地方组织。实际上，这个数字与上一小节引用的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记述一致。也就是说，就这一点可资证实伊尔库茨克得到的有关中共党组织的情报是张太雷带来的。果真如此，由于舒米亚茨基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节，那么，将《宣言》带到伊尔库茨克的，也有可能是张太雷。总之，在当时的文件中，只有张太雷报告记述了具体时期的、包括具体地名在内的党组织情况，因而这份报告不仅对于了解党的活动情况，而且对于了解这些情报是如何传到共产国际的，也是最重要的资料。

4．“中共使者”张太雷

如前所述，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对于探讨中共的创建过程，以及所谓的“三月会议”，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学术界对此并无异议。张太雷被认为是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最早的中共党员，又由于他在 1927 年底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从而在中共党史上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到底是以何种资格、如何于 1921 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的，却几乎完全不得而知。这样，如果说他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当然包括他对“三月会议”的记述，都是为了让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正在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也未尝不可。要探讨张太雷是如何去俄国，必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此点既然牵涉到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份中共早期少数文件中尤其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

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张太雷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他赴俄国的时间。张太雷在 1921 年下半年以后（即自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回国后）显然是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的；但是，他 1921 年赴俄以前的活动却几乎是个谜。有关他在天津（就读于北洋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资料，都是在他

去世后写成的回忆录，其中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成的[174]；而关于他与天津的学生运动的核心、后来融入中共的周恩来等人的团体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他何时入党、赴俄是受谁所派、赴俄时的具体身份如何等等，这一切都不清楚。[175] 当然，中共的创建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留下记录并非不可思议；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有关创建中共的原始资料都在中国被发掘了出来，而惟独张太雷与早期中共的关系，除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外，却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面对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说，张太雷是没有任何预兆而突然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回忆张太雷的文章中，有关他赴俄后的活动惟一较详尽的，是舒米亚茨基于1928年写的长篇悼念文章，题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176] 张太雷的传记自不待言，连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驻的最早使者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基于舒米亚茨基的这篇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受到如此的重视，自然有其理由。理由之一是，这篇文章是关于张太雷赴俄的惟一资料；作者舒米亚茨基是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与赴俄后的张太雷有过直接接触；而且他在文中还多处引用了原文，则是另一个理由。也就是说，这篇回忆录之被尊重，不单纯因为它是回忆录，还因为它具有几乎和原始材料相同的可信性。[177]

但是，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终究是回忆录。如果把他引用的所谓原文，与真正的原文做一比较，立刻就会发现他引用时的杜撰和窜改。让我们一一进行说明。首先，舒米亚茨基引用的所谓原文，其实是本节第一小节介绍过的《中国的罢工运动（摘要介绍中国工人的刊物）》、《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等。如前所述，前者主要介绍了上海发行的《劳动界》杂志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出自张太雷之手，可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些文章时，一概将其当做张太雷来俄国前发表的文

章。[178] 例如，舒米亚茨基说《劳动界》9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是出自张太雷之手，而实际上却是陈独秀所作。[179] 而后者，本来是舒米亚茨基对自己收集的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加以编辑而成；但在回忆录中，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部分会议记录也被说成是张太雷曾经参与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很明显，这些都是故意窜改。

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即，舒米亚茨基在1928年执笔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时，重新阅读了他数年前在伊尔库茨克编辑的那些刊物，意在从中寻找有关张太雷的材料，结果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就把多少带有革命性内容的事迹都归在了张太雷的名下；而既然是写悼念文章，就不得不把张太雷描写成一个早期就参加了革命的人物。鉴于舒米亚茨基所作的回忆录有恣意窜改之处，根据该回忆录来探究张太雷赴俄的经过及其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纵然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危险的。而有的学者依据该回忆录推测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是在1921年3月末或4月初[180]，这个见解当然也必须重新考虑。

那么，张太雷到底是在何时、以什么身份来到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的呢？现在，能够用来确认张太雷进入俄国的比较可靠的文件资料，是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22日的会议记录，其中记载了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书记。[181] 但是，张太雷的任期却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也就是说，他此时是中共的正式代表到任前的临时代表；反过来说，他来俄国时，并不一定是中共正式承认的代表。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肯定已经到达了伊尔库茨克。而其到达的日期，恐怕是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做如此推断的根据是，舒米亚茨基在1921年2月写的上述《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一文中，收录了据推测是张太雷带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其中包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

综上所述，1921年1月至2月间，张太雷携带着包括中国各

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记录在内的情报来到了伊尔库茨克，将其交给了远东书记处，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于是，尽管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却在3月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临时书记。根据当时天津至伊尔库茨克的交通条件倒过来推算，他离开天津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12月或1921年1月。[182]当时，中国警方在中国东北防范极严，不断有赴俄国的人被逮捕、下狱；而在西伯利亚等待他的，又是食品和燃料的极端匮乏，寒冬进入俄国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想必张太雷一路上遭受了不少磨难。

那么，张太雷是以什么身份、亦即受什么组织的派遣赴俄国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如前所述，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也未必信实。但是，张太雷无疑是携带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进入俄国的，这给人以受命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印象。实际上，张太雷作为中国代表，不仅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确实也出席了同一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83]

关于张太雷赴俄前的行踪，据说曾与他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谌小岑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张太雷在天津的活动；该回忆录应该是详细记述张太雷在天津时期活动的惟一资料。据该回忆录称，张太雷从在北洋大学求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因擅长英语而为天津的英文报纸North China Star（《华北明星报》）和俄国人柏烈伟做过口译和笔译，从而得以与北京的李大钊以及柏烈伟建立联系。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了，张成为该青年团实际上的负责人。[184]

在张太雷携带至伊尔库茨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中，也确实包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会议记录。细心地阅读这些章程和会议记录，我们会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首先，章程的内容和成立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系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185]（刊登于《广州晨报》）完全相同，和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也非常类似。1920年秋冬在中国各地成立的社会主义

青年团，尽管名称一样，但是，从无政府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平分天下的北京和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呈鱼目混杂的状态。不过，由上述事实可知，各地的青年团至少在表面上是遵照统一的章程同时开展活动的。毛泽东在1920年11月得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想必也与此无异。暂且不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也如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样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二者的章程相同，这至少表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各地的青年团是根蒂相结的。

其次，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载，在有14人出席的第六次会议（1921年12月9日）上，由于书记“张（Чжан）”到北京出差，“吴（У）”代替“张”就任书记；然后，“谌（Шэнь）”就发行面向工人的日报《来报》（Лай—бао）——名称取崭新的未来将要到来之意的“来”字，亦谐指英语“Labor［劳动］”——一事做了说明，并决定次年1月2日正式创刊。[186]

此处所见人名“张”、“吴”、“谌”，依据谌小岑回忆录推断，当分别指张太雷、吴南如和谌小岑（吴、谌后来没有参加共产党）。所谓《Лай-бао》，即《来报》，据说是张太雷等天津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在1921年初短时期发行的报纸，谌小岑在回忆录中也将其作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之一。[187] 但是，《来报》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当时的其他报刊和警方资料也都没有提及，难以确认是否真正发行过；即使确曾发行，恐怕其流通范围也极小。总之，如果这份会议记录可靠，我们就有根据断定，张太雷确实曾于1920年底组织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张”即张太雷到北京出差是为了联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如前所述，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奉行的章程又是基本统一的，那么，也可以推测，张太雷等人的活动步调与北京小组肯定是一致的。[188]

由以上事实观之，1921年初赴俄的张太雷，纵然不是共产

党派出的正式代表，也很可能是受命于几乎等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回忆录也说："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189] 不过，我们不可就此断定他赴俄时的身份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理由有二。第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邀请函是1921年3月中旬才传递到中国的[190]，这时候张太雷已经在伊尔库茨克；第二，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即北京的何孟雄、上海的俞秀松二人，于同年4月试图赴俄（如前所述，何孟雄在路上被逮捕，没能进入俄国）；俞秀松在赴俄途中写回的信中明确地说到，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两个人（俞、何二人）[191]，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其他中国代表（至少，在俞秀松看来，张太雷不算代表）。至于在天津似乎与张太雷有过接触的柏烈伟，确实曾接受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但同时也在帮助脱离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赴俄。

另外，莫斯科档案馆藏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料中，保存有各国代表递交给大会的、由本国组织签发的委任状，张太雷的委任状并非中国的有关组织签发，而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 就这样，张太雷赴俄时的身份越来越无从认定。

5.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

带着张太雷赴俄的种种谜团，重读他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其内容不是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关于共产党的），几个疑点自然浮现出来。首先是关于1921年5月时存在的七个地方组织。张太雷列举的七个地方是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但其中的天津、香港和南京这三个城市事实上不存在党组织；即使说报告是反映了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他此时报告1921年5月的情况，也显然不自然。因为，如前所述，他离开中国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同年1月；而

在5月，他应该已经在伊尔库茨克，5月4日，他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列席了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致了贺词。[193]

关于所谓“中共三月会议”，也存在类似的疑点。张太雷在报告中写道，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中共于1921年3月在中国国内召开了会议；而他这个时期并不在中国国内，不可能直接了解这次会议。前文已经考察过，所谓“中共三月会议”，其惟一根据就是张太雷的这份报告；既然张太雷不可能直接了解这次会议，那么，也就不能断定“三月会议”是先于中共“一大”而召开的建党会议，甚至连张太雷报告的执笔经过及其是否信实，也必须加以重新考虑。

但是，这并不是说张太雷报告完全是捏造的。因为，报告所记述的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情况，若非当事者，不可能知道得如此详细。例如，“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一段有关中共建党过程的叙述表明，报告的执笔者在赴俄前虽然不十分清楚建党过程，但是至少曾经通过某种渠道听说过。那么，张太雷不可能直接了解的“三月会议”以及党在1921年5月时的地方组织状况，却被他写进了报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能性而言，有两个。

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报告执笔者为了给人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的印象，作为权宜之计，捏造了事实上从未召开和并不存在的会议和地方组织。如前一章第三节所述，在1920年至1921年的中国，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组织和人物并不少见，后来发展成中共的共产主义组织，当时还并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的共产党。鉴于这种背景，不能彻底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及“三月会议”和详细记述地方组织，是为了提高他自己所属的共产党组织的地位，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主义组织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取胜。据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召开前后，除张太雷代表的共产党外，还有四个“共产党”的代表也来到了莫斯科，其中包括不承认张太雷等人的代表资格

的“少年共产党”，他们都主张自己的组织是正统，争夺得十分激烈。[194] 而张太雷则反复要求共产国际不要理睬那些“共产党”。[195] 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要“真正”成为“共产党”，就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或夸大其词，或煞有介事地加进一些数字和成就，并不稀奇。[196] 所以，我们不能断定惟独张太雷报告是个例外。如果真是那样，再加上张太雷赴俄时的身份本来就不清楚，那么，他的报告就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

第二个可能的答案是，张太雷在 1921 年初进入俄国之后，又得到了最新情报。关于这一点，舒米亚茨基回忆道：“张太雷同志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197]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确有美化张太雷的倾向；但是，如果此处回忆属实，则张太雷在赴俄后又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最新情报的推论就能够成立。不过，当时中俄间的通信情况，使我们对此即刻间难以置信；更何况，如回忆属实，反过来则不期然地意味着中共当初未曾给予张太雷任何身份。

因此，我们只有做这样的考虑，即张太雷报告是在另外的中共有关人的帮助下写成的。说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此前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张太雷，可实际上，中国代表还有其他人。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的组成，需要多费些笔墨。因为，大会的会议速记中对这一正式文件的记载，有的地方前后有出入。在德语记录的开头，中国代表是“共产主义团［Kommunistische Gruppen］”和“左派社会主义党［Linke Sozia list ische Partei］”，而在记录的末尾，则被改为“共产党［K. P.］一人、青年团［Jugend］一人”。[198] 在这两名代表中，“共产党一人”无疑是指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的张太雷(Chang Tai-lai)，但是，另一名代表则不知道是谁。所以，要推

断是谁对张太雷报告提供了帮助，必须首先探明另一位中国代表。

首先，所谓“左派社会主义党”，即指时在莫斯科的江亢虎的“社会党”。江亢虎说，他曾作为“社会党员”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并得到了发言权；而他的代表证也被保存至今。因此，毫无疑问，他的确出席了这次大会。[199] 可是，“左派社会主义党”的名称在大会速记录的末尾不见了，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不是编辑时的失误，就可能是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围绕正统地位展开争夺的反映。果然，大会期间，江亢虎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这样一封信：

> 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Kabasky）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200]

收缴了江亢虎代表证的卡巴斯基，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茨基（M. Kobetsky）。关于这次收缴代表证事件，江亢虎在另外的地方进一步地这样记述道：

> ［我］本以社会党代表名义出席第三国际会，已就绪矣。闻某团代表张某［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系由东方管理部［远东书记处］部长舒氏［舒米亚茨基］所介绍而来者，因往访之。……不意相晤之下，张闪烁其词，不自承为代表。余方异之，及出席时，见张与舒氏在座，因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转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至终事后细访其故，始知张某等竟设为种种证据，致书于国际会，以中政府侦探目余。[201]

对于江亢虎接触共产国际，张太雷等人十分敏感，并试图加以阻挠，这从张太雷大会期间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这封信中，张太雷称江亢虎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十足的政客”，并强烈抗议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202] 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前后，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并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而相互明争暗斗；而在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出，对张太雷等人来说，江亢虎的社会党也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张太雷等人的抗议似乎起到了作用，江亢虎的与会资格不再是正式代表，他的名字也从中国代表的最终名单上被删掉了。[203] 也就是说，江亢虎开始时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但由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抗议，大会期间被取消了正式中国代表的资格。大会速记的末尾见不到开头曾经出现的“左派社会主义党”的名称，正是这一过程的反映。

那么，排除了江亢虎之后的两名代表中，张太雷之外的另一名“青年团”代表到底是谁呢？实际上，学术界早就知道，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除张太雷外，还有其他人；而这另一名代表，学者们一直认为是“YangHo-te”。[204] 这种见解，追溯其根据，仍然源自舒米亚茨基 1928 年写的回忆录（悼念张太雷的文章）。在该文中，舒米亚茨基说，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后，从中国又来了“杨厚德［音译，Ян-Хоу-Де］”（有的地方也称“杨好德［音译，Ян-Хау-Де］”），他们二人参加了共产国际大会。而在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厚德”被称为“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不仅如此，报告原文甚至还有“杨好德”的签名。[205] 很明显，这位“杨”就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另一位中国代表，也是协助张太雷起草报告的人。

曾经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位神秘的“杨”是杨明斋。[206] 其主要根据是，杨明斋有一个别名叫“杨好德”。但是，遗憾的是，

认为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之说不成立。因为，虽然杨明斋在这个时期似乎确实去了西伯利亚，但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他留在了伊尔库茨克。[207]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由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近年被解密而最终得到了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证证明，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Чиа нТаи Лей）和俞秀松（СюСун），另有陈为人（Чен Вун Инь）和瞿秋白（Цюй Цубе）也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大会。[208] 如果那个“杨”是另一位中国代表，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杨”只能是俞秀松。如前所述，俞秀松是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离开中国、前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与共产国际大会的会议速记录称有一名“青年团”代表相符。

6.《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的起草者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俞秀松自 1920 年 3 月底到上海之后，一直与陈独秀等人从事的创建中共的活动关系密切。后来，他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于 1921 年 3 月 29 日从上海出发，取道北京、哈尔滨，经陆路只身进入了俄国。[209] 从时间上看，他比张太雷晚到三四个月。虽然难以确定他达到伊尔库茨克的具体时间，但是，他于 6 月 4 日在莫斯科领到了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证明书（14 日与张太雷、陈为人一起住进了大会代表宿舍）[210]；所以，他进入俄国后与张太雷会合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张太雷报告是他们到达莫斯科后不久的 6 月 10 日写成的。也就是说，俞秀松协助起草报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报告的“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 1920 年 5 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一段，以及有关机器工会的内容，并非张太雷所知情，而是该时期在上海的俞秀松所提供的情报，这样看，也就容易理解了。

陈为人赴俄的经过和时间，仍不甚明了。不过，比他们稍迟、于 8 月 5 日到达莫斯科的抱朴（秦涤清）说，陈为人“代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211] 赴俄以前，陈为人曾是1920年成立于上海的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这一点较为明确；同年11月至翌年1月间，他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界》杂志上接连不断地向工人发表呼吁文章，据此推断，他也可能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212] 从他与张太雷、俞秀松一同抵达莫斯科这一点判断，可能他也是经西伯利亚进入俄国后，再与他们会合的。总之，他也有可能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

除他们之外，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的，还有远东书记处，该机构此前曾收集到一些不甚完整的中国情报。将张太雷报告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远东书记局的前身）1920年12月的报告加以比较，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即，张太雷报告所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情报处、出版处、组织处）及其活动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而该报告是根据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写成的。而且，张太雷报告提及的共产党的刊物，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也看得到。

这样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含有张太雷不可能知道的内容。该报告署名是张太雷，故而常被称为“张太雷报告”；但是，更接近事实的看法应该是，报告所记述的有关中共的情况，与其说是张太雷本人早已了解的，倒不如说是他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在得到的新情报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结果。例如，就“中共三月会议”而言，由于俞秀松是1921年3月29日离开上海的，因而对这次会议，是可能有所了解的。

不过，即使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确实含有俞秀松、陈为人等提供的内容，该“报告”的疑点并非就此全部消解。因为，报告中叙述的5月1日这个时间的党的组织状况，俞秀松、陈为人等人也不可能知道；而且，报告中地方党组织的分布与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分布并不一致。因此，即使不能断定其为捏造，最起码也含有故意夸张的因素。说到“中共三月会议”，尽管另

有许多资料可以证实，1921 年初，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正在从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中被排除出去；但是，至于是否在同年“3 月”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并制定了“宣言”和“临时性的纲领”，则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因而，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值得怀疑。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张太雷报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而非党的情况，并据此解释“三月会议”的召开和地方组织的分布。[213] 由于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也参与了起草报告，所以，这种见解看上去能够成立。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提交给配合共产国际大会而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1921 年 7 月 9—23 日）的报告 [214] 里，详细叙述了青年团的成立经过，却并不包含相当于“三月会议”的内容。

这样看来，如下的看法也许更合理，即，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和地方组织分布等煞有介事的记述，是为了主张自己所属的党的活动更有成就，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党”争夺正统的竞争中胜出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能否断定其为捏造，还有待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无条件地全面相信张太雷报告。

7.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

既然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是经过前一小节考察的过程写成的，那么，张太雷在赴俄国以前就没有必要一定是中共党员，也没有必要一定是某个组织的正式代表。基于这种看法来推测中国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经过，大体如下。

首先来看张太雷。他在去俄国前，通过在天津接触柏烈伟等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对苏俄产生了共鸣，并通过这个渠道知道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存在，于是，就在天津征求好友成立了青年团。后来，他收集到了广州、武汉等地青年团的情报，去了俄国。大胆地讲，这个行动可能是他自己的决定，代表的是他自己

成立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行动的目的，恐怕并非是要与共产国际组织取得联系，而是与当时去俄国的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是为了考察新俄，或者是留学。实际上，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往往被看做留俄中介机关。上海的青年团就聚集了许多希望赴俄留学的青年，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加入青年团，不过想得到留俄的介绍”。[215] 在据信是张太雷赴俄前不久写给妻子的信中，有一句是“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216]；这并不一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特殊任务，也许是真实目的的吐露。这种情形，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俞秀松那里也看得到；他也说，他去俄国的目的，除了出席会议外，也是为了留学，以求取知识。[217]

作为负有使命的职业革命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赴俄，开始成为特殊的行动，那是稍后一个时期的事。在这个时期，中国青年赴俄的动机，首先还是渴望实地观察革命俄国的实际情况，如若可能则留学，掌握新知识；所以，不一定非要断定惟独张太雷是当初就带有某种特殊目的赴俄的。如果说他赴俄有什么特别意义，则在于他首先成功赴俄。对于正需要中国情报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来说，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并且是携带着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情报来俄的张太雷，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人才。舒米亚茨基此时正因刘泽荣、朴镇淳等的个人素质问题而伤脑筋，所以，远东书记处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书记——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来赴任前的临时任命——不存在任何障碍。

再来看俞秀松。稍迟来到伊尔库茨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在这之前是否认识张太雷，不得而知。[218] 不过，一直认为中国代表只有自己和何孟雄两个人的俞秀松，肯定没有想到张太雷已经在伊尔库茨克；更出乎他意料的，张太雷还就任了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从远东书记处方面来考虑，尽管对张太雷的任命是“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的临时措施，但是，从中国新来的俞秀松，虽然是共产党

员，但其正式资格只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所以，也不便罢免张太雷，重新任命俞秀松。再者，眼见共产国际大会迫近，而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正式代表迟迟没有到任。于是，远东书记处推荐了该局中国科书记张太雷和本来是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俞秀松，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他们和与其汇合的陈为人一同起草了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

且不说张太雷如何，就俞秀松而言，他可能准备了一些青年团的报告资料，以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使用，但显然没有准备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资料，他所了解的，至多是关于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上海方面创建共产党的过程，以及他所记忆的离开上海之前的党的一些情况而已。至于陈为人，他也许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有所了解，关于上海方面共产党的事情，可能比张太雷知道得还要多一些，但绝不会比自始参与创建共产党的俞秀松更详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内容，整体上看，概况介绍多，而具体记述少，是因为三位报告起草者本来并非为了出席共产国际大会而去俄国的，因此事先并无准备。[219] 他们尽管能够记得起社会主义刊物以及党成立的大概过程，但由于没有准备，却说不出具体数字、日期等。理应写进报告的数字（比如党员人数）在报告里却见不到，对地方组织活动的介绍有较大失误，这一切并非因为他们认为党的这方面的活动不值得写进报告，而是他们的个人经历所留下的记忆不足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空白所致。远东书记处保存的来自中国的报告等资料，虽然稍嫌陈旧，还是被采用到报告里，正反映了他们为弥补资料匮乏所做的努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最后一天（7 月 12 日），作为中国代表发言的是张太雷。发言的不是俞秀松，而是张太雷，这不仅因为张太雷的头衔是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也许还因为他的语言能力较强的缘故。[220]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预定在大会最后一天进行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讨论没能充分展开，

因此，张太雷的发言也比事先准备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短了许多（仅五分钟）。[221]“报告”的有关中共的建党过程及现状部分，在发言时全部被省略。结果，在大会闭幕之后，“报告”的内容被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人民》杂志上，而其原件则被尘封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

如上所述，严格地讲来，张太雷也好，俞秀松也好，他们也许都不能算是中国方面正式派来的“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出席共产国际大会这件事，对于中国共产党却是意义重大的。首先，这是诞生于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组织参加的第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上所看到的、中国侨民在俄国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情况，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其次，姑且不说张太雷，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之一俞秀松出席了这次大会，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在与齐集莫斯科的其他各色的中国“共产党”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胜出，从而成为共产国际承认的惟一的中国共产党。乍看起来，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比如在当时的美国和朝鲜，曾经因为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一个国家（地区）内分立，就正统地位、统一组织等问题，以共产国际为舞台长期纠纷不断；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起步时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类似问题，是值得庆幸的。试想，如果这次大会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上述姚作宾的“共产党”或江亢虎的“社会党”等组织就有可能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此，也就可能出现如高丽共产党那样的最坏局面，即不得不把本应用到革命运动中去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内部争斗及其调停上去。当然，在中共后来的长期历史中，有一个时期也曾出现成立“第二中央”的动向，但终究没有酿成牵涉到共产国际争夺正统地位、从而使党陷于分裂的局面。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言，中共的诞生及其开始成长算是比较顺利的。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召开的几乎同一时期，青年共产国际

第二次大会也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三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据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文件记载，俞秀松是有议决权的代表，而张太雷和陈为人是有发言权的代表。[222] 俞秀松他们也为这次大会准备了报告，但是，由于他们最终没有机会发言，报告也就没能在大会上宣读。[223]

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成立的经过，在本书叙述共产党成立经过时已经屡屡谈到，故不再重复。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在此顺便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广州）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1920年下半年各地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没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24] 也就是说，这年3月俞秀松离开上海时尚存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到他抵达莫斯科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准确地说，俞秀松等是代表一个形式上不存在的组织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些都是因为当时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需时太久，导致现实与认识之间产生了偏差。这说起来或许是笑谈，但是，类似的或大或小的偏差，在后来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过多次。

注释：

[1] 中共“一大”以前，“共产主义小组”只是对各地开展活动的组织的统称。当时，这些组织的成员称自己的组织为“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所以，对于把“一大”前的各地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也有不同意见。详见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7页。本书采用“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主义组织”，是鉴于当时称呼不统一，并不意味着当时也如此称呼。

[2]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皆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

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8 期。

[3] 请参阅任武雄《1920 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兼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 年第 4 期。

[4] 对各种有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录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本庄比佐子：《上海共产主义グル　プ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论集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 1981 年版；味冈彻：《“中国共产党小组”をめぐる若干の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若干问题］》，载《驹泽大学外国语部论集》第 30 期，1989 年。

[5] 关于发现日记的经过，请参照安志洁、俞寿臧《珍藏七十一载重现在党的纪念日——俞秀松烈士部分日记被发现》，载《上海党史》1991 年第 7 期。

[6]《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1 辑，开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7 页。

[7]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9 辑，文海出版社 1968 年版，原载《自由人》［香港］1951 年 11 月 24、28 日，12 月 1、5 日；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广州文史资料》第 7 辑，1963 年；《郑佩刚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郑佩刚的回忆录明显地参考了梁冰弦的回忆录，所以，严密地讲，能够用以证实“社会主义者同盟”确曾存在的，只有梁冰弦的回忆录。

[8]《谭祖荫的回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黎昌仁的回忆》，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谭天度：《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前引《“一大”前后》(二)。

[9] 任武雄：《对“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探索》，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 年第 6 期；胡庆云：《何谓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 年第 10 期；沈海波：《试论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 年第 1 期等。

[10] 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载《党的文献》1997 年第 6 期、1998 年第 1 期。

[11] 金立人参与编辑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也采用了金氏的这个见解。

[12] И. М. Му син, *Очерк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опрос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Москва, 1927, стр. 228（穆辛：《中国工人运动概述》，载《中国革命问题》第 1 卷）。

[13]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沈雁冰：《回忆上

海共产主义小组》；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14] 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见《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мпартия на III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Доклад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 3，1921（《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的报告］》，载《远东人民》）；《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

[16] 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是1921年冬日本发生的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案件。1921年11月，以近藤荣藏为首的“晓民会”（倾向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秘密组织）会员在东京散发反对陆军的传单，日本政府扬言此为“晓民共产党”的行动而大肆逮捕其成员，12月开始审判。施存统虽未直接参与“晓民会”的活动，但由于与近藤的关系，被强迫充当“晓民共产党”案的证人（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证词的全部内容，请参阅拙稿《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17]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 4，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也报道说：“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 施存统也在1927年发表的脱离中共的声明（《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1927年8月30日）说到：“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

[20] 陈独秀字仲甫，但此外又举陈独秀名，故王仲甫和陈独秀不应是同一人。施存统在“晓民共产党”案的预审法庭上也说“王仲甫”是其同志之一，可见“王仲甫”并非笔误。

[21]《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年4月4日）》，载《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22]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2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有

如下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页。

［24］《俞秀松自传（1930年，莫斯科）》，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95，目录225，卷宗3001；转引自杨福茂《俞秀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5］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

［26］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6月19日条。

［27］1920年6月1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有费哲民和孙祖基的送别诗两首，据认为是6月16日晚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会上所作。

［28］1920年6月16日的《民国日报》《觉悟》记载，戴季陶将于6月17日前往湖州。

［29］当时，陈独秀曾称他们自己的组织为"社会党"。见《对于时局的我见》，载《新青年》八卷一号，1920年9月。

［30］李达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是1920年8月19日，游杭州后抵上海是9月6日。见《外秘乙第325号留日学生总会及该会文牍主任李达之行动（1920年9月10日）》；《外秘乙第395号留日学生总会件（1920年9月27日）》；（《G》）。依据回忆录进行的中共成立史研究里面，李达的回忆录往往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其回忆录有关1920年8月以前的记述，引用时应该特别慎重。

［31］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1967年版，第139—140页。

［32］前引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

［33］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1920年8月第2期。

［34］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前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第8页；原载《自由人》（香港）1951年11月24日。

［35］《郑佩刚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

［36］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页。另，《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也刊登了《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1923年6月18、20—25日），此处注明写信日期为1923年3月10日。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刊：《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1982年版，第458—471页。

［37］原著为 Arthur Ransome，*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London，1919．兼生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19年11月12日至1920年1月7日）。

[38]《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页。

[39] 当时在广州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也谈到，1920年10月，黄凌霜曾受李大钊指示，陪俄国人 Perkin（波金，大概是佩尔林）等来广州。见前引《谭祖荫的回忆》。

[40] 谌小岑：《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天津觉悟社》，《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参加"华俄通信社"工作的觉悟社的两个社员，大概是曾于1921年5月随霍多罗夫来广州的薛撼岳（见《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和梁乃贤。

[41]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4, 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前引《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1—57页）。另，该报告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时的名称是"青年社会革命党"。

[42] 前引《郑佩刚的回忆》。

[43] 佛突（陈望道）：《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会底创立》（载《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8月22日）翻译、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章程草案，还说，"中国方面，也已由他们［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发起人］直接传来"。

[44] 介绍外国语学社的活动的，几乎都是回忆录；通过概括这些回忆录研究外国语学社的，有以下几篇论文。陈绍康：《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8期；青谷政明：《外国语学社（上海）ノート［外国语学社研究笔记］》，载《地域综合研究》20卷1号，1992年等。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1页；萧劲光：《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萧劲光：《赴苏学习前后》，载《革命史资料》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46] Claude Cadart, Cheng Yingxiang, *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emoires de Peng Shuzhi*, Paris, 1983, pp. 161—162（《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轫：彭述之的回忆》）；汉译见《被遗忘了的中国建党人物》，载《争鸣》（香港）1983年第68期。

[47]《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9月23日；秋白（瞿秋白）：《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愿赴俄者注意》，载《晨报》1920年12月14日；抱朴（秦涤清）：《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3日。

[48] S. N. Naumov,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 M. Wilbur and J. L.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1989, p. 450（原文为：Калачев［С. Н. Наумов］,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антон*, 1927, No. 1 [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载《广州》]。另,关于"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名单(推测),见前引《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所收慕水:《外国语学社师生名录》。

[49]《组织世界语学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3月27日;《世界语学社议订草章》,载《民国日报》1920年4月1日;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50]木下义介:《上海に於ける过激派一般(大正11年6月)[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27—36页(《C》)。

[51]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前引《郑佩刚的回忆》称,陈独秀、沈玄庐等也曾来新华学校讲演。另,郑佩刚提到的从俄国来的新华学校教员"Stoping",可能就是斯托帕尼。

[52]划平(廖划平):《旅俄通信》,载《人声》1921年第2期,收于前引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袁文彰:《赴俄失败的回忆》,载《民国日报》《杭育》1924年7月30日;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5日。

[53]《世界语学会追悼会纪》,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11日。

[54]《俄国同志V. Stopani来函》,载《民声》1921年4月第31号。

[55]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6月29日条。

[56]前引抱朴《赤俄游记》。

[57]《少年俄人自戕之检验》,载《民国日报》1921年3月31日;《一个自杀的青年》,载《民声》1921年4月第31号。

[58]前引划平《旅俄通信》。

[59]《上海机器工会聚餐会纪事》,载《劳动界》1920年12月第19期。

[60]《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载《劳动界》1920年10月第9期;《本埠机器工会开会记》,载《民国日报》1920年10月6日。

[61]《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纪》,载《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江田宪治:《孙文の上海机器工会における演说[孙中山在上海机器工会的演讲]》,载《孙文研究》1992年第14期。另,关于与会人数,江田论文作"三百余人"。

[62]前引《上海机器工会聚餐会纪事》。

[63]前引《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

[64]《美国IWW致上海机器工会书》,载《劳动界》1921年1月第24期。另,该函是IWW执行部总干事罗伊·布朗(Roy Brown)的名义发来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4日。

[65]《北京电》,载《申报》1920年10月16日。

[66] 陈独秀：《无理的要求》，载《劳动界》1920年9月第6期；李汉俊：《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载《民国日报》1921年3月5日；李汉俊：《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3月8日。

[67]《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19页。该报告是1956—1957年由当时的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原文是俄语。有关该报告的发现经过，请参阅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另，该报告现在所能看到的，是由俄语翻译过来的汉语本，俄语原文尚未公开。

[68] 原文（汉语）为《劳动者》，但《劳动者》杂志是在广州出版的。概为北京小组1920年11月创刊的《劳动音》之误写。

[69] 原文（汉语）为《经济学谈话》，概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的原书名（*Shop Talks on Economics*）之译。

[70]《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底本是什么不得而知。《共产党纲领》概即后来出版的希曼译《俄国共产党党纲》（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版）。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请参阅本书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

[71] 报告称，《曙光》“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曙光》是以山东学生宋介等为中心于1919年11月创刊的，报告中“我们的一个同志”概指宋介。

[72]《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73] 顺言之，魏金斯基于同年10月到过北京（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之4）；故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有可能是在魏金斯基来北京的影响下成立的。

[74]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511页。另外，《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等，也都部分地收录了关谦报告，但《北京青年运动史料》所收较为全面。

[75] 在关谦报告里，共产主义派时而称“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而又称“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从其成员（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看，并考虑到当时“团”和“党”的区分并不明确，其所记述内容，大概包括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团”和“党”两方面的动向。

[76]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在莫斯科实际召开，是7月9日。

[77] 一般认为，青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使者，是1922年来华的达林（S. A. Dalin）；但是，其他回忆录（С. А. Дал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Москва, 1975；汉译：《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其

他俄语资料集并无此类记述。

[78]《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载《共产党》1921年5月第4期。

[79]《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文献档案选辑》，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80] 上海外国语学社第一批派往俄国的董锄平等一行七八个人在满洲里被逮捕（见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期），大概何孟雄也在此次被逮捕者之中。另外，北京的无政府主义派资助的三名四川学生（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也同时被逮捕。有关四川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当时的活动，请参阅杨世元《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析解》，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81] 据抱朴：《赤俄游记》（《晨报副镌》1924年8月23日）记载，同一时期试图赴俄的抱朴，5月在哈尔滨，与从齐齐哈尔监狱释放出来的十三名青年有过接触，他们对抱朴说赴俄如何危险，并劝其放弃赴俄。

[82] 朱政、任锐：《中共"一大"前党员简介》，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3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多少成员?》，前引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等。

[83] S. N. Naumov,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Wilbur and How, *op. cit.*, pp. 450—451（原文为 Калачев [С. Н. Наумов],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антон*, 1927, No. 1 [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广州》]）。

[84]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成员还有张申府。纳乌莫夫没有提到他，可能是因为他1920年10月就离开北京，经上海去了法国的缘故。晚年的张申府著有较详细的回忆录（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V.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1992；汉译见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85] 关于对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考证研究，请参阅《广州党的早期组织何时建立?》，前引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

[86]《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25页。原文为俄语，但现在只能看到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汉语本，俄语原文尚未公布。

[87] 陈独秀1920年12月17日由上海出发，途经香港，12月25日抵达广州（《陈独秀君启程赴粤》，载《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香港电陈独秀昨抵粤（26日）》，载《申报》1920年12月27日）。与陈独秀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

[88] М. А. Персиц, Из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1, No. 4（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载《亚非人民》；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1984年）；К. В. Шевел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0, No. 4（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远东问题》；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上述两篇论文部分地引用了佩尔林回忆录。

[89] 兼生：《实际的劳动运动》（载《劳动者》1920年10月第1期）注有"1920年9月28日，草于广州东山"。

[90] 前引《谭祖荫的回忆》。

[91]《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92]《斯托扬诺维奇给某人的信（1920年9月29日，广州）》（《文件五》）。

[93]《俄语学校招生广告》，载《广东群报》1921年2月16日。

[94] 前引 Дал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тр. 90；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82页。

[95]《谭平山答词》，载《广东群报》附录《青年周刊》1922年3月第4期。

[96] 罗章龙曾说，"当时党团是不分的"（《罗章龙谈北京团及〈先驱〉》，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集，1982年）。有关早期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请参阅拙稿《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载《东方学报》京都，第68册，1996年。

[97]《共产党广州部传单》，载《广州晨报》1920年12月24日（《C》）。另有报道说，1920年秋也曾有"广东共产党"的传单在广州市内散发。见《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载《劳动者》1920年10月第2期。

[98]《公第174号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报告件（1920年12月8日）》（《C》）。

[99]《来函》，载《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

[100]《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载《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日。

[101] Б. Шумяцкий, Юноше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обзор отчетов о работе］, *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 No. 2, 1921（舒米亚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这篇文章的执笔时间是1921年2月。

[102] 有关陈独秀前往广州赴任的背景及其在广州的活动，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1921年）》（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496期）叙之甚详。

[10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28页。

[104]《陈独秀先生在公立法政演讲词——社会主义批评》，载《广州群报》1921年1月18、19日。

[105]《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上集中刊登了这六封公开信，但其最初

刊载的报刊及日期分别如下。区声白:《致陈独秀先生信》,载《广州群报》1921年1月22日;《陈独秀答声白的信》,载《广州群报》1月27日;区声白:《答陈独秀先生书》,载《广州群报》2月14—16日;《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载《新青年》1921年8月9卷4号;《区声白再答陈独秀书》,载《民声》4月5日第30号增刊;《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载《新青年》1921年8月9卷4号。

[106] 有关"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详细经过,请参阅蔡国裕《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之第四章《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以及嵯峨隆:《刘师复死后の〈民声〉について[刘师复死后的〈民声〉]》,载《法学研究》1995年68卷2号。

[107] 玄庐:《告晨报记者》、玄庐:《答晨报攻击我个人的》、《袁振英质问夏重民》、博(陈公博):《可怜的生活和主张》,以上载于《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博:《正告夏重民》,载《广东群报》1921年3月4日。陈独秀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以毁坏名誉为由向《广州晨报》社长夏重民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二十四小时之内赔礼道歉(《广州群报》3月3日)。

[108] 关于《民声》杂志,请参阅狭间直树《〈民声〉解题》,载《民声》原本复刻版,朋友书店1992年版。

[109] 有关《民声》复刊后的倾向,前引嵯峨隆《刘师复死后的〈民声〉》叙之甚详。

[110] 前引《黎昌仁的回忆》。

[111]《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互助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呈(1921年3月13日)》,前引《北京青年运动史料》,第503页。

[112] 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5月9卷1号。

[113] 胡庆云、肖甦:《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14]《董必武的回忆》,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上;包惠僧:《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上。

[115]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116] 前引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董必武:《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前引《"一大"前后》(二)。

[117]《心社意趣书》,载《民声》1914年6月第14号。

[118] 包惠僧于翌年春发表的《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4月9日),就是在对工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119] 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9期。

[120] E.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York, 1961, p. 157; 汉译本:《斯诺文集 第2卷　红星照耀中国》, 新华书店1984年版, 第137页。

[121] *Ibid.*, p. 155; 汉译本: 同前, 第136页。关于这三册书目, 请参阅本书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A9、14、20)。

[122]《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53—54页。

[123]《张文亮日记》, 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下, 第518页。

[124]《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5]《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前引《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第597页;《毛泽东致彭璜的信(1921年1月6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79页。只不过,《毛泽东致彭璜的信》原为促请彭出席1月13日召开的团的成立大会而写的, 所以, 严格来讲, 没有资料证明这一天确曾召开了成立大会。

[126]《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 见《蔡和森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7]《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 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下, 第474—476页。

[128] 请参阅《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 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下; 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 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9] 比如, 有的回忆录说, 济南小组在北京的陈为人帮助下建立的; 还有的说, 魏金斯基一行1920年4、5月从北京到上海, 途经济南时, 与当地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过接触, 但是, 柳建辉通过研究证明, 这些说法都不可信。柳建辉:《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的时间问题》, 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柳建辉:《魏金斯基1920年4月到过济南吗?》, 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30] 柳建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新探》, 载《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1期。另, 在人名辞典里, 王尽美有时作"王烬美", 有考证认为应作"王尽美"。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31]《李达自传(节录)》, 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132]《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 载《晨报》1920年10月7日。

[133]《济南齐鲁书社广告》, 载《新青年》1920年10月8卷2号。

[134] 丁龙嘉、张业赏:《王尽美》,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25页。

[135]《会务报告》, 载《励新》1920年12月1卷1号;《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 载《励新》1920年12月1卷1号。皆收于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下, 第620—622页。

[136] И.Н. 索特尼科娃（Сотникова）报告、马贵凡编译：《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4 期；Г. М. Адибеков, Э. Н. Шахназарова, К. К. Шири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 Москва, 1997, стр. 26—28（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前引 Дал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тр. 27—38；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 23—33 页。关于这些人的生平和经历，达林回忆录叙之甚详。

[137]《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非定期刊物）创刊于 1921 年 2 月 27 日，据说总共发行至第 9 期，现在保存下来的是第 1—7 期（5 月 29 日）。见 К. В. Шевелев,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единого фронта в Китае 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 П К, *Китай: тради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 ость*,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208（舍维廖夫：《中国统一战线的经过史和中共成立大会》，见《中国——传统与现代》；汉译见徐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38]《远东人民》杂志发行至第 5 期（1921 年 11 月 10 日）。

[139] 原文为：В. Власовский, Забастовочное движениев Китае（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рессы）；А. Ильич,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Обзор изданий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

[140] 能够确认的被引用文章有，翼成：《一个工人的报告》，载《劳动界》第 1 期；畸：《上海申新纺纱厂一瞥》，载《劳动界》第 1 期；袁实笃：《上海米贵罢工的情形》，载《劳动界》第 1—4 期；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第 2 期；吴芳：《最近劳动界罢工运动一班》，载《劳动界》第 6 期。

[141]《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1 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142] 原文为：Цюй-Бо（Кантон），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и их надеждына Россию；Юй-Сун-хуа, Зачем я приехал в Советскую Россию. 另外，瞿秋白的信收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标题为《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但是，该译文并非译自《通讯》，而是译自《亚非人民》（*Народы Азии Африки*）1970 年第 5 期。

[143]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53 页。

[144] 原文为：Ян-Сюнь, Рабочи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145]《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1 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146] 原文为：Б. Шу мяцкий, Юноше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обзор отчетов о работе）.

[147] Б. Шумяцкий, 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и о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 ртии Китая тов. Чжан-Та-Лая］, *Революци онный Восток*, No. 4—5, 1928, стр. 212（《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

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见《革命的东方》；汉译见《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0 页)。

[148] 原文为：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итае，*Народ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No. 2，1921.

[149] 被列入目录的，有以下 42 种刊物：

【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马克斯经济学说》、《阶级战争》、《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计划》、《旅俄六周见闻录》、《新俄罗斯之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工团主义》、《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实业自治》、《社会主义运动》、《社会问题》、《各国社会思潮》、《近世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学史》、《克鲁泡特金的理想》

【小册子】《苏维埃·俄罗斯》、《一个兵士的谈话》、《两个工人的谈话》、《职业同盟》、《告远东少年》、《谁是共产党》、《共产党无政府党及议会》、《共产党指针》、《十月革命给了我们什么》、《社会改造家之传略》

【杂志】《共产党》、《新青年》、《曙光》、《劳动者》、《劳动音》、《劳动界》、《劳动与妇女》、《星期评论》

【报纸】《群报》、《民国日报》、《来报》、《闽星》

[150] 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47—551 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1 页，载有原件照片。另，李新、陈铁健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说“《宣言》原件为俄文”(第 333 页)，但是，至今并未发现有俄文本《宣言》。

[151] 前引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顺言之，据说，该刊物的第 6 期和第 10 期(皆刊于 1958 年)，译载了同为“档案”一部分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

[152] 近年来，杨奎松通过涉猎尚未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指出魏金斯基可能参与了起草《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由魏金斯基协助上海组织(即所谓中共发起组)起草的，或者是代为起草的(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 页；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第 7 页)。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杨奎松没有提示任何根据。

[153] 尚未发现重新翻译时依据的英文底本。

[154] 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及其中国代表团，请参阅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国际与日本］》第四章，法律文化社 1982 年版；川端正久：《极东诸民族大会と中国［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载《思想》第 790、791 号，1990 年；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155] 过去有人认为，张太雷也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而“Chang”即精通英语的张太雷（比如，Tony Saich，(ed.)，*The Rise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New York，1994，p. 95)。但是，近年已经弄清，张太雷确实做了准备工作，但并未出席大会。请参阅 C. A. Горбунова，Съезд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7，No. 4（戈尔布诺娃：《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载《远东问题》)；钱听涛：《张太雷在 1921 年》，载《北京党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A. Pantsov，*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Honolulu，2000，p. 226. 另外，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编者也把“Chang”作张国焘。

[156] 张国焘 1921 年 11 月 7 日到满洲里，随后进入俄国，在伊尔库茨克停留约两个月。这期间，他忙于起草提交给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报告。见前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第 190 页。

[157]《远东人民》创刊号没有注明发行日期，但从内容和第 2 期和第 3 期的发行日期（分别是 1921 年 6 月 23 日、8 月 1 日）推断，可能是 1921 年 5 月中旬以后。

[158] 原文为：Б. Шумяцк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59] 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考察舒米亚茨基这篇文章的少数论文之一。据该论文考证，除《远东人民》外，与舒米亚茨基文章所引用的几乎相同的字句，也出现在当时伊尔库茨克发行的《共产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第 7 期（1921 年）上；只不过，《远东人民》上的“群众斗争”、“其打击”，在《共产主义者》上分别换成了“阶级斗争”和“其对资本主义的打击”。但是，舍维廖夫为底线部分“最近”一词所累，认为底线部分字句即张太雷所说的“中共三月会议”通过的内容。

[160] 据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考证，与《共产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 所载完全一致。

[161] 有关《远东人民》第 1 期各论文的执笔时间，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有所考证。

[162] 在与《共产党》创刊号同日发行的《劳动界》第 13 期上，魏金斯基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署名吴廷康），以纪念俄国革命纪念日，同时号召中国的工人、农民继俄国之后行动起来。另，该文章是作为“演讲”刊登的，但不知演讲地点为何处。

[163]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一般多以 1921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分期，表述为“1921 年 7 月，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等。必须指出，这种说法要成立需要许多前提。其前提之一是，共产党要开代表大会才算成立。但是，若采用此说法，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发行了《共产党》月刊，又当如何解释呢？张太雷等1921年6月（即中共“一大”前）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时，其身份分明是“中国共产党”代表，这又如何解释呢？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以前已经存在，1921年7月的党的大会，尽管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党并不是通过此次大会诞生的。即使单就顺序而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上有“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字句，却没有任何字句是宣告党的成立的。

[164] 原文为：Китайская Компартия на III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Доклад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 3，1921.

[165]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

[166] 益群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莫斯科）》，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报告最初应该是用汉语或英语写成的，但是没有发现。

[167] 前引益群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莫斯科）》；《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另，《远东人民》刊载本中，删去了七个地方党组织的地名及其组织概况。

[168]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

[169] 中国学术界研究“三月会议”的论文有，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述观：《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8期；柳建辉、郑雅茹：《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吗？——与王述观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海波：《“中共三月代表会议”辨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1992年；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苏开华：《1921年的“三月代表会议”性质辨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5期；钱听涛：《也谈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与苏开华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钱听涛：《我对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的看法》，载《中共党史通讯》1994年第6期。

[170] 前者有瞿秋白和李宗武（与瞿秋白同被派驻莫斯科做特派记者）二人的共同署名，前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93—299页收有该文的汉译。后者为瞿秋白于1929年冬至1930年春在莫斯科的列宁国际学院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手稿，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公布后，收录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4—924页。

[171] 李玲：《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与叶孟魁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72] 前引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第40—47页。

[173] 前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883页。文中“秋白的报告”概指上述《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174] 有关张太雷的大部分回忆录，收于前引《回忆张太雷》。

[175] 由于张太雷一直被尊为烈士，他的传记和年谱等的记述总让人以为，他和中共自中共创建时期以来关系就十分密切。最近终于有人指出，没有资料能够证实这种看法。比如，钱听涛：《关于张太雷如何加入中共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张太雷研究会编：《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6] Б. Шумяцкий, 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и о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тов. Чжан-Та-Л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No. 4—5, 1928, стр. 194—230《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见《革命的东方》；汉译见：前引《回忆张太雷》，第171—208页。

[177] 比如，刘玉珊等编：《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现在最详细的年谱，但是，有关张太雷赴俄国前后的行踪，几乎全面依据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178] 顺言之，查遍每一期《劳动界》，都找不到一篇张太雷的文章。

[179]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1920年8月第2期。另外，瞿秋白文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第1期刊登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苏俄的期望》）的一节，也被当做张太雷的文章。

[180]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佩尔西茨的根据之一是，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另外，1920年代曾在西伯利亚、远东工作的达林也回忆说，张太雷是1921年3月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前引 Дал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тр. 34；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30页）。但是，达林到伊尔库茨克是同年8月，他的所谓回忆似乎也源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181]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7，第12页。

[182] 瞿秋白一行在几乎相同时期从北京陆路赴俄，他们从天津到伊尔库茨克费时两个半月。他们在沿途城市常常逗留数日，所以实际行程约需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183]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184] 谌小岑：《张太雷与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前引《回忆张太雷》。不过，很明显，这篇回忆录也是读了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后写的（没有标明，但有几处是引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不可全面相信。另据张太雷直至北洋大学时期的好友吴南如回忆，吴和张太雷在1920年5月大学毕业前一直专心于学业，没有参加任何学生

运动；后来，1920年冬天，张太雷接替吴南如在天津柏烈伟处帮助工作后，开始与早期中共组织有了关系。见华羊《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中共研究》1976年10卷7期。

［185］请参照本章注98。

［186］前引 Шумяцкий，Юноше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обзор отчетов о работе）（舒米亚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份会议记录时，就《来报》加编者注说，第1期实际于1921年1月4日发行了。

［187］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见本章注148、149）及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都提到《来报》。

［188］此外，心美（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载《晨报》1920年12月21日）也反映了张太雷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部分交流。

［189］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5页。

［190］《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1921年3月17日）》，前引《北京青年运动史料》，第504—505页。

［191］《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239页。

［192］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2页。委任状签发日期是1921年5月16日。大会的另一名中国代表俞秀松的委任状（第93页），也不是中国的组织，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签发的（日期为6月4日）。

［193］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ытие，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 осъезда коре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No. 6，1921（《开幕典礼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оре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ытие Съезда］，*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 2，1921，стр. 189，217（《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典礼）》，载《远东人民》）。在这些会议记录中，张太雷被称为“张同志（тов. Чжан）”或“тов. Ч”。

［194］江亢虎：《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页。江亢虎说，“少年共产党”与张太雷和俞秀松一样，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举来俄的留学生，但是他们不承认张和俞的代表资格。所谓这个时期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举来俄的留学生，概指袁笃实、卜士奇、吴芳、王一飞等（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46，第17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6—97页）。他们比张太雷、俞秀松稍迟到达莫斯科，如果真如江亢虎所说，他们和张、俞等之间发生了对立，这件事对于理解张、俞当时的立场倒是很好的材料。前引抱朴《赤俄游记》也提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部分留学生和俞秀松等人发生冲突一事。

[195]《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俞秀松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7日）》，皆为中央档案馆资料。

[196] 譬如说，1923年访问莫斯科的蒋介石，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显夸大国民党员人数，说有60万人，并说有上海的国民党总部的党员名册为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文件九十六》］）。有关共产国际会议报告的“夸大”倾向及其可信性的探讨，请参阅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228—248页。

[197] Б. Шу мяцкий, 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и о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тов. Чжан-Та-Л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No. 4—5, 1928, стр. 215；汉译：前引《回忆张太雷》，第192页。

[198] *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Moskau, 22. Juni bis 12. Juli 1921*）, Hamburg, 1921, SS. 13, 106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

[199] 前引江亢虎《江亢虎新俄游记》，第26页；汪佩伟：《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的卷首照片；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32，第10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1，第12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7，第48页）。

[200]《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29日，莫斯科）》，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5页。

[201] 游人：《新俄回想录》，军学编辑局1925年版，第92—93页。该书是一位中国军人1921年只身访问苏俄的游记，书中朋友“海通君”即江亢虎。

[202]《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中央档案馆资料；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12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6—97页）。

[203] 同前（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12—13页）。

[204] Xenia J. Eudin,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1957, pp. 139—140；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79页。

[205]《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之译者（马贵凡）注。

[206] 余世诚：《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另一名中国共产党人是杨明斋》，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75页。

[207]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抱朴即秦涤清于1921年7月16日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杨明斋。

[208]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12。最早介绍这

份资料的杨奎松举“陈闻影”为瞿秋白以外的另一名旁听者。所谓“陈闻影”是按俄语标音选择近似汉字所致，应为“陈为人”。

[209]《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1日，北京）》、《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238—240页。

[210]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3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17，第9页）。另，瞿秋白在《多余的话（1935年5月）》附录《记忆中的日期》里记载：“1921年5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4页），将张太雷到莫斯科的时间写作5月，概为记忆错误。

[211]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27日。

[212] 关于陈为人当时的活动，请参阅吕芳文《陈为人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8页。不过，该书叙述陈为人赴俄经过，全部依据回忆录和推测。

[213] 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14]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4, 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前引《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1—57页）。另，关于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起草人，经如下论文考证，几乎可以肯定是俞秀松。任武雄：《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兼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成立时间》，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6期；陈绍康：《对〈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之补正》，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11期。

[215]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

[216]《家书》，前引《张太雷文集（续）》，第1页。原函残缺，也没有日期。从内容看，应是赴俄前所写，但除引文外，没有写赴俄的目的和原委。

[217]《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

[218] 在杭州、北京、上海一直与俞秀松在一起的施存统，1921年秋，与来日本的张太雷见过面，但是，施存统在被捕后对警方所做的口供中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拙稿：《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北京小组成员的刘仁静也说：“记得那时［1922年］我还不认得张太雷，我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是后来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内”（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张太雷赴俄前知名度并不高（从未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由此推断，张太雷和俞秀松也极有可能没有见过面。

[219] 就这一点讲，与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相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给几乎同

一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要详尽得多。

[220] 张太雷的外语（英语）能力是有定评的，后来，马林、鲍罗廷来华时，他多次担任翻译兼助手。早期的中共尚无翻译机关，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谈判能力，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共党员应用外语（张太雷的英语，瞿秋白的俄语）的交际能力。

[2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另外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料情况，请参阅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65—80页；伊藤秀一：《20世纪のアジアとコミンテルン［20世纪的亚洲与共产国际］》，《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亚洲历史研究入门］》第5卷，同朋舍1984年版；村田阳一：《コミンテルン资料集［共产国际资料集］》别卷，大月书店1985年版。

[222]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223] 大会闭幕后，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被冠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的题目，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人民》第4期（1921年10月15日）上。

[22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1922年5月第8期。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节　召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1. 马林、尼科尔斯基来华

就在张太雷就任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也就是俞秀松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离开上海赴俄国的时候（1921 年 3 月），共产国际方面出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动向，这就是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和尼科尔斯基（Nikolsky）。

中国共产党在 1920 年 11 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事实上已经成立。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由于 1921 年初魏金斯基（Voitinsky）回国，再加上缺乏资金，没有能够切实开展活动，《新青年》和《共产党》的发行也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1921 年劳动节前夕即 4 月 29 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查封了“外国语学社”。[1] 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团员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到了 1921 年 5 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 改变这种困难局面的，是分别受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于 6 月初到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他们到上海后就立即督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于 7 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让我们先看远东书记处派遣尼科尔斯基的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根据魏金斯基和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张太雷等人的报告，在 1921 年 3 月份就已判断召开中共的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

熟。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3月27日收到的舒米亚茨基(Shumyatsky)的报告称，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与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3]可见，远东书记处这时不仅制定了中共大会的提纲，为了对大会进行指导，还准备派遣（或者已经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上海召开的大会，当初是预定在5月份。虽然没有发现远东书记处制定的提纲，但是，从舒米亚茨基4月末或5月初写下的《共产国际在远东》[4]一文可以判断，中共的大会无疑是预定在5月召开的。舒米亚茨基引用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协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一段，然后这样说道：

> 而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这次大会上，协商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就这样，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正在在那里出现。

可见，舒米亚茨基认为，在他“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即4月末或5月初，在遥远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正在按他3月向莫斯科报告的那样如期召开，并展望“协商会议所说的话”即前一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将在这次大会上化为坚定的组织——“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受派遣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大会的，就是尼科尔斯基。

与马林一同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原名Neiman-Nikolsky Vladimir Abramovich，或Borg Viktor Aleksandrovich，1898—1943），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其实，他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到中国的。[5]他的经历，包括他来华时的身份得以弄清，是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Kartunova）的功劳。[6]根据卡尔图诺娃的研究，尼科尔斯基曾在赤塔的商业学校接受教育，1919年至1920

年参加革命派军队，1921 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我们难以确定他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从事了什么工作，以及他受远东书记处之命启程前往中国的详细时间；但是，从上述舒米亚茨基的报告和文章（《共产国际在远东》）来判断，他在 4 月应该已经离开了伊尔库茨克。卡尔图诺娃还指出，他不仅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还兼赤塔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7]代表，其任务除了准备和出席中共的大会外，还负责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和安排向不久后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派遣中国代表。[8] 他来华的路线不得而知，抵达上海的时间是 6 月 3 日前后，与马林几乎同时到达。[9]

在上海与他几乎每天接触的马林说，“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10] 中共方面的成员对这种近乎监视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但反过来讲，有了这样的指示，他出席中共“一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离开上海的时间是 1921 年 10 月或 11 月。[11]

人们对国共合作促成者的马林（Maring，原名 Hendricus J. F. M. Sneevliet，1883—1942）并不陌生，以他在中国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详细评传和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2]，所以在此对他的经历仅作简单介绍。马林生于荷兰，在铁路公司做事务工作时参加了工人运动和荷兰社会民主劳动党、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1913 年赴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他在爪哇岛的活动为人所熟悉的是，通过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 年成立）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为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1918 年遭荷属东印度驱逐出境，回荷兰后，即作为荷属东印度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因其在殖民地工作的经历当选为执行委员。如本书第二章开头所述，在这次大会期间的 1920 年 7 月，他与朴镇淳、刘泽荣（刘绍周）就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进行了讨论。[13] 8 月，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世界的重要地区派遣驻外代表，而被指定为驻上海代表

的就是马林。

马林自己说，他是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这时已经知道，在伊尔库茨克似乎有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14] 1921年3月，正是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的大会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时间。难以确认马林离开莫斯科之前是否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马林只说他去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15]，而没有直接谈及中共的大会，所以，有可能他离开莫斯科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马林晚年回忆说，“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16] 从这些话来看，尽管同属共产国际系统，但是，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却有可能分别单独向中国派去了代表。

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赴中国。[17] 途中，4月在维也纳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而加以阻挠[18]，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还是经过新加坡，在6月3日到达了上海。[19] 在旅馆小住后，他于6月14日住进公共租界麦根路（Markham Road，现淮安路）32号（其后，又迁到汇山路［WaysideRoad，现霍山路］6号）[20]，和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尼科尔斯基取得了联系，又与受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派遣、已经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福罗姆别尔戈（Fromberg）[21] 共同开始了活动。

与魏金斯基一样，马林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记者。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Andresen），还自称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Oriental Economist*）杂志的记者。[22] 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新报》。不过，马林自称《东洋经济新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之前，曾经凭《东洋经济新报》的“三

浦（Miura）”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的签证。他在给“三浦”的信（1920年11月4日）中这样写道：

> 我在日本使馆，凭您的信件办妥了护照签证。本想经西伯利亚径直赴日，但在俄国听说那样走十分困难，我遂回到荷兰。现正觅船准备尽快前往您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如若可能，希望［1921年］1月或2月开始为您的杂志工作。[23]

这位“三浦”，除了《东洋经济新报》主编、以其“反对大日本主义”而闻名的三浦铁太郎以外，不可能是别人[24]，而介绍马林和三浦认识的，也许是曾在东洋经济新报社工作过的片山潜，或者是马林的同志鲁特赫尔斯（S. J. Rutgers）[25]等。三浦对马林其人了解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他到上海的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26]，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根据马林的叙述[27]，他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到上海之后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尽管开始时与尼科尔斯基每天一同工作，但“与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实际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看来，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他强调作为远东书记处成员并没有什么积极活动所举出的理由是，在上海期间，“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结果，他“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

策和全盘工作”，“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在他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包含上述内容的报告里，能看得出他对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的不信任。而导致这种不信任的原因，除了自己的身份被未经预告突然改变以外，还与他在上海被牵连进的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的内讧和远东书记处对此的干预有关。关于这一点，他指出，分为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的高丽共产党内两派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舒米亚茨基）和赤塔的远东共和国对外机关（负责人是克拉斯诺晓科夫［Krasnosh chekov］）争夺领导权，对二人的宗派行为表示批判。高丽共产党的内讧和伊尔库茨克、赤塔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在此不加详述。惟一清楚的一点是，马林认为“在伊尔库茨克设一个共产国际办事处，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那个城市太偏远了，不可能经过满洲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因而主张共产国际的指导机构应该设在中国，而非不远不近的西伯利亚。而他被派来上海，本来正是为了在上海设立指导机构的。

我们不知道从伊尔库茨克来向马林传达改变他身份的密使是何时抵达上海的，所以，马林在7月9日发出的报告[28]不是寄给远东书记处，而是寄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是否意味着此时他的身份尚未被改变？还是被改变了身份以后，他仍然以执行委员会代表自居？不过，报告里却含有如下重要内容：

> 希望本月（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这是他在报告中共的大会即将召开。

2. 大会的召集

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29] 他事先可能连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不太了解。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在上海与他一起工作的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他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说是中国党员自发召集的，倒不如说是在派驻到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召集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

> 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30]

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催促之下召集得相当匆忙，中国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赴会，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人认为，“南陈北李”缺席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太忙。[31] 但是，事实上陈独秀在大会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32] 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待他们就开会了，这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当然，围绕着党的工作，在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和上海之间保持着书信联系[33]，所以，在马林抵达之后，关于召集大会一事肯定是经过陈独秀同意的。

接到上海方面联系的各地组织，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章程或明

文规定的组织规则，所处的政治状况和活动条件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代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比如，北京好像是开会决定的，而长沙和济南则似乎是与上海的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自发地代表当地出席的。通过当时的记录可以确定其行踪的，有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以及北京代表刘仁静。

谢觉哉的日记表明，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的时间是6月29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之招”。[34] 没有写出来的五个字，也许是“共产党大会”或者是“共产主义者”。总之，长沙代表在那之前肯定已经接到上海方面召开大会的通知。考虑到当时长沙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状况，五天左右能够到达上海，所以，7月上旬他们应该已经在上海。而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35] 北京代表刘仁静，则首先参加了于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7月2日抵达南京）[36]，之后接着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大会，所以他也肯定于6月末以前接到了召开大会的通知。

把这些与会者的行踪连起来可以看出，首先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人在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向各地发出了通知；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们于6月末陆续赴上海，7月初开始齐集上海。[37] 马林的“希望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大会，将大大利于我们的工作”的报告，就是在代表们正在前来赴会的情况下写的。

中共“一大”考证研究的重要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38] 记录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这份文件是在大会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也有几处涉及召集大会的经过和时期。这份文件是五十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其译文首次于1958年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6、10号上，此后在中国才为人所知。[39] 不过，《党史资料汇报》只是供一部分

干部阅读的内部资料，因而一般学者几乎不得与闻。[40] 后来，当时的苏联学者科瓦廖夫（Kovalev）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当时）的资料中发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文件，并于1972年连同详细注释公开发表[41]，至此，这份重要文件才为一般学者所了解。这份《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中，关于大会的召集和召开这样写道：

> 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42]

根据这份报告，大会本来预定在6月20日召开，但因为代表没有到齐，实际开会拖到了7月23日，即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一个多月。这个说法有些勉强。为什么呢？如前所述，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即使李达、李汉俊等上海的党员在他们的督促之下即刻向各地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从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等情况来考虑，也不会把会期定在6月20日。也有一种见解认为，之所以把“6月20日”这个没能实现的日期写进报告里，是为了使派遣中共代表出席6月22日开幕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正当化。[43] 这种看法有点过于穿凿。事实上，马林7月9日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只说大会预定在“7月底”召开，而没有谈及会期推迟或与共产国际大会的关系，从其口气来看，大会一开始就是预定在7月底召开。

另外，出席大会的广州代表陈公博，在大约两年半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道，大会“于7月20日召开”。[44] 如此看来，惟一可能的就是，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在6月20日（на20июня）”并非虚构，而是“7月20日（20июля）”这个日期的笔误。[45] 在俄语文章中，把“6月”和“7月”写错并不鲜见[46]，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写错了。果真如此，则所有问题都可以解释得通。即，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一个半月这段时间，对于从发出开会通知到代表们齐集上海来讲是比较充分的，而这也与马林7月9日的报告所说的“7月底”的预定日期一致。长沙的毛泽东以及北京的刘仁静是在6月末赴上海的，如果说大会预定时间是“6月20日”，也无法解释；而如果是“7月20日”，就非常自然了。

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这里，广州代表陈公博的行踪值得留意。如前所述，他是7月22日到上海的。如果本来预定开始会议的日期是“7月20日”，而实际开始时间推迟了三天，这可以解释为是预定出席的部分代表迟到了的缘故（不清楚除陈公博外是否还有迟到者）。综上所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是这样的，即于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中共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等接触之后，要求召开党的大会，于是，李达等在6月中旬决定7月20日为预定开会时间，并向各地的组织进行联系。6月下旬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于6月末陆续前往上海，但是，部分代表未能如期在上海会合，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三天。

据说，各地的代表们，除了开会通知外，每人还收到了100元的汇款作为旅费。[47] 从外地赴上海开会的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开支旅费约1000元。考虑到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约50元，三等是15元左右[48]，所以，这100元旅费是很高的。当时的共产党，因为经费困难，连《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难以想像能够独自立即筹措到1000元的旅费。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因此，这笔经费自然是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的。顺言之，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之后的1922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17000多元中，94%强即16000多元是共产国际援助的，独自筹措的只有1000元。[49]就这样，单从活动资金方面看，早期的中共也是不得不依靠共产国

际的。

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到，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时增时减的“一大”出席者人数——回忆录是如何写成的

在中共创建史的考证研究中，1921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一般简称“中共‘一大’”）的与会人数和会期一直是被探讨最多的问题。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实际掌握中国政权的中共的历史出发点即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而出现了许多回忆录和研究论文。说起中共的“成立”，即指 1921 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 1949 年以后的事。[50] 与此同时，即随着党史上的中共“一大”受到广泛注目，“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如前所述，共产党实际上在 1920 年 11 月已经成立——逐渐被视为建党的准备过程。对此，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有关人为了提高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的位置，通过把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等的组织称作“共产主义小组”，相对降低对后者的评价。[51] 直率地讲，中共“一大”是后来才被赋予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准确地说则是，掌握了政权的中共必须正式确定自己的来历，外界也希望如此，结果中共“一大”的会期和与会者变成了特别重要的历史问题。

关于中共“一大”的与会代表和会期的问题，由于原始资料极少，有关人的回忆出入很大，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1949 年以后，由于党史的研究资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长

期未得到公开，外国（如苏联、美国、日本）的研究和所发掘的资料又很难反映到国内的研究上来，因而使本来就复杂的研究状况更加复杂，如果要对中国国内国外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史和研究交流史作一总结的话，足可以写一本书。[52]

既然以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形势为背景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和资料公布的过程本身，与如何解决中共“一大”的代表和会期等问题密切相关，那么，就不可能把这二者完全分开来探讨。更准确地讲，问题不在于代表人数（或其资格）和会期，而在于回忆录和“定论”之间摇荡不定的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必须探讨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中共“一大”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有关人员的回忆录的执笔过程和“定论”的演变。比如，和包惠僧、李达一样屡次回顾中共“一大”经过的董必武，因是在中共“一大”出席者中至1949年从未离开过共产党的要人，所以，他的回忆录被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奇怪的是，在他的一系列回忆录中，有关大会参加者部分前后并不一致。下面，我们就循着董必武见解变化的轨迹，对增减不定的大会出席者人数问题作一探讨。这并不是因为代表和会期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通过探讨下文要介绍的回忆录写作过程和“定论”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代表以及会期的问题，实际上是抬高中共“一大”的“意识”和回忆录作者在执笔时所处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变量问题。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人的人数，最可靠的资料是上文探讨大会召开经过时介绍过的俄语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两者皆主张是12人（没有列出姓名）。但是，由于这两份资料长期没有公开，所以，并没有能够反映到1949年以前的有关人的回忆录中。[53] 而在中国国内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1927年1月中共有关人士发表的两篇文章[54]，都主张是11人。不过，也都没有列出姓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回忆录最早给出姓名的，应该是

周佛海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55] 周说，出席大会的是“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也就是，算上济南代表二人，是“十三人”。[56] 记住了济南两个代表名字的是武汉代表陈潭秋。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写下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57]，在这篇文章中，陈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说出席会议的共13人，除王、邓以外11人的名字和所代表的地区与上述周佛海列出的名单完全一致。至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和成员基本上明确了。

中共在延安时期，基本上以“十三人”为定论。但是，奇怪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开始出现“十二人”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951年（即中共建党三十周年）成了定论。[58] 30年代曾经成为定论的“十三人”，后来却被“十二人”取代，我认为，很大原因在于毛泽东1936年秋天向埃德加·斯诺（Edger P. Snow）谈起自己的经历时所说的“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一共有十二个人”这句话。[59] 斯诺的那部使毛泽东一举成为世界著名人物的采访即《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汉译本《西行漫记》，而前一年在延安已经出了几种名曰《毛泽东自传》的节译本。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写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传略》，并最先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的萧三，正是这些《毛泽东自传》的翻译者之一。[60]

那么，在毛泽东的记忆里，这12个人都是谁呢？萧三写的几部毛泽东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萧三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干部，也由于是初次由中共党员写成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1949年版）的作者而广为人知。这本书的蓝本是他为1944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2日），在这

里，萧三说出席中共“一大”的是“十二人”，还列举了他们的名字（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寒烬、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李达、李汉俊、包惠僧、俞秀松——其中王寒烬[与王尽美非同一人物]和俞秀松没有到会）。这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一大”代表是“十二人”的中共方面的文章。萧三在这里举出的12人，可能是在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的人名以外，又加上了萧三自己的推测；不过，萧三在写这篇文章时，曾亲自采访过毛泽东，所以，这12个人很可能是毛泽东告诉萧三的。[61] 由此可以设想，毛泽东记忆中的代表和周佛海及陈潭秋所说有出入。

1945年，毛泽东本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说，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的说法就成了党的正式见解。[62] 延安时期，特别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因此，他说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哪怕只是一句话，也足以推翻以前的回忆录所持的“十三人”的立场。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出现关于大会代表的新资料，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研究都一致主张是“十二人”，其原因只能是毛泽东的表态。[63] 就这样，5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党史学界长期采信“十二人”的立场[64]，因而导致了这样一个逆转现象，即建国后执笔的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定论”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这些回忆录里，董必武的回忆录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关于大会代表，董必武是怎么说的呢？其实，早在20年代末，他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时，何叔衡写信给他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在回信中列出了十一个人的名字（和上述周佛海所举出的相同）和“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65] 我们无法知道这时候他说的“山东代表”是几个人，或者他事先是否看到过周佛海列出的名单；而后来，他在1937年会见尼姆·韦尔斯（Nym Wales）时，列出了13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山东代表。[66] 看来，董必武原来记得有13个人出

席大会，这个记忆因陈潭秋的回忆录而得到印证，所以，他到了1949年仍多次谈到是13个人。[67] 如前所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是“十二人”，而他直至1956年仍然没有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说“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68]

他放弃己见，是在1959年从中央档案馆送来了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等中共“一大”文件的译文之后。在被要求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作鉴定时，他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接着又写到，“如‘一大’代表人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都明白地答复了。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十三人说］，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69] 在这里，他放弃了代表人数是“十三人”的立场，改为同意“十二人”。后来，1963年，人民大学方面有人询问“一大”代表人数时，他也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李达回忆录（采“十二人”说）回答说是12人。[70] 就这样，他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受当时发表的其他回忆录和新发现资料的影响很大。

古往今来的回忆录都是或多或少参考其他有关人的回忆录和当时的文献来回首往事的，所以董必武的做法并不奇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回忆录总是某种“学习”的产物。但是，就董必武来讲，问题在于1959年他所看到的资料里面，实际上混有并非原件、而是经过加工的资料。那是一份中央档案馆独自写的含有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一大”后党中央委员名单。董必武看过名单后，对中央档案馆做了如下答复：

> 至于‘一大’选出了那些中央委员，我记不起有那些人，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71]

董必武加上“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对其可靠性给予了保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本来，中央档案馆方面应该立即对他讲明那名单并不是原件，但并没有那样做。这样，董必武就误以为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也必定是依据某种原件资料写成，而写进回忆录发表了出去。这就是1961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董必武的那篇谈话。[72] 在谈话里，他不但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还说，“毛主席不仅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并当选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而关于“一大”的文件，他时而说“以后就遗失了”，时而又说“一大”通过的纲领，“无文字可征”。然后说道，根据他的记忆，其中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在这里，他曾经亲眼见到过的“一大”文件被说成根本不存在，而文件上根本未曾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却成了纲领的内容之一。说起来，由于中央档案馆的疏忽和董必武“学习”不认真，这篇谈话成了既非史料介绍又非回忆录、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当时很少有回忆录发表，而他的谈话又发表在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就像董必武本人参考李达的回忆录那样，其他中共“一大”有关人肯定也会参考董必武的这篇谈话。也就是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有关人的回忆录，即使不能断定其根本不可靠，最起码不可轻易相信。

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董必武的回忆录，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央委员会一段，果然引起了部分党史学者的关心，甚至有些人写信给中央档案馆，反映这个问题。至此，中央档案馆才终于发现出了差错，于是在1964年7月再次致函董必武，解释五年前送阅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没和‘一大’的三份材料放在一起”，这份名单“不一定准确”[73]；但是，这个说明已经为时太晚。这封信让董必武异常震惊，他马上向各方面联系，解释《人民日

报》上的“谈话”有错误。[74] 1971 年 8 月 4 日的回忆录《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可以看作是为此所作的解释之一。文中谈到关于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时，这样写道：

> 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1961 年，沈德纯、田海燕［1961 年把董必武谈话拿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董的秘书］问我时，我说主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回忆是错误的。我当时是根据解放后苏联交来的两个文件说的，有一个文件上写毛主席是中央委员，那是不可靠的。这两个材料在档案馆，档案馆的两个材料，我说第一个材料纲领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另一个材料不可靠，说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两个材料放在一起，我以为是一个人写的。……后来知道这个材料不可靠。这个问题，不值得去更正，都是个秘密文件，国家机密。[75]

遗憾的是，这份发言在董必武生前没有公开发表。部分党史学者以及其他中共“一大”有关人也许知道这个订正，但是，当时彻底神化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值高潮，包括董必武在内，谁也不可能把毛泽东从中共“一大”中央委员的名单上划掉。董必武 1961 年的谈话，在毛泽东去世后也没有马上得到更正，甚至到了 1977 年还在被照旧引用[76]，其后也一直影响着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和其他回忆录。就这样，大会的原始资料即俄语文件被当作“秘密文件”、“国家机密”，与董必武的更正谈话一起，一直被秘而不宣，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77]

再回过头来看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问题。由于发现了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原来坚持是“十三人”的董必武也转而执“十二人”说，却没想到使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就此定格在毛泽东讲过、其后在中国成为定论的“十二人”上面。但是，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周佛海和陈潭秋的回忆录中已经得到互相印

证的十三人中谁不是代表的问题。在“十二人”说已成定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第一次列出代表名单的，是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78]，在那份名单里，原来被认为是广州代表的包惠僧的名字不见了。当时，李达还不可能看到过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所以，可能是他按照当时的一般说法减掉了一个。后来，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减掉包惠僧，他这样回答说：

> 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79]

按李达的解释，出席大会的是13人，但是正式代表是12人；包惠僧确实出席了，但并不是代表。不过，这个解释怎么看也难以自圆其说。首先，以往的所有回忆录，包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回忆录在内，都清楚地记载包惠僧是广州代表，并且都未曾有只字片言涉及他的代表资格问题；第二，李达的解释使人立即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连资格审查委员会也没有，第一次召开大会的中共怎样分得出谁是代表，谁是一般出席者？李达说，“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恐怕不承认包惠僧是代表的，并不是当时的代表们，而是执笔写自传时的李达本人。看来，李达是费尽心机地要把“十三人”这个事实和“十二人”这个当时的一般说法加以调和，才把包惠僧从代表中减掉的。

那么，为什么被减掉的是包惠僧而不是别人呢？理由之一可能是，按李达的判断，包惠僧来自武汉，而武汉已经有董必武和陈潭秋两名代表，因此包不可能是武汉代表；同样，来自武汉的党员也不可能是广州代表。[80]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理由是对包惠僧的反感。事实上，董必武在转而同意“十二人”说之后（1971

年），也附和李达说，“广州［的代表］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81] 董必武早就不满地说，包惠僧写的回忆录“常有鼓吹自己的不实之处”。[82] 董必武在考虑必须减掉一名代表时，对包惠僧的这种反感很有可能影响了他对包惠僧的印象。不拘怎样，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 年）上的讲话中谈到（可能是按照李达的解释）的“十二人”说，已经是必须“认真学习、彻底贯彻执行”的“定论”；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除包惠僧以外的十二位代表的名字，排除了包惠僧。[83] 所以，即使仅仅为了服从党的决定，董必武也不得不对这个“定论”表示赞同。

董必武在谈到对中共“一大”的回忆摆脱不了当时的政治倾向时，直截了当地说道：

> 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了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84]

说这话时的董必武身居国家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位。[85] 连他都难以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更不用说与他相比社会地位低得多的李达、包惠僧、刘仁静[86] 等这些留在大陆的“一大”代表，更不可能摆脱各个时期中共的“思想意识”。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共“一大”研究陷入了混乱，相关回忆受到资料管理人员（就董必武的例子来讲，是中央档案馆）以及研究人员提供的错误资料的影响，也不断受到“学习”、“思想意识”和“定论”的影响而被扭曲，而被扭曲了的回忆又反过来影响研究。再加上，对错误回忆的更正不能马上公开发表，最可靠的原始文件又被当作“国家机密”，因此，要通过研究弄清历史事实，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笔者之所以认为，代表以及会期的问题，实际上是抬高中共“一大”的“意

识”和回忆录作者在执笔时所处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变量问题，就是这个缘故。

2. 大会代表

如前所述，中共“一大”是被成为执政党的中共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因此，会期及参加会议的人数存在些微差异，对于必须确定党的历程的中共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党的创建史的整体轮廓，却并不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发生变化。由于对包惠僧参加会议的资格解释不同，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有人说是 12 人，有人说是 13 人。但是，包括包惠僧在内的 13 个人——且不管其资格如何——出席了大会确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只是如何整体把握这一事实与俄语文件所记载的“十二人出席”的差异而已。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被探讨过，还有日本学者蜂屋亮子的论文（以下简称“蜂屋论文”）提出了极具见地的看法。[87] 下面将依据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论述，另辅以若干补充。

概观各种回忆录，出席大会的都应该是 13 人，但是，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写成的两个资料即俄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都主张是 12 人，这是为什么呢？陈公博论文可以认为记忆有误，暂且不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大会结束后不久写成的，那上面的“十二人”这个数字不应该受到怀疑。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记载绝非笔误。如前所述，我们不得不认为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有关预定开会时间的记述是笔误（“7 月”误写为“6 月”）。但是，关于代表人数的记述却没有作同样怀疑的余地。因为，这十二个人的地区分布写得很清楚，是“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加起来正好是十二人。在七个地区中，只派了一个代表的地区有两个，这一点也很清楚。其中一个地区肯定是周佛海代表的日本地区，所以，国内的六个地区中，还有

一个地区是一名代表。

那么，国内六个地区中，只派了一位代表的是哪个地区呢？如果我们接受上述李达的解释，这个地区就是广州，广州代表是陈公博一人，而包惠僧不是代表，只是出席了会议而已，结果就是“出席会议者十三人，代表十二人”。正式提出这个见解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邵维正1980年发表的论文[88]，在该论文里，邵氏认为包惠僧出席会议是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指派的。在中国，现在，这个变相的“十三人”说已经成了定论。[89]

与这种见解不同，中国以外的史学家多认为，长沙代表何叔衡由于被指出缺乏代表资格，中途离开会议回长沙。也就是说，那一个代表的地区是长沙。[90] 这种见解的根据，说到底来自张国焘的回忆录。

> 在大会开始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让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91]

但是，这个解释也和李达一样搬出资格审查问题，不能马上令人信服；包括回忆录在内，找不出任何其他旁证资料，也使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定论是十二人，采纳这个定论的著作，也有极少部分恐怕是出于疏忽，写漏了何叔衡的名字。[92] 大概张国焘写回忆录时参考的资料中就有此类资料，而这启发张国焘创作了何叔衡中途退出会场的一幕插曲。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远在加拿大，因而就断定中国有关大会代表记述的混乱不会波及张国焘。

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认定参加大会的是十二人的时候，那位被从十三个人里面排除出去的人物，不是包

惠僧或何叔衡，而是如“蜂屋论文”指出的那样，是中途离开大会的陈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惟独不见了陈公博，这件事，不仅张国焘和周佛海在回忆录中都大加揶揄[93]，陈公博自己在会后不久写的文章中也承认不讳[94]，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写成的，之所以把当初的十三人改为“十二人”，不是什么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因大会结束时十三人之一的陈公博不知去向，而把他排除了出去。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测，比“包惠僧是指派代表”、或“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都有说服力。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说的一个代表的地区是日本和广州，而广州代表是包惠僧。[95] 根据以上探讨，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名单应该是这样的：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广州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也出席了，但中途离开会议，不算作代表）
日本代表周佛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3. 会期

关于中共“一大”的会期，也已经有数不清的论文发表，大凡可能的见解都已经得到探讨。所以，为了简便起见，下面基本上依据这些已有成果论述，适当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另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史方面，不能忘记香港的民间史学家邓文光进行的考证研究；他从事的也是中共“一大”研究，但是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就把“七一”定为建党纪念日[96]，所以中共“一大”的会期，很早以来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邓文光自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97]邓氏的研究，由于其后又有许多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所以，从现在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看，确实存在明显的错误。[98]但是，在当时，连利用为数不多的回忆录都需要从甄别作者真伪做起，资料极端匮乏，能达到如此水准，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以外地区偶尔被引用，而在中国，以实证方法阐明中共“一大”的功劳，基本上都被归于邵维正80年代初进行的研究[99]，邓氏的贡献却完全被忽视。毫无疑问，邵氏的研究对弄清中共“一大”的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之被忽视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缺乏中共“一大”研究方面交流的证明。总之，邓氏的研究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在探讨中共“一大”的会期时，现时最可靠的资料还是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件资料在记载了大会召集过程之后，就大会本身的过程这样写道：

> 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抵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国焘］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斯内夫利特［马林］同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斯内夫利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

> 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后，通过了委员会的提案］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幕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100]

许多回忆录都证实，侦探和警察闯入后，为了讨论剩下的议程而去的"附近一个小城市"就是浙江省嘉兴。为躲避劫难，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在距上海约100公里——快车需两小时——的嘉兴风景优美的南湖的船上进行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报告，把大会过程整理成如下的日程表：

7月23日[101]开幕。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听取汇报。

7月25—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8日第四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9日第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租界警察搜查而流会。

×月×日继续开会（嘉兴南湖船上），讨论和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关，闭幕。

仅从这个报告看，闭幕日期无法确定，但是23日会议开始至30日的日程，基本无误。这段时间的日程，在会议参加者之一陈公博于大会结束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102]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篇文章记录了陈公博7月22日到31日这十天在上海的经历，其中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完全一致的地方，是不少大会参加者的回忆录都谈到的侦探闯入和其后武装警察前来搜查的那天夜里的情形。就这件事，陈公博写得既含糊又夸张，然后说，“于是我们［陈公博及其新婚妻子］翌日便乘车游杭”。但是，在另外一处却说，去杭州是“31日夜”。这与法租界警察的搜查发生在31日的前一天的夜里，或者按《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召开第六次会议的日期是30日，完全相符。

陈公博说，他之所以去杭州，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里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孔阿琴被杀事件）。经查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件凶杀案确实发生在7月31日凌晨。[103]也就是说，陈公博30日夜里的经历太不平凡：租界警察搜查大会会场使他惊魂未定，凌晨就又碰上了隔壁房间里发生凶杀案。由于他的这一难忘经历，并且由于他把它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得以确认租界警察搜查中共“一大”会场是发生在7月30日夜。

剩下的问题是大会最后一天即嘉兴的“南湖会议”的日期。“南湖会议”在因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的7月30日的会议（第六次会议）之后不久，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有一份史料却使问题复杂起来，那就是驻赤塔的赤色工会国际全权代表斯穆尔基斯（Smurgis）同年10月13日写的一封信。[104]这封信在谈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时这样写道：

> 您大概已经知道，自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

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按这封信所说，大会的最后一天是8月5日。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斯穆尔基斯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负责人，福罗姆别尔戈1921年1月赴上海就是受他所派，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同时兼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这封信的时间是赤色工会国际）远东局代表，按常识讲，斯穆尔基斯的这封信应当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写成的。在7月30日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止的大会，竟然五天后才又重新开会，这显然不自然；不过，由于这封信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惟一文字材料，因而有些学者就此认为大会是“8月5日闭幕”的。就这样，关于大会闭幕日期，现在仍然是“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几种见解并存。[105]

这几种见解，除了主张“8月5日”的见解有斯穆尔基斯的信作根据以外，都是对存在某种形式的矛盾的几种回忆录加以解释而得来的。但是，大会参加者的名字姑且不论，利用回忆录来确定特别不容易记忆的日期，前提就很难成立；更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录，还受到以“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这一“定论”的干扰，而这个“定论”出现以前的回忆录也存在着“南湖会议”在租界警察搜查的次日和第三天召开这两种主张[106]，因此，根据回忆录来确定某一具体日期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撇开自相矛盾的回忆录，另外寻找线索，那么8月1日傍晚袭击嘉兴的暴风可能成为推定闭幕日期的根据。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信》称这场暴风是“巨灾”：“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遮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也就是说，就在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举行最后一天会议的南湖，在8月1日这天发生了这场惨祸。4日的《申报》还

继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2日夜。假如会议果真在8月1日或2日在嘉兴南湖举行，那么应该有某位代表记得并谈到这次灾害，但是，有人记得南湖会议持续到晚上，却没有任何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这意味着，南湖会议并不是8月1日或2日召开的。[107]

面对租界警察搜查这一意外事态，有必要尽快结束大会；因此最自然的推断应该是这样的，即30日夜警察搜查之后，第二天（即31日）会场移至嘉兴南湖，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斯穆尔基斯信中8月5日闭幕一段话，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的“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一节解释，电告了伊尔库茨克的，应该是租界警察搜查以前决定的日程（按此解释，中共“一大”原定8月5日闭幕），而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接到经由伊尔库茨克转来的报告，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预定日程举行了。

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及闭幕日期，有待探讨的地方还很多，细究起来没有止境。不过，那种过于细微的探讨最多也只不过说明“一大”在解放后中共党史研究上的特殊地位，而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因此，这里不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4. 大会会场被搜查之谜

中共“一大”最大的突发事件是7月30日夜法租界警察对会场（李汉俊私宅）的搜查，这个事件也影响到对大会日程的推定。幸好没有人被逮捕，但是中共因此被迫改变了大会会场和日程，发生了不小的混乱。这次搜查对代表们也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大事，包括马林在内，几乎所有的大会参加者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秘密召开的大会，何以会遭到警方搜查呢？

我们自然能够想到，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在从莫斯科

到中国的路上，这一年的4月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108] 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然而却无法完全隐匿他个人的行动。现在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109]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110] 该报道说，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警察在搜查会场时，误认陈为“日本社会党”[111]，这也许反映了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

在中国，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细致入微，甚至有人查找导致搜查会场的“侦探”的名字[112]，还有人按照据说曾参与了搜查的人物的回忆写出“传奇”[113]，意在进一步搞清搜查时的实

际情形。如果有租界当局的原始材料则另当别论，否则，连亲自参加了大会的当事人都记不清，不用说自称参加过搜查的人的回忆，更不可靠。这些都只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中共“一大”被赋予了多么特殊的地位。

总之，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林行动的同时，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5. 大会讨论的内容

中共“一大”上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114] 第一个章程包括如下四项纲领条文。

>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
>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
> 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 四、加入第三国际。[115]

第四项姑且不论，如何才能在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当然需要立足于国情加以阐发，但是见不到这方面的内容，这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共产党纲领相似。有人对中共“一大”竟然通过了如此激进的纲领感到不可理解。[116] 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一大”是在马林等出席并指导之下召开的，但是，其纲领却几乎没有反映出马林在印度尼西亚曾初步实践、并在他参加过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 年 7 月）上决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方针，即在“落后国家”里，共产党必须首先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结成同盟，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斗争的方针；

我们都知道，这个方针后来成为国共合作路线的理论根据。据说马林在大会演讲时，还“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117] 如果他真的承认了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纲领，确实令人感到奇怪。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留待后述，在此暂先明确这样一点，即他们这些早期共产党员这时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考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 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让我们来看他们在大会上讨论时的情形。大会讨论经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里面记载得颇详细，焦点有如下两个：①是否应该进行议会工作，以及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章程”第十四项）；②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以及是否应该结成统一战线（“章程”第三、四项，“决议”第五项）。特别是关于前者争论较激烈。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革命起义的机会并非总是存在，平时应该同时利用合法和非合法手段进行活动。对于这种立场，另一种意见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进行反驳说，议会工作不仅会使人抱有无用的幻想，而且会使党本身变质。与此相关，在党员做官的问题上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党员中与北京政府政界有关联的倒是没有，但是，特别是广东的有些共产党员与孙中山等国民党有各种形式的关系，比如陈独秀当时正在广东政府任要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如何看待这些人的活动成了焦点。

第二个问题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问题间接派生出来的，因为这关系到部分共产党员对与其保持各种关系的广东政府作何评价。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共同敌人军阀，应该共同斗争，在这一点上代表们没有分歧，但是，是否应该把广东政府与“军阀”等同起来，意见就不一致了。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把对共同敌人作共同斗争放在首要位置，还是在进行共同斗争的同时，重点进行与其他政党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决议”对于第一个问题做出了某种

妥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任公职："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胥吏[118]不受此限（原注：此项规定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激进派的主张占了上风，做出了如下规定：

>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章程"）
>
>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决议"）

与此相关，入党条件也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也就是说，这些规定没有反映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中提出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方针。

就最后形成这种结论的讨论过程，大会参加者在回忆录中各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把这些记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阵式，即李汉俊、陈公博等始终努力把讨论朝温和的方向引导，而张国焘、刘仁静等则满口"教条"言词，主张通过一个好战的纲领。由于纸面有限，不可能把这些回忆全部罗列出来；为了管窥代表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此处仅介绍在大会上积极发言，并参加了大会文件起草的刘仁静的回忆。如前所述，利用回忆录确定具体事实时要十分谨慎，而为了了解大会的气氛，还是可以参考的。

大会上与李汉俊这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激烈争论的刘仁静，在代表北京地区参加大会时年仅十九岁，是年龄最小

的代表；但是，由于他涉猎过不少马克思主义文献，故被大家送了个“小马克思”[119]的外号。他在谈到自己被选为中共“一大”代表时这样说：

>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能被选为党的“一大”代表，除了一些偶然性的原因……外，毕竟还需要我也具有一定条件。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特点只在我比较注意钻理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又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这个事实就突出说明当时党内认识水平，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水平由此也可见一斑。[120]

同为大会参加者之一的包惠僧亦说，当时“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1]共产党建党时的这种理论状况，使刘仁静发言的水平显得出类拔萃。把刚刚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样不变地在党的大会上宣讲，这确实有点“教条”；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共产党成立时的一般知识状况，不外乎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即“教条”。

刘仁静如何在大会以前就知道那些他“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呢？就这个问题，他也留下了回忆录。他说，他恰好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注意到其中说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这话照搬到大会发言中去了。[122]在大会以前，《哥达纲领批判》只有人部分引用，尚未正式介绍到中国来，大部分代表不知道《哥达纲领批判》为何物；而刘仁静竟能据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滔滔不绝地宣传”，因此，要说他进一步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关系，并使其在党纲中有所反

映，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这样看来，中共“一大”的文件，确实是代表们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过讨论而产生的。但是，刘仁静等大会代表的回忆录中，忽视了、或者说错误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曾参与大会文件起草的张国焘说，“我们［起草文件时］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123] 张国焘想证实大会文件是代表们独自拟订的，但是，很明显，大会通过的这些文件是有蓝本的。

首先，“章程”的蓝本是前一年12月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124] 比较两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虽然有几处按照中国的情况做了修正，但是，关于入党条件和组织规定，无论是形式还是用语，基本上是模仿了《美国共产党党纲》。例如，在中共“一大”上引起激烈争论的关于做官的规定，美国共产党的党纲中也看得到同样的规定（第二条第五项）。

再看“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上述同一期《共产党》月刊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125] 比如，在中共“一大”上，围绕断绝与其他政党关系的问题，与做官问题一样引起了激烈争论；《美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形下面，美国共产党决保持那不调和的阶级战争，并且否认与不信任革命的阶级战争底团体或党派共同做事，例如劳工党、社会党……”中共既然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这些美国共产党的文件，并且还进行了翻译，那么，他们在自己开大会时援用这些文件是自然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参考手头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起草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提交大会讨论；其中有关做官和与其他政党断绝关系的规定尽管受到了部分代表的反对，但是，大会文件还是基本上照原案通过了。

顺言之，当时，中共也还得到了关于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召开经过的报告[126]，这也可能被用于召开大会的参考。共产党

的大会是或者应该是怎样的？对此，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无法有一个明确概念，因此就模仿欧美共产党的先例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这种模仿其实一点也不特殊，因为 1921 年 4 月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章程》（据信为山川均起草）[127]，也和中共“一大”的“章程”一样参考了英国共产党的章程。[128] 亚洲的共产党人对“共产党”这一特殊政党没有具体的概念，他们在描绘党的构造和前景时，只有较早建党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可作参考。进一步讲，既然中国共产党人设想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全球性的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首次起草“章程”和“决议”时与欧美的共产党统一步调，根本谈不上是模仿，而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成立与其早期活动，毫无疑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

这样看来，中共“一大”制定的“章程”和“决议”谋求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带有浓厚的激进色彩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后匆忙决定召开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只好参考、模仿他们得到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准备了大会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国国情来看相当激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世界共同运动的早期中共党员来说，不仅不是“激进纲领”，肯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合适。由于租界当局搜查这一突发事件，使大会不得不临时改变会址，并匆忙宣告闭幕（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在南湖召开的最后一天的会议）。这恐怕也是大会文件未能反映出马林的意向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所规定方针的理由之一。[129]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意外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闭幕，致使部分议题未能审议；但是，尽管如此，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之下得以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建党历程告一段落。从苏俄方面部分人来看，如上述斯穆尔基斯所言，也许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会议”，但是，过多的议论其理论

水平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允许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是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自己。如果说斯穆尔基斯称中共党员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表达了什么的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即暗示了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言论流露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优越感，同“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特有的属性结合在一起，将在其后的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系中建立起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第三节　年轻的党员们

——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

1.“非孝”青年

1921年7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这不止是说中国共产党由酝酿到成立的时间短，更主要是指她是由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举一个数字讲，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其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8岁，加上没有参加大会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巨头，也只有29岁。也就是说，早期参加创建中共的许多党员，是生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度过了善感的青少年时期，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各地领导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那么，这些在五四时期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从而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们，其精神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呢？当然，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契机和道路各不相同，选择一个特定人物作他们的代表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要举出一个代表人物的话，从草创时期就是党员的施存统是最合适的。他在清末、民国时期就读于新制学校，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反孔教运动和杭州的学生运动中站在前列，经过吸收新思潮和对社会改造的各种各样的摸索之后，在参与创建中共的过程中，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见，某种程度上，他的经历对当时的年轻党员来讲是有代表性的。

正如本书屡次谈到的那样，施存统是作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中心党员和理论家而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参加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则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就任劳动部副部长而为人所知。但是，尽管他是创建中共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却只是配角。这主要是因为他后来的脱党问题，即1927年自己主动在报纸上发表声明[130]抛弃了共产党的缘故。不过，他脱党的这段经历[131]，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足迹，以及他代表了当时年轻党员这一事实。而本书重视施存统的另一个理由，是有关他的宝贵资料至今尚有保存。亦即，在有关中共创建的过程和当时党员活动的原始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却存在日本警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132]，和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等。所以，即使从考证史实的角度来讲，施存统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

青年时期的施存统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是相当雄辩的，尤其是他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发表的自传《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33]，在同时期青年写的自我分析中也是最出色的。我们先据此看看他赴日留学前的经历。[134]

施存统（后改名复亮，化名方国昌，笔名光亮、亮、文亮、伏量、CT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现金华市）叶村，父施长春，母徐氏，存统是长子。父施长春有田五亩，也租地耕种，农闲时运送稻米，是个兼业农户。母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识字。施存统一边帮父亲做农活，十岁上了私塾，十二岁上了初等小学堂。在学堂里，老师反复要求“做伴同睡”，上课不用教科书，而用《论语》、《孟子》。总之，施存统接受的是早期特有的那种学校教育。后来，经过一番曲折，得到伯父资助学费，于1917年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立志做一个儒教信徒，并且特别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仲由）——这也是他以“子由”为号的原因——的施存统，既是一

个梦想“升官发财”的学业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个热衷赌博的浪荡公子。而使他的人生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也正是浙江一师。

当时的浙江一师，不仅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而且在校长经亨颐“与世俱进”的方针之下，因厉行革新学校管理而有名。尤其是国文科，在所谓“四大金刚”即刘大白、陈望道、夏道尊、李次九等革新教员的影响下，废除文言，教授口语，很早就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带进了教室，因而被浙江省教育厅斥为“学无本原，一知半解……不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必使全校学生坠入魔障”。[135] 而学生们如施存统等却对此感到清新和共鸣，非常欢迎，学校的景象宛如新文化运动实验场。施存统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结成挚友或同志，也是在浙江一师就读的时候。

1919年，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施存统马上举双手欢迎。五四时期他在杭州的活动，比如，为了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而设立“书报贩卖部”等，还是值得介绍的，但为了避免琐碎，此处省略。浙江一师时期的施存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使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名扬全国的“非孝”事件。[136]

“非孝”事件是因杭州的进步学生刊物《浙江新潮》第2号（1919年11月）刊登施存统痛骂孝道的文章《非孝》而发生的笔祸，是五四时期发扬反儒教精神的最大事件之一。遗憾的是，该期《浙江新潮》在中国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参照原文。不过，施存统自己在第二年写的《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叙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可以知其梗概。文章说，使他写《非孝》的“事实的刺激”是使疾病缠身的母亲陷于悲惨境地的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狠毒行为。让我们通过其中一段，来看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时所抱有的心境。

> 我在这种环境，绝对没有做孝子的方法。……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一样遭遇的人！我母已无可救，我

不能不救将成为我母这样的人！……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所谓被说成“已无可救”的“我母”，就是当时在家乡患神经性疾病而人事不省的母亲，所谓“这种环境”，即指认定母亲是不治之症，要把治病的钱用来送葬的父亲的冷酷行径。而被强迫向这样的父亲尽“孝”即屈从的施存统，通过阅读《进化》、《民声》、《实社自由录》、《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这些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得到“思想的启发”，百感交集之下写下了《非孝》。孔教最大的德行当然是“孝”，而正面以此为“非”，这在当时对孔教的批判日趋高涨的思想状况之下，也是破天荒的尝试。他对自己由孔教的信奉者转变为孔教的反叛者的过程曾经做了这样的回顾，即入浙江一师的那年（1917 年）他在《新青年》读到陈独秀的反孔教论时，曾唾弃陈为“一个刻薄文人”；但是，不久后再次读这篇文章时，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到了 1919 年下半年就“全体都赞同”了。可见，他是受《新青年》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时代产儿。

1919 年下半年发表《非孝》时的施存统，既是一个反孔教之徒，同时精神方面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我们没有必要絮说他在理论上成熟与否。事实上，当有人善意地批评《非孝》“可惜没有锻炼成熟”时，他申诉道，《非孝》的价值就在于“反抗精神”这四个字，那种批评是次要的，是不理解他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只要能够从中窥到五四青年特有的、把彻底否认存在于身边的旧道德直接和全社会的改造相联系的激进情绪就足够了。

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里面，他还毫不掩饰自己的隐秘，坦白了自己是如何断然戒掉手淫这一青年的“自杀行为”的，对于自己在浙江一师学习的两年半中，坚决拒绝一般学生习以为常的赌博和作弊，从未坐过人力车，不抽烟，不喝酒，从心

底感到自豪。现在的他，已经是要求自己全面实践提高品行、肉体禁欲和社会改造的五四青年的一员，无论是信条，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前后，武汉的恽代英，长沙的毛泽东也正循着同样的思路开始迈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暂不说他们是否如施存统那样把“改造社会”的梦想天真地寄托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137]

《浙江新潮》刊登的施存统的《非孝》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大部分是对他的诽谤）。据他自己说，不仅他自己被称为“妖怪”，连同在杭州读书的表妹也被“冷嘲热骂”为“禽兽底表妹”。而对于早就不高兴经亨颐以及浙江一师的教育方针的浙江省当局来说，《非孝》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攻击材料，校内校外到处声讨《非孝》为大逆不道自不待言，新旧两派围绕着纵容“煽惑”的经亨颐的去留问题发生对立，第二年又发生集体殴斗，警察封锁学校，终于发展成所谓“浙江一师风潮”。[138] 1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禁售《浙江新潮》[139]，致使该杂志仅发行至第三号就不得不停刊。在杭州无处存身的施存统，遂于1920年1月1日和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一起去了北京。[140]

不过，施存统等去北京，并非单单为了出去躲避风头，而是为了实践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北京有施存统十分景仰的陈独秀——陈曾就《非孝》草成一文，赞赏道，“《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141] 这时陈独秀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待呱呱落地，施存统等去北京的目的，正是为了投身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理想、以图迈出改造社会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据说，被《新青年》、《星期评论》这些青年们喜爱的刊物称为浙江《非孝》事件的骁将的他们参加互助团，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注目。到北京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

2. 摸索中国改造之路——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施存统于1月10日兴奋地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共同生活[142]，一边做一些小规模的手工劳动，一边在大学听课。但是，与团员们的理想相反，本应是新社会雏形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一开始就因团员之间的摩擦而陷于停顿，再加上没有经济支撑，两个月左右就解散了。团员间产生感情龃龉的最初原因是团员们围绕中途加入第一组的易群先（国会议员易宗夔之女）发生的恋爱纠纷[143]；被指为一方当事人的施存统大失所望。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最后决定解散。[144] 陈独秀此时已经迁离北京，互助团的发起人李大钊、胡适等担心团员们的去向，在解散之前考虑为他们在北京大学介绍印刷厂排字工，或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工作。但是，施存统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兼刎颈之交俞秀松决定拒绝他们的斡旋，离开北京。[145] 施存统和俞秀松处理完团的善后，就像为了追随陈独秀似的，于3月26日去了上海，翌日抵达上海。[146]

据说，在赴上海时，他们开始准备到福建省漳州去，投靠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陈炯明。当时，秉承刘师复思想的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正集聚在陈炯明那里，要在陈的庇护下实行无政府主义政策。到上海的当天，他们就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他们没想到，在那里的际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施存统等在上海先去投靠星期评论社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里有“浙江二沈”，即沈玄庐[147]和沈仲九。沈玄庐与戴季陶一样对浙江一师的革新教育表示共鸣，曾在《星期评论》杂志上表示支持“非孝”；而沈仲九则是施存统在杭州陷于四面楚歌境地时极少数理解者之一（《非孝》事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的《教育潮》杂志主编[148]）。顺言之，这时的星期评论社，宛如浙江一师革新派的避风港，被逐出杭州的“四大金刚”中的陈望道和刘大白也存身于此。除他们以外，戴季陶（《星期评论》主编）、李汉俊、邵力子等也时常进出星期评论社，更是那些慕《星期评

论》之名不断从家里逃来的青年男女们获得解放的场所。[149] 俞秀松刚到上海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50] 这也应该是施存统的感受。

在星期评论社，施存统表示想投靠陈炯明，沈玄庐和戴季陶听后回答说："投身军队，不如投身工场要紧。"说来也巧，在他们到上海以前，正好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决定解散的那天，戴季陶曾写下《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151] 一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探讨了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局限，疾呼"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他面对施存统和俞秀松很可能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二人接受规劝，没有去漳州，决意选择走资本主义社会象征的工厂工人的道路，并暂时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为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工厂的就是给他们以建议的戴季陶。[152] 就这样，俞秀松在4月成了虹口的厚生铁厂的工人。[153] 而施存统则于4月份撰写《"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154] 一文，从他自己的角度对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总结，对戴季陶"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的话表示全面赞同。不过，这时他正好患了肺病，不得不暂缓进入工厂。据他自己说，直到6月出发到日本之前，他都在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155] 与此同时，他参加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从事的创建共产党的活动，这一点，前文已多次提到。他在亲眼见证了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暂时称"社会共产党"）成立之后，在戴季陶和宫崎滔天、宫崎龙介父子的帮助下，于1920年6月赴日本留学去了。

3. 留日生活

施存统在上海时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与李汉俊齐名的戴季陶，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的也是他。当时，正赶上施存统暂时存身的《星期评论》于1920年6月停刊，社员们都在考虑以后的出路。星期评论社解散后，原来

聚集在法租界白尔路（Rue Eugene Bard）三益里的办公楼的同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了。他们之中，除了施存统以外，考虑出洋、留学的也不少。[156]

施存统十分倾倒戴季陶，施存统自己也坦白承认，与诸多同人相比，自己“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157]戴季陶自然也喜欢施存统，并为他的前途费心。戴季陶高度评价堺利彦、山川均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58]，又非常喜爱高知、青森、京都等地的自然环境[159]，就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兼治肺病。当然，日本有他多年的同志宫崎滔天和其子宫崎龙介，斡旋留学也方便；宫崎龙介前一年秋天来中国时，还亲自拜访了戴季陶。[160]就这样，戴季陶就拜托宫崎龙介帮助施存统留学。6月19日，朋友们把施存统送上了船[161]（第二天起航）。

施存统出现在照顾他留学的宫崎父子（当时住在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村3626番地）的面前，是6月26日。宫崎龙介当天写的信[162]中提到的“从支那来的患肺病的朋友”即指施存统。施存统在日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大概到日本后马上就去拜访了宫崎家。宫崎龙介的信中还提到，当天，施存统就在宫崎龙介的陪同下去了医院，可见他的肺病相当严重。当时的宫崎龙介，作为宫崎滔天的长子，又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为人知；虽然那年3月因纠纷而被新人会除名[163]，但依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仍然参与《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5月，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来访时，他也为之奔走。[164]这时，宫崎被委托管理清末革命家黄兴曾经拥有的邸宅，还将其作为新人会会员共同活动的场所[165]（龙介离开新人会后里面也住着不少人）。在租定住处以前，施存统大概就暂时住在那里。7月，他从宫崎家搬到不远的高田村1556番地的三崎馆。[166]

施存统决定在日本学习经济学[167]；但是，为此必须先掌握日语。来留学之前，日语能力极强的戴季陶对他说，日语“用功两年，大概可以自由一点；若要真正自由，总非三四年不行”。[168]他在目白的东京同文书院登记了学籍（1921年春退

学）[169]，最初的三四个月专心学习日语。[170] 他的日语会话能力到最后似乎也只是“还须努力学习”[171] 的水平，但是，经过刻苦学习，阅读方面长进很快，当年年底，已经可以向《民国日报》投寄长篇译稿，因而被人称赞说“存统学了半年日语已经可以译书了”。[172]

当时的施存统，在上海受戴季陶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173] 但是，他刚到日本留学时的思想立场，则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不自然），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话虽如此，但是我对于他[戴季陶]所抱的主义，却还没有绝对信仰，就是我一向所相信的‘安那其’主义，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合理的理想”。[174] 他在上海期间，以及初到日本时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175]，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没想到，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接触，使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察觉了他的存在和行动。警视厅开始警惕施存统，始于景梅九等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1期（1920年12月）上登出的“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统”的日本通信地址，第二年一月，担任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中日两国间暗中活动的警视厅外事科查明了施存统“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也已经发现他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176] 这之后，直到回国，他的行动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

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一事，使施存统在中国声名远播，除了上述《自由》杂志以外，1月14日他还收到了安徽省芜湖第五中学学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的宗旨书，要求他介绍无政府主义书籍。[177] 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对待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但在1月，他告诫那些责备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说：

> “自由组织，自由联络”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自然是我们要达到的理想，然而我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

上、教育上，总没有可以看到从现社会一步跳到那个理想的理由，这其间当然要有一种过渡机关。[178]

由此推测，这时的施存统对“安社”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真理”不会举双手赞同。关于施存统自己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留待后叙；事实是，在对待无政府主义比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戒备的警方的报告中，也没有记录他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关系。而4月以后出现在警方报告中的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的“要注意支那人”。

根据1921年4月23日警方报告[179]记载，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通，翻译彼等著述宣传该主义之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等，向支那内地人介绍”。所谓“翻译彼等著述……向支那内地人介绍”，大概指施存统翻译并时常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山川均等的文章(后述)。这份报告还指出，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据上述鹤近来寄予该人信件观之，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鹤某”就是当时上海的共产党负责人李达。也就是说，这时的施存统似乎已经成为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

根据施存统同年末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180]，他初次与堺利彦面谈是在1920年12月，目的是为了转递上海的李达给堺利彦的信件（为翻译而询问文章的空字），那是经过谢晋青[181]介绍，和朝鲜人权某（大概是权熙国[182]）一同去的；第二次是2月份，是应上海李汉俊之请，购买堺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183]两次往访都是为了联系社会主义书籍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斡旋被日本警方当成了“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

另一方面，施存统接触的高津正道，当时（1921 年 6 月）正在写一篇介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184] 这篇文章非常具体地列举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信奉者”的真实姓名（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机关刊物（《共产党》）、活动内容（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人夜校）、地方组织所在地等等。高津正道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支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85] 中写道：“本文曾得到 C.T（施存统笔名）君指教，深表感谢。”由此观之，《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肯定是基于施存统提供的情况写成的。施存统本人在警视厅也承认曾经与高津见过几次面。

就这样，施存统到日本留学之后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中转站。而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正是中国方面正式开始建党活动的时期，施存统和周佛海（当时在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学习）二人也与陈独秀等保持联系，在日本从事建党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中共“日本小组”。4 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来了两封信（邮戳日期分别是 4 月 19 日、4 月 28 日），传达了广州陈独秀来信的意思。4 月 19 日的信中写道：

> 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但我有两个困难：一、我明年将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事也未能干。二、我大学志愿在京都，但和日人联络仍然不便。我有以上两个困难，拥有代表虚名，实在惭愧。此意请转告独秀。你居东京，极为方便。[186]

从这封信看，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所谓中共“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建议在 4 月下旬成立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所谓“日本小组”的目的，是“联络日本同志”，实际负责的不是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而是东京的施存统。从这个意义

看，上述施存统与堺、高津等的接触，正是“联络日本同志”，使其了解他们“团体”存在的任务的一环。附带地说，解放后他在有关“日本小组”活动的回忆录中说，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彭湃（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杨嗣震、林孔昭等十几人，开过两三次会。[187] 遗憾的是，关于“日本小组”的活动情况，日本警方的报告中找不到相关记录。[188]

日本警方掌握了施存统等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相呼应，对日本“同志”展开活动的动向，当然就更加警惕施存统。他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这封信也被警方检查过）中可以看到“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189] 的字句，反映出他被严密监视的状况。6月17日，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他回答他们说，他是“由戴天仇［戴季陶］介绍给宫崎，并在宫崎的帮助下才得以居住现在的宿舍”，“现在，上午专心自修英语，下午则研习日语及经济类书籍。如果准备得充分，希望进庆应大学学习经济学”；还说，“来日本后，平均每月从家里收到约一百元的学资”，而汇款手续是戴季陶实际办理的。[190] 不过，他的家境绝非丰裕，也不可能给发表过《非孝》的儿子每月汇这么多钱。真实情况恐怕是后来宫崎滔天向警察说的那样，“戴季陶……认为施存统头脑清晰，将来大有希望，遂送其来我国留学，每月并资助学费五十元左右”。[191] 施存统没有实说，大概是怕警察知道他接受上海有名的社会主义者戴季陶的资助而加强对他的防范。

除此之外，他还极力否认与社会主义人士的交往，说“在当地的日本人中，除宫崎龙介之外没有结交任何朋友……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次也没有交往过”，“胡适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在陈独秀发表其言论思想时，我曾为其学说折服，但他现在已在广东政府做官……早已不是思想界人”，“我虽然研究社会主义，但并非社会主义者，故没有从事过该主义之宣传”。[192] 这些都同样是在掩饰自己。但是，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与堺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接触的事实，当然

不会相信他的话。尽管施存统不满意地说，“最近警察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受到很大束缚。岂有此理”。但是，对他的监视以后也没有松懈过，倒是处境更加严峻，以至于“房主要求搬到别处去住，十分窘迫”。

施存统接受警视厅外事科讯问的1921年6月，正是李达、李汉俊在同月3日抵达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开始准备召开中共“一大”的时期。中共“一大”当初预定在7月20日召开，如前所述，不久后要召开会议的情报已经被日本警方掌握。当然，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涉及这个情报的来源，因此，不能断定警察是从施存统和上海之间的联络中获得了情报。但是，施存统等“日本小组”在决定派周佛海出席中共“一大”时，肯定事先已经得到上海方面关于召开大会的通知，施存统和周佛海也肯定就此有所联络；而施存统这时的所有往来信件几乎都要被警方检查。所以，我们有根据推断，警方得到的情报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总之，通过派遣周佛海出席在7月末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日本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施存统，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4. 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日本生活一年以后，就好像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相呼应似的，施存统最终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开始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日本吸收的共产主义理论。

来日本留学以前，他就时常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特别反复呼吁打破封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但并没有翻译或论述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193] 他当时的语言能力恐怕也还没有达到阅读英语或日语社会主义书籍的水平，顶多利用现有的汉语无政府主义书籍或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报道来了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轮廓而已。通过与戴季陶、陈独秀、李汉俊等个人交往，他也许

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概要，但是，与其改造社会的热情相比较，其理论基础大概仍然不过是一知半解。

到日本留学后，他马上接触了日语社会主义文献，并将其翻译后向上海的报刊投稿，这使他从一个社会主义学说的初学者成长为一个理论探索者。他最初翻译的日语社会主义文献，是1921年1月的《劳动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月6日至8日。原著是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同文馆1919年出版）；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他回国的这一年间，已总计翻译了11篇。其中，河上肇和山川均的文章就占8篇[194]，看得出他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尤其关心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纯粹翻译以外，仅1921年一年，他还发表长短文章共计五十几篇，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也是以河上、山川、堺等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显然，他在掌握了日语以后，通过阅读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一下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从施存统论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村社会脱离贫困、发展工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是否有效？中国是否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关乎他们所进行的运动为何必须存在的理论难题。施存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一个方面是，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单独发展。他说：

> 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

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195]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的精力和牺牲节约到最小量？知识阶级纵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却也握有至少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钥匙。总之，这要视知识阶级在多大程度上看清楚社会进化的方向，并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理解历史的必然而定。[196]

当时，施存统对山川、河上非常崇拜[197]，当然不会不去注意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他试图以按照唯物史观来判断历史趋势（山川称之为“社会进化的方向”）的“人的努力”来弥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缺少的物质基础。社会革命的确需要“经济的必然”，但并不排除“人的努力”，即如下的见解：

要想在支那实行共产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支那还非常薄弱；我们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就非努力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现在的支那，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们底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198]

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逻辑，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薄弱，但是，越是薄弱，就越需要“人们底努力”。他自己也认识到，严格地讲，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矛盾的，但似乎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大的错误。他说：

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

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9]

施存统接着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唯物史观”，而据那个“唯物史观”，“国际的社会主义战胜国际的资本主义”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并做出结论说，必须从这里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00]

要指出施存统的这些议论自相矛盾或者自卖自夸是容易的，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试图通过主体努力克服客观状况的倾向的萌芽。但是，我们面对施存统，不应该按现在的眼光去考察其议论内容的水准高低，而是应该看到，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尽管还有些牵强附会，却是努力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坚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甚至断言：“我们在支那提倡共产主义，决没有与马克斯底主张冲突；就是马克斯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产主义。”[201] 这些话表现出的，是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信心；而给予他这种信心的，正来自他在日本吸收的理论。

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给予他的影响，也可以从他肯定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诀别方面看得到。使他开始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山川、河上根据该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工农专政的正当性的论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构想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实行革命的独裁。自 1920 年起，山川以及河上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这个构想是俄国革命中工农专政的理论根据。[202]

《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本在中国出版是 1922 年的事[203]，但是，1921 年夏就有人介绍其部分内容，尤其是在政治过渡期无产阶级实行革命的独裁。这就是山川均 1921 年为《新青年》

写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204]，以及施存统受此启发于同年8月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205] 特别是后者，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成就。文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哥达纲领批判》，还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乱》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丰富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正相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在此基础上，施存统明确地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又引用山川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见解（"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上述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一节），以证明自己的这个阐述没有错误。很清楚，施存统的这篇文章，是依据山川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翻译的山川均论文《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社会主义研究》三卷二号，1921年3月）写成的。

山川在《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一文中，对于曾被视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认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可以说，使山川转而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原封不变地被施存统继承下来，又通过施存统促进了中国国内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时值围绕社会革命中"独裁"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所以，从时机上看，施存统依据山川的见解来把《哥达纲领批判》具有的意义较早地介绍到中国，其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使他自己实现了转变，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遵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党"找到重要的理论根据。早期中共党员的必读书目《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出版），主要收录了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论文，其中施存统的文章仅次于陈独秀占到五篇（都是在留学期间写成）之多，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

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前后发表的《第四阶段独裁政治底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206]，也反映了山川均

等阐述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施存统的影响。对于当时仍坚持认为“我决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207]的施存统来讲，从《哥达纲领批判》推论出的过渡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也是合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这样说：“无产阶级专政，本是一种革命手段，并不是共产党底目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期”和“共产主义半熟期”到达“共产主义完成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就会实现[208]，而通过唯物史观科学地预见到这一点的，就是《哥达纲领批判》。

通过《哥达纲领批判》，一方面确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相同，同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种见解，实际上和这一时期的河上肇是相同的。[209]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施存统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步调一致。就这样，他无须丢掉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而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贯彻“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代手段”的样板。从这种观点出发，施存统对只注重理想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210]，并进一步声明：“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于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我所信的马克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21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激进青年从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而加入中共的典型思想变化轨迹。即施存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不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或者说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理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找到了通向“阶级完全消灭，国家也因而失其效用”的“无国家社会”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212]的理论；而这显然迥异于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里面存在的“放纵”、“懒惰”这些自古未改的性情大加非难的陈独秀。笔者认为，像施存统这样的例子当时绝非少数。这个时期的施存统毫不掩饰他对列宁的崇拜，说：“我很佩服列宁先生，我很希望大家都学列宁先生。”[213]当

时也在日本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张景曾这样回忆施存统是如何表现出对苏俄的好感："施君每日读书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他说：'列宁在苏联一天要工作十八九小时，只舍得休息五个小时，像我们青年，应该更要比他努力一些才对。'我有一幅列宁像，他写上'世界革命'四字，我贴在书案壁上。"[214] 这大概是在山川均影响下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施存统1921年下半年的形象。

如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研究》及其主编山川均，对施存统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影响非常大。实际上，施存统也是非常钦佩山川均其人的。他当时写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和山川均的活动状况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215] 一文中，除详细载明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购阅时的联系地址、价格等以外，还对山川不顾肺疾倾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加称赞。同样身患肺病仍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肯定从山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据施存统自己说，他第一次去久已仰慕的山川家里拜访，是1921年9月。[216] 当时，施存统已经翻译了山川的四篇论文，并且，如前所述，他已经在山川的影响下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必山川是很愉快地欢迎了这位"同志"的。而对施存统来讲，见到尊敬的山川，肯定也与其前见到堺利彦一样，是一大快事。他后来明确地对警视厅的警官说："据我看，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位是堺利彦，第二位是山川均。"[217] 也许与只读他们的文章相比，通过交谈，施存统更增强了对他们的敬意。后来，他们之间交谊没有中断，直到这年年底被捕以前，为了确认杂志上发表的山川论文空字，施存统还去拜访过山川。

5. 东京被捕以及被驱逐出境

中共"日本小组"即施存统和周佛海接受的任务是，逐一介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联络日本同志"，发挥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桥梁作用。而施存统作为"日本小

组”事实上的惟一一个成员，也确实执行了这些任务。在施存统1921年夏转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信徒”之后的活动中，有一件事不可不提，那就是在张太雷为推动日本方面派人参加预定在这年秋天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而秘密来日本时，施存统介绍张太雷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也就是说，10月上旬张太雷来日本后，施存统就躲过警察的严密监视出面斡旋，使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张太雷成功地会见了堺利彦、近藤荣藏。

据说，张太雷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参加了“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邀请中国、日本的代表参加大会，于8月或9月回国，之后不久受马林派遣秘密来到了日本。[218] 中共“一大”后仍然留在中国的马林曾经说过，张太雷受派遣去日本之后，才与日本同志接上了联系。[219]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

据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所作的证词[220]（以下简称“证词”），以及他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221]（以下简称“口供”）记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张太雷带着“俄国过激派代表”“S君”（Sneevliet即马林[222]）的秘密使命和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他租住的三崎馆，是在10月5日。张太雷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到后的第二天，就在他陪同下拜访了他曾经见过面的堺利彦，并要求派人参加“远东大会”。堺立刻叫来近藤荣藏与张和施会谈。不过，也许是施存统的日语还做不了口译，双方用英语进行了交谈。施存统在“证词”中还说，后来张太雷又与堺会见过一次，确认了派遣出席大会的人数；其中一次会见时，张交给近藤派遣旅费1000元，用的是朝鲜银行的百元钞，其中500元由施存统在朝鲜银行兑换成日本纸币，他自己也拿了100元，作为翻译日本社会主义文献的稿酬，并用这些钱付了拖欠的房费。张太雷完成使命回国是在10月13日前后，是从东京回上海的。

这些“证词”和“口供”几乎没有隐瞒任何事实，这一点后

文还要谈到。不过，关于张太雷来日本的经过和离开日本的时间等尚有诸多不明之处，需要进行若干补充。首先，派遣张太雷到日本一事，马林似乎没有与陈独秀商议，而是自行决定的。根据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讲，在张太雷出发后才得到消息的陈独秀责备马林专横，二人因此产生了感情对立，最后导致陈独秀命令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发去密函，让施存统不要协助张太雷。张国焘详细叙述了这其间的情形，并称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223] 张国焘还回忆道，幸好施存统把接到的密函拿给张太雷看后，接受了张的解释，张也才总算完成了任务。当时，陈独秀强烈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处理党务，对马林动辄摆出共产国际的权威不满意，这一点有关人士在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所以，陈独秀对马林，以及他的助手兼翻译、部分人评为“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224] 的张太雷采取这种举动，是不难想像的。

关于张太雷抵达和离开日本的时间，施存统在“证词”中分别说是“10 月 5 日”、“10 月 13 日”。但是，也有的警方资料说是“8 月下旬”、“10 月 2 日”[225]，无法断定。至于离开日本的时间，也有“8 月下旬”、“12 月 12 或 13 日前后”[226] 等见解，也必须进行若干探讨。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与马林意见相左的陈独秀的动向。陈独秀为了领导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而离开广州是 9 月 10 日，同年 10 月 4 日被上海的租界警察逮捕，10 月 26 日被释放，恢复自由。[227] 据说，为了陈独秀获释，马林和从日本回国来的张太雷都做了努力，因派张太雷赴日而僵持的陈独秀和马林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缓和。[228] 从上述派张赴日的经过考虑，张太雷赴日应该在陈独秀 9 月中旬到上海之后，其回国时间最迟应该在陈被释放那天以前。另外，日共领袖德田球一也回忆说，他为了出席“远东大会”而离开日本是“10 月上旬”，是与张太雷一同乘“日本邮船春日丸”到上海的。[229] 如果德田名无误，张太雷离开日本的时间可以通过查对春日丸的航海记录来确定。据日本报纸刊登的这一时期的航期表，该船 9 月 25 日、10 月 12 日、10 月 30 日自横浜起航。考虑到上海方面这一时期发生

的情况，张太雷最有可能乘坐的是10月12日由横浜起航、经停神户后10月14日再起锚的班轮。而这个日期，与施存统的“证词”正好一致。虽然不能断定德田球一和张太雷乘坐的肯定是“春日丸”，从当时上海的情况考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施存统“证词”中所说的张太雷来去日本的时间没有错。

在日本代表出席“远东大会”之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了。从这点看，施存统介绍张太雷和堺、近藤会见，其意义不可低估。他的存在体现了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或联结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工作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在张太雷来日本后不到三个月，他的留学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他因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的嫌疑而遭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

导致施存统被捕的，是发生在11月下旬的所谓“格雷事件”，以及近藤荣藏受此牵连被拘捕（11月25日）后酿成的“晓民共产党事件”（嫌疑是散发传单宣传反对军队）。此前的研究，已经使“晓民共产党事件”相当清楚了[230]，此处不再详述。而“格雷事件”，与施存统也曾参与的共产国际和中国、日本的联络活动有关，又几乎没有搞清楚[231]，所以需要稍费笔墨。所谓“格雷事件”，是指一个叫鲍里斯·格雷（BorisP. Gray〔Grey〕）的人，因携带据信是提供给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作活动经费用的巨资（约7000日元）入境，于11月24日在横滨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事件。拘捕他的日本警方资料记载，1889年生于莫斯科的格雷，英国国籍，1920年前后起在俄国远东活动，1921年10月以达尔塔通讯社通信员身份来上海，与近藤荣藏派来上海传递“日本共产党”文件并接受活动经费的青年重田要一一同于11月下旬来日本（11月20日到长崎，22日住进横滨的宾馆）。他来日本的目的是接触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并提供活动经费，准备与近藤会见，亲手交给他5000日元宣传经费，他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还写有山川均、荒畑寒村等的名字。[232]

受“格雷事件”牵连的近藤荣藏的回忆，与警方的这份资料基本一致。他说，经施存统介绍与张太雷会见后，为了领取早先约定的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和山川均一同写好了报告和纲领，交给尚未被警察注意到的早稻田大学学生重田要一送到上海。[233] 而来人就是格雷。近藤大惑不解的是，重田确实完成了任务，转交时，警方也没有动他一根指头，而那些文件何以落到了警方手中？其实，重田在“格雷事件”前后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审讯[234]，结果，文件落入警察手中[235]，而近藤也因此被拘捕。

这个格雷，确实是苏俄、共产国际派来的密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筹设的1920年11月到12月之间，格雷作为书记处预定成员之一，名字频频出现在俄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中，其后，他担任堪察加革命委员会主席直到第二年秋天，这些情况都有据可查。[236] 他是1921年9月从堪察加出发的，化装成商人来到上海是10月。[237] 派格雷去日本一事，当时在上海的马林也曾参与其事，这一点，马林自己的话可以证实。马林说：“[至于日本的治安防范之严密] 格雷〔Gray〕同志的那段经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格雷同志拿着一张英国护照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11月22日就在东京被捕。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同志也在警察局招了供。”[238]

据报道，“格雷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开始考虑彻底肃清可疑的外国人，同时，在搜查介于格雷和日本人之间从事联系的外国人的过程中，查出了施存统。[239] 不知道是否从格雷身上搜出了能够证明施存统就是在日联系人的物品，不过，随着对格雷、重田、近藤的审讯，曾经在张太雷提供经费给近藤时居间斡旋的施存统浮出水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果然，在近藤被捕后不到一个月，12月20日，施存统也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日比谷警察署。[240]

施存统被关押后，立即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了严厉审讯。他

生来身体弱，严酷的审讯，加上在寒冷的拘留所一个星期的关押，使他身体更加虚弱。[241] 读本书附录《施存统口供》即可发现，他这时所作的口供，内容也非常详细。[242] 在警视总监向内务大臣申请判处他驱逐出境的那一天（12 月 23 日），他又被提到东京地方法院，在“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基本上按照口供内容作了证。“口供”和“证词”的相当部分是关于张太雷来日事，这在上文已有交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内容。

在施存统就张太雷来日本一事回答讯问后，法官问：“上海生活”的“古曼，你认识吗?”近藤在预审法庭上说，同年 11 月曾向“上海生活的古曼”书面报告过晓民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243]，法官此问大概就是为了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所谓“上海生活的古曼”，是指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谈到的魏金斯基的合作者古尔曼（Goorman）。[244] 法官还问到认识不认识黄介民［黄介民］，这大概也是在追究近藤讲过的同年 5 月到上海时与黄介民等“上海共产党”有过接触一事。[245] 对于这些讯问，施存统一概回答说“不认识”。不过，施存统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中曾经谈到“黄介民派所组织”的共产党即大同党系统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就此断定他真的不认识黄介民。关于古尔曼也一样。他接触过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宫崎龙介等）和与陈独秀等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他都能对答如流，而有意识地隐瞒与古尔曼和黄介民的关系，大概是因为感觉到他的回答会直接影响对近藤荣藏的审理。

经过被捕和其后的审讯，施存统大概已经感到自己将不可避免某种惩处，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任务和立场。他在“口供”中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务是“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在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对“从十九岁就一直研究［社会主义］”的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明确地说：“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这也是他对促使自己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一年半的留学生活所作的总结。

12月27日，内务大臣下令把在押中的施存统驱逐出境。[246] 第二天，各报都着重报道了逮捕和驱逐施存统的消息，并配发了他的照片。日本新闻界对继“格雷事件”之后揭发出的“密使”，以“经手赤化宣传经费之可疑支那人被驱逐出境……潜伏于高田村的施存统”（《国民新闻》）、“支那人施存统被命令离境……赤化运动暴露”（《东京日日新闻》）为题大做文章。在中国，《晨报》（北京）和《申报》（上海）也做了简短报道。[247] 但是，施存统经常投稿的《民国日报》却对逮捕和驱逐出境只字未提，大概是顾忌提起“经手赤化宣传经费”的施存统与该报的关系。

施存统最可倚靠的宫崎龙介，当时身处“白莲事件”（著名女诗人柳原白莲突然离开身为煤矿资本家的丈夫，与宫崎私奔结婚的事件）的漩涡之中，自己也成为新闻界追逐的对象，因而根本不可能为施存统奔走。代他受警方讯问的宫崎滔天这样说：

> 他来我国后，我听说他访问了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大杉荣等之后，曾前后三次恳切告诫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者皆卖文卖名之徒，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继续交际，于前程不利。当时他本人明言今后绝对不再与堺等交际，我也相信了他的话。总之，警察既处以驱逐出境，谅已掌握大量证据。[248]

但是，宫崎滔天接着又说：“使邻国支那一青年不得再度入境的做法，未免太过狭隘，我若主事，决不如此处置。”这话一方面表现了宫崎滔天作为中国革命支持者的风骨；同时，在当时到处高喊警惕“赤化运动”的形势下，他至多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与施存统有交谊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表面上反应冷淡，比如田汉说：“假使真如报上所说那样宣传社会主义，串通日本社会

主义者危害日本治安，也只有被处以驱逐出境。”[249] 就这样，施存统匆匆忙忙做了回国的准备之后，12 月 28 日，在三崎馆住处与同住的约 20 名中国学友一起“共进茶点约十分钟”[250]，傍晚，在两三个朋友的陪同下赶赴横滨，又在神奈川县警察局刑警的护送下，登上“亚利桑那丸”，走进了三等统舱。据报纸报道，身着竖领制服的施存统不时从窗口眺望陆地，面露凄凉。[251] 第二天即 29 日上午八点半，载着施存统和两名警视厅警官的“亚利桑那丸”起航了。[252]

在到上海的船上，施存统显得气宇轩昂，驱逐出境似乎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护送他的警视厅的警官大胆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 这次，日本政府驱逐我出境，把我赶出国外。鉴于我在日本的行动，现在日本政府的措施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这都是现在日本的各种制度使然，我没有任何反感。然而，我回国后，准备就此次离境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面发表感想。……现今俄国已经全面赤化，人民生活得自由幸福。然日本各报仍在刊登与此相反的文章，说到底都是为资本家进行宣传。中国眼下文化运动正盛，将来再兴起工人运动、军队运动，相信必定能够赤化。日本将来也有可能赤化。所以，我将以各种方法对日本联系。……总之，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还要更进一步地联系日本人。[253]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一个获得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青年无限期望俄国革命、憧憬世界革命的心情；他表示要继续与日本同志联合，盼望日本兴起革命，则婉转地表达了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共鸣，和对使自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感谢。对于确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施存统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他正在前往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和自己一样信仰共

产主义的青年，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

从浙江农村到杭州，再到北京、上海、东京，然后再回到上海，施存统所走过的这些道路，也是五四青年们为了不断地追求新思想和变革中国的方案，从尊儒到反儒、又从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团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在他把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毕生的指针回到上海时，已经没有了青年时代的彷徨。载着施存统的“亚利桑那丸”经过神户、门司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新年过后的1922年1月7日。[254] 共产党给回国的施存统分配的，是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负责人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他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得到施存统这样满怀理想而又富于朝气的青年的支持，召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革命”舞台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注释：

[1]《法捕房搜外国语学社》，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30日。不过，外国语学社后来仍在《民国日报》登广告招生（比如同年7月15日）。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号，1922年5月。

[3]《舒米亚茨基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报告（1921年3月27日）》，М. А. Персиц, 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Африки*, 1971, No. 4, стр. 51（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载《亚非人民》；汉译：《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4] Б. Шумяцк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1, 1921（《远东人民》）。关于该文的写作时间，请参照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的考证。

[5] 说尼科尔斯基是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的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源于包惠僧1950年代所著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也曾有

资料说他是共产国际代表（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Dov Bing, The Founding of a Comintern Bureau in the Far East, *Issues & Studies*, Vol. 8, No. 7, 1972）。

[6]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Забытый участник I съезда КПК,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9, No. 2（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参加者》，载《远东问题》；汉译：《四川党史》1991年第2期）。在中国，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曾援引这篇论文。另外，任止戈（任武雄）：《读史札记》（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是中国较早考证尼科尔斯基不是赤色工会国际、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论文，但是限于资料制约，没有能够明确尼科尔斯基的经历等。

[7] 有关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请参阅本书第二章注156、157。

[8] 也请参照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 Leiden, 1991, p. 205.

[9]《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 *op. cit.*, p. 30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以下简称《马林报告》）。报告中马林称自己与尼科尔斯基"同时到达"。马林是1921年6月3日到上海的，所以尼科尔斯基到上海也应该是这前后。另外，有关马林到上海的时间，请参阅注17。

[10]《马林报告》。卡尔图诺娃公布的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3，第37、39页）也是"所有的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另外，卡尔图诺娃在此处还注明，这不仅指中共的会议，也包括出席当时旅沪朝鲜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会议。

[11]《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3页；《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松尾尊兒编：《续·现代史资料2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6年版，第61—62页。

[12] Saich, op. *cit.*, 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塞奇（T. Saich）所编资料集系对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整理而成，实属宝贵；但是，也有意见认为翻译和引用时应该慎重（Book Reviewby F. Christianse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38, Part2, 1993）。李玉贞编资料集，除了包括上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外，还包括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外交史料中有关马林的文件发掘而得到的史料。

[13] 在三方协商中，曾讨论把远东处设在上海。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经过一番周折之后，1921年1月，远东处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14]《马林报告》。马林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后，曾短期回荷兰（Saich, *op. cit.*, p. 31）。

[15]《马林报告》。

[16] Notes on a Conversation with H. Sneevliet, in Harold R. Isaacs (ed.), Documents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45, 1971, p.102; 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2—23页。

[17] 关于马林到中国的旅程，Saich, op. cit., pp. 31—33，以及山内昭人:《片山潜の盟友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Ⅶ）[片山潜的盟友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Ⅶ）]》(《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社会科学）》第75号，1993年）叙之甚详。

[18]《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页。

[19]《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荷属印度总督的信（1921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4页；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China Quarterly*, No. 48, 1971.

[20] Saich, *op. cit.*, p. 33;《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2—15页。

[21] 关于福罗姆别尔戈，请参照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22]《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的信（1921年6月30日）》、《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有关人员的信（1921年7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13页。

[23]《致东京〈东方经济学家〉编辑三浦先生的信（1920年11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9页。

[24] 关于《东洋经济新报》和三浦铁太郎，请参照松尾尊兒《解说·三浦铁太郎小论》(松尾编:《大日本主义か小日本主义か——三浦铁太郎论说集［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1995年版)。

[25] 山内昭人:《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研究——片山潜·ボリシェヴィキ·アメリカレフトウィング［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片山潜·布尔什维克·美国左翼］》(ミネルヴァ书房［MINERVA书房］1996年版）对鲁特赫尔斯及其与马林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详细。据该书第274—275页讲，鲁特赫尔斯1918年访日时，片山潜（时在美国）把三浦介绍给他（二人似乎还在日本见过面)。

[26]《马林报告》。

[27]《马林报告》。

[28]《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1年7月9日）》(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所引。补注——此函最近才公布了:《马林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

7月9日，上海)》(收于 К. Шевелев, 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No. 4 [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载《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29] Isaacs, *op. cit.*, p.102；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

[30]《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31] 邓文光：《中共创始人"南陈北李"何故未出席"建党大会"》，载《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青驰出版社1976年版；原载：《南北极》月刊，1974年第53期。王其昌：《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32] 陈绍康：《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回沪时间考》，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1921年)》，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496号。

[33] 参见拙搞《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A—4、A—5。

[34]《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5] 公博（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载《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年7月。这一期《新青年》注明发行日期为7月1日，但是陈公博的这篇文章讲的是7月下旬在上海的经历，实际刊行日期应该是8月以后。

[36]《南京大会记略》、《会员消息》，皆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9月第3卷第1期。

[37] 关于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刘仁静以外的代表赴上海的行踪，请参照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38页。

[38] 俄文题目为：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в Китае.

[39] 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译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在该论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汉译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40] 从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80年以后公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后，汉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收进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559页，但是，俄语原文尚未全面公开。

[41]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 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另外，探讨这些文件的性质、内容的还有以下论文或专著：K. B. Шевелев, Кдатировке I сь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3, No. 1（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载《亚非人民》）；M. A. Персиц, Охарактере записки《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в Китае》, *Народы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3, No. 1（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载《亚非人民》）；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陈小枚、齐得平：《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其中蜂屋论文的考证、校订尤其详尽。

[4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151页；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页。

[43] 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26号，1991年。

[44] C. M. Wilbur (e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 en Kung-po*, New York, 1966, p. 79（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45] 舍维廖夫在原苏联时期的研究（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中最早指出这个日期可能是笔误。后来，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再次论证是笔误，正确日期应该是“7月20日”；可是，中国学术界其后也没有考证这个笔误问题的迹象，现在仍然认为大会预定召开日期是“6月20日”。另外，舍维廖夫论文还卓有见地地指出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认为该文件开始是用英语写成，然后由不怎么擅长俄语的人译成俄语的。

[46] 时间稍后的例子还有《罗易（N. N. Roy）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年9月17日）》（《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称，罗易在中国收到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是“七月底（原文：конце июля）”，但是，实际上罗易已经在7月上旬离开武汉，此处“七月底”应为“六月底（конце июня）”之误。

[47] 前引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包惠僧还说，每人还领到了回程路费五十元。

[48] 丸山昏迷（丸山幸一郎）：《北京》，大阪屋书店1921年版，第516页。

[49]《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

[50] 在中共有关人1949年以前的文章中，通常认为中共在1920年成立，而与翌年的第一次大会明显区分开来。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1927年1月，收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以及邓中夏1930年执笔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

[51]"姚金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国际专题讨论会（北京，1999年）上所作的综合论述"，载《陈独秀研究动态》2000年第19辑。

[52] 例如，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报告文学，但是许多地方涉及中国的研究状况，以及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交流，具有研究史概述的性质。

[53] 专门研究陈公博硕士论文的英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C. M. Wilbur, e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Kung-po*, New York, 1966）在中国大陆为人所知是在1972年前后，其详细经过请参照叶永烈《红色的起点》，第27—28页。

[5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及S. N. Naumov,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 M. Wilbur and J. L.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1989, p.452（原文是Калачев [С. Н. Наумов],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 *Кантон*, 1927, No. 1；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广州》）。

[55]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8—279页。

[56] 周佛海的回忆录后来被朱枕薪引用时去掉了姓氏不明的两位济南代表，只留下11个人（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载《新国家杂志》1927年8月第1卷第8号。该文曾被转载于《醒狮》第144—147期[同年8至9月]），其后又被反复引用，成为"十一人出席"说的根据。比如，大塚令三：《中国共产党の成立期に就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载《满铁支那月志》1930年第7年第1号；大塚令三：《支那共产党史》上卷，生活社1941年版，第18、23页；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收于《最近支那年鉴（昭和十年版）》，东亚同文会1935年版，第1598页。

[57] 收于《"一大"前后》（二）。原文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9月第7卷第4、5期。

[58]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7页。

[59] E.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61, p.157（汉译本：《斯诺文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60] 斯诺著、张宗汉译：《毛泽东自传》，延安文明书局1937年版；史诺著、张洛甫译：《毛泽东自传》，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史诺、萧三等著：《毛泽东生平》，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版。据说斯诺根据采访毛泽东的记录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是在1937年。延安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大概并非《红星照耀中国》的全译本，只译出了毛泽东半生的自传部分。至于《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的传播，请参阅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

[61] 王政明：《萧三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6页详细叙述了萧三当时为写毛泽东传而多次采访毛泽东。另外，后来萧三就自己执笔的毛泽东传撰文（《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载《北方文化》1946年5月第1卷第6期）订正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十二三人”）时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事前未经毛泽东过目，文责全部由自己承担。但是，按常识考虑，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的毛泽东传，毛事前不可能没有阅读。再后来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9年），出席大会人数又被更改为“毛泽东等……共十二人”。

[6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63] 有人认为“十二人”的说法源自李达（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4期）。其根据是李达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为申请重新入党而写，被以《李达自传（节录）》为题收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记载中共“一大”出席人数是十二人。但是，“十二人”在此之前已经中共正式表态，所以，我认为，李达在申请重新入党时，尽管人名有所变更，而在出席人数上仅是照此说出而已。李达对于大会开幕日期也尊重当时的普通说法（“7月1日”），这点可以证明他是努力忠实于当时的正式见解的。不过，后来李达的自传无疑也成了“十二人”出席说的旁证。

[64] 对“十二人”出席说形成定论影响颇大的，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事实上，胡乔木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曾经这样向毛泽东确认过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回答说：“是十二人”（《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1951年6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而在中国国外，在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后，多采“十三人”的说法。详见蜂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

[65]《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

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66] N. Wales,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2, p. 39（汉译：《"一大"前后》(二)，第292—293页)。

[67]《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68]《董老的嘱咐》，载《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5日，及"董必武给《新观察》主编欧阳柏的回答（1956年)"（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所引)。在"十二人"成为定论的时期仍坚持"十三人"说法的还有包惠僧，不过，他的情况有点特殊，即如同意"十二人"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自己被排除在外。

[69]《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70]《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收于：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编刊《中共"一大"资料汇编》，1979年版。所谓李达回忆录，指他1955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收于《"一大"前后》(二))。该文以后经更正，题目也改为《七一回忆》(《七一月刊》1958年第1期)、《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皆收于《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1]《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

[72] 沈德纯、田海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人民日报》1961年6月30日。此外，董必武在1963年也陈述同样的见解，见前引《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

[73]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74] 同前。

[75]《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

[76] 比如，舒怀为纪念董必武逝世两周年而作《深切地怀念敬爱的董老》(《人民日报》1977年4月2日）依旧引用了1961年的谈话。

[77]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国内，一般学者得以看到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的汉译和董必武的更正谈话，是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1980年第1辑和《"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之后。实际上，中共一大的三个

文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已分别在美国和苏联被发现、公开，所以只有中国将其作为“国家机密”。

[78]《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请一并参照注63。李达其后也一直坚持不包括包惠僧的“十二人”说。

[79]《李达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1957年3月18日）》，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所引。同样的解释也见于《李达致中央档案馆的信（1959年9月）》，《李达文集》第4卷，第720页。

[80]《李达对叶蠖生的谈话（时间不详）》，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所引。

[81]《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82]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

[83]《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84]《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85] 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第19位），林彪倒台后的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列第9位）。

[86] 李达、包惠僧、刘仁静皆被追究脱党后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别被扣上“资产阶级学者”、“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的帽子，受到了迫害。

[87] 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1988年第31号。

[88]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邵维正也是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这一中国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划时代著作中有关中共“一大”部分的执笔者，后来又出版了该部分的增补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不过，也有一些党史读物，为避免繁琐，把包惠僧也包括在内，称十三位参加者。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90] 持这种见解的有，邓文光：《研究现代史的甘苦》，载《人物与思想》第18期，（1968年后被收进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东风出版社1974年版；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藤田正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の参加代表、会期につい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载《近代中国》第8卷，岩南堂书店1980年版；郑学稼：《中

共兴亡史》第1卷下，帕米尔书店1984年版，第646—648页等。

[9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

[92] 据“蜂屋论文”载，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广州，1950年版）、《人民手册一九五一》（大公报社）等都写漏了何叔衡的名字。

[9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45页；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第279页。

[94]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照注57）和刘仁静的回忆（《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中，除陈公博外，还同时举出李汉俊的名字，说他们没有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据推测，这是陈谭秋写回忆录时，把警察搜查后的情景（李汉俊和陈公博都留在会场）与南湖会议的情景弄颠倒了；而刘仁静的回忆则被认为是模仿了陈潭秋的叙述。

[95] “蜂屋论文”谈到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所写的参加者是十二人一点时说，“陈公博……在写‘十二人’时，应该清楚这一数字不包括自己在内”。但是，也不能排除他自己记错数字的可能性。

[96] 关于“七一”被定为建党纪念日的由来，请参照蔡林《党的纪念日“七一”的由来》，载《党史资料丛书》1979年第1辑；邵维正：《“七一”的由来》，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葵闻、李志春：《对〈“七一”的由来〉一文提点不同看法》，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

[97] 这些论文被收于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以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

[98] 比如，邓文光：《中共建党日期之研究》（《人物与思想》1969年第23期）是最早认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是与现今定论相同的“7月23日”，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不可靠的资料倒推出来的，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99]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100] 关于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译文，因其现在通行的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559页）不一定准确，而“蜂屋论文”中有经过考证和校订的日语译文，本书遇必要时，斟酌引用蜂屋译文。

[101] 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一段可以有两种解释，即开会是“7月23日”当天，或者是次日。但是，斯穆尔基斯的信（请参照注104）则明确地说，“从7月23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行文看，照一般解释，应该肯定是23日开会。

[102]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103］《申报》1921年8月1、2、3日，载《民国日报》8月3日。

［104］卡尔图诺娃在莫斯科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将其作为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 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发表出来。汉译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5］各种见解有代表性者如下：

【7月31日】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

【8月1日】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蜂屋论文"；沈海波：《中共"一大"八月一日闭幕考》，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7期。

【8月2日】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周子信：《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八月二日》，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2期。

【8月5日】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曹仲彬：《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曹仲彬：《党的一大八月五日嘉兴闭幕考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载《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另外，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中记为7月31日。但是，该书的1987年版和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以及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都改为"8月1日或2日"。

［106］认为是在次日召开的有：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认为是在第三天召开的有：《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

［107］最早指出存在嘉兴南湖灾害报道的，是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

［108］警方的这些文件，收于 Saich，*op. cit.*，《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09］《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B—1。

［110］《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载《民国日报》1921年7月31日。发现此条例的存在，是得到了"蜂屋论文"的启发。

［111］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112] 叶永烈：《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7—569 页。

[113]《中共建党传奇》，载《党史信息报》1989 年 3 月第 78 期。该文系依据所谓原租界警察薛耕莘的回忆而成，大致内容如下：法租界当局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经通过李书城（李汉俊胞兄）得到召开大会的计划，决定不予干涉。但是，北京政府放出的携带手榴弹的刺客被租界当局逮捕，在得知其目标是激进党的会议后，就派人去要求会议延期。

[114] 大会通过的两份文件的中文原文尚未发现，现可以确认的是由俄文本（全文未公开，《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第 23—24 页载有俄文版照片）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9 页），和由汉语译成英语的“The Firs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The First Decision as to the Objec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C. M. Wilbure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Kung-po*, New York, 1966, pp. 102—10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题为党的“纲领（Program）”，但就其内容看，实际是党章。这个时期，外国共产党的“章程”时常译为“党纲（党的纲领）”（例如，《共产党》月刊第 2 期上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的原文［请参阅本书第一章注 149］是美国统一共产党的 Constitution［汉语应译为“章程”］），概因此“党纲”被用于指章程。为避免混乱，本书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称“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称“决议”。

[115] 现行许多版本译为“联合”。“加入”和“联合”含义大不相同，但是，创建时期的中共党人在翻译别国共产党文件时，有时把向共产国际的“加入”和“联合”作同义词使用（参见震寰译《英国共产党成立》，载《共产党》第 1 期，以及《英国共产党大会》，载《共产党》第 6 期）。因此，此处选择“加入”。

[116] Steve A. Smith, A Road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Richmond, 2000, p.28.

[117]《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118] 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该处使用“офицер（将校、士官）”或者“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企业家、厂长）”。大概是在翻译时，把汉语原文“胥吏”一词误译为这些俄语。

[119]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刘仁静：《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 年第 16 期。

[120] 刘仁静：《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顺言之，回忆录中所谓“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载于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第 136 页。

[121]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122]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

[12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9页。

[124]《共产党》刊登的《美国共产党党纲》（译者：P生＝沈雁冰）的原文，准确地讲，是“美国统一共产党（The 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1920年5月制定的“章程”。详见本书第一章注149。

[125] 实际上原文是“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纲领”。见本书第一章注149。

[126]《共产党》第1期译载了原载英国共产党机关杂志《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第1期（1920年8月5日）上的文章（Arthur McManus，The Task awaiting the Communist Party），题为《共产党未来的责任》；而同一期《共产党人》上面还载有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大会报告“The Communist Conference”。

[127] 村田阳一：《资料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的宣言·规约（1921年4月）［资料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的宣言·章程］》，劳动运动史研究会编：《日本の统一战线运动［日本的统一战线运动］》，劳动旬刊社，1976年。

[128] 岩村登志夫：《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党の成立［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三一书房1977年版，第135—136页）指出，《日本共产党章程》酷似英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制定的章程。

[129] 还有的回忆录认为，马林的意向未能在中共“一大”得到反映，是因为他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压人，态度专横，因而引起了中国党员的反感（例如，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133—143页）。

[130] 施存统：《痛苦中的自白》，载《中央副刊》1927年8月30日。

[131] 施存统作为中共党员的活动及其脱党问题，请参照拙搞《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京都，第68册，1996年。研究他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所从事的活动的论文有，平野正：《施复亮と中间路线论［施复亮与中间路线论］》，平野：《中国の知识人と民主主义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思想］》，研文出版社1987年版；齐卫平：《论施复亮与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水羽信男：《施复亮の“中间派”论とその批判をめぐって［施复亮的“中间派”论与对其的批判］》，今永清二编：《アジアの地域と社会［亚洲的地区和社会］》，劲草书房1994年版。

[132]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有关施存统的文件，收录于前引拙搞《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

[133]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载《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20—24日。

[134] 施存统传略有，王水湘等：《施存统》，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齐卫平：《施复亮传》，见《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关于施存统的早期思想以及参与创建共产党

的论文有，陶水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陈绍康：《论早期团的领导人俞秀松和施存统》，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梁妙珍：《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同前）；Wen—Hsin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1996等。本书在论述施存统留日以前的事迹时，主要参照这些传记。

[135]《省教育厅给省长的调查报告》；转引自《浙江学潮底动机》，载《星期评论》1920年2月第39号。

[136] 关于《非孝》事件的概要，请参阅齐卫平《施存统著〈非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载《民国春秋》1990年第1期。

[137] 请参阅小野信尔《从恽代英看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李良明等编：《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砂山幸雄：《"五四"の青年像——恽代英とアナ キズム［"五四"青年形象——恽代英与无政府主义］》，《アジア研究［亚洲研究］》35卷2号，1989年；狭间直树：《五四运动的精神背景——对于恽代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38] 坂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当时浙江一师学生陈昌标的日记详细论述了"浙江一师风潮"的始末。此外，有关"浙江一师风潮"的资料集有，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9]《国务院致各省密电稿（1919年12月2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3页。

[140]《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1920年6月27日条。

[141] 陈独秀：《浙江新潮一少年》，载《新青年》1920年1月7卷2号。

[142]《俞秀松致家人信（1920年3月4日）》，《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143] 有关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观，以及围绕易群先发生的恋爱纠纷，清水贤一郎：《革命と恋爱のユ トピア——胡适の"イプセン主义"と工读互助团［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中国研究月报》1995年第573号）叙之甚详。

[144]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载《星期评论》1920年5月第48号。

[145]《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年3月）》，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

235 页。

[146]《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 年 4 月 4 日）》，同前，第 236—237 页。

[147] 玄庐：《学生与文化运动》，载《星期评论》1920 年 2 月第 39 号。据说，《浙江新潮》第 3 号在杭州不能印刷，后在沈玄庐和戴季陶的帮助下，由星期评论社印刷。倪维熊：《〈浙江新潮〉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148] 沈仲九的生平不明之处颇多，坂本洋史：《山鹿泰治と中国——〈たそがれ日记〉に见る日中アナキストの交流［山鹿泰治与中国——〈黄昏日记〉中的日中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猫头鹰》1983 年第 2 号）中有所涉及。

[149] 关于当时的星期评论社同人的生活，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150] 前引《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 年 4 月 4 日）》。

[151] 戴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载《星期评论》1920 年 3 月第 42 号。

[152] 前引《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 年 4 月 4 日）》。

[153] 同前，及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 年 6 月 27 日条。

[154] 前引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155] 请参照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

[156] 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7 月 10 日、12 日条记载，沈仲九、夏丏尊等也有到日本留学的想法，俞秀松自己也曾被沈玄庐劝说到日本留学。

[157] 施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载《民国日报》《觉悟》1920 年 8 月 26 日。

[158] 戴天仇：《三民主义》，载《解放》［日文］1920 年 2 月号。

[159] 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载《建设》1920 年 8 月 2 卷 6 号。

[160] 宫崎龙介：《新装の民国から［新气象民国通信］》，载《解放》［日文］1919 年 12 月号。

[161] 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6 月 19 日条。

[162]《宫崎龙介致伊藤烨子信（1920 年 6 月 26 日）》，宫崎智雄收藏。

[163]《新人会记事》，载《先驱》［日文］1920 年 4 月第 3 号。

[164]《宫崎龙介致伊藤烨子信（1920 年 5 月 9 日、5 月 13 日、5 月 19 日、5 月 27 日）》，宫崎智雄收藏。关于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的活动，请参阅第一章注 40。

[165] Henry D. Smith,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Cambridge, Mass., 1972, pp. 59—60.

[166]《外秘乙第 19 号无政府主义宣传杂志〈自由〉之通信者件（1921 年 1 月 10 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1。

[167] 前引施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

[168] 施存统：《对于抄近路求学的朋友底忠告》，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27日。

[169] 请参阅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

[170] 前引施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对于抄近路求学的朋友底忠告》。

[171]《外秘乙第1621号我国人对中国人施存统被处驱逐出境之感想（1921年12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C—5。

[172] 前引施存统《对于抄近路求学的朋友底忠告》。

[173] 施存统：《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载《中国青年》1925年9月第91、92期。

[174] 前引施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

[175] 施存统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三年前从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跑到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得了块把钱，即捐于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去印小册子”。施存统：《本团的问题》，载《先驱》1923年6月第21号。

[176]《外秘乙第19号无政府主义宣传杂志〈自由〉之通信者件（1921年1月10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1。

[177]《外秘乙第52号宣传“无政府主义”文章件（1921年1月15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2。另外，该报告说，“该人［施存统］似在去年6月前后，随宫崎滔天同行来我国”。但是，宫崎滔天和宫崎龙介在这个时期都没有去过中国。

[178] 施存统：《改革底要件》，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0日。

[179]《外秘乙第523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1921年4月23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3。

[180] 请参照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

[181] 谢晋青（生卒年不详，江苏省徐州人），“东方书报社”成员，在1920年前后的《民国日报》《觉悟》上常有该社寄自东京的《日本通讯》。谢在留日时期与施存统有交谊，因而被警视厅圈为“需要监视之中国人”，1921年8月回国。《外秘乙第643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谢晋青之行动（1921年5月14日）》（《B》）；《外秘乙第907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之行动（1921年6月18日）》（《B》）；警保局：《在留外国人概况［在日外国人概况］大正10年12月》（《A》），第50页。

[182] 权熙国时为留日学生活动家。关于其生平及其与“可思母俱乐部”的关系，请参照松尾尊兊《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2000年第26号。

[183] 原著当然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堺的翻译于1918年3、4月刊登在《新社会》4卷6、7号（7号遭禁售）上，1921年5月，大镫阁将

其集成一册出版了《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施存统在“口供”中称，访问堺是为了购买没能公开出版的卖文社版《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

[184]《劳动运动（第二次）》1921年6月第13号。

[185]《劳动运动（第二次）》1921年4月第8号。

[186]《外秘乙第560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件（1921年4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4。中文原件没有找到，此件根据日本警方的日文译稿译成中文。

[187]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前引《“一大”前后》（二））。

[188] 彭湃、林孔昭与堺利彦等成立的“可思母俱乐部”有关系一事见于警方报告：《外秘乙第780号“可思母”俱乐部成员集会预报（1920年12月23日）》（《D》）、《外秘乙第447号募集中国人“可思母”俱乐部成员件（1922年11月28日）》（《D》）。林孔昭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留学生（《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华民国留日名人调查］》，兴亚院1940年版，第178页）。

[189]《外秘乙第721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1921年5月25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6。

[190]《外秘乙第907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之行动（1921年6月18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7。

[191] 前引《外秘乙第1621号我国人对中国人施存统被处驱逐出境之感想（1921年12月29日）》。另外，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称，陈独秀和戴季陶还支付给他生活费。

[192] 前引《外秘乙第907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之行动（1921年6月18日）》。

[193] 请参照前引拙搞《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附录《施存统著作系年目录初稿（1919—1933年）》。

[194] 这些文章，被收于施存统回国后编译的《社会经济丛刊》（泰东图书局1922年1月版）重新刊行。详情请参照本书附录一《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河上肇、山川均项。另外，与施存统同为“日本小组”成员的周佛海也曾致力于翻译此二人的文章。

[195]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载《共产党》1921年6月第5号。

[196] 山川均：《劳动运动に对する知识阶级の地位［知识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解放》［日文］1920年8月号。关于这个时期河上肇对“人的有意识行动”的论述，山之内靖：《解题》（《河上肇全集》第11卷，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551—553页）叙之甚详。

[197] 光亮（施存统）：《河上底左倾》，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9月25

日；CT:《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同前 1921 年 9 月 27 日。这两篇文章表明施存统时刻注意阅读山川和河上的著作。

[198] 前引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199] 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 年 8 月 9 卷 4 号。另外，该期《新青年》注明发行日期为 8 月 1 日，但是这篇文章的日期却是 8 月 14 日，故该期《新青年》实际刊行日期应是 9 月以后。

[200]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9 月 8 日。

[201] 前引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202] 比如山川均：《ソヴィエット政治の特质とその批判——プロ レタリアン·ディクテ トルシップとデモクラシ [苏维埃政治的特质及其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研究》1920 年 6 月号。另外，《哥达纲领批判》的日译和介绍，是堺利彦和河上肇在 1921 年下半年完成的。堺译：《ゴ|タ纲领の批评[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研究》1921 年 10 月号；河上：《1875 年に书いたマルクスの手纸 [马克思写于 1875 年的信]》，《社会问题研究》1921 年 11 月第 27 册。

[203] 熊得山译：《哥达纲领批评》，《今日》1922 年 5 月 1 卷 4 号。

[204] 山川均著、李达译：《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载《新青年》1921 年 5 月 9 卷 1 号。有关该文的刊登经过，请参照第一章注 123。

[205] 前引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206] 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7 月 21 日，以及前引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

[207] 光亮：《一封答复“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7 月 15 日。

[208] 前引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以及前引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209] 河上肇的讲演《マルクスの所谓共产主义の过渡期と完成期（1921 年 5 月 29 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和完成期]》，（前引山之内靖：《解题》，《河上肇全集》第 11 卷，第 557—559 页）。这个讲演后来整理成《マルクス主义に谓ふ所の过渡期について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载《经济论丛》1921 年 12 月 13 卷 6 号。施存统也翻译了这篇文章。光亮译：《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12 月 18 日、19 日。

[210] 前引光亮：《一封答复“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

[211] 光亮：《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 年 7 月 31 日。

[212]《施存统致太朴信》《外秘乙第 930 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

(1921年6月22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A—8。该信曾要求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但似乎被日本警方扣留，未能见诸报端。

[213] 前引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214] 张景：《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第90辑。

[215] CT：《介绍〈社会主义研究〉》，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9月27日。

[216] 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口供称，这次拜访的介绍人是朋友唐伯焜。唐伯焜曾翻译堺的《妇人问题》(无产者小册子丛书，1921年10月版)，并向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投稿，但其生平未详。

[217]《施存统の追放顛末［驱逐施存统始末］》，载《外事警察报》1922年2月第10号。

[218] 张太雷参与了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或者在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说，源自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Б. Шумяцкий，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но 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ов. Чжан-Та-Лая］，*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No. 4—5，1928）《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载《革命的东方》；汉译见：《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如第三章第三节探讨过的那样，舒米亚茨基的这篇回忆录存在疑点。例如，张太雷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舒米亚茨基说他参加了。所以，张太雷到底参与了多少筹备工作，也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

[219]《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 cit.*，p. 315；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7—68页)。

[220] 前引拙摘《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附录二《施存统证词》。

[221] 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

[222]《口供》编者在“上海俄国过激派成员S”后，加按语说“似Semeshko”，这一解释不对。

[223]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7—161页。

[224] 同前，第135页。

[225] 分别见于《特别需要监视人物最近之状况大正11年1月调查》、《堺利彦等预审终结意见书》，皆收于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2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10、494页。

[226] 分别见于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8页，和片山政治编：《日本共产党史（战前）》，公安调查厅1962年5月版，现代史研究会1962年12月复刻版，第27页。

[227] 前引陈绍康《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回沪时间考》；前引村田雄二郎：《陈

独秀在广州（1920—1921年）》；以及《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日、20日、27日。

[228]《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页。

[229] 德田球一：《わが思い出［我的回忆］》，《德田球一全集》第5卷，五月书房1986年版，第138页。

[230] 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国际与日本］》，法律文化社1982年版，第88—96页；犬丸义一：《第一次共产党史の研究增补日本共产党の创立［第一次共产党史的研究增补日本共产党的创建］》，青木书店1993年版，第117—121页。

[231] 就著者所见，只有前引《共产国际与日本》（第94、96页）涉及此问题。

[232]《外秘收第4628号呈报驱逐宣传共产主义运动之英国人件（1921年11月30日）》（《E》）、《关于驱逐英国人件（1921年12月1日）》（《E》）。

[233] 近藤荣藏：《コムミンテルンの密使［共产国际密使］》，文化评论社1949年版，第165—171页；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近藤荣藏自传》，比睿书房1970年版，第239—248页。

[234] 前引《外秘收第4628号呈报驱逐宣传共产主义运动之英国人件（1921年11月30日）》（《E》）；《特别需要监视人物最近之状况大正11年1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2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10页。

[235] 前引《特别需要监视人物最近之状况大正11年1月调查》中所载“秘密结社日本共产党一派之活动计划及预算”（第120—126页）概指近藤、山川所写文件。

[236]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г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6, стр. 167—168, 176, 234—235, 257—258, 271—272, 274, 308（《苏俄的远东政策》）。格雷还常被称作“伊万·帕布罗维奇·克拉尔克（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Кларк）”。

[237]《克拉尔克书信（1921年10月15日，上海）》（前引《苏俄的远东政策》，стр. 308）；前引《外秘收第4628号呈报驱逐宣传共产主义运动之英国人件（1921年11月30日）》（《E》）；前引《关于驱逐英国人件（1921年12月1日）》（《E》）。

[238]《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 *op. cit.*, p. 315；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8页）。

[239]《东京朝日新闻》1921年12月7日，载《读卖新闻》1921年12月28日。

[240]《读卖新闻》1921年12月28日。

[241]《钟复光同志谈施存统（1980年2月9日）》（未刊稿）。

[242] 施存统在口供和证词中都说是在1920年7月10日来到日本的。但是，如前所述，他在6月26日就已经到宫崎家拜访过，实际到达日本应该比这更早。7月10日也许是他搬进三崎馆，或是入东京同文书院的日期。

[243] 前引片山政治编《日本共产党史（战前）》，第23页。

[244] 古尔曼在魏金斯基回国后继续帮助马林等工作（Saich, *op. cit.*, pp. 248, 272, 284；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38、47页；《文件三十九》）。

[245] 前引片山政治编《日本共产党史（战前）》，第18页。

[246]《内务省训令第998号（1921年12月27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C—3。

[247]《晨报》1921年12月31日，《申报》1922年1月4日。另外，《申报》报道说，施存统“于前日到沪”；但是，日本警方资料记载，此时尚在到上海的途中。

[248]《外秘乙第1621号我国人对中国人施存统被处驱逐出境之感想（1921年12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C—5。

[249]《外秘乙第1619号留日中国学生对中国人施存统被处驱逐出境之感想（1921年12月28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C—4。

[250] 同前。

[251]《东京朝日新闻》1921年12月30日。

[252]《外秘收第4792号被驱逐者中国人施存统出发件（1921年12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C—6。

[253] 前引《驱逐施存统始末》，载《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2年2月。施存统说要发表的关于被驱逐出境的感想，最终未见发表。

[254]《大阪商船船只调度记录》，大阪商船三井船舶股份公司藏。

附录一　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

本篇系将1919—1922年间发表在中国国内报刊，且属译自（包括部分翻译）或大量引用日语文献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按原著者分别整理而成。其中，这期间经常被翻译、引用的山川均、山川菊荣、河上肇、高畠素之、堺利彦等分别单独列项，并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论文名、书名于下；其余原著者则另作一项，同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整理本篇时，尽量多地调查了各种报刊；但是，要把五四时期发行的大量杂志全部阅读是不可能的，因此，本篇主要是同时期日本有代表性的上述五位社会主义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翻译的情况，而关于其他学者，则殊难全面反映。

属同时翻译或参考多部日语文献而成的汉语译作，皆以“*”记号标出。报纸、杂志、单行本的卷号、刊行日期（版权页的发行日期，有时与实际刊行日期不符），原则上采如下方式标注。报纸及报纸副刊：发行年、月、日；杂志：卷—号（或刊行年—月）；单行本：刊行年（有时同时标出月份）。

【山川均】

《劳动运动战术のサボターヂュ》（改造 1919—9）

戴季陶：《〈萨波达举〉的研究》（星期评论 34，1920.1）*

《现代文明の经济的基础》（山川《社会主义者の社会观》1919.11 所收）

施存统译：《现代文明底经济的基础》（觉悟 1921.2.23—24）

《フランス劳动总同盟の研究》（改造 1920—4）

邹敬芳译：《劳动总同盟研究》（泰东图书局，1921.5）

《劳农露国の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研究 2—7，1920.9）

陈国榘译：《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国民 2—4，1921.5）

《产儿调节と新マルサス主义》（改造 1920—10）

平沙（陈望道）译：《生育节制和新马尔塞斯主义》（妇女评论 1922.5.17）

《劳农露国の劳动组合》（解放 1920—10）

陈望道译：《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新青年 8—5，1921.1）

《ソヴィエット露国の农业制度》（社会主义研究 2—9，1920.11）

周佛海：《劳农俄国底农业制度》（新青年 8—5，1921.1）

陈国榘译：《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国民 2—4，1921.5）

《カウツキーの劳农政治反对论》（社会主义研究 3—2，1921.3）

施存统译：《考茨基底劳农政治反对论》（觉悟 1921.4.22—29）

施存统编译：《社会经济丛刊》（泰东图书局，1922.1）*

《劳农治下のクロポトキン》（社会主义研究 3—2，1921.3）

鸣田抄译：《由英归俄后的克鲁泡特金》（觉悟 1921.4.7）

《劳动组合运动と社会主义》（日本劳动新闻 45，1921.3）

光亮（施存统）译：《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觉悟 1921.8.19）

《社会主义国家と劳动组合》（改造 1921—4）

周佛海译：《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新青年 9—2，1921.6）

《劳农ロ国无政府主义の人人》（社会主义研究 3—4，1921.5）

施存统译：《劳农俄国底安那其主义者》（觉悟 1921.6.1）

《ソヴィエトの研究》（改造 1921—5）

均《劳农制度研究》（共产党 5，1921.6）

王文俊译：《苏维埃研究》（北京知新书社，1921.8）

《レーニンとトロツキー》（1921.6）

张亮译：《列宁传》（人民出版社，1922.1）

《梅雨时期の日本》（改造 1921—7）

罗豁译：《梅雨节的日本》（觉悟 1921.7.12）

《劳农露西亚の研究》（与山川菊荣合著，1921.9）

李达编译：《劳农俄国研究》（商务印书馆，1922.8）

《劳农革命の建设的方面》（与山川菊荣合译，原著者：列宁，1921.9）

象予译：《劳农俄国底建设事业》（晨报副镌 1922.2.15）

《农村问题》（与堺利彦合著，无产社小册子，1921.10）

Y. D. 译：《农民为什么苦呢?》（觉悟 1921.12.6）

《タンクの水》（1921.11）

晋青（谢晋青）译：《奴隶和铁锁》（觉悟 1921.11.14）

长庚译：《水槽底水》（觉悟 1922.5.1）

《インタナショナルの历史》（社会主义研究 1922—9）

熊得山译：《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今日 2—3，1922.10）

此外，还有以下两篇译文：

李达译：《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9—1，1921.5）

译者无署名：《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见》（新青年 9—5，1921.9）

【山川菊荣】

《一九一八年と世界の妇人》（中外 1919—2）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 6—2，1919.2）

《社会主义の妇人观》（翻译，原著者：P. Rappaport，社会主义研究 1—1，1919.4）

衡译：《社会主义的妇人观》（觉悟 1919.6.20）

鹤鸣（李达）译：《社会主义底妇女观》（妇女评论 1921.10.5）

《五月祭と八时间劳动の话》（解放 1919—6）

李大钊：《“五一”May Day 运动史》（新青年 7—6，1920.5）

《妇人の胜利》（1919.6）

蔼庐译：《欧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解放与改造 1—4，1919.10）

K 译：《山川菊荣女史妇女解放的意见》（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5，1920.2）

Y. D. 译：《日本妇女状况》（妇女杂志 7—1，1921.1）

李汉俊译：《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商务印书馆，1921.7）

黄芬译：《原始社会的男女关系》（学灯 1921.9.21）

婴彦译：《男女争斗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妇女杂志 8—2，1922.2）

《世界思潮の方向》（解放 1919—8）

金刚、李汉俊译：《世界思潮之方向》（觉悟 1919.9.5）

《妇人论に序す》（A. Bebel 著，村上正雄译《社会主义と妇人》，1919.8 序文）

戴季陶译：《现代女子问题的意义》（星期评论 23，1919.11）

《妇人劳动运动の大势》（《劳动年鉴（大正九年版）》1919.5 所收）

吴文庵译：《各国妇女劳动运动的大势》（劳动界 1，1920.8）

《劳农露国の结婚制度》（解放 1920—10）

李达译：《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新青年 8—6，1921.4）

《劳农露西亚に於ける妇女の解放》（社会主义研究 3—1，1921.2）

徐增明译：《劳农俄国底妇人解放》（学灯 1921.5.26）

李达译：《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新青年 9—3，1921.7）

《劳农露国の代表的三妇人》（社会主义研究 3—1，1921.2）

徐逸樵译：《劳农露国代表的三妇人》（学灯 1921.3.2）

《劳农露国婚姻法》（社会主义研究 3—1，1921.2）

恸生译：《俄国婚姻律全文》（觉悟 1921.6.17）

《レニンの妇人解放论》（社会主义研究 3—1，1921.2）

李达译：《列宁底妇人解放论》（新青年 9—2，1921.6）

《绅士阀と妇人解放》（解放 1921—3）

李达译：《绅士阀与妇女解放》（妇女杂志 7—6，1921.6）

《产儿制限论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 3—5，1921.6）

味辛译：《产儿制限与社会主义》（妇女杂志 8—2，1922.6）

《劳动妇人の解放》（堺为子编《无产社小册》1921.9 所收）

Y. D. 译：《劳动妇女底解放》（妇女评论 1921.12.21）

《リープクネヒトとルクセンブルグ》（水曜会小册子，1921.11）

李特（李达）译：《李卜克内西传》（觉悟 1922.1.15）

李特等译编：《李卜克内西纪念》（小册子，1922.1）

《回教国の妇人问题》（女性改造 1922—11）

祁森焕译：《回教国的妇女问题》（晨报副镌 1922.11.14）

此外，还有以下几篇译文：

郑伯奇：《访问日本妇女问题女论客山川菊荣女士之谈话》（少年世界 1—8，1920.8）

黄芬译：《山川菊荣特集（12 篇）》（学灯 1921.10.3—11.19）

【河上肇】

《贫乏物语》（1917.3）

杨山木译：《救贫丛谈》（学艺 2—1～2—8，1920.4—11）

止止（李凤亭）译：《贫乏论》（泰东图书局，1920.7）

杨山木译：《救贫丛谈》（商务印书馆，1920.12）

《マルクスの〈资本论〉》（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9 所收）

渊泉（陈溥贤）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

涯》（晨报副刊 1919.4.1）

《共同生活と寄生生活》（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9 所收）

髯客译：《共同生活和寄生生活》（晨报副刊 1919.7.6）

筑山醉翁（陈光焘）译：《共同生活及寄生生活》（解放与改造 1—1，1919.9）

《妇女问题漫谈》（河上《社会问题管见》1918.9 所收）

陈望道译：《妇女劳动问题底一瞥》（星期评论 48，1920.5）

《マルクスの社会主义の理论的体系》（社会问题研究 1，1919.1）

渊泉（陈溥贤）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晨报副刊 1919.5.5）*

罗琢章、籍碧译：《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学灯 1919.8.5—12.2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 6—5，1919.5）*

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 18—1，1921.1）

《思索の必要と研究の态度》（社会问题研究 1，1919.1）

无署名：《思索之必要与研究之态度》（学灯 1919.12.25）

《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观》（社会及国体研究录 1—1，1919.3）

渊泉（陈溥贤）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晨报副刊 1919.5.5）*

陈望道译：《马克斯底唯物史观》（觉悟 1920.6.17）

《劳动と资本》（翻译，原著者：马克思，社会问题研究 4，1919.4）

食力译：《劳动与资本》（晨报副刊 1919.5.9）

《社会主义の进化》（社会问题研究 5，1919.5）

邝摩汉译：《社会主义之进化》（学灯，1919.6.11）

黄七五译：《社会主义进化谈》（学灯，1920.9.2）

施存统译：《社会主义底进化》（觉悟，1921.2.27—28）

施存统编译：《社会经济丛刊》（泰东图书局，1922.1）*

《利己主义と利他主义》（社会问题研究 6，1919.6）

东里译：《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学灯 1919.12.9）

《资本家的思想の一例》（社会问题研究 9，1919.10）

黄七五译：《资本家思想底一例》（学灯 1920.7.7）

《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观に关する一考察》（经济论丛 9—4，1919.10）

安体诚译：《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可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学灯 1919.12.6—8）

《同盟怠业の道德的批判に就て》（经济论丛 9—5，1919.11）

戴季陶：《〈萨波达举〉的研究》（星期评论 34，1920.1）*

《资本论に见はれたる唯物史观》（经济论丛 10—2，1920.2）

苏中译：《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建设 2—6，1920.8）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1920.4）

邝摩汉译：《马克斯剩余价值论》（学灯 1920.6.27—29）

李培天译：《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泰东图书局，1920.9）

《脑味噌の问题》（翻译，原著者：G. R. Kirkpatrick，社会问题研究 15，1920.5）

于树德译：《脑筋问题》（觉悟 1920.6.12）

《共产者宣言に见はれたる唯物史观》（社会问题研究 16，1920.6）

施存统译：《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觉悟 1921.5.15—19）

施存统编译：《社会经济丛刊》（泰东图书局，1922.1）*

《科学的社会主义と唯物史观》（翻译，原著者：恩格斯，社会问题研究 17，1920.7）

苏中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建设 3—1，1920.12）

《社会主义の未来国》（翻译，原著者：J. Borchardt，社会问题研究 21，1921.3）

熊得山译：《社会主义的未来国》（今日 1—2，1922.3）

《断片》（改造 1921—4）

李茂斋译：《断片（见日本改造杂志）》（曙光 2—3，1921.6）

《次の日の问答》（我等 3—5，6，1921.5，6）

C. T.（施存统）译：《马克斯主义和劳动全收权》（觉悟 1921.7.19）

《マルクスの理想及び其の实现の过程》（社会问题研究 27，1921.11）

施存统译：《马克思底理想及其实现底过程》（东方杂志 19—6，1922.3）

《マルクス主义に谓ふ所の过渡期について》（经济论丛 13—6，1921.12）

光亮（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觉悟 1921.12.18）

《唯物史观问答——唯物史观と露西亚革命》（我等 1922—1）

C. T.（施存统）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觉悟 1922.1.19）

【高畠素之】

《个人主义と社会主义》（新社会 2—5，1916.1）

晓风（陈望道）译：《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觉悟 1921.8.26）

《社会主义と进化论》（1919.3）

张光焕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新中国 2—7，1920.7）

夏丏尊、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觉悟 1921.3.10）

夏丏尊、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商务印书馆，1922.3）

《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翻译，原著者：考茨基，1919.5）

渊泉（陈溥贤）译：《马氏资本论释义》（晨报副刊 1919.6.2—11.11）

戴季陶译：《商品生产的性质》（觉悟 1919.11.2）

戴季陶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建设 1—4，1919.11）

陈溥贤译：《马克斯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9）

《社会问题总览》（1920.2）

李达译：《社会问题总览》（中华书局，1921.4）

盟西译：《社会问题详解》（商务印书馆，1921.4）

陈望道译：《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东方杂志 18—11，1921.6）

《社会主义的诸研究》（1920.11）

施存统译：《马克斯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1922.4）

《マルサス人口论の盛衰と资本主义》（高畠《社会主义的诸研究》1920.11 所收）

陈昭彦译：《马尔塞斯人口论之盛衰与资本主义》（学艺 3—1，1921.5）

【堺利彦】

《共产党宣言》（翻译，原著者：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研究 1，1906.3）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8）

《科学的社会主义》（翻译，原著者：恩格斯，社会主义研究 4，1906.7）

衡石译：《科学的社会主义》（觉悟 1920.1.5—8）

《男女关系の进化》（1908.5）

郭须静译：《男女关系的进化》（新潮 1—5，1919.5）

《社会主义伦理学》（翻译，原著者：考茨基，1913.1）

伯阳（李文范）译：《伦理与唯物的历史观》（闽星 1—4，1919.12）

秋明译：《伦理与唯物史观》（学灯 1921.7.7）

董亦湘译：《伦理与唯物史观》（觉悟 1922.9.7）

《自由社会の男女关系》（翻译，原著者：E. Carpenter，1915）

哲父译：《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星期评论 28，1919.12）

《自由社会の自由恋爱》（翻译，原著者：E. Carpenter，1916）

厚庵译：《男女关系论》（晨报副刊 1919.6.29）

《ボリシエヰキの建设的施设》（新社会 5—6，1919.2）

寿凡译：《广义派之建设》（解放与改造 1—4，1919.10）

《唯物史观概要》（翻译，原著者：L. Budin，社会主义研究 1—1，1919.4）

无署名（陈溥贤）：《马氏唯物史观概要》（晨报副刊 1919.7.18）

《マルクス说とダアヰン说》（翻译，原著者：A. Pannekoek，社会主义研究 1—1，1919.4）

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商务印书馆，1922.1）

《フーリエーの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 1—3，1919.7）

祝枕江译：《福利耶之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 1—3，1919.10）

《道德の动物的起源及び其の历史的变迁》（堺《唯物史观の立场から》所收，1919.8）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 2—2，1919.12）*

《宗教及哲学の物质的基础》（堺《唯物史观の立场から》所收，1919.8）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 2—2，1919.12）*

《欧洲战争の经济的原因》（堺《唯物史观の立场から》所收，1919.8）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 2—2，1919.12）*

《マルクス主义の分化》（翻译，原著者：W. P. Larkin，社会主义研究 1—5，1919.9）

戴季陶编译：《英国的劳动组合》（星期评论 双十节纪念号，1919.10）*

《劳动者の天下》（新社会小册子，1919.10）

晋青（谢晋青）译：《劳动者底天下》（觉悟 1921.12.16）

《女性中心と同性爱》（与山川菊荣合译，原著者：Lester Ward/ E. Carpenter，1919.11）

丐尊（夏丐尊）译：《女性中心说》（妇女评论 1921.8.3）

李达译：《女性中心说》（商务印书馆，1922.1）

《唯物史观解说》（翻译，原著者：H. Gorter，新版，1920.1）

李达译：《唯物史的宗教观》（少年中国 2—11，1921.5）

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21.5）

《社会主义の渊源及び其発达》（堺《恐怖・斗争・歓喜》1920.4 所收）

丹卿译：《社会主义发达的经过》（东方杂志 17—24，1920.12）

《女の演说》（改造 1921—6）

晓风（陈望道）译：《女性底演说》（觉悟 1921.5.29）

《妇人问题》（无产社小册子，1921.10）

伯焜（唐伯焜）译：《恋爱自由说》（妇女评论 1921.10.19）

伯焜译：《妇女底天职》（妇女评论 1921.11.2）

伯焜译：《我们的家庭主义》（妇女评论 1921.11.16）

伯焜译：《女子国有么?》（妇女评论 1921.11.30）

伯焜译：《男女结合底目的》（妇女评论 1921.12.7）

伯焜译：《妇女与经济的平等》（妇女评论 1921.12.14）

伯焜译：《妇女问题概观》（妇女评论 1921.12.28）

唐伯焜译：《妇女问题》（民智书局，1922.6）

《〈女天下〉の社会学的解说》（新小说 1922—7）

丐尊译：《〈女天下〉底社会学的解说》（妇女评论 1922.8.2）

此外，还有以下译文：

译者无署名：《太平洋会议》（新青年 9—5，1921.9）

【其他】

志津野又郎译：《マルクス传》（原著者：W. Liebknecht，社会主义研究 1，1906.3）

戴季陶译：《马克斯传》（星期评论 31，1920.1）

福田德三：《续经济学讲义》（1913.5）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 6—6，1919.11）*

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1913.1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 6—6，1919.11）*

宫崎龙介译：《地底の露西亚》（原著者：S. Stepniak，东方时论 3—1，1918.1）

可叔译述：《地底的俄罗斯》（晨报副刊 1919.2.27）

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1919.1）

李汉俊译：《IWW 概要》（星期评论 33，1920.1）

施存统译：《劳动问题》（觉悟 1921.1.6—18）

施存统编译：《社会经济丛刊》（泰东图书局，1922.1）*

米田庄太郎：《デモクラシーと我国——社会学的考察》（大阪朝日新闻 1919.2.23）

微译：《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晨报 1919.4.2）

米田庄太郎：《挽近社会思想の研究》（1919.4）

刘震译：《法的社会主义之研究》（法政学报 2—5，1920.5）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激主义》（中央公论 1919—6）

晨曦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晨报副刊 1919.7.1）

尾崎士郎、茂木久平：《西洋社会运动者评传》（1919.6）

筑山醉翁（陈光焘）译：《西洋之社会运动者》（晨报副刊 1919.8.1）

河田嗣郎：《社会问题及社会运动》（1919.6）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 6—5，1919.11）*

贺川丰彦：《唯心的经济史观の意义》（改造 1919—7）

无署名：《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晨报副刊 1919.7.25）

久留弘三：《劳动运动》（1919.7）

周佛海译：《劳工运动》（觉悟 1919.9.18—29）

陈望道译：《劳动运动通论》（劳动界 19—23，1920.12—

1921.1）

佐野学：《劳动者运动の指导伦理》（解放 1919—8）

大悲、汉俊译：《劳动者运动之指导的伦理》（觉悟 1919.9.9—14）

寿凡译：《劳动运动之伦理的指导》（解放与改造 1—2，1919.9）

《露国の片面 レーニン语る》（大阪每日新闻 1919.9.7）

戴季陶译：《李宁的谈话》（星期评论 16，1919.9）

室伏高信：《ギルドソーシアリズム及び其の批判》（批评 7，1919.9）

戴季陶编译：《英国的劳动组合》（星期评论 双十节纪念号，1919.10）*

远藤无水译：《通俗マルクス资本论附マルクス传》（原著者：Mary E. Marcy，1919.11）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9）

中目尚义译：《マルクス派社会主义》（原著者：W. P. Larkin，1919.11）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 9—2，1921.6）

李凤亭译：《马克斯派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22.6）

室伏高信：《社会主义批判》（1919.11）

绍虞译：《布尔塞维克的批判》（解放与改造 2—16，1920.8）

李培天译：《社会主义批评》（学灯 1921.1.6）

小泉信三：《学问艺术と社会主义》（三田学会杂志 13—11，1919.11）

刘步青译：《科学艺术与社会主义》（学灯 1920.2.5）

卖文社编：《劳动经济论》（1919.12）

施存统译：《劳动经济论》（觉悟 1921.3.27～4.4）

卖文社编：《现时の劳动问题概论》（1919.12）

冯飞译述：《劳动问题概论》（华星印书社，1920.7）

吉野作造：《唯物史观の解释》（中央公论 34—13，1919.12）

陈望道、张维祺译：《唯物史观底解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 10，1920.1）

远藤无水译：《科学的社会主义 附エンゲルス传》（原著者：恩格斯，1920.1）

郑次川译：《科学的社会主义》（群益书社，1920.8）

森户辰男：《クロポトキンの社会思想の研究》（经济学研究 1，1920.1）

于树德译：《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思想之研究》（建设 2—3，1920.4）

枕江（祝枕江）译：《克鲁泡特金之社会思想研究》（解放与改造 2—9，1920.5）

村上正雄：《社会主义と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研究 2—3，1920.4）

明权译：《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学灯 1920.8.16）

茅原退二郎译：《露西亚革命实记》（原著者：托洛茨基，1920.4）

周诠译：《俄国革命纪实》（人民出版社，1922.1）

浅野护译：《过激主义の心理》（原著者：J. Spargo，1920.5）

陈国榘译：《布尔什维主义底心理》（商务印书馆，1921.5）

中目尚义译述：《过激派の本领》（1920.5）

孙范译：《过激党真相》（泰东图书局，1921.3）

栉田民藏：《マルクス学に於ける唯物史观の地位》（我等 1920—10）

施存统译：《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位置》（东方杂志 19—11，1922.6）

佐野学：《露西亚农民史论》（解放 1921—1）

李达译：《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新青年 8—6，1921.4）

王兆栩译：《俄国农民史论》（时事月刊 1—3，1921.4）

横田千元：《劳农露西亚问答》（水曜会小册子，1921.11）

光亮（施存统）译：《劳农俄国问答》（先驱 13，1922.11）

附录二　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
(1919—1923)

本篇为中国（包括香港）自 1919 年 1 月至 1923 年 12 月刊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单行本简介，目的是尽量准确地把握这类书籍当时的出版状况。本篇收录的大部分为笔者在中国和日本各大图书馆、资料馆所亲见；对殊难确认者，则以图书目录或图书卡为据，同时查阅当时的报刊，确认了其的确发行。另外，鉴于这个时期发行的社会主义书籍多为译作，故特别留意确认其原著或重译时的底本。

【本篇所收书籍的范围】

同为论社会主义的书籍，其所论述的，有工人、社会、妇女、俄国革命、共产国际等多方面问题，要对所有这些书籍进行考察，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本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外的著作，及其反对论）为主，收录了据此探讨工人问题、妇女问题、俄国革命等的书籍；而同为当时流行思潮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原则上不予收录。

【关于本篇所收书籍的刊行时期】

将刊行时期限定为自 1919—1923 年之间，个人研究能力有限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基于如下认识，即，与辛亥革命前一样，1919 年也是社会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一年；而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召开，则象征着国共合作的开始，此后，共产党员活动的中心从学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转移到了实际政治工作上来。换言之，1919年开始的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进入1924年之后转化成了旨在实现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

【说明】

本篇把在中国刊行的书籍分为A、B两类记述。其中A类为实际刊行日期明确的书籍；B类则为1923年以前确实刊行，但难以确认具体刊行日期的书籍。

凡例

1. A类按刊行时间排列。

2. 以书名为标题，依据该书籍版权页和相关资料，尽所知标出著者、译者、出版社、刊行年月于其下。

3. 凡实际亲见的藏书，将其保存馆所标于解说文开头（常用略称：国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上图＝上海图书馆；近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文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4. 由于译自英语版的书籍居多，故原著为西方书籍（包括俄语书籍）时，原则上标注英语书名。

5. 书志说明所用数字代号①—⑦，分别表示载于如下同时期书目。

①文化书社（长沙）1920—1921年经售书目（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写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1—23、37—47页）。

②收录于伊尔库茨克的俄语杂志《远东人民》（*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第2期（1921年6月23日）所载《中国的社会主义书籍》中的书籍。

③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述的书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50 页）。

④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 年的藏书目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 年 2 月 6 日）。

⑤李汉俊 1922 年推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觉悟》1922 年 6 月 6 日）。

⑥冰冰：《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中国青年》1924 年 3 月第 24 期）介绍的书籍。

⑦施存统：《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中国青年》1924 年 4 月第 26 期）推荐的参考书籍。

A 类

A1 《社会主义平议》，南海谭荔恒、香港刘铸伯合著，东兴毛澄宇、南海潘孔言同校，香港华商总会报社 1919 年 8 月

近史所藏。著者谭荔恒、刘铸伯生平不详。统篇以孔教观点批判社会主义，名曰“平议”，内容实为抨击，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共产妻、杀人”、“社会主义之流毒且千万倍于杨墨佛老”。该书使人们得以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同时存在着迥异于作为世界思潮的社会主义的、以儒教观点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并且华商总会这个商业组织此时已在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颇耐人寻味。

A2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邵振青编著，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4 月

邵振青即有名的进步记者邵飘萍。邵飘萍在五四时期曾主持北京的《京报》。1919 年 8 月，《京报》因发表过激言论被迫停刊，邵飘萍也逃离北京，并于同年冬天接受《大阪朝日新闻》

之邀，作为该报顾问开始居住日本。故该书概为其在日本时所著。与A8《新俄国之研究》类似，该书对在日本广泛涉猎的海外思潮的动向，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状况进行了翻译、介绍，引用了山川均：《社会主义の定义［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研究》1919年6月号）等。对俄国革命及其领导人也有所记述。

A3　《社会主义与中国》，冯自由著，社会主义研究所（香港）1920年4月

近史所藏。由三章组成：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之过去及将来，第二章　从社会主义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之宣传方法。该书主要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民生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也简单地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第一章《中国社会主义之过去及将来》曾在《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月16—19日）连载（转载《香港晨报》新年增刊）。发行处“社会主义研究所”不详。

A4　《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兰姆塞著，兼生译，北京晨报社1920年4月

原著为Arthur Ransome,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1919.《晨报副刊》曾于1919年11月12日—1920年1月7日连载兼生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后出版单行本。译者“兼生”即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①②）

A5　《劳农政府与中国》，张冥飞辑译，汉口新文化共进社，1920年6月

京都大学法学部图书馆藏。据《民国日报》1920年9月10日广告载，该书为泰东图书局发行，泰东图书局似也出版过。译者张冥飞1923年曾做过上海《中国晚报》主笔，而《中国晚报》据信多少与国民党有关系。该书翻译、收录了不少俄国革

命文件（法令、布告），是这个时期比较完整、因而较为出色的苏俄政权资料集。明显译自英语，但是没有注明出处。1918 年至 1919 年，美国的《民族》（The Nation）杂志曾将译载的苏俄政府的宪法、法令类汇集成册，该书有可能是此类小册子之翻译。（①）

A6 《劳动问题概论》，卖文社编，冯飞译述，华星印书社（北京）1920 年 7 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高畠素之派版的实务指导小册子、卖文社编：《劳动问题丛书》中的《现时の劳动问题概论［现时劳动问题概论］》，卖文社 1919 年版。该书是为指导从事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而作。译者冯飞的生平等不详。

A7 《贫乏论》，河上肇著，止止（李凤亭）译述，泰东图书局 1920 年 7 月

原著是日本畅销书之一的河上肇：《贫乏物语》，弘文堂 1917 年版。但据《新人》1 卷 6 号《新人社消息》称，“止止君”在翻译时删除颇多，似为抄译。第三版注明为李凤亭译，据此推测“止止君”即李凤亭。向新人月刊社投寄批评函的人中确有名李凤亭者（《新人月刊社消息》，《新人》1 卷 2 号），但其生平等不详。此外，A19 也是《贫乏物语》的汉译。（①）

A8 《新俄国之研究》，邵飘萍著，日本东瀛编译社（大阪南区）1920 年 8 月

历史所藏。大阪南区的东瀛编译社的详情不明；但是，卷末有泰东图书局的广告，《评论之评论》创刊号（1920 年 12 月）上的广告也称该书为泰东图书局发行，概实际刊行者是泰东图书局。邵飘萍生平，请参阅 A2。主要翻译著者在日本收集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文章而成。卷末有“嘉定吴定九”译：《列宁与纽约世界报特派员林康阿耶谈话》和《美国派使勃烈脱（Wil-

liam C. Bullitt）之报告》两篇附录。（①②）

A9　《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年 8 月

国图、上图藏。原著为 K. Marx / F.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关于陈望道翻译时依据的日语底本的考证，请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三节《4 汉译〈共产党宣言〉》。1921 年，人民出版社作为《马克思全书》第一种重印时，作“陈佛突译”。（①②③④⑤⑥⑦）

A10　《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儿著，郑次川编译，王岫庐校订，群益书社 1920 年 8 月

附《恩格儿传》。原著为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1883，仅抄译第三章。由于书名一样、同附有恩格斯传、且都是只翻译第三章等，可以断定参照了远藤无水译：《科学的社会主义》（文泉堂 1920 年版。只抄译原著第三章，并附有考茨基：《恩格斯传》）。关于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前曾有衡石重译：《科学的社会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0 年 1 月 5—8 日，也只译出第三章）；但衡石译依据堺利彦译：《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1906 年 7 月第 4 号），与郑次川译本没有直接关系。（①②）

A11　《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9 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 K. Kautsky, *Karl Marx´Oekonomische Lehren*, 1887，但陈译底本为高畠素之译：《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卖文社出版部 1919 年版。高畠译本在当时被誉为最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汉译本是在《晨报副刊》1919 年 6 月 2 日至 11 月 11 日连载（渊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的基础上，经修订后出版的单行本。关于译者陈溥

贤，请参阅本书第一章。据说，刊行前，陈溥贤曾写信给高畠素之，请其告知原文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但没有得到答复。《东方杂志》17卷14号（1920年7月）近刊广告称，渊泉译注之《资本论解说》将于近期出版，可见，该书开始时曾准备沿用日译本书名，作《资本论解说》刊行。考茨基的这部著作，戴季陶也曾翻译，并在《建设》杂志发表过《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的连载（1919年11月—，未完），亦同属高畠译本的重译。另，据说李达曾出过同名译作，此为讹传。（①②④⑤⑥⑦）

A12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9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Mary E. Marcy, *Shop Talks on Economics*, c. 1911，但李译是远藤无水译：《通俗マルクス资本论 附マルクス传［通俗马克思资本论 附马克思传］》（文泉堂1919年版）的重译。原著在日本备受称赞，除远藤译外，同时期还出版过冈野辰之介译：《マルクス主义と劳动者［马克思主义与劳动者］》和岛田保太郎译：《マルクス经济学入门［马克思经济学入门］》。严格讲来，原著并非解说《资本论》，而是社会主义的简明入门著作。包惠僧、张国焘、刘弄潮等都回忆说曾经读过该书，读者似颇广。《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载出版部代售书籍目录中的《马格斯资本论》，以及《新青年》9卷5号（1921年9月）载《人民出版社通告》中的李漱石（李汉俊）译《资本论》等，概皆指此书。（①②④⑤⑥⑦）

A13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9月

国图藏。原著为河上肇：《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岩波书店1920年版。该书解说自亚当·斯密至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经济学思想；但⑦评其译文“太错得不可解了”。译者李培天字子厚，云南省宾川人，1895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学

习。据《新人》1卷6号广告称，他还准备翻译出版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以作《学术研究会丛书》之一；但实际上似没有刊行。（②⑤⑥⑦）

A14　《社会主义史》上、下，克卡朴著，李季译，新青年社1920年10月

人文所藏。原著为T. Kirkup，*A History of Socialism*，1906. 该著作概述了社会主义运动自空想社会主义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日本，堺利彦也曾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3号（1906年5月）上依据该著作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该书是影响毛泽东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译者李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0年前后与陈独秀关系密切，主要从事从英语图书翻译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著有自传《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①②④⑥）

A15　《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陶孟和校，商务印书馆1920年10月

国图藏。原著为Edwin R. A. Seligman，*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903. 该著作以经济观点解释历史，这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近；但从其拒绝使用“唯物史观”、另倡“经济史观”来看，绝非为解释马克思主义而作；统篇贯彻“经济一元论”，以至于⑦评其为“有许多误解曲解之处”。汉译依据1912年版原著，附注中记述了各国（日、俄、西、法）翻译该书的状况。日本出版有河上肇译：《历史之经济的说明　新史观》，昌平堂川冈书店1905年版。（①⑤⑥⑦）

A16　《社会主义总论》，邝摩汉著，北京又新日报社1920年11月

《世界改造丛书》之一。由社会主义的起源、定义、要素、分类、学说、政略、国家等七章组成。著者邝摩汉原名邝振翎，

原同盟会会员，当时留学回国不久。在北京以《今日》杂志为中心进行活动，有时翻译河上肇论文并向《时事新报》（学灯）栏投稿。《世界改造丛书》以译作为主，故该书实际上可能是译作。世界改造丛书由“冯飞、邝摩汉、何海鸣”三人编辑，华星印书社刊行；该丛书之一冯飞译述：《劳动问题概论》（A6）卷末广告载，《社会主义总论》也是由华星印书社刊行。又新日报社和华星印书社的关系不详。

A17 《失业者问题》，飘萍、吉人合著，泰东图书局 1920 年 11 月

飘萍，即邵飘萍；吉人则不详。因邵飘萍翻译日语文献颇众，故虽称“合著”，很可能是卖文社编辑部编撰：《失业问题》（卖文社 1919 年版）的翻版。（①）

A18 《社会问题概观》上、下，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共著，周佛海译，中华书局 1920 年 12 月

原著为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社会问题十二讲》，新潮社 1920 年版。该书简明论述了法国革命、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工会、普选、妇女问题等。④中记周佛海译：《社会问题概论》，概为该书之误。（①④）

A19 《救贫丛谈》，河上肇著，杨山木译，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12 月

国图藏。原著为日本的畅销书之一、河上肇著：《贫乏物语》（弘文堂 1917 年版），杨译似汇集《学艺》2 卷 1 号（1920 年 4 月）至 2 卷 8 号（1920 年 11 月）连载的杨山木译：《救贫丛谈》（抄译）而成。此前，同年 7 月，已有李凤亭译：《贫乏论》出版（A7）。

A20 《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 1921

年1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1892；似译自英语版 *The Class Struggle*（*Erfurt Program*）, trans. William E. Bohn, 1910. 关于恽代英翻译此书的时间，请参照本书第一章注（145）。影响毛泽东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①②④⑤⑥⑦）

A21　《工团主义》，哈列著，李季译，新青年社1921年1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J. H. Harley, *Syndicalism*, 1912（?）译作底本似为英语，为了解工团主义的简明入门书籍。关于译者李季，请参阅A14。（①②④）

A22　《过激党真相》，孙范译述，泰东图书局1921年3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英国杂志 *The Round Table* 所刊登文章汇集而成的 The Macmillan Company,（ed.）, *Bolshevik Aims and Ideals and Russia's Revolt against Bolshevism*, 1919. 但从书名判断，译作底本似为中目尚义译述：《过激派の本领［过激派真面目］》，大镫阁1920年版。译者孙范的生平不详。该书由《布尔塞维克之运动》和《反布尔塞维克之的运动》两篇组成，在解说布尔什维克的同时，断定布尔什维克是“可称之为革命暴君政治的一种暴君政治，完全排斥民主主义，完全排斥思想及行动的一切自由”。而对于高尔察克的反革命运动，则说他们“由衷希望使其国家不再陷于混乱局面”。总之，该书反布尔什维克色彩浓厚。（①）

A23　《社会问题总览》共三卷，高畠素之著，李达译，中华书局1921年4月

原著为高畠素之编：《社会问题总览》，公文书院1920年版。原拟依原著章节出四册，即刘正江译：《社会政策》，李达

译：《社会主义》，正树译：《劳动组合》，正格译：《妇人问题》（《解放与改造》2卷13号广告），但最后由李达一人全部翻译。一如书名所示，这本书概述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妇女问题），并考察了各国的相关状况。由于原著《第二编 社会主义》解说社会主义理论简明扼要，其他抄译者也颇多，商务印书馆也刊有盟西译：《社会问题详解》（A24）。

A24 《社会问题详解》共三卷，高畠素之著，盟西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4月

原著为高畠素之编：《社会问题总览》，公文书院1920年版。据《中国青年》第9、10号（1923年12月）载恽代英：《研究社会问题发端》、《研究社会政策》评论，盟西译比前项（A23）李达译：《社会问题总览》翻译得准确。④有李季译：《社会问题详解》，概为盟西译之误。有关原著内容，请参照《社会问题总览》（A23）。（④）

A25 《劳动总同盟（之）研究》，山川均著，邹敬芳（锦芳）译述，泰东图书局1921年5月

近史所藏。原著是山川均：《フランス劳动总同盟（CGT）の研究［法国总工会研究］》（《改造》1920年4月号、5月号），内容为对法国总工会的历史、组织、现状的研究。山川执笔时参照了布盖特（Pouget），帕弗洛夫斯基（Pawlowsky），列文（Levine），路易（Louis），柯尔（Cole），裴罗铁（Pelloutier），埃斯泰（Estey）等人的著作。（①）

A26 《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1921年5月

人文所藏。原著为 H. Gorter,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09，但李译底本为堺利彦译：《唯物史观解说》，大镫阁1920年版。该书是当时系统诠解马克思主义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堺译序称，“直至几年前，该书始终被看作是同类著作中惟一较通俗的”。李达在译者自序中说，翻译过程中，除日语版外，还在李汉俊帮助下参考了德语版。李达并推荐与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已有堺利彦译日语版：《社会主义伦理学》）一同阅读。《东方杂志》17 卷 14 号（1920 年 7 月）载有同名书籍（郭泰著、渊泉译：《唯物史观解说》）的近刊预告，但实际似未曾刊行。（⑤⑥⑦）

A27　《欧洲劳佣问题之大势》，桑田熊藏著，刘景译，吴贯因校，内务部编译处 1921 年 5 月

原著为桑田熊藏：《欧洲劳动问题の大势［欧洲工人问题大势］》，有斐阁 1920 年版。该书内容为论述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同时介绍了英、法、德各国工会的组织和沿革。概作为北京政府应对社会运动的参考资料而译。

A28　《布尔什维主义底心理》，施罢戈著，陈国榘译，商务印书馆 1921 年 5 月

原著为 J. Spargo, *The Psychology of Bolshevism*, 1919，但陈译底本似为浅野护译日语版：《过激主义の心理［过激主义的心理］》，日本评论社出版部 1920 年版。译者陈国榘（字伯隽），广东省东莞人，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国民》杂志社社员，在该杂志上翻译介绍山川均的论文。原著者施罢戈基本上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以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但对布尔什维克却持批判态度，斥其为“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真髓的幽灵”、“精神病患者、一种没有理性的歇斯底里”。

A29　《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王尔德著，袁振英译，受匡出版部（香港）1921 年 5 月

原著为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919. 该书认为个人主义是近代各种思想的中心，而社会主义则是个人

主义最完美的实现形态。译者袁振英，别名仲斌、震瀛、无梦青年等，广东省东莞县人；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应陈独秀之邀参加编辑《新青年》，任该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

A30 《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田诚著，汉口 1921 年 6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出版社、发行处不明。封面书名用英语 The Communism and Intellectual Class 印就，但并非译作，为一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加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投身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小册子。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收有该小册子的翻印本。该书载任武雄：《介绍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推测，“田诚”为陈独秀的别名。

A31 《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山川菊荣著，李汉俊编译，商务印书馆 1921 年 7 月

原著为山川菊荣：《妇人の胜利［妇女的胜利］》，日本评论社出版部 1919 年版。共由五章（一章 绪论、二章 原始社会的男女关系、三章 论文明社会的男女关系、四章 论近代妇女运动、五章 结论）组成，几乎完全译出。据原著自序称，山川菊荣在写这部书时，参考了堺利彦：《男女关系の进化》、倍倍尔（A. Bebel）：《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妇女》、格里坎（W. M. Gallichan）：《原始社会妇女的地位》、希尔马海尔（K. Schirmacher）：《近代女权运动论》等多部著作。

A32 《苏维埃研究》，山川均著，王文俊译，北京知新书社 1921 年 8 月

原著为山川均：《ソヴィエトの研究［苏维埃研究］》，《改造》1921 年 5 月号；后收入山川均、山川菊荣合著：《劳农露西亚の研究［工农俄国研究］》，アルス［阿尔斯出版社］1921 年版。山川的该论文是当时日本有关革命后俄国状况的惟一比较准

确的研究。李达也翻译过山川均研究苏维埃的论文（请参阅 A54 之《劳农俄国研究》）。译者王文俊生平等不详。

A33　《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袁让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K.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据说汉译的底本为 1891 年德语版和 1902 年英语版。译者袁让的生平等不详。（③④⑤⑥⑦）

A34　《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李立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Lenin, The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The Soviets at Work）（《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但翻译底本可能是下列三种之一，即 N. Lenin / L. Trotzky,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8，或山川均、山川菊荣合译之日语版：《社会主义革命の建设的方面 ソヴィエットの当面の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性一面——苏维埃当前的问题］》（《社会主义研究》1921 年 8 月号），或山川均、山川菊荣合译：《劳农革命の建设的方面》，三德社 1921 年版。另外，山川夫妻译依据 N. Lenin, *The Soviets at Work.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918. 译者李立不详，或为人民出版社主编李达的别名。（③④⑦）

A35　《讨论进行计划书》，列宁著，成则人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

国图藏。原著为 Lenin, Letters on Tactics, Towards Soviet, On the Task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Revolution（《论策略书》、《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译作底本或为 N. Lenin / L.

Trotzky,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8. 译者成则人即沈泽民（茅盾［沈雁冰］胞弟）。（③④）

A36 《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著，太柳译，人民出版社1921年12月

原著概为 Bukharin, *The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s (Bolsheviki)*, c. 1920. 1922年3月2日的《广东群报》刊有布哈林著、太柳译：《共产党底计划》，该号《人民出版社通告》栏还载有该书目录。在④里书名作《共产党底计划、政治理想、社会结构学》（太柳译）。译者太柳不详；但《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9卷5号，1921年9月）有“张空明译：《共产党计划》”，据此推测，太柳或许就是张空明即张国焘（张特立）。关于张国焘又称张空明，请参阅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3页，及A43。（②③④⑥⑦）

A37 《李卜克内西纪念》，李特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

国图藏。据③载，1922年1月15日，在全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纪念会上，散发了五千册印有“李卜克内西传、卢森堡传和斯巴达卡司团宣言”的小册子，此小册子或即《李卜克内西纪念》。李特是李达的笔名。另，《先驱》也于1922年1月15日创刊号特辟副刊《里布克奈西特纪念号》，同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也载有署名李特的《李卜克内西传》，皆与此小册子类似。译作可能参考了山川菊荣著：《リープクネヒトとルクセンブルグ［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水曜会小册子，1921年版。（③）

A38 《社会经济丛刊》，施存统编译，泰东图书局1922年1月

上图藏。翻译、汇编有关社会主义的日语论文而成，收有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工人问题］》、河上肇：《社会主义の进化［社会主义的发展］》、河上肇：《共产党宣言に见はれたる唯物史观［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卖文社编：《劳动经济论》、山川均：《カウツキーの劳农政治反对论［考茨基的工农政治反对论］》。（⑥⑦）

A39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派纳柯克著，施存统译，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

原著为 A. Pannekoek，*Marxismus und Darwinismus*，1914，施译属堺利彦抄译的日语版：《マルクス说とダアヰン说［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社会主义研究》1919 年 4—10 月号；后收入堺利彦：《恐怖・斗争・欢喜》，聚英阁 1920 年版）之重译。《东方杂志》19 卷 10 号（1922 年 5 月）刊有已出版书籍的广告，其中载原著者为“班纳柯克”；又，《晨报副镌》自 1922 年 1 月 12 日开始连载“班纳哥克（Pannekoek）”著、雁汀译：《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这篇与施译关系如何不详。（⑤⑥⑦）

A40　《俄国革命纪实》，托洛次基著，周诠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国图藏。原著为 L. Trotzky，*From October to Brest—Litovsk*，1919. 但是，托洛茨基的这部著作，已有茅原退二郎翻译的日译本：《露西亚革命实记［俄国革命纪实］》，日本评论社 1920 年版。从汉译书名推测，周译本概为此日译本的重译。译者周诠的生平等不详。（③⑦）

A41　《共产党礼拜六》，列宁著，王静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Lenin，Great Initiative：in-

cluding the Story of "Communist Saturday" (《伟大的创举》), 1919. 列宁这部著作的翻译，山川均、山川菊荣合译：《共产党土曜日［共产党星期六］》（《社会主义研究》1921 年 11 月号）的发表早于汉译本，但不清楚汉译本是否依据日译本。译者王静的生平等不详。(③⑦)

A42 《女性中心说》，堺利彦编述，李达译，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

译自华德（Lester Ward）及卡朋特（E. Carpenter）原著、堺利彦、山川菊荣合译：《女性中心と同性爱［女性中心与同性爱］》，アルス［阿尔斯出版社］1919 年版（原著是 Lester Ward, *Pure Sociology*, Chap. 14, 1903 及 E.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1912）的堺译部分（华德著部分）。在此之前，堺译：《女性中心说》已被译成汉语，《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自 1921 年 8 月已开始连载"夏丏尊译、日本堺利彦达指、美国瓦特原著：《女性中心说》"，后来民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可见在中国传播极广。另，陈望道也曾计划将其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社会经济丛书》之一于 1920 年出版，还在《少年中国》1 卷 12 期至 2 卷 2 期上连发广告（计划 1920 年 12 月刊行，书名定为《女性中心与同性爱》），但实际没能出版。

A43 《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国共产党著，希曼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翻译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的解说文而成。"希曼"为张西曼别名。《广东群报》1922 年 3 月 2 日的《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有出版广告和该书目录。《青年周刊》（《广东群报》附录）1922 年 3 月 7 日广告作"布哈林著"；若此说无误，则原著与 A36 同为布哈林《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纲领》（Bukharin, *The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s (Bolsheviki)*, c. 1920），即后来有名的《共产主义

ABC》，但难以确认。（③⑥⑦）

A44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季诺维埃夫著，墨耕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国图藏。原著不详，或为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大会等所做的报告、演讲。墨耕是李梅羹的笔名。关于李梅羹的生平，请参阅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3—164 页，以及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205 页。《广东群报》1922 年 3 月 2 日的《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有出版广告和该书目录，据此可知书中含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③⑦）

A45　《列宁传》，山川均著，张亮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山川均：《レーニンの生涯と事业［列宁的生涯和事业］》《社会主义研究》1921 年 4 月号；后收入山川均：《レーニンとトロツキー［列宁与托洛茨基］》，改造社 1921 年版），译自季诺维也夫 1918 年所做关于列宁的讲演写成的传记。汉译较忠实于原著。《广东群报》1922 年 4 月曾予以转载（《广东群报》4 月 12 日之《列宁传》）。译者张亮的生平等不详。（③⑦）

A46　《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著，墨耕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2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原著为 Lenin, The Achievement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但③以原著为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果然如此，则可能译自德语版（1920 年）。关于译者墨耕（李墨耕），请参阅《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A44)。(③)

A47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丏尊、李继桢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

上图藏。原著为高畠素之：《社会主义と进化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卖文社出版部1919年版。但高畠著本身大量参考了刘易斯（A. Lewis）和考茨基的著作，近乎译作。原著介绍了有代表性的进化论者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继承关系为前提，反映出当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不可分割的情形。高畠的这部著作，此前已由夏丏尊和李继桢译出，并以《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为题，自1921年3月10日始在《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该书或为其单行本。(⑤)

A48 《马克斯学说概要》，高畠素之著，施存统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4月

上图藏。原著为高畠素之：《社会主义的诸研究》，大镫阁1920年版。汉译只抄译其第一编《マルクスに关する诸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研究》为汇集高畠在各种杂志所发表论文而成，简明评述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⑥⑦)

A49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第三国际编，成则人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4月

国图藏。收有《第三国际议案》、《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宣言》。原著不详，或为翻译、汇集美国杂志 *Soviet Russia* 以及 *The Communist* 载共产国际资料而成。译者成则人即沈泽民。(③⑥⑦)

A50 《劳动运动史》，施光亮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劳动学校教科用书）1922 年 4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工人教育用书，叙述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施光亮即施存统笔名。施存统翻译日语书籍颇丰，或许参考了高畠素之著实务指导用书即卖文社编《劳动问题丛书》中《劳动运动史》，1920 年 5 月版。

A51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伊利著，何飞雄译，陶孟和校，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5 月

国图藏。原著为 R. T. Ely,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1894. 此前，《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自 1920 年 5 月 12 日已开始连载（何飞雄译：《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该书或即其单行本。在日本，伊利的这部著作曾被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引用，安部矶雄也曾将其译为《社会主义と社会改良［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出版（收于《社会政策二论》，大日本文明协会 1909 年版）。但汉译未见参考日译本的痕迹。

A52　《马克思纪念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1922 年 5 月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社会运动状况ノ部　支那国》，分类目录 4—3—2—1—4—5）。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而刊行，由以下三篇文章组成，即《马克思诞生 104 周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传》（戴季陶译：《马克斯传》，《星期评论》第 31 号，1920 年 1 月）、《马克思学说》（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 年 5 月 5 日；及《新青年》9 卷 6 号，1922 年 7 月）。据③称，该书由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方组织所在地共散发两万册。（③）

A53　《马克斯派社会主义》，拉尔金著，李凤亭译，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6 月

原著为 W. P. Larkin, *Marxian Socialism*, 1917. 但译者李凤亭也是《贫乏论》（河上肇）的翻译者（A7），故而有可能译自中目尚义译日语版：《マルクス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日本评论社出版部 1919 年版。该书综合论述了马克思学说的起源、发展变化；但由于拉尔金不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⑦评论说，该书没有特色、谬误颇多。据《东方杂志》17 卷 14 号（1920 年 7 月）载近刊广告称，一湖（彭鑫）译：《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纳肯著）即将发行；概译者后来替换。（⑥⑦）

A54 《劳农俄国研究》，山川均、山川菊荣共著，李达编译，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8 月

历史所藏。原著为山川均、山川菊荣合著：《劳农露西亚の研究［工农俄国研究］》，アルス［阿尔斯出版社］1921 年版。比起俄国革命的史实和经过，该书着重讲解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组织、工会、农民、教育制度、妇女解放等革命后建设的状况，在当时几乎是惟一一部全面介绍苏俄的著作。山川均有关俄国革命的论文被译成汉语的，此前曾有 1921 年 8 月出版的王文俊译：《苏维埃研究》（A32）。（⑦）

A55 《社会主义讨论集》，陈独秀、李达等著，新青年社 1922 年 9 月

收录了主要在《新青年》等发表的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论文共二十五篇；后收入《民国丛书》，上海书店 1996 年影印本，第 5 编 17 社会科学总论类。（⑥⑦）

A56 《妇女问题》，堺利彦著，唐伯焜译，上海民智书局 1922 年 6 月

原著为堺利彦：《妇人问题》，无产者小册子 1921 年版；唐译本翻译了其中六篇文章（《自由恋爱说》、《女子国有么》、

《妇女的天职》、《妇女与经济的平等》、《我们的家庭主义》、《妇女问题概观》）。《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12—22期（1921年10月19日至12月28日）已于此前连载，此或其单行本。原著是堺擅长的充满幽默的启蒙读物。堺论妇女的文章，另有李达译：《女性中心说》（A42），说明堺在当时的中国被视为与山川菊荣并列的妇女问题大家。关于译者唐伯焜，除了他曾向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投过稿件外，其他如生平等不详。

A57　《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斯著，李季译，陶孟和校，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

原著为K.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价值、价格与利润），1898，但不知李译依据何种版本。（⑥⑦）

A58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柯祖基著，郭梦良、徐六几、黄卓共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

国图藏。原著为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06. 中文版译自英语版（*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rans. John B. Askew, 1907），但有可能也参考了堺利彦译日语版：《社会主义伦理学》，丙午出版社1913年版。该书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论述了希腊哲学、基督教伦理学以至康德哲学的伦理学说史，同时阐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李达在其译作《唯物史观解说》（A26）的后记向读者推荐同时阅读的《伦理与唯物史观》（A26）即指该书。国民党系的李君佩也曾计划以相同书名翻译出版，但没有实现。（⑦）

A59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塞里格门、尼林著，岑德彰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1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Edwin R. A. Seligman / S. Nearing, *A Public Debate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1921. 收录了塞里格门和

尼林围绕社会主义进行论战时的论文。译者岑德彰是广西省西林人，生于189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从其经历推测，译作底本可能是在美国得到的英语版。顺言之，该书在日本也有河上肇的译作出版（《一经济学者と一社会主义者との立合演说［一位经济学者与一位社会主义者同台演讲］》，《社会问题研究》1921年12月第28册）。

A60 《社会主义之意义》，格雷西著，刘建阳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1月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原著为J. B. Glasier, *The Meaning of Socialism*, Leicester, 1919. 内容为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述评。译者刘建阳的生平等不详。

A61 《马克斯经济学原理》，恩脱门著，周佛海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4月

上图藏。原著为Ernest Untermann, *Marxian Economics: a popular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Marx's "Capital"*, 1913，但周译底本是山川均译日语版：《マルク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大镫阁1921年版。原著为马克思《资本论》全三卷的概述，但以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的记述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堪称以唯物史观写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恩脱门的这部著作，另有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杨寿译本，但未能实现。（⑥⑦）

A62 《唯物史观浅释》，刘宜之著，向警予校，上海书店1923年4月

国图藏。该书为初学者简述了唯物史观的意义，概括了阶级斗争论。上海书店为中共所办。译者刘宜之的生平等不详。（⑥⑦）

A63　《社会主义浅说》，梅生编著，星五校，教育研究会1923年4月

近史所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虽称梅生编著，实为摘译高畠素之：《社会问题总览》（公文书院1920年版）之《第二编社会主义》而成。内容有社会主义的定义、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理论解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动向等。高畠素之：《社会问题总览》一书，此前亦曾有李达译本和盟西译本出版（A23、A24）。译者梅生和校订者星五，其生平等皆不详。

A64　《社会主义与近世科学》，安锐戈佛黎著，费觉天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5月

上图藏。原著为 Enrico Ferri, *Socialismo e scienza positiva: Darwin, Spencer, Marx*, 1894（英译本有 *Socialism and Modern Science*, tran. Robert Rives La Monte, 1909），费译是译自日语版（荫田三郎译：《近世科学と社会主义（近世科学与社会主义）》，1921年版）。该书评述了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等各种学说。译者费觉天原名费秉铎，湖北省黄梅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曾是《国民》杂志社社员，1920年1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

A65　《资本的利润及资本的发生》，彭守朴译，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5月

国图藏。据译者说明称，原著为俄国出版的《马克斯学说》，但具体指何种著作不详。概为《今日》2卷4号（1922年12月）和3卷1号（1923年2月）载彭守朴译：《资本的利润》、《资本的产生》汇集而成的单行本。发行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系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无关，是《今日》杂志的胡鄂公等“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于1922年5月成立的组织（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

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85—187 页）。译者彭守朴的生平等不详，但《今日》杂志常刊登他的文章，是胡鄂公、彭岳渔等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成员。

A66 《近世社会主义论》，伊黎著，黄尊三译，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6 月

原著为 R. T. Ely, *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 1883. 但是，从书名和译者判断，汉译底本概为河上清译、田岛锦治补阅：《近世社会主义论》，法曹阁书院 1919 年翻印再版。日语版第一版刊于 1897 年，迟至 1923 年才翻译，似稍迟；但是，如此不避陈旧，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之流行。黄尊三，曾留学日本、《三十年日记》作者，关于其生平，请参阅黄尊三著，实藤惠秀、佐藤三郎译：《清国人日本留学生日记》，东方书店 1986 年版。

A67 《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编，广州丁卜图书社 1923 年 9 月

国图藏。收有三篇文章和附录，即《一、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二、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附录《社会之历史的进化》。一如书名所示，为陈独秀讲演词整理汇编而成，其中包括曾发表在 1921 年 1 月 9 日《广东群报》上的《社会主义批评——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演词》。（⑥）

A68 《妇人和社会主义》，山川菊荣著，祁森焕译，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11 月

原著为山川菊荣：《女性の反逆［妇女的反抗］》，三德社 1922 年版，以及山川菊荣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共十篇（《社会主义と妇人［社会主义与妇女］》、《妇人运动の四潮流［妇女

运动的四大潮流]》、《无产阶级の妇人运动［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等），部分论文此前经祁森焕翻译后曾在《妇女杂志》上刊登（《妇女杂志》9卷1号，1921年1月）。该书附有山川菊荣传。祁森焕还曾翻译过山川菊荣的其他论文（比如，《回教国的妇女问题》，《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4日），但其生平等不详。

A69　《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上、下，列德莱著，李季译，陶履恭校，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

近史所藏。原著为 Harry W. Laidler, *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 1920. 由第一部《社会主义之思潮》（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第二部《社会主义之运动》（国际主义的起源、各国社会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1914—1919年间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要）组成，卷末附有长达十五页的英语社会主义书籍简介。李季是作为《社会主义史》（A14）的续编翻译这部书的，1921年3月脱稿，也发了刊行预告（《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但实际出版似因故延迟。

A70　《俄国革命史》，朱枕薪编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

原著不详。《民国日报》1924年1月18日载广告称，该书全面记述了俄国革命的原因和结果。《劳农俄国之考察》（请参阅A75）也录有朱枕薪的文章（《苏维埃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似与本书内容有关。

A71　《社会主义初步》，刻尔卡普著，孙百刚译，中华书局1923年11月

人文所藏。原著为 Thomas Kirkup, *A Primer of Socialism*, 1913，但孙译极有可能译自町野并树译日语版：《社会思想の变

革［社会思想的发展］》，下出书店 1921 年版。在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请参阅 A14）摘要的基础上，充实了有关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内容，从古代经济到社会主义学说的起源、社会主义各派别（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概要，做了简要概括。译者孙百刚是日本文学翻译家，译有仓田百三原著《出家及其弟子［出家とその弟子］》（创造社 1927 年版）等。

A72 《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高劳译，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12 月

原著为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朝报社 1903 年版。这部著作曾是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到了大正民主时期后期，早已被后起的堺、高畠、山川等更高水平的研究所超过。汉译本的刊行标志着，在清末的中国曾盛极一时的幸德的名气这时仍未消逝。“高劳”即有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笔名。1907 年曾有蜀魂遥译：《社会主义神髓》出版，后来，《东方杂志》（8 卷 11 号至 9 卷 3 号，1912 年）又连载了高劳的同名译作。该书或即《东方杂志》连载的高劳译作之单行本。

A73 《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施存统等译述，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12 月

集录《东方杂志》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而成，包括 18 卷 1 号（1921 年 1 月）的范寿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マルクスの社会主义の理论的体系　其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之三］》，《社会问题研究》第 3 册，1919 年 3 月）、19 卷 11 号（1922 年 6 月）的施存统：《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位置》（原著为栉田民藏：《マルクス学に於ける唯物史观の地位》，《我等》1920 年 10 月号）等。

A74 《近代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 1923

年12月

集录了《东方杂志》刊载的七篇论文，包括 Louis Levine 著、钱智修译：《论工团主义之由来及其作用》、劳人：《新组合主义之哲学》、昔尘：《边悌之社会主义》、《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

A75　《劳农俄国之考察》，东方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

近史所藏。集录了《东方杂志》刊载的有关苏俄的如下三篇论文：朱枕薪：《苏维埃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原载《东方杂志》19卷11号）、林可彝：《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东方杂志》19卷15号）、罗罗、锡琛合编：《劳农俄国之面面观》（原载刊物不详）。

B类

B1　《两个工人谈话》，安利科马赍特斯太著，李少穆译，人民出版社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国图藏，无版本记录页。《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载广告作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刊。似译自 Enrico Malatesta, *A Talk between Two Workers.* 采问答形式，启蒙性小册子。虽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贯穿始终。译者李少穆的生平等不详。（①②）

附录三　施存统口供

这是施存统1921年12月被捕后在日本警视厅接受审讯时的口供，原题《附 警视厅に於ける施存统の陈述要领［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收录于《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2年2月）所载《施存统の追放颠末［驱逐施存统始末］》中。文中（ ）为原注，［ ］为引用者注。

附 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

一　生平

余（施存统）曾学于浙［浙］江省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第三学年中途退学，不久后入北京工读互助团，该团办事处位于北京骑河楼斗鸡坑7号。约三月后，至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旋因患肺病辞职。大正9年［1920年］7月10日来日。

来日后，一边疗病，一边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客年［1921年］春退学，专心研究社会主义。

二　与上海社会主义团体之关系

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

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所创建，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界民［黄介民］派所组织，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而余有关者乃前者。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

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

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其中，在中国内地者，长沙11名，武昌9名，济南10名，广州7名，北京5名，上海18名；国外者，日本2名，法国2名，俄国1名。在日本之学生，即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周佛海及余二人［旁点为原文所注］。

此类团体之宣传手段为报纸、杂志、通信。除社会主义大学校采通信手段外，其他多利用报纸、杂志。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之世界语学校。该校发行《自由》杂志以为宣传机关，谢晋青及余为该杂志之驻日代表。然该杂志已停刊，故现无任何关系。

禁止携入日本之《共产党》杂志，其发行地点不明，亦不知与上述共产党有无关系。余自广州共和书局订阅。

现今，留日中国学生中，除周佛海及余外，更无同志。故即使余为上海共产党之驻日代表，其目的亦非为对留学生开展工作，实为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

三　本人与中国人主义者之关系

在杭州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余曾发表论文《非孝》，排斥儒教、否认忠孝。因该文颇受中国青年欢迎，以至于为主义者所知，后得以结交同志，开始交往。其主要者为陈独秀、戴天仇［戴季陶］、李达、张国焘、俞秀松、黄璧魂（女）、李淳、周佛海、谢晋青、李人杰、杨明齐［杨明斋］、李和明、哲民［费哲

民]、李灵丹、邵力子等，余来日后仍有书信往来。就中，陈独秀、戴天仇二人乃余最崇拜者，彼等一直汇寄生活费与余。

谢晋青（警视厅指定乙类需要监视之人物，现居上海）确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罗豁、陈春培皆为无政府主义者，惟其主义与大杉荣派稍异。

黄璧魂乃三十四五岁妇女，广东省香山县议员，为上海及广州女学联合会之重要人物。据闻其夫曾在上海作公司职员，现在广东为官。

俞秀松乃余同学，于上海［北京］工读互助团及上海星期评论社皆同行止；然去年［1921 年］1 月赴莫斯科，至今未曾联系。

邵力子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主笔，余居上海时曾向《觉悟》投稿，而彼亦向余所参与之周报《星期评论》投稿，缘此多有交往。

四　与本国社会主义者之关系

迄今交往之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堺利彦、高津正道、伊井敬（近藤荣藏别号，由罗马字缩写 E. K 转讹）、宫崎龙介、山川均、高濑清等。

最初得会堺乃前年［1920 年］12 月许，李达来函与堺，询问其载于《改造》杂志文中所略者何字，余代转。时经谢晋青介绍与朝鲜人权某［概权熙国］一同访堺。

次乃去年［1921 年］2 月，李人杰托余购买其时尚未能公开出版之卖文社刊《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时，以及数月前介绍上海俄国过激派代表所派张太雷时。

与高津正道，三四月前曾于神田美土代町基督教青年会馆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晤面，但未曾过府往访。

与宫崎龙介，因其父［宫崎滔天］与戴天仇相识，经戴介绍结识其父子，时时过府拜晤。

与山川均，去岁［1921 年］9 月，同友人唐伯焜一同造访府上。后因面咨《改造》杂志所刊论文删减部分再访。最后往

访乃11月或12月初，鹿儿岛之周佛海赴上海之际；周接该地俄国过激派领袖S（似Semeshko）致山川信，然因故不得来京，托余转交。余即持该信至山川处。

时山川曰余："汝固知近来日本社会主义者多被起诉，来自伊尔库茨克之日人代表亦将遭起诉；烦请通过上海汝友将此件通知给在沪日人伊尔库茨克代表切勿回国。"该日本人姓名，当时记得，现已忘却。

五　本人与张太雷之关系

张又称张复，江苏省人，天津北洋大学中途退学，现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然非干部。

10月15日，张持时在上海之周佛海介绍信，负上海俄国过激派成员S（似Semeshko）使命来访，并嘱余介绍堺。余遂于次日同张访堺于其私宅，介绍张与堺及伊井（近藤）二人相识。时张以面额100元之朝鲜银行钞10张亲手交与堺，谓宣传费；伊井即以其中500元嘱余兑换。翌日遂至朝鲜银行分行兑换，后径赴堺处交与伊井。

时余受张100元朝鲜银行钞，用以付清拖欠房费。

同月13日，张自东京乘列车回上海，至今未接任何联系。云云。

参考文献目录

【日语】（著者、编者汉字人名拼音次序）

坂井洋史：《山鹿泰治と中国——〈たそがれ日记〉に见る日中アナキストの交流》，《猫头鹰》2 号，1983

——《五四时期の学生运动断面〈陈昌标日记〉に见る“一师风潮”》，《言语文化》26 号，1989

本庄比佐子：《上海共产主义グループの成立をめぐって》，《论集 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1981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の成立》，《最近支那年鉴（昭和 10 年版）》，东亚同文会，1935

——编《资料集成 中国共产党史》第 1 卷，时事通信社，1961

布施胜治：《ソウエート东方策》，燕尘社，1926

朝鲜总督府警保局《大正十一年 朝鲜治安状况》第 2 卷，高丽书林，1989 复刻

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法律文化社，1982

——《极东诸民族大会と中国》，《思想》790—791 号，1990

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21 年）》，《中国研究月报》496 号，1989（中文摘译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6）

村田阳一：《最初に日本へ绍介されたレーニンの文献》，《经济》72 号，1970

——《资料 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の宣言・规约（1921 年 4 月）》，劳动运动史研究会编《日本の统一战线运动》，劳动旬刊社，1976

嵯峨隆：《刘师复死后の〈民声〉について》，《法学研究》68 卷 2 号，1995

——《陈炯明支配下の新文化运动——闽南护法区を中心に》，小岛朋之、家近亮子编：《历史の中の中国政治——近代と现代》，劲草书房，1999

——等编译《中国アナキズム运动の回想》，综和社，1992

大岛清：《日本语版〈共产党宣言〉书志》，栉田民藏著、大内兵卫补修《〈共产党宣言〉の研究》，青木书店，1970

大杉荣著，飞鸟井雅道校订：《自叙传・日本脱出记》，岩波书店，1971

大塚令三：《中国共产党の成立期に就て》，《满铁支那月志》第 7 年 1 号，1930

——《支那共产党史》共 2 卷，生活社，1941

德田球一：《わが思い出》，《德田球一全集》第 5 卷，五月书房，1986

饭仓照平：《北京周报と顺天时报》，《朝日ジャーナル》1972. 4. 21

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お茶の水史学》31 号，1988

高濑清：《日本共产党创立史话》，青木书店，1978

关忠果等：《杂志〈改造〉の四十年》，光和堂，1977

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每日新闻社，1997

河上肇：《河上肇全集》共 36 卷，岩波书店，1982—1986

后藤延子：《李大钊における过渡期の思想——“物心两面の改造”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22 集，1970

——《李大钊资料拾遗、并びに觉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21 号，1987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月报》491 号，1989（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7，1990）

——《李大钊と日本文化——河上肇・大正期の杂志》，《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报告书》1990

——《李大钊とマルクス主义经济学》，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26 号，1992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选集》共 16 卷，岩波书店，1995—1997

姜德相：《吕运亨评传》第 1 卷，新干社，2002

江田宪治：《五四时期の上海劳动运动》，同朋舍，1992

——《孙文の上海机器工会における演说》，《孙文研究》14 号，1992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 5、11 卷，岩波书店，1977，1978

金原左门：《昭和への胎动》，小学馆，1988

近藤荣藏：《コムミンテルンの密使》，文化评论社，1949

堀江则雄：《极东共和国の梦》，未来社，1999

末次玲子：《五四运动と国民党势力》，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

木下义介：《上海ニ於ケル过激派一般（大正 11 年 6 月）》，内务省警保局，1922

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大正文化 1905—1927》新装版，劲草书房，1987

片冈一忠：《天津五四运动小史》，同朋舍，1982

片山政治编：《日本共产党史（战前）》，公安调查厅，1962；现代史研究会复刻版，1962

朴庆植编：《在日朝鲜人关系资料集成》第 1 卷，三一书房，1975

平记念事业会：《平贞藏の生涯》，平记念事业会，1980

平野正：《中国の知识人と民主主义思想》，研文出版，1987

青谷政明：《外国语学社（上海）ノート》，《地域综合研

究》20 卷 1 号，1992

——《赤都へ——外国语学社とその学生が辿ったロシアへの道》，鹿儿岛经济大学地域综合研究所编：《近代东アジアの诸相》，劲草书房，1995

青柳达雄：《李人杰について——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中の人物》，《国文学 言语と文艺》103 号，1988

清水安三：《支那新人と黎明运动》，大阪屋号书店，1924

——《回忆鲁迅——回想の中国人（1）》，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1 号，1968

清水贤一郎：《革命と恋爱のユートピア——胡适の“イプセン主义”と工读互助团》，《中国研究月报》573 号，1995

萩野修二《“支那通”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报》554 号，1994

——《ある“支那通”の轨迹——泽村幸夫について》，《中国文学会纪要》15 号，1994

犬丸义一：《第一次共产党史の研究 增补 日本共产党の创立》，青木书店，1993

仁木ふみ子：《震灾下の中国人虐杀》，青木书店，1993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 1 卷，劲草书房，1970

《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共 62 册，高丽书林，1989 复刻

三田刚史：《甦る河上肇——近代中国の知の源泉》，藤原书店，2003

森时彦：《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の成立》，《东方学报》（京都）52 册，1980（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3，1982）

——《中国における勤工俭学运动研究の动向》，《东洋史研究》40 卷 4 号，1982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の成立》，《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80 号，1985

砂山幸雄：《“五四”の青年像——恽代英とアナーキズ

ム》,《アジア研究》35 卷 2 号, 1989

山边健太郎:《パリ・コミューン百年と日本》,《图书》1971—8

山内昭人:《片山潜の盟友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Ⅶ)》,《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社会科学)》75 号, 1993

——《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研究——片山潜・ボリシェヴィキ・アメリカレフトウィング》ミネルヴァ书房, 1996

——《ボリシェヴィキ文献と初期社会主义——堺・高畠・山川》,《初期社会主义研究》10 号, 1997

——《日本社会主义者とコミンテルン・アムステルダム・サブビューローとの通信、1919—1920 年》,《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499 号, 2000

山泉进:《大杉荣、コミンテルンに遭遇す——(付)李增林听取书・松本爱敬关系资料》,《初期社会主义研究》15 号, 2002

山下恒夫:《薄幸の先驱者・丸山昏迷》,《思想の科学》1986. 9—12

单援朝:《上海の芥川龙之介——共产党の代表者李人杰との接触》,《日本の文学》8 集, 1990

上杉一纪:《ロシアにアメリカを建てた男》,旬报社, 1998

上田秀明:《极东共和国の兴亡》アイペックプレス, 1990

社会文库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人物研究史料(1)》,柏书房, 1964

石川祯浩:《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思想》803 号, 1991

——《东西文明论と日中の论坛》,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4

——《中国“ニセ”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の接触した中国の“共产党”》《飙风》30 号, 1994

——《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京都) 68 册, 1996

——《吉野作造と1920 年の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选集 月报》14 号, 岩波书店, 1996

——《中国“ニセ”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は生きていた》,《飙风》32 号, 1997

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庆应通信, 1959

石堂清伦:《堺利彦と〈共产党宣言〉その他》,《初期社会主义研究》10 号, 1997

水野直树:《コミンテルンと朝鲜——各大会の朝鲜代表の检讨を中心に》,《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1 号, 1984

水羽信男:《施复亮の“中间派”论とその批判をめぐって》, 今永清二编:《アジアの地域と社会》, 劲草书房, 1994

松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 青木书店, 1966

——《创立期日本共产党史のための觉书》,《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 号, 1979

——编《续・现代史资料 2 社会主义沿革》2, みすず书房, 1986

——《解说・三浦铁太郎小论》, 松尾编:《大日本主义か小日本主义か——三浦铁太郎论说集》,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5

——《民本主义と帝国主义》みすず书房, 1998

——《コスモ俱乐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26 号, 2000

孙安石:《1920 年代、上海の中朝连带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の成立、构成、活动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报》575 号, 1996

汤本国穗:《五四运动状况における戴季陶——“时代”の方向と中国の进む道》,《千叶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B—19, 1986

藤井升三:《中国革命と第一次カラハン宣言》,《アジア经

济》10卷10号，1969

藤井正：《日本社会主义同盟の历史的意义——〈大同团结〉から〈协同战线〉へ》，增岛宏编：《日本の统一战线》上，大月书店，1978

藤田正典：《中国共产党の初期全国代表大会关系文书について》，《东洋学报》45卷3号，196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の参加代表、会期について》，《近代中国》第8卷，1980

田中真人：《高畠素之——日本の国家社会主义》，现代评论社，1978

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近藤荣藏自传》比睿书房，1970

《外务省警察史》共53卷，不二出版复刻版，2001

丸山昏迷：《北京》大阪屋号书店，1921

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中国研究月报》526号，1991

丸山松幸、斋藤道彦：《李大钊文献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

味冈彻：《“中国共产党小组”をめぐる若干の问题》，《驹泽大学外国语部论集》30号，1989

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の黎明》，岩波书店，1976

——《五四运动の精神的前提——恽代英のアナキズムの时代性》，《东方学报》（京都）61册，1989（汉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民声〉解题》，《民声》原本复刻版，朋友书店，1992

——等《データでみる中国近代史》，有斐阁，1996

——编《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

本》，みすず书房，1999（汉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小关信行：《五四时期のジャーナリズム》，同朋舍，1985

小野信尔：《五四时期の理想主义——恽代英のばあい》，《东洋史研究》38 卷 2 号，1979（汉译见：李良明等编《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三一运动と五四运动》，饭沼二郎、姜在彦编：《植民地期朝鲜の社会と抵抗》，未来社，1982

——《劳工神圣の面包——民国八年秋・北京の思想状况》，《东方学报》（京都）61 册，1989（汉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五四运动前后の王光祈》，《花园大学研究纪要》22 号，1990

——《五四运动在日本》汲古书院，2003

岩村登志夫：《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党の成立》三一书房，1977

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大月书店，1958

——《〈共产党宣言〉の日本语译をめぐって》，《季刊 科学と思想》69 号，1988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の思想世界——《新青年》の群像》，岩波书店，1990

伊藤秀一：《十月革命后の数年间におけるソヴェト・中国・朝鲜勤劳者の国际主义的连带について》，《历史评论》162，163 号，1964

——《第一次カラハン宣言の异文について》，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41 号，1968

——《コミンテルンとアジア（一）——第二回大会に关する觉书（1）》，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中国史研究》6

号，1971

——《コミンテルンとアジア（一）——第二回大会に关する觉书（2）》，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47号，1971

——《バクーの东方诸民族大会について》，《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号，1972

——《20世纪のアジアとコミンテルン》，《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第5卷，同朋舍，1984

宇野重昭：《中国共产党史序说》共2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3—1974

原晖之：《ロシア革命、シベリア战争と朝鲜独立运动》，菊地昌典编：《ロシア革命论》，田畑书店，1977

——《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涉 1917—1922》，筑摩书房，1989

远山茂树等编：《山边健太郎·回想と遗文》，みすず书房，1980

斋藤道彦译：《私のマルクス主义观》，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2号，1970

——译：《物质变动と道德变动》，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5、6号，1974，1976

竹内实：《毛泽东》岩波书店，1989（汉译：黄英哲、杨宏民译《毛泽东》，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

〔杂志、报纸〕《北京周报》，《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改造》，《国民新闻》，《解放》，《劳动运动（第2次）》，《社会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时事新报》，《外事警察报》，《先驱》，《新社会》，《新社会评论》

【汉语】（著者、编者人名拼音次序）

安志洁、俞寿臧：《珍藏七十一载 重现在党的纪念日——俞秀松烈士部分日记被发现》，《上海党史》1991—7

坂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学林出版社 1997

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党史研究资料》1979—9

——《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1980—1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抱朴（秦涤清）：《赤俄游记》，《晨报副镌》，1924.8.23—9.8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 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蔡国裕：《192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中共党史》第 1 册，国史馆 1988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蔡林：《党的纪念日“七一”的由来》，《党史资料丛刊》1979—1

曹仲彬：《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近代史研究》1987—2

——《党的一大八月五日嘉兴闭幕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0—4

曹仲彬、杜君：《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王学启、张继昌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1—6

陈登贤、巫忠：《谭平山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共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 1967

陈其尤：《1919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文史资料选辑》24辑，1961

陈绍康：《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回沪时间考》，《党史研究资料》1982—11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上海党史》1990—8

——《对〈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之补证》，《党史研究资料》1991—11

陈绍康、萧斌如：《介绍〈新时代丛书〉社和〈新时代丛书〉》，《党史研究资料》1983—9

陈望道：《陈望道文集》共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90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80—3

陈小枚、齐得平：《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8—4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共2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新中华报》1941.4.27

程天放：《李公祠四年》，《传记文学》1卷7期1962

崔忠植：《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正中书局199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

——译《资本论解说》，民智书局1927

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东风出版社1974

——《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青骢出版社197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49

丁则勤：《关于张太雷去苏联的次数问题》，《北京大学学

报》1984—5

董必武：《董老的嘱咐》，《中国青年报》1956.9.15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1982—1

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党史研究资料》1979—1

范体仁：《孙中山先生在全国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7 辑，1981

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共 2 册，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方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个新闻通信社——上海“中俄（华俄）通信社”》，《上海党史研究》1992—9

仿鲁（袁振英?）：《清算陈独秀》，《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 1933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 1920

高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党史研究》1980—2

——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高兴亚：《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文史资料选辑》135 辑，1999

高一涵：《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工人日报》1957.4.27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61 辑，1979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 42 册，黄山书社 199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共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1984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关海庭、陈坡：《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若干材料》，《党

史通讯》1983—19

关山复：《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党史通讯》1984—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共2卷，中华书局1979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东大图书公司1996

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编《海丰人文资料》17，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1996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辑，文海出版社1968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何锦洲、沙东迅：《广东最初共产党组织之研究》，《学术研究》1980—4

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

后藤延子著、王青等编译：《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

胡庆云：《何谓社会主义者同盟》，《党史研究资料》1993—10

胡庆云、肖甦：《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近代史研究》1984—2

华德韩：《邵飘萍传》，杭州出版社1998

华羊：《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中共研究》10卷7期，1976

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清江文史资料》1辑，1986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共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 1980

《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 1984

江亢虎：《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 1923

姜沛南、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后》，《近代史研究》1987—2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 年的中国》，正中书局 1981

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2

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献》1997—6，1998—1

葵闻、李志春：《对〈“七一”的由来〉一文提点不同看法》《党史研究》1980—5

李达：《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1980—8

——《李达文集》共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0—1988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共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4

——《英伦航稿 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中共党史研究》1999—4

——《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6

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5

——《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民国档案》2001—3

——《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档案与史学》2002—6

——《〈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在华早期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2

李国继：《关于中共一大预定开会时间的探究》，《党的文献》1993—1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李季：《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 1932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党史研究》1980—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党史研究》1983—5

——《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与叶孟魁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2—3

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 1994

李新、陈铁健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历史研究》1979—6

——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7，8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 1 卷，东大图书公司 1997

——《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张希哲、陈三井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国史馆 1997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66

柳建辉：《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的时间问题》，《党史研究》1986—4

——《魏经斯基 1920 年 4 月到过济南吗?》，《党史研究》1986—5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新探》，《党史研究资料》1986—11

柳建辉、郑雅茹：《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吗？——与王述观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89—4

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孙中山研究论丛》6 集，1988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刘仁静：《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79—16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党史通讯》1984—8

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两个中国人》，《党史研究资料》1986—6

——《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张永奎情况简介》，《革命史资料》1986—4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刘玉珊等：《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

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 4. 21

——《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60 辑，1979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吕芳文：《陈为人传》，人民出版社 1997

罗章龙：《罗章龙谈北京团及〈先驱〉》，《青运史资料与研

究》1集，1982

——《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马贵凡：《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党史通讯》1985—11

——《赴苏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情况述略》，《中共党史通讯》1991—16

——《独欺冰雪挺苍松——俞秀松在苏联的坎坷岁月》，《中共党史研究》1999—4

马连儒：《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共4卷，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沐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裴桐：《1956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党的文献》1989—5

彭焕才：《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湘潭大学学报》1992—4

彭述之：《彭述之选集》第1卷，十月出版社1983

彭述之著、程映湘译：《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争鸣》（香港）68期，1983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3—1

齐卫平：《施存统著〈非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国春秋》1990—1

——《施复亮传》，《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1，华夏出版社1991

钱听涛：《也谈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与苏开华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3—1

——《关于张太雷如何加入中共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张太雷研究会编：《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我对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的看法》，《中共党史通讯》1994—6

——《张太雷在1921年》，《北京党史研究》1996—3

邱捷：《“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学术研究》1996—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共7卷，人民出版社1987—1996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任武雄：《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兼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成立时间》，《党史研究资料》1991—6

——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

——《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兼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3—4

——《对“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探索》，《党史研究资料》1993—6

——《建党时期的中俄通讯社和华俄通讯社》，《党史研究资料》1994—11

——《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上海党史研究》1996—3

任武雄、陈绍康：《〈共产党宣言〉陈译本出版时间补证》，《党史资料丛刊》1981—3

任止戈（任武雄）：《读史札记》，《党史研究资料》1983—7

沙健孙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 1991

——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 辑，开明出版社 1992

邵维正：《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党史研究资料》1979—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1

——《“七一”的由来》，《党史研究》1980—1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

——《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0—4

——《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1—1

舍维廖夫：《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3，1982

沈德纯、田海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人民日报》1961. 6. 30

沈海波：《任弼时首次赴苏时间考》，《中国青运》1990—4

——《中共“一大”八月一日闭幕考》，《上海党史》1990—7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 5 月解散的问题——兼论外国语学社结束的时间》，《党史研究资料》1990—8

——《外国语学社学生赴俄时间考》，《上海党史》1992—9

——《试论社会主义者同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1

沈以行等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中国青年党党史委员会 1987

沈之瑜：《“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上海滩》1988—10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丛刊》1980—1

《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文献档案选辑》，《近代史资料》1957—5

石川祯浩：《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10

——《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曾庆榴、洪小夏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华星出版社 2000

石克强（舍维廖夫）：《孙中山与远东电讯社（1920—1921）》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 1989

——《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3，1982

舒怀：《深切地怀念敬爱的董老》，《人民日报》1977.4.2

司马璐：《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自联出版社 1974

苏长聚：《关于〈陈独秀传〉（上）一书中几处史实的订正与商榷》，《中共党史通讯》1991—6

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4

——《1921 年“三月代表会议”性质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5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1928

索特尼科娃：《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4

唐宝林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唐德刚编：《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陶水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4

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 1999

田子渝：《恽代英传记》第二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汪佩伟：《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 1998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 1993

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1

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浙江学刊》1984—3

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1 编，正中书局 1965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3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 1983；王明哲：《做好革命历史文件资料的征集工作》，《党史资料通讯》1981—23

——《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一年征集工作简况》，《党史资料通讯》1982—3

王其彦：《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齐鲁学刊》1991—4

王奇生：《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6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1

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88—4

——《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1—8

王维舟：《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1 辑，1982

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王晓秋：《李大钊与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王学启、张继昌：《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3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1920—1927）》，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

王政明：《萧三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7 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伍仕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党史资料丛刊》1981—1

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合编刊：《中共“一大”资料汇编》，1979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等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百年潮》2001—7

萧劲光：《赴苏学习前后》，《革命史资料》3，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1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7.1—2

——《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北方文化》1 卷 6 号，1946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 1949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80

肖甦：《关于王尽美“名字”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1—6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 1984

谢荫明：《布尔特曼、缪勒尔与中国早期马列主义者的联系》，《光明日报》1991.6.12

谢英伯：《人海航程》，《革命人物志》19 集，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

徐万民：《伊文与伊凤阁辨》，《中共党史研究》1993—5

徐相文：《从苏俄的亚洲战略看中共“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23 期，1997

徐有礼：《五四前后中国报刊对共产国际的介绍》，《党史研究资料》1986—11

徐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薛承、封春阳：《十年来党的创立时期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1—2

薛衔天：《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机关报〈大同报〉》，《近代史研究》1991—3

——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5

杨福茂：《俞秀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0—5

杨纪元：《毛泽东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党史研究资料》1981—2

杨奎松：《李大钊与河上肇——兼谈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史研究》1985—2

——《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4

——《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4—2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4

——《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东大图书公司 1997

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杨匏安：《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杨世元：《1920 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析解》，《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6—1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党史研究资料》1979—14

叶孟魁：《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1990—5

叶明勋、黄雪邨：《追忆陈博生先生》，《传记文学》39 卷 1 期，1981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80

游人：《新俄回想录》，军学编辑局 1925

余敏玲：《苏联境内出版的中文期刊 1918—1937》，《前进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余世诚：《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另一名中国共产党人是

杨明斋》，《党史研究资料》1984—1

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6

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虞崇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江汉论坛》1986—5

曾长秋：《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几个史实的考证》，《史学月刊》1992—4

翟作君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历次代表大会介绍》，《青运史研究》1984—1 至 1985—2

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 199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明报月刊出版社 1971

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张景：《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断片》，《文史资料选辑》90 辑，1983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 1954；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 1978；张太雷：《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张西曼：《历史回忆》，济东印书社 1949

张小曼编：《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共 4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张钟、陈志莹：《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江汉论坛》1982—3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7 辑，1963

郑学稼：《中共兴亡史》共4册，帕米尔书店1984再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90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6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99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共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

——编：《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刊：《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1986

——编：《红旗飘飘》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

——《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共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共6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198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共3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刊：《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编：《白坚武日记》共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共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共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共3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4

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

历》，中华文化基金会 1988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2；《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4

——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 民国九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8

钟凤：《金侶琴——最早中译列宁著作的人》见《人物》1984—6

钟复光：《钟复光同志谈施存统（1980 年 2 月 9 日）》（未刊稿）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共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周佛海：《我的奋斗》，《古今月刊》2 期，1942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周子信：《“一大”时张太雷不是马林的翻译》，《党史研究资料》1981—12

——《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八月二日》，《革命史资料》1986—2

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新国家杂志》1 卷 8 号，1927

庄福龄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杂志、报纸】《北京大学日刊》，《晨报》，《晨钟报》，《共产党》，《广东群报》，《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建设》，《解放与改造》，《今日》，《劳动》，《劳动界》，《劳动者》，《每周评论》，《民国日报》，《民声》，《青年周刊》，《少年中

国》，《申报》，《时事新报》，《先驱》，《新潮》，《新青年》，《新中国》，《星期评论》，《益世报》，《中国青年》，《中央副刊》

【韩语】

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共5卷，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1967—1976

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北韩研究所1999

孙春日：《上海临时政府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1919年9月－1921年7月)》，《白山学报》42号，1993

【西语】

Andréas, Bert,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Histoire et Bibliographie 1848—1918*, Milano, 1963（《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历史与书目》）

Bernal, Martin,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 Y., 1976（汉译：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Bing, Dov,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China Quarterly, No. 48, 1971

——The Founding of a Comintern Bureau in the Far East, *Issues & Studies*, Vol. 8, No. 7, 1972

Cadart, Claude/ Cheng Yingxiang, *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 Paris, 1983（高达乐、程映湘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轫：彭述之的回忆》）

Carr, E. H.,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London, 1959—1961

——*1917: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6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1, Lawrence, 1971

Chapman, H. 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 London, 1928

Chen, Joseph 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Leiden, 1971（汉译：陈曾焘著、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 1981）

Comintern Archive, *1917—1940*; Congresses, microfiches, Leiden, 1994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1989

Draper, Theodore, *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57

Eudin, Xenia J. / North, Robert C.,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1957

Gouldner, Alvin W.,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1979（汉译：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Isaacs, Harold R., Documents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45, 1971（汉译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 22—31 页）Kasanin, Marc, *China in the Twenties*, Moscow, 1973Kriukov, M., The Winding Road to Alliance: Soviet Russia and Sun Yatsen (1918—1923), *Far Eastern Affairs*, 1999, No. 2—3

Lenin, N. / Trotzky, L.,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Chapters by Louis C. Fraina, New York, 1918

Luk, Y. L. Michael,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1928*, New York, 1990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67（汉译：迈斯纳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nd ed., Stanford, 1963（汉译：诺斯著，之圣译：《莫斯科与中共》，亚洲出版社 1956——初版本的翻译）

Norton, H. K.,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 London, 1923

Pantsov, Alexander,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2000

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22. Juni bis 12. Juli 1921), Hamburg, 1921（汉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1 年 6—7 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Reinsch, P. S.,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New York, 1900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Report of the Joint Legislative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Seditious Activities, filed April 24, 1920, in the Senat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ol. 2, Albany, New York, 1920

RKP (B), 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 Dokumente. Band 1. (1920—1925), Munchen, 1996

Saich, Tony,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2 vols., Leiden, 1991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1994

Scalapino, R. 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1967

Scalapino, R. A./ Yu, G. T.,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 1961

Scalapino, R. A./ Lee, Chong—sik, Communism in Korea, 2 vols. Berkeley, 1972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

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1992（汉译：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Smith, H. D.,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Cambridge, Mass., 1972

Smith, S. A.,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Richmond, 2000

Snow, Edgar P,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44（revised ed., 1968）（汉译：《斯诺文集》第 2 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 1984）

Suh, Dae—Sook, *The Korean Communist Movement: 1918—1948*, Princeton, 1967

Trotzky, L., *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 New York, 1918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91

Wales, Nym,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2

Whiting, A. S.,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Stanford, 1968

Wilbur, C. M.,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én Kung—po*, New York, 1966（汉译：陈公博著、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1976（汉译：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

Wilbur, C. M. / How, J. L.,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1989

Yeh, Wen—Hsin,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1996

【杂志】

The Clas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The Communist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The Communist (*Organ of the 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The Fortnightly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The Nation

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

The Liberator

Soviet Russia

【俄语】

Адибеков, Г. М. / 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 Н. / Шириня,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 Москва, 1997 (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1970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 Документы, T. I. (1920—1925), Москва,

1994; T. II. (1926—1927), Москва, 199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Гарушянц, Ю. М., 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их Марксистов за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1, No. 3 (加鲁尚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 载《亚非人民》)

Горбунова, С. А., 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No. 4 (戈尔布诺娃:《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 载《远东问题》; 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3, 1989)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 1921—1927*, Москва, 1975 (汉译: 达林著, 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 1920—1922 г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6 (《苏俄的远东政策》)

Ефимов, Г. В., *Сунь Ятсен Поиск пути: 1914—1922*, Москва, 1981 (叶菲莫夫:《孙逸仙——道路的探索》)

Капица, М. С., Важнейший документ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9, No. 2 (贾丕才:《苏中关系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 载《远东问题》)

Картунова, А. И., Профинтерн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Из истории 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 1 (卡尔图诺娃:《赤色工会国际与中国职工运动（相互关系史）》, 载《亚非人民》; 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0, 1992)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Китая (1920—1922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3, No. 1 (《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 载《远东问题》; 汉译见: 徐

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такт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й секции РКП（б）с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КПК：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1921—1922，*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8，No. 2（《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 1921—1922 年文献写成》，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6，1990）

——Забытый участник I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9，No. 2（《被遗忘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参加者》，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四川党史》1991—2）

Ковалев，Е. Ф. / Картунова，А. И.，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 6（科瓦廖夫、卡尔图诺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984，第 47—50 页）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Москва，1969（《共产国际与东方》）

Крюков，М. В.，*Улица Мольера，29：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полковника Попова*，Москва，2000（刘克甫：《莫利爱路 29 号：波波夫上校的秘密使命》）

Кутик，В. Н.，Н. Г. Буртман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пыт и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ПК（К 6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артии）*，Москва，1981（库季科：《布尔特曼——革命家、国际主义者》，见《中共历史的经验教训——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周年》；汉译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3）

Мамаева，Н. Л.，*Коминтерн и Гоминьдан：1919—1929*，Москва，1999（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

Мухачев，Б. И.，*Александр Краснощеков*，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9（穆哈切夫：《亚历山德·克拉斯诺晓科夫》）

Мюллер, А. А., *В пламени революции (1917—1920 гг.)*, Иркутск, 1957（缪勒尔：《在革命的烈火中》；中文节译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6，7）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ванов (Ивин),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5, No. 4（尼基福罗夫：《阿列克赛·阿列克塞维奇·伊万诺夫》，载《亚非人民》）

——Абрам Евсеевич Ходоров,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6, No. 5（《阿勃拉姆·埃布塞维奇·霍多罗夫》，载《亚非人民》）

Пак, Б, *Ким Мангым (И С Серебряков)*, Москва, 2001（鲍里斯·朴：《金万谦（谢列勃里亚科夫）传》）

Персиц, М. 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и Китай*, Москва, 1962（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

——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1, No. 4（《中国共产党形成史》，载《亚非人民》；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6，1984）

——О характере записки《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 Китае》,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3, No. 1（《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载《亚非人民》）

Сибирское бюро ЦК РКП (б), 1918—1920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ч.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8（《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1918—1920年）史料集》）

Устинов, В. М.,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8—1920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1, No. 4（乌斯季诺夫：《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载《苏共历史问题》；汉译见：《益阳师专学报》1981—2，3）

Шевелев, К. В., К датировке 1 сь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3, No. 1（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载《亚非人民》）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единого фронта в Китае 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ПК, *Китай: тради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осква, 1976 (《中国统一战线的经过史和中共成立大会》, 见《中国——传统与现代》; 汉译见: 徐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980, No. 4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载《远东问题》; 汉译见: 《"一大"前后》三, 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150—170 页)

——К 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001, No. 4 (《纪念中共创立 80 周年: 新资料》, 载《远东问题》; 汉译见: 《百年潮》 2001—12)

【杂志】 *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

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远东人民》)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革命的东方》)

后　记

本书是我这十年多研究成果积累的结晶。1988 年，我入京都大学大学院现代史专业不久，在现代史演习课上，曾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为题做过一次研究报告，那是我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最初契机。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正值高潮，能否从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发挥的影响即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呢？出于这样一个单纯的想法，我调查了几个中国社会主义文献的来源，并做了报告。虽然我曾经作为普通进修生从 1984 年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过两年中国近现代史，但是对于中共党史却始终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次演习课上的报告，也并未十分重视，只是尽一次义务而已；但报告后得到的质疑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对此，松尾尊𠮟先生（现京都橘女子大学教授）表示异议。后来，我根据松尾先生的意见和他介绍的有关文献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确如先生所言。先生的研究方向并非中国近代史，他是在研究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的交往时，注意到“渊泉”的。

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囫囵吞枣，我对此深感羞愧，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于是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的关

系，旁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这是约十年前的事，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即源于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自撰写硕士论文时就注意到，关于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共成立史，比起投入之大的研究精力，尚未弄清的问题却意外的多。幸运的是，我后来忝在学者之列，十年间，研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展到中共成立史，得以潜心研究。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近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与本书内容的对应关系开列如下：

《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第一章第二节；

《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共产党の结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版1992年，第一章第二、三、四节；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について［关于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飙风》第27号，1992年，第一章第三节；

《若き日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期の“日本小组”を论じてその建党问题におよぶ［青年时期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日本小组”兼论建党问题］》，《东洋史研究》53卷2号，1994年，第四章第三节；

《中国“ニセ”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の接触した中国の“共产党”［中国“伪”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飙风》第30号，1994年，第二章第三节；

《魏金斯基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渠道》，《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一章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宣言〉と“中共三月会议（1921年）”に关する一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三月会议（1921

年)”的考察]》，《神户大学史学年报》第14号，1999年，第二章第三节。

在本书执笔过程中，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体系性，对这些论文做了大幅度改写和订正，调整了结构，因而本书中不少地方看不出这些论文的原貌。加上这一年半左右执笔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本书约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是新近研究的成果。

从在京都大学学习时开始，我的学习条件就是非常优越的。毕业前，有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师悉心指导，有各位同窗可以互相切磋琢磨；硕士毕业后马上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录用，在这里工作的七年间，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环境，利用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料，集中精力于研究。研究所有狭间直树(现该研究所教授)、森时彦（同前)、江田宪治（现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等各位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其丰富实为日本国内之冠)，可以随时任意阅览。而研究所每周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会，也是锤炼我的好机会，它不仅是交流学术信息的宝贵场所，也是惯于追索细枝末节的我开阔眼界的启蒙学堂。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狭间直树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安心读书，别的不用管”；在他的鞭策和激励下，我得以无忧无虑地潜心于研究。

如果说松尾先生是我学习历史学的恩师，狭间先生则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学的恩师；两位先生的研究范围尽管不同，但对待史料都极其严谨，这种史学家的矜持态度使我获益匪浅，至今受用不尽。可以说，如果没有两位先生的教诲，就没有我忝列学林的今天，更不会有本书面世。还有，做助理研究员期间，我曾参加《梁启超年谱长编》集体翻译讨论组。在那里，岛田虔次先生使我得窥治学的必备素养，了解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岛田先生已于去年3月仙逝，这本书只能献在他的灵前了。

说到感谢，不能不提到1997年后供职的神户大学为我提供的研究环境。在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的七年间，虽然有时也在大学方面授课，但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此，对我来说，神户大学文学系教育和研究并行的生活，是非常清新的体验。虽然不能如做助理研究员时那样把所有时间用于研究，但是，通过备课、授课使研究成果更加成熟，则使我感到无上喜悦。各位同事，尤其是森纪子、滨田正美两位教授，不仅从不抱怨我疏于校务，还对本书的执笔给予了慷慨支持。现在的日本，对中共党史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在此，感谢耐心聆听我讲授这门课的神户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们。另外，随着研究的进展，越来越需要俄语资料，而神户大学藏有伊藤秀一先生（现日本大学教授）收集的大量俄语文献，这对我也是很幸运的事。

正如本书详细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苏俄、共产国际的远东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近年来，由于所谓莫斯科档案的解密，利用原始文件再现这些事实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这些只有参阅、参考俄语资料和俄语著作才能搞清的问题，对于几乎不懂俄语的我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弥补我这方面缺陷的，是由同好者自愿参加、1997年以来未曾间断的“早期共产国际与东亚研究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水野直树先生（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山内昭人先生（现宫崎大学教授）。水野先生立足于朝鲜纵览东亚的社会运动间的相互关系，而山内先生则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造诣高深，如果没有这两位先生“同志”般的鼓励和资料支持，就不会有本书对共产国际的探讨。研究会的另一位成员寺山恭辅先生（现东北大学副教授）是我京都大学文学系时的学友，他在俄语文献的翻译及俄文书写方面给予了我慷慨帮助。当然，翻译和书写方面若有错误，文责自然在我。

除此以外，本书在资料收集等方面还得到了众多支持，殊难一一表述。其中，对小野信尔先生（现花园大学教授）、森时彦先生、江田宪治先生尤应致以特别感谢。经小野先生指点迷津，

本书才得以利用外交史料馆藏有关施存统的资料；森先生曾致力于研究中共党史，在转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后，也经常对我提供宝贵的启发；而江田先生是现今日本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史学者，我在研究方面讨教尤多。

中共党史的许多资料在日本国内难以目睹，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中国学者的支持。有关党史的刊物发行量本来较少，流通渠道一般又较特殊（在日本自然也就难以求购），所以，时常不得不拜托中国相关地方的朋友，请其在当地查阅并邮寄。近几年，电子邮件大为普及，相互间的联系方便多了；在此之前，向中国写信以拜托邮送资料、文献，往往要占用不少研究时间。而在我需要某一方面的资料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杨奎松、唐宝林、李玉贞，上海的徐有威（东华大学）、任武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武汉的田子渝（湖北大学）等诸位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并屡屡给予我有益的建议和鼓励。

另外，在俄语资料（例如，本书中介绍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方面，除承石克强先生（M. V. Shevelev，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刘克甫先生（M. V. Kriukov，台湾淡江大学）直接惠赐外，还蒙潘佐夫先生（A. Pantsov，首府大学，美国俄亥俄州）和卡尔图诺娃女士（A. I. Kartunova，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有关共产国际资料等的宝贵指教。而本书开头介绍的李汉俊的后人、现居住伦敦的李丹阳女士（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惠寄了有关来华俄国人的研究论文（未刊稿），使我了解了不少新见解。

从以上所举姓名即可看出，本书是在国内外有共同问题意识的众多学者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正如本书反复谈到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都绝非中国一国之事，而是在世界规模的思想流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展开的。因此，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互相交流、合作才能够进行透彻的研究。在此，对上述学术研究上的“国际主义者”表示深

深的感谢。

今年（2001 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八十周年。中国在 1991 年的七十周年纪念时，曾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集；今年 7 月前后，也可能照例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据悉，还计划出版几部标志这十年间研究成果的有关学术著作。本书恰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出版，实在是一种巧合，并非有意为之。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

正如本书重点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展开，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组织上都有其复杂多样的国际契机，这也是本书不称“创建史”，而以“成立史”为题的理由。但是，中国史学界对这些国际契机至今仍缺乏关心。例如，《新青年》杂志性质改变的象征是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而其信息来源则是《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关于这一点，胡适的评断（“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虽屡屡被引用，却常常是作为胡适“反动性”的标志，而没有任何人去对照《苏维埃·俄罗斯》的实物资料求证胡适评断的原意。《共产党》杂志上译载美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也仅被当作建党时机日臻成熟的标志，至于原文出自美国、英国的怎样的共产党，以及通过何种渠道被带进中国的，则没有人查证；尽管如本书介绍的那样，只要稍稍翻阅原载杂志，连《新青年》、《共产党》杂志的图案及体裁的出自也是一目了然的。关于苏俄方面的动向，比如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也因已有汉译，中国学者全都毫不怀疑地引用，竟没有人向舒米亚茨基引以为据的俄语杂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去求证回忆录本身是否信实；而正是在信实性这一点上，如本书详述的那样，该回忆录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1949 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

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其典型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这个见解认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已经把建党提上了日程；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这种说法依据的是毫无根据的回忆。要推翻某个仅以回忆录为根据的“史实”，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回忆录的执笔过程（执笔时参考了什么资料，出于何种考虑等）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本书第四章特以较大篇幅探讨了有关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见解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就是为了拨去这些回忆录产生过程中的迷雾，以照射出这些回忆录到底有多大价值。这样做，也是我对现今中共创建史研究仍在偏重回忆录的一种回答。

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是本书提示的旨在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以考古学为例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例如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出土了具有类似特点的陶器或青铜器，此时，人们会依常识判断这两处之间曾经有过人或文化的交流。原以为是孤立的某种古代文化，因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似的遗迹，而重新认定其原属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圈，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从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发掘出遗迹时，如果新地层的遗迹比古老地层更洗练，那么，以常识来考虑，新地层的文化是继承了古老地层的文化。

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是普遍性，还拥有世界规模的共同语言，并且各种回忆录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这是因为，比较、对照已经发现的东西要相对容易，而这之前的发现、发掘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又往往是一无所获，或者出土的东西不一定反映什么继承和传播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很幸运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书库里潜心发掘十年，而发现的东西足以回报所投入的时间，则是更加幸

运。我相信，要回到当时的现场重新构建中国共产党史，这种考古学的方法，是必须的。

“文革”结束后，邵维正先生曾首开中共创建史的实证性研究。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开始其开拓性研究时情景的文章（《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里，披露了这样一件轶事。他说，激发他们发奋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台湾的一个中共党史学者 1973 年说过的一句“嘲讽”的话：“自 1921 年到今天，中共已有 52 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本书当然丝毫没有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但是，在史实考证等方面，确有不少观点与官方党史不尽一致。比如，本书根据当时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把中共的“成立”（1920 年 11 月）与“一大”分开的观点。提出这些新观点和新史实都是为了恢复历史原貌，是从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出发的，毫无政治上的考虑。

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如果说，本书于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时刊行有什么意图的话，这种意图绝不同于曾使中国学者下决心进行实证研究的台湾学者，即并非诋毁，而是通过本书颇为正规而认真的研究，给每每自我封闭的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这也是对帮助我在留学期间取得收获，并使我开眼认识中国的许多中国人的报答。因此，在本书刊行后，出版本书的汉语版将是我理应承担的又一义务。

在日本，本书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专著。考虑到日本这方面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对章节等结构做了特意安排，使每一具体事项都能够反映出中共成立史的全貌。因此，若与索引并用，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百科辞典使用。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把中共成立史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日本、欧美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来考

察；所以，不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如果关心日本近代史、欧美社会主义史的广大读者也来读这本书，并给以更多指正，我将感到无上荣幸。

最后，时下学术著作出版景气萧条，但岩波书店仍应允出版本书，泽株正始、佐藤司两位编辑也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石川祯浩

2001 年 2 月